马列毛主义者基础书单之火星派反对经济派的斗争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 编

2023

声明

本 pdf 文件由志愿者制作，内容搜集自 telegram 频道“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其频道链接是 t.me/proletarianstruggles。

编者简介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是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机关报。我党主张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本报作为全国性质的政治报，通过建立代办员网络、进行全面的政治鼓动，宣传革命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逐步做到巩固的思想一致，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群众。

斗争报将力图对一切引起关注和争论的斗争事件按马列毛主义的精神进行评论，坚决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将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当中。

联系方式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是从民族主义者、自由派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等一切资本主义政党的敌人。因此，无耻的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政客们必然会用尽各种办法攻击我们党，可以预见到阶级敌人的其中一种手段就是**表面上假扮成支持我党**的口吻，**事实上却肆意编造谣言来歪曲我党的主张**，甚至**冒充我党党员发表反动言论，把我们从未说过的话强行按在我们头上**，把我党抹黑成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赤匪或者极端“左”倾的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红卫兵，借此欺骗恐吓小资产阶级群众远离和仇视无产阶级革命派，迫使群众对我们党的纲领和主张保持一无所知的状态。有鉴于此，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预先发布下列联系方式和 GPG 公钥，以便广大群众能够直接联系我党和了解我们的立场，摆脱资产阶级的谎言。

我们的**公开群组**对所有进步群众开放，只要不发表反动言论都可以留在群内。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审查每一个加入群组的人的真实身份，不可能把警察、自由派、机会主义者等等绝对排除在公开群组以外，这些反革命分子必然潜藏在群众里伺机而动。因此，各平台的**公开群组**里鱼龙混杂，**群成员的言论仅能代表发言者个人，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代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立场**。不论在墙内还是墙外，只有我们在《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和《佳士工人声援团官网》上公布和验证过的宣传平台能够代表我们党的正式立场，除此之外，不要相信任何自称能代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骗子。

一、网站

佳士工人声援团官网

jiashigrsyt1.github.io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

proletarianstruggles.github.io

proletarianstruggles.wordpress.com

二、邮箱

佳士工人声援团联络邮箱

jiashigrsyt@protonmail.com

斗争报邮箱

douzhengbao@protonmail.com

三、Telegram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频道

https://t.me/proletarianstruggles

“声援佳士工友”群组

https://t.me/JSshengyuan

管理员电报账号

https://t.me/jsgrsyt

https://t.me/zgmzdzygcd

四、Matrix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频道

https://app.element.io/#/room/#proletarianstruggles:matrix.org

“声援佳士工友”群组

https://app.element.io/#/room/#JSshengyuan:matrix.org

管理员 Matrix 账号

https://app.element.io/#/user/@jiashigrsyt:matrix.org

https://app.element.io/#/user/@mcpc:matrix.org

五、Keybase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团队

https://keybase.io/team/douzhengbao

管理员 Keybase 账号

https://keybase.io/jiashigrsyt

六、XMPP

“声援佳士工友”群组

jsshengyuan@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

管理员 XMPP 账号

jsgrsyt@conversations.im

mcpc@yax.im

七、GPG 公钥

https://keybase.io/jiashigrsyt/pgp_keys.asc

https://proletarianstruggles.files.wordpress.com/2023/11/pgp_keys.asc

https://jiashigrsyt1.github.io/pgp_keys.asc

目录

编辑部的话[1]......1
一......6
二......13
注释：......19
略论党内意见分歧[1]......22
注释：......50
答“社会民主党人报”[1]......56
注释：......65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66
注释：......76
为《工人报》写的文章[1]......84
给编辑部的信......84
我们的纲领......86
我们的当前任务......89
迫切的问题......93
注释：......97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01
注释：......124
论《宣言书》[1]......127
注释：......135
《哈尔科夫的五月》小册子序言......137
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143
注释：......147

从何着手？[1]......148
注释：......154
新的激战......158
注释：......162
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164
注释：......170
游行示威开始了......172
注释：......174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76
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177
注释：......182
《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报告[1]......185
注释：......192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信[1]......194
注释：......202
关于游行示威[1]......204
注释：......204
新事件和旧问题......205
注释：......209
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211
注释：......215
《无产阶级斗争报》[1]......216
注释：......216

巴布石金的回忆……218
伊凡·瓦西里维契·巴布石金（简历）……218
悼伊・瓦・巴布石金……222
注释：……226
巴布石金的回忆（上）……226
注释：……277
巴布石金的回忆（下）……278
注释：……335
附录　巴布石金1901年发表在《火星报》上的通讯……336
1.1901年5月第4期……336
注释：……337
2.1901年7月第6期……338
3.1901年9月第8期……342
注释：……348
4.1901年10月第9期……348
注释：……352
5.“为捍卫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而斗争”[9]……352
注释：……371
斯大林传记，苏联《格拉纳特百科辞典》，转引自《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郑异凡，2017年10月……373

编辑部的话[1]

斯大林

（说明）载于一九〇一年九月 《斗争报》创刊号

我们这一部分格鲁吉亚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深信创办一种自由的定期刊物对于觉悟的格鲁吉亚读者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我们深信这个问题现在必须加以解决，如果再拖延下去，就只会使共同事业受到损害；我们深信每一个觉悟的读者都会欢迎这种刊物并给以各种帮助；因此，针对着这种需要，我们将竭尽全力满足读者的愿望。今天，我们办的格鲁吉亚第一个自由刊物**《斗争报》**[2]创刊号出版了。

为使读者对于我们这个刊物，同时也对于我们本身有明确的认识起见，我们要讲几句话。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波及全国每一个角落，也波及我们称之为高加索的这一个俄国的角落，而和高加索一起，我们的格鲁吉亚同样被波及了。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不久以前才产生的，它一共只有几年的历史，确切一点说，这个运动的基础是在一八九六年才奠定的。我们这里也像其他各地一样，最初时期的工作也没有超出秘密活动的范围。我们近来所看到的那种鼓动工作和广泛宣传工作，当时是无法进行的，所以只好把一切力量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小组上面。现在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已经在工人群众中间传播开来，于是工作也就超出了狭小的秘密活动的范围，而在很大一部分工人中间展开了。公开的斗争开始了。这个斗争向第一批工作者提出了许多过去还不突出、也不十分需要加以阐明的问题。首先及其尖锐地提到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什么办法来更广泛地展开斗争？口头上回答这个问题是很简单很容易的，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样。

对于有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来说，主要的手段当然是广泛地宣传和鼓吹革命思想。然而革命者现在的工作条件却是如此矛盾，如此困难，并且要求作如此重大的牺牲，以致无论宣传工作或鼓动工作，往往都不能像运动初期所需要的那样进行。

靠书本和小册子进行小组活动渐渐不可能了，这首先是由于宪警的迫害，其次也由于工作的实际要求。只要有人被捕，鼓动工作就会松懈下来，要和工人保持联系，要时常到工人那里去，就成为不可能了，然而工人对于许多迫切的问题却盼望得到解释。残酷的斗争在工人周围进行着，政府用一切力量对付工人，而工人却无法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时局，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往往只要临近某工厂遭到小小的挫折，就会使具有革命情绪的工人消沉下去，对前途失掉信心，于是领导者又得重新吸引他们来参加工作。

靠那种只能解答某些具体问题的小册子进行鼓动工作，在大多数场合，效果是很小的。因而创办一种能够解答日常问题的刊物，就成为必要的了。这个尽人皆知的真理是无须我们证明的。在格鲁吉亚工人运动中，以定期刊物作为革命工作最主要手段之一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为了供某些没有经验的读者参考起见，我们认为关于合法报纸应该讲几句话。如果工人中间有人以为合法报纸（无论这个报纸是在什么条件下出版的，也无论它的方针怎样）能代表他的利益，代表工人的利益，那末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关心”工人的政府对待合法报纸的手段是很高明的。一大群叫做书报检查员的官吏被派来专门监视这些报纸，只要有一丝真理的光芒从缝隙里透露出来，他们就用红墨水和剪刀来对付。一道一道的训令雪片似的飞到书报检查局：“不得放过任何一点有关工人的消息，不许登载某某事件，不准讨论某某问题”，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报纸是不能真正办好的，工人要想在报纸上，哪怕是从字里行间寻找一点有关工人问题的报道和正确的评价都是徒劳无益的。假使有

人认为工人可以利用某一合法报纸上面仅仅由于刽子手检查员的疏忽而放过的寥寥几行顺便涉及工人问题的文字，那末应该指出：谁要把希望寄托在这样的片言只字上面，谁要靠这些零碎消息来建立一套有系统的宣传工作的话，那就证明他是不通事理的。

再说一遍，我们之所以要讲这一点，不过是供某些没有经验的读者参考罢了。

总之，创办格鲁吉亚的自由的定期刊物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迫切需要的。现在问题只在于怎样办这个刊物，它应当以什么为指南，它应当给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一些什么。

如果从旁观者的地位一般地来看格鲁吉亚报纸的存在问题，尤其是内容和方针问题，那末也许会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自然地简单地自行解决：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运动，并不仅仅是具有自己纲领的格鲁吉亚工人运动，它和全俄的运动携手并进，因而是服从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由此可见，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应当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机关报，主要是阐明地方性的问题和反映地方性的运动。但是这样的回答却抹杀了我们所不能回避而必然要碰到的困难。我们所讲的是语文方面的困难。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有可能通过全党机关报来解释一切总的问题，而把阐明仅属地方性问题的事情交给各个地区委员会去做，然而格鲁吉亚报纸在其内容方面却处于困难的境地。格鲁吉亚报纸应同时起全党机关报的作用和区域性的、地方性的机关报的作用。由于大多数格鲁吉亚工人读者不能流畅地阅读俄文报纸，所以格鲁吉亚报纸的领导者就不能不阐明带全党性的俄文报正在讨论和必须讨论的一切问题。这样，格鲁吉亚报纸必须向读者介绍一切原则性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同时它必须领导地方上的运动，恰当地阐明每一事件，对任何事实都不能不加以解释，并且还要解答本地工人特别关心的一切问题。格鲁吉亚报纸应当把格鲁吉亚的战斗工人跟俄罗斯

的战斗工人联系起来，团结起来。它应当向读者报道本地生活、俄国生活和国外生活中一切使他们感到兴趣的事物。

我们对格鲁吉亚报纸的看法，总的说来就是如此。

现在谈谈这个报纸的内容和方针。

我们应当要求这个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战斗的工人身上。我们认为用不着多说，在俄国，而且到处一样，只有革命无产阶级才负有解放人类并为全世界谋幸福的历史使命。显然，只有工人运动才有自己的坚固根基，也只有它才没有任何荒诞无稽的空想。因而这个报纸，作为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就应当领导工人运动，给它指示道路，使它不犯错误。总之，这个报纸的首要责任是尽可能地接近工人群众，设法经常影响他们，使自己成为有意识的、领导工人群众的中心。

可是，因为在俄国今天的情况下，除工人以外，社会上还可能有其他阶层的人以“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姿态出现，并且因为这种自由是俄国战斗工人当前的目标，所以这个报纸对于任何革命运动都应该给以篇幅，哪怕这个运动是发生在工人运动范围以外的。我们说“给以篇幅”，不是仅仅顺便刊载一些报道或简讯，不，这个报纸必须特别注意其他社会阶层中间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革命运动。它必须解释每一社会现象，从而影响每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人。因此，这个报纸应该特别注意到俄国的政治形势，估计到这个形势的一切后果，而且要把必须进行政治斗争的问题尽可能提得更广泛些。

我们确信，谁也不能利用我们这些话来证明我们似乎就是要与资产阶级保持联系和实行妥协的人。对于反对现存制度的运动（哪怕这个运动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发生的）给予应有的估价，指出弱点和错误，也不会给社会民主党人涂上机会主义的污点。不过我们决不应忘记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斗争方式。如果我们以这个尺度来衡量每一个运动，我们就会避免伯恩施坦派的一切呓语。

这样，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必须对一切有关工人运动的问题经常给以明确的答覆，解释各种原则性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明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作用，并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光芒照耀工人所遇到的每一种现象。

同时，这个报纸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者，必须及时向读者报道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所持的一切策略观点。它必须向读者介绍其他各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和他们为了改善自己的地位在干什么，在怎样斗争，必须及时地号召格鲁吉亚工人起来参加斗争；同时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运动都不应不加以注意，不应不给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

我们对格鲁吉亚报纸的看法就是如此。

我们不能用依靠我们现有的力量就能全部完成这些任务的诺言来欺骗自己，又欺骗读者。要把这个报纸办好，就需要读者和同情者方面的帮助。读者会看出《斗争报》创刊号是有许多缺点的，然而只要读者能给以帮助，这些缺点是能够改正的。例如，我们可以指出地方新闻报道做得不够。我们远离故乡，没有可能注视格鲁吉亚的革命运动，没有可能及时报道和阐明这个运动中的问题。所以必须有格鲁吉亚当地人士的帮助。谁愿意在写作方面也帮助我们，那他一定会找出办法来和《斗争报》编辑部建立直接或间接联系的。

我们号召全体战斗的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亲切关怀《斗争报》的命运，对于它的出版和散发予以多方面的协助，从而把格鲁吉亚第一个自由的报纸《斗争报》变成革命斗争的工具。

注释：

[1]社会民主党的秘密报纸《斗争报》社论。

[2]《斗争报》是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列宁火星派用格鲁吉亚文秘 密出版的第一个报纸。《斗争报》的发起人是斯大林。关于创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秘密刊物的问题，格鲁吉亚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麦撒墨达西社”中革命的少数

（斯大林、克泽霍越里、楚鲁启则）从一八九八年起就进行斗争，反对该社机会主义的多数（饶尔丹尼亚等人），而《斗争报》的出版就是这一斗争的结果。《斗争报》在巴库秘密印刷所排印，这个印刷所是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革命派责成斯大林最亲近的战友克泽霍越里设立的。该报出版方面的实际工作也由克泽霍越里负责。《斗争报》上关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和策略问题的指导性论文都是斯大林写的。《斗争报》出了四期：创刊号于一九〇一年九月出版；第二、三两期的合刊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二月间出版；第四期于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出版。除《火星报》之外，《斗争报》是俄国最好的马克思主义报纸，它坚决主张南高加索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必须和全俄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紧密联系。《斗争报》也像列宁的《火星报》一样，捍 卫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宣传了社会民主党组织必须转而进行群众政治鼓动工作和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坚持了应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列宁思想。《斗争报》在反“经济派”的斗争中，论证了建立工人阶级统一的革命政党的必要，并揭露了自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者。列宁的《火星报》曾指出，《斗争报》创刊号的出版是一个极重大的事件。

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

斯大林

*〔**说明**〕载于 1901 年 11—12 月 《斗争报》第 2—3 号*

一

人类的思维只是在经历许多磨难、痛苦和变化之后，才科学地研究和论证了社会主义。西欧社会主义者只是在空想（无法实现的，不能实现的）社会主义荒野上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给自己开辟了道路，才探索和论证了社会生活的规律，从而证明了社会主义对于人类的必然性。从十九世纪初叶起，欧洲产生了许多勇

敢的、忘我的、忠诚实干的学者，他们曾力图阐明和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东西才能拯救人类，使之摆脱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而日益严重和恶化的宿疾？为了消灭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在西欧有过多次暴风雨，多次大流血，然而悲愁依旧没有消散，创作还是那样厉害，痛苦日益不堪忍受。我们应当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空想社会主义没有阐明社会生活的规律，而是脱离生活，好高骛远，其实需要的却是与现实的牢固联系。当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任何基础时，空想主义者就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当前的目标，并且依其结果讲来更可悲的是，他们（罗伯特·欧文、路易·勃朗、傅立叶，等等）期待当代有权有势的人来实现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是不难信服社会主义理想的正确性的。这个观点完全忽视了现实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群众，其实工人群众才是社会主义理想唯一天然的代表者。空想主义者是不能了解这一点的。他们想用立法和发表宣言的办法来创造人间的幸福，而不要人民（工人）本身的帮助。他们对于工人运动并没有特别注意，甚至往往否认它的意义。因此他们的理论始终是和工人群众不相干的理论，可是在工人群众中间却有一种伟大的思想完全不依赖这些理论而成熟起来，这种思想在十九世纪中叶由天才的**卡尔·马克思**宣布出来：**“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从这些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现在连“瞎子”也看得清楚的真理：要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就必须有工人的独立自主的活动，必须使工人不分民族和国家团结成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当时必须论证这个真理（这一点由马克思及其朋友恩格斯光辉地完成了）以便为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奠定牢固的基础，这个政党今天好似一个难逃的劫运笼罩着欧洲资产阶级制度，威胁着这个制度，要消灭它，要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发展的途径差不多也和在西欧一样。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也是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达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即科学的社会主义。在这里也有过社会主义者，也有过工人运动，可是两者互不相干，各行其是：社会主义者走向无法实现的空想（“土地和自由”社[1]、“民意党”[2]），而工人运动则走向自发的骚动。两者在同一时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活动，可是互不相识。社会主义者在劳动人民中间没有基础，因而他们的活动是脱离实际的，没有根基的。工人则没有领导者，没有组织者，因而他们的运动流为混乱的骚动。这就是社会主义者争取社会主义的英勇斗争没有结果和他们非凡的勇敢精神在专制制度的坚壁上碰得粉碎的主要原因。俄国社会主义者直到九十年代初才和工人群众接近起来。当时他们看到，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救星，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俄国社会民主党随即把自己的努力和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当时俄国工人中间所发生的运动上面。觉悟还不高的和对斗争还没有准备的俄国工人，力求逐渐摆脱自己的绝望境地，总想设法改善自己的命运。自然，当时在这个运动中有条理的组织工作是没有的，运动是自发的。

社会民主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着手领导这个不自觉的、自发的和无组织的运动。它竭力提高工人的觉悟，竭力把成批的工人各自反对其业主的互不配合的分散的斗争统一起来，融合成总的阶级斗争，使这个斗争成为俄国工人**阶级**反对俄国压迫者阶级的斗争，并竭力使这个斗争具有组织性。

最初一个时期，社会民主党不能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开展自己的活动，因而只安于宣传鼓动小组的工作。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唯一工作方式就是小组活动。这些小组的目的是要从工人中间造就出一批将来能领导运动的人才。因此这些小组是由先进工人组成的，也只有优秀的工人才有机会在这些小组里学习。

但是，小组活动时期很快就过去了。社会民主党不久便觉得必须走出狭隘的小组圈子，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广大工人群众中去。外部的条件也促进了这一点。

这时工人中间的自发运动特别高涨。你们谁不记得几乎整个梯弗利斯都被这种自发运动所席卷的那一年呢？各烟草工厂和铁路工厂中无组织的罢工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发生在 1897—1898 年，在俄罗斯则稍微早一些。当时必须及时给以帮助，而社会民主党也就赶紧去帮助了。要求缩短工作日、废除罚款、提高工资等等的斗争开始了。社会民主党清清楚楚地知道，工人运动的发展不能局限于这些琐碎的要求，这些要求并不是运动的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尽管这些要求是琐碎的，尽管各个城市和地区的工人今天还是各自分散地进行斗争，但这个斗争本身将教会工人，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整个工人阶级结成统一的、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冲击他们的敌人时，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这个斗争也将向工人表明，他们除了自己的直接敌人资本家而外，还有另一个更警觉的敌人，这就是整个资产阶级有组织的力量，即拥有军队、法庭、警察、监狱和宪兵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既然西欧的工人要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任何最小尝试都会碰到资产阶级政权的压制，既然在已经争得人权的西欧，工人也得与政府当局进行直接的斗争，那么俄国工人在自己的运动中就一定更会和专制政权发生冲突，这个政权之所以是任何工人运动的警觉的敌人，不仅因为它保卫资本家，而且因为它既是**专制政权**，就不能容忍各个社会阶级的独立自主活动，特别是不能容忍比其他阶级更受压迫更受践踏的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活动。俄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理解运动的进程，并尽全力在工人中间传播这些思想的。它的力量就在于此，它一开始便有伟大的和胜利的发展，其原因就在于此。1896 年彼得堡各纺织工厂工人的大罢工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最初一些胜利竟使某些不坚强的人失去了理智，冲昏了头脑。从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注意到最终目的，并为这个目的所眩惑而完全忽视或者否认在他们眼前展开的现实的工人运动；而某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则恰好相反，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只放在自发的工人运动及其日常需要方面。当时（五年以前）俄

国工人的阶级觉悟是很低的。俄国工人还刚刚从百年大梦中觉醒过来，他们的眼睛习惯于黑暗，当然看不到第一次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他们没有什么大的需要，他们的要求也不高。俄国工人还只是要求稍微增加工资或缩短工作时间而已。至于必须改变现存制度、必须消灭私有制、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一切，俄国工人群众是一点概念也没有的。他们也不大敢想到结束全俄人民在专制政权下所过的苟延残喘的奴隶生活，不大敢想到人民的自由和人民参加管理国家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俄国主党的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另一部分人却醉心于经济斗争，醉心于局部地改善工人状况的斗争（例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甘愿把自己的伟大职责、自己的伟大理想完全忘掉。

这后一部分人也象他们西欧的同道者（所谓伯恩施坦派）一样地说："对我们来说，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注：爱·伯恩施坦的这一修正主义公式，最早是在他 1898 年 1 月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来的。）工人阶级究竟为了什么进行斗争，他们根本不去过问，只要有斗争就行了。于是所谓舍本逐末的政策就盛行起来了。结果有一天彼得堡《工人思想报》[3]竟然宣称："我们的政治纲领就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恢复六月二日法令[4]所废除的节日。"（!!!）（作者注：必须指出，最近彼得堡"斗争协会"及其报纸编辑部已抛弃了自己原先那个纯经济的方针，竭力把政治斗争的思想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去。）

这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去领导自发运动，不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灌输到群众中去，不把群众引向我们的最终目的，反而成了运动本身的盲目工具；他们盲目地跟着一部分不够开展的工人走，只限于表达当时工人群众所意识到的那些需要和要求。一句话，他们是站在那里敲着敞开的大门，不敢走进屋子里面去。他们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明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甚至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

明当前的目标是推翻专制制度，更可悲的是他们认为这一切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他们把俄国工人看成了小孩子，唯恐这种大胆的思想吓坏了俄国工人。不仅如此，依照社会民主党某些人的看法，实现社会主义并不需要任何革命斗争，所需要的只是经济斗争，只要有罢工和工会、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社会主义就算成功了。他们认为老的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学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些人说，当政权尚未转入无产阶级手中（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改变现存制度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彻底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其实它和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区别。譬如，据他们说，把社会主义纳入现存制度并不困难，每一个工会，甚至每一个消费合作社零售处或生产合作社，都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了。他们就想用这种补缀旧衣的荒唐办法来给受苦受难的人类缝制新衣！但最令人痛心而且为革命者所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这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西欧的老师（伯恩施坦及其同伙）的学说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居然恬不知耻地宣称：政治自由（即罢工、结社、言论等等自由）和沙皇制度是可以相容的，因而特别的政治斗争，即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单是经济斗争就足以达到目的，只要不顾政府禁令，更频繁地举行罢工，政府就会疲于惩治罢工者，罢工和集会的自由也就自然而然地到来。

可见这些假“社会民主党人”要想证明的是：俄国工人只应当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精力用在经济斗争上，而不应当追求各种“远大的理想”。在实践上他们的行动表明了，他们认为自己的天职仅仅是在某个城市里进行**地方**工作。他们对于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丝毫不感兴趣，反而认为组织政党是一种滑稽可笑的儿戏，会妨碍他们履行自己的直接“天职”——进行经济斗争。罢工、再罢工和为战斗基金募集几文钱，——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

你们一定会以为，他们既然这样缩小了自己的任务，既然抛弃了社会民主主义，那么这些自发“运动”的崇拜者至少可以给这个运动做出许多成绩来。然而

就在这点上我们也被欺骗了。彼得堡运动的历史使我们确信这一点。起初，在1895—1897 年间，运动有过辉煌的发展和勇敢的迈进，以后就变为盲目的徘徊，最后竟至停滞不前。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经济派”为了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坚固组织的全部努力，必然会碰到政府当局的坚壁，而且总是碰得粉碎。警察的残酷迫害使得任何经济组织都无法存在。罢工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一百次罢工总有九十九次被警察的高压手段所扼杀，工人们被无情地赶出彼得堡，牢狱的墙壁和西伯利亚的严寒残忍地消磨着他们的革命精力。我们深信，运动之所以会这样停滞（当然是相对的停滞），不能只归咎于外部的条件，即警察的迫害，也要归咎于思想本身，即阶级意识发展方面的停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革命精力的减弱。

由于俄国工人在进行斗争时所打的旗帜仍然是一块写着争取一戈比的经济斗争口号的陈旧褪色的破布，他们就不能随着运动的发展深刻地了解斗争的崇高目的和内容，所以工人们也就不免以较少的精力、较小的兴趣、较低的革命热情来参加这个斗争，因为伟大的精力只是为了伟大的目的而产生的。

而且，要不是我国实际生活条件日益有力地推动俄国工人去进行直接的政治斗争，上述情况对运动造成的危害是会更大的。当时，哪怕一次小小的普通罢工，也向工人正面提出我们在政治上毫无权利这个问题，使他们与政权和武装力量发生冲突，并且清清楚楚地证明单靠经济斗争是不够的。所以和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的愿望相违背，斗争一天比一天更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觉醒了的俄国工人对于今天压得他们呻吟叫苦的经济和政治现状公开表示不满的每一尝试，他们想摆脱压迫的每一尝试，都能推动工人举行经济斗争色彩日益减少的游行。俄国的五一节为政治斗争和政治游行示威开辟了道路。于是俄国工人在自己原来的唯一斗争手段——罢工以外，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强有力的手段，即 1900 年规模巨大的哈尔科夫五一游行时第一次试用过的政治游行示威。

这样，俄国工人运动由于自己内部的发展，便从小组宣传和利用罢工进行经济斗争逐渐转上**政治斗争**和**政治鼓动**的道路了。

当工人阶级看见俄国其他社会阶级的人抱着争取政治自由的坚定决心登上斗争舞台时，这个转变就显著地加速了。

二

在沙皇制度压迫下呻吟叫苦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专制制度沉重的魔掌也窒息着其他的社会阶级。呻吟叫苦的有因经常挨饿而浮肿的俄国农民，他们被苛捐杂税的重担弄得贫困不堪，他们受商人、资产者和“高贵的”地主任意宰割。呻吟叫苦的有小市民，国家机关和私人机构的小职员，小官吏，总之，就是人数众多的城市平民，他们的生活也和工人阶级的生活一样没有保障，他们有理由不满意自己的社会地位。呻吟叫苦的有不能容忍沙皇鞭笞政策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乃至中等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受过教育的人，即所谓自由职业者（教员、医生、律师、大学生和一般学生）。呻吟叫苦的有俄国境内被压迫的各民族和异教徒，其中包括那些被逐出乡土而其神圣情感蒙受伤害的波兰人和芬兰人，历史赋予他们的权利和自由都被专制制度蛮横地践踏了。呻吟叫苦的有经常受迫害受侮辱的犹太人，他们甚至被剥夺了其他俄国臣民所享有的微不足道的权利，即随处居住的权利、就学的权利、供职的权利等等。呻吟叫苦的有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他们被剥夺了开办本族学校的权利、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权利，他们不得不服从专制政权所疯狂推行的可耻的、压迫少数民族的俄罗斯化政策。呻吟叫苦的有俄国千百万教派信徒，他们不愿依照东正教神父的意旨而想本着自己的良心来信奉宗教。呻吟叫苦的还有……但一切受俄国专制制度压迫摧残的人是举不胜举的。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多，要是他们都懂得这一点并且知道谁是他们的共同敌人，那么俄国的专制政权是一天也不能存在的。可惜俄国农民还

处于数百年来由奴役、贫穷和无知所造成的闭塞状态，他们现在还刚刚在觉醒，还不知道谁是他们的敌人。俄国各被压迫民族，在不仅有俄国政府反对他们，甚至还有俄罗斯人民由于尚未认识专制制度是全国人民的公敌而同样也反对他们的时候，他们简直不敢想象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剩下的就是工人阶级、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中受过教育的人。

但是，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资产阶级都极善于攫取并非由自己的胜利所得来的果实，都极善于假他人之手火中取栗。他们从来也不愿意在与强敌斗争中，在暂时还不大容易获得胜利的斗争中，拿自己的较有特权的地位去冒险。尽管他们不满意，但他们毕竟生活得不坏，因此他们乐意把受哥萨克鞭打、被士兵枪杀、在街垒中搏斗等等权利让给工人阶级和一般平民。他们自己只是“同情”斗争，至多也不过是对残暴的敌人那种镇压人民运动的残酷行为表示（在心里）“愤慨”罢了。他们是害怕革命行动的，只有在斗争的最后几分钟，当看清敌人没有力量的时候，他们自己才转而采取革命的办法。这一点是历史经验教给我们的……只有在斗争中除了自己的锁链而外别无可失的工人阶级和一般平民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尽管俄国的经验还很贫乏，却也证明了一切革命运动的历史所教给我们的这个人人皆知的道理。

特权阶层中，只有一部分大学生表明决心要为实现自己的要求斗争到底。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这部分大学生也是那些受压迫的公民的子弟，并且大学生都是在校的青年，当他们还没有投身于人生大海，还没有在那里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时候，他们比任何人都热心地追求那号召他们为自由而斗争的理想。

不管怎样，现在大学生几乎是以首领、以先进部队的姿态出现于“社会人士”的运动中。社会各阶级中不满意的人，今天都聚集在他们周围。起初，大学生试图使用从工人那里模仿来的罢工手段进行斗争。可是，在政府对他们的罢课报之

以野蛮的法令（《暂行条例》[5]），规定把参加罢课的大学生征去当兵的时候，大学生就只剩下了一种斗争手段，即向俄国社会求援，并由罢课转向**街头游行示威**。

大学生也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没有放下武器，反而斗争得更英勇更坚决了。被压迫的公民聚集在他们周围，工人阶级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于是运动就变成了威胁政权的强大运动。俄国政府使用大批军警和宪兵来对不驯顺的公民进行残酷而毫无结果的斗争已经有两年之久了。

最近几天的事件显示，政治游行示威是不会失败的。12 月初在哈尔科夫、莫斯科、下新城、里加等等城市发生的事件表明，目前公众的不满已经是有意识地表现出来了，这些不满的公众已有决心从沉默的抗议转向革命的行动了。然而大学生所提出的要求，即学习自由和大学内部生活的自由，对于广阔的社会运动来说是太狭隘了。要把所有参加这个运动的人联合起来，就需要一面旗帜，一面为大家所了解而感到亲切的、能体现一切要求的旗帜。**这样的旗帜就是推翻专制制度**。只有摧毁专制制度，才能建立起依靠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并保障学习、罢工、言论、宗教、民族及其他等等**自由**的社会制度。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给人民以自卫手段，使他们不受各种压迫者、商人、资本家、僧侣、贵族的迫害；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开辟出一条自由的道路，使人们走向美好的未来，并能自由地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

当然，大学生只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进行这个巨大的斗争的，他们软弱无力的手臂擎不住这面沉重的旗帜。要擎得住这面旗帜，就需要更强有力的手臂，而在当前的条件下，只有工人群众联合的力量才是这样的力量。因此俄国工人阶级必须把全国旗帜从大学生软弱的手中接过来，在上面写上“打倒专制制度！民主宪法万岁！”去引导俄国人民走向自由。对于大学生呢，我们应当感谢他们给我们上了这一课：他们让人看到了政治游行示威在革命斗争中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街头游行示威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可以很快地把大批的居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使他们立刻知道我们的要求，并且造成广阔的肥沃土壤，使我们能够大胆撒播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由的种子。街头游行示威可以造成街头鼓动，使社会上一部分落后的怯懦的人不能不受到它的影响。（作者注：秘密的书籍和鼓动传单，在俄国目前条件下，很难传到每个居民手中。虽然散发秘密书刊收效很大，但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些书刊只能散发到一小部分居民中间。）在游行示威的时候，任何人只要走到街上，就能看见勇敢的战士，就能明白他们是为了什么而斗争，就能听到号召大家起来斗争的自由演说，就能听到揭露现存制度和暴露我国社会疮痍的战斗歌曲。因此，政府当局最害怕街头游行示威。所以它恐吓大家：不但要严惩示威者，而且要严惩"好奇者"。在人民的这种好奇心中间，隐藏着对政府当局的主要危险：今天的一个"好奇者"，明天就会作为一个示威者把一批批新的"好奇者"集合到自己的周围。而这样的"好奇者"今天在每个大城市里都是数以万计的。今天俄国居民再也不象过去那样，一听到什么地方发生骚动就躲藏起来（从前他们总是说："说不定就会出乱子，可别把我也牵连进去，还是走开为妙。"），今天他们却赶忙到发生骚动的地方去，"好奇地打听"：究竟这种骚动是为什么发生的，这样多的人究竟为了什么要去挨哥萨克的鞭打。

在这种条件下，"好奇者"再不会漠不关心地听着皮鞭和马刀的挥舞声了。"好奇者"看到，示威者集合在街头是为了诉说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而政府当局却用毒打和残酷镇压来回答他们。"好奇者"不惟不逃避皮鞭的挥舞声，反而要挤上前去，可是皮鞭再也分辨不出：究竟哪里是普通的"好奇者"，哪里是"暴徒"。这时皮鞭遵照着"完全民主平等"的原则，不分性别、年龄甚至阶层地位而任意乱打这两类人的脊背。皮鞭就这样帮我们的大忙，加速"好奇者"的革命化。皮鞭就从震慑人们的武器变成唤醒人们的武器。

因此，尽管街头游行示威还不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效果，尽管示威者的力量今天还很薄弱，不足以迫使政府立刻对人民的要求让步，可是今天我们在街头游行示威中所蒙受的牺牲，将来会换得百倍的补偿。在斗争中牺牲的或我们阵营中被抓去的每一个战士，都会唤起成百成千的新战士。暂时我们在街头还不止一次要挨打，政府在街头搏斗中也还不止一次要成为胜利者。但这将是“皮洛士式的胜利”[6]。再来几次这样的胜利，专制制度的失败就必不可免了。专制制度以今天的胜利给自己准备未来的失败。我们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这一天已为时不远，我们要冒着皮鞭的毒打去播下政治鼓动和社会主义的种子。

政府也不亚于我们，它深知街头鼓动对于它是死刑的判决；只要再过两三年，**人民革命**的幽灵就会出现在它的面前。前几天，政府通过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省长宣布：它“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手段来消灭街头游行示威的最小尝试”。显然，这个声明带着子弹气味，可能还带着炮弹气味，但我们认为子弹是一种比皮鞭更能激起人们不满情绪的工具。我们并不认为，政府采取这种“极端手段”就能长期制止政治鼓动，从而阻碍它的开展。我们希望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也能使自己的鼓动工作适应因政府采取这种“极端手段”而造成的新情况。无论如何，社会民主党应当警惕地注视事变，应当迅速利用这些事变的教训，并且善于使自己的行动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

但是，为了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就必须有一个强大而紧密团结的组织，即**党的组织**，它将不仅按名称来说是团结的，而且按自己的基本原则和策略观点来说也是团结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以坚定的原则和不可摧毁的秘密活动武装起来的强大政党。

社会民主党应当利用已经开始的新的街头运动，**应当把俄国民主主义的旗帜拿到自己手里并把俄国民主主义引向大家所盼望的胜利！**

这样，在我们面前就开始了一个**以政治斗争为主**的时期。这种斗争对于我们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现存的政治条件下，经济斗争（罢工）是不能得到什么重大结果的。罢工在自由国家里也是一种有利也有害的武器：甚至在那里，工人虽然有各种斗争手段，即政治自由、坚强的工会组织和富足的基金会，但罢工往往还是以工人的失败而告终。至于我们这里，罢工却是一种要遭受逮捕和武力镇压的罪行，任何工会组织都要受禁止，因此我们这里的罢工只有抗议的作用了。可是就抗议而言，游行示威却是更有力的武器。在罢工期间，工人的力量是分散的，参加罢工的只有一个厂或几个厂的工人，至多只有某一种行业的工人；举行总罢工甚至在西欧也是非常困难的，而我们这里则完全不可能，但是在街头游行示威中，工人却能立刻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

由此可见，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对于问题的看法是多么狭隘，他们竟想把工人运动局限在经济斗争和各种经济组织的范围里，把政治斗争让给"知识界"、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去进行，而只让工人充当**配角**。历史教导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就只好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常常乐于利用工人壮健的手臂，但当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就把胜利的果实据为己有，使工人一无所得。如果我们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那么工人从这个斗争中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至于大学生和社会人士中的其他抗议者，其实他们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只要给他们一个能赋予人民些微权利的无伤大体的"残缺不全的宪法"，就足以使这些抗议者唱起另一种调子来颂扬"新"制度了。资产阶级时时刻刻惧怕共产主义的"赤色幽灵"，在一切革命中他们总是当事情刚刚开始时就力图把它结束。被工人吓坏了的资产阶级只要得到一点点于自己有利的让步，就向政府伸出调和的手，无耻地出卖自由事业。（作者注：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指那些已经背弃了自己的阶级而参加到社会民主党队伍中作斗争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是例外，他们是"白色的乌鸦"。）

只有工人阶级才是真正民主主义可靠的砥柱。只有工人阶级才不会由于获得某种让步而和专制制度妥协，才不会因为人家弹奏宪政琵琶、唱起甜蜜调子便麻痹起来。

因此，工人阶级是能够站在整个民主主义运动的前头，还是作为“知识界”即资产阶级的配角去做运动的尾巴，这对于俄国民主主义事业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在前一场合下，由于推翻专制制度，就会有一个广泛的**民主宪法**，这个宪法给工人、受压迫的农民和资本家以平等权利。在后一场合下，我们就只会得到一个“残缺不全的宪法”，这个宪法在践踏工人的要求、只给**人民**一种自由的幻影方面，将不亚于专制制度。

但是，为了能起领导作用，工人阶级就必须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那时工人阶级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就不会害怕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社会人士”的任何叛变和出卖行为了。当这些“社会人士”一旦背叛了民主主义事业时，工人阶级就会用自己的力量引导这个事业前进；而这个独立的政党将给工人阶级以担当这种事业所必需的力量。

注释：

[1]注：土地和自由社，是秘密的民粹派组织，1876 年在彼得堡建立，最初称为北方革命民粹主义社，1878 年改用此名，主要成员有亚·德·米哈伊洛夫、格·瓦·普列汉诺夫、谢·米·克拉夫钦斯基、奥·瓦·阿普捷克曼等。土地和自由社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主张通过暴力推翻沙皇政府，取得土地和自由。但它错误地认为：俄国能够走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农民村社是这条道路的基础；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只靠农民就可以推翻沙皇政府。由于农民不了解他们的宣传，没有跟他们走，同时政府又对革命者加紧迫害，该社一部分成员主张采取暗杀手段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土地和自由社因此发生了分歧，形成了两派，一派（安·伊·热里雅鲍夫等人）主张采取恐怖手段，另

一派（以普列汉诺夫为首）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两派于 1879 年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

[2]注：民意党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俄国革命民粹派的组织，在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于 1879 年 8 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彼罗夫斯卡娅等。民意党人主张同专制制度进行政治斗争，他们的纲领包括有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和集会自由，实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他们仍然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者，没有摆脱民粹派的基本思想，相信俄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通过农民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民意党人从“英雄”和“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 1881 年 3 月 1 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此后不久，民意党在沙皇政府打击下趋于瓦解。

[3] 注:《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яМълслъ》)是俄国经济派的机关报，由弗·巴·伊万申、康·米·塔赫塔廖夫等编辑。1897 年 10 月—1902 年 12 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十六号。列宁在《怎么办？》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指出它的观点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

[4]注：指 1897 年 6 月 2 日（公历 14 日）俄国沙皇政府颁布的关于缩短工厂工作日的法令。这个法令是在 1895—1896 年彼得堡工人群众罢工的压力下通过的。它规定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日班为十一个半小时，夜班为十小时（在这以前，工作日没有限制，甚至达到十四五个小时)，但同时规定节假日一年为六十六天（比习惯上的节假日约减少了四分之一)。

[5]注：指 1899 年 7 月 29 日（公历 8 月 10 日）俄国沙皇政府批准的《因聚众滋事而被开除的高等学校学生服兵役的暂行条例》。这个条例规定，凡参加集体行动反对高等学校的警察制度的学生，一律开除学籍并罚当兵一至三年。

[6]注：皮洛士——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公元前 280 年入意大利同罗马作战，两次获捷，但损失惨重。他曾说："如果再取得这样一次胜利，谁也不能跟我回到伊庇鲁斯去了。""皮洛士式的胜利"表示代价特大、得不偿失的意思。

略论党内意见分歧[1]

斯大林

〔说明〕1905 年 5 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印成小册子出版

“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卡尔·考茨基

我们的“孟什维克”真是太讨厌了！我说的是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他们一听说党内有分歧意见，就喋喋不休地说：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谈论意见分歧，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们反正总是要骂“布尔什维克”！于是他们就拚命地骂，好象发了疯一样。在一切十字路口，在自己人或外人中间，总而言之，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叫嚷着老一套：要提防“多数派”，这不是自己人，这是靠不住的人！单在“通常的”活动场所叫骂，他们还嫌不够，还把“事件”搬到合法刊物上去，从而再次向世人表明自己……惹人讨厌。

“多数派”究竟有什么过错呢？我们的“少数派”为什么要这样“生气”呢？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吧。

“多数派”和“少数派”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 年）[2]上开始产生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分散的力量应当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党。我们这些党的工作者对这次代表大会曾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当时欢呼：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们就要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了，我们就有可能按照统一的计划活动了！……固然，在此以前我们也活动过，但我们过去的活动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固然，在此以前我们也曾企图统一起来，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898 年）[3]，甚至似乎是“统一起来了”，可是这种统一只在口头上存在：党仍然分散为一些单个的集团，力量仍然是分散而需要统一的。所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是把分散的力量集合起来，并把它们团结成一个整体。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统一的党。

但事实证明，我们当时的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是过早了。这次代表大会并没有能够使我们团结成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党，它只是为这样一个党奠定了基础。然而代表大会却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火星报》（指旧《火星报》）[4]的路线，一条是《火星报》反对者的路线。因此代表大会就分成两部分，即“多数派”和“少数派”。前者拥护《火星报》路线，并团结在《火星报》周围；后者则反对《火星报》而采取相反的立场。

这样，《火星报》就成了党内“多数派”的旗帜，而《火星报》的立场就成了“多数派”的立场。

《火星报》走的是什么道路呢？它所维护的是什么呢？

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知道它是在什么条件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火星报》创刊于 1900 年 12 月。这是俄国工业开始发生危机的时候。伴随有一系列同业罢工（1896—1898 年）的工业繁荣，渐渐为危机代替了。危机一天天尖锐起来，而且成了同业罢工的障碍。虽然如此，工人运动还是为自己开辟道路，并向前发展：许多细流汇成一条洪流，运动日益带有阶级色彩，渐渐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工人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了……不过当时还看先进部队，还看不见能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赋予无产阶级斗争以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民主党（作者注：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其中包括一切社会民主主义的战士，不论他是工人或是知识分子。）。

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被称为“经济派”）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竭力赞扬自发运动，漫不经心地重复说：工人运动并不怎样需要社会主义意识，没有这种意识它也能很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问题的实质在于运动本身。运动就是一切，而意识却是微不足道的。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这就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既然如此，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呢？他们断定说：它应该是自发运动的驯服的工具。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不是我们的事情，领导这个运动也不是我们的事情，——这只是徒劳无益的强制；我们的义务只是倾听这个运动的声息并准确地记录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做自发运动的尾巴。[5]一句话，社会民主党被描绘成运动中的累赘。

谁不承认社会民主主义，谁也就不应该承认社会民主党。正因为如此，“经济派”才这样固执己见，再三断言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说：让自由派去从事政治斗争吧，这种事情是比较合乎自由派的身分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干些什么呢？我们应该照旧以单个的小组形式存在，各小组在自己的圈子里单独活动。

需要的不是党而是小组！——他们说。

这样，一方面，工人运动发展起来了，它需要一个先进的领导的队伍；另一方面，以“经济派”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不但不去领导运动，反而否认自己的作用，做了运动的尾巴。

当时必须大声疾呼地说明一个思想：没有社会主义的自发工人运动就是在黑暗中摸索，即使有一天能摸索到目的地，但谁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并且要受多少痛苦，所以社会主义意识对于工人运动是极大意义的。

同时还必须说明，这种意识的体现者社会民主党应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应该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而不要冷眼旁观，做自发工人运动的尾巴。

同时还必须说明一个思想：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责任是把无产阶级各个先进队伍集合起来，把它们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从而永远结束党内的分散状态。

《火星报》着手规定的正是这些任务。

请看它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见《火星报》创刊号）[6]中是怎样说的："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这就是说，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或站在工人运动外面的社会主义，都是社会民主党应该反对的一种不良现象。可是，因为"经济派—工人事业派"崇拜自发运动，因为他们轻视社会主义的意义，所以《火星报》指出："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变得烦琐，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此，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是"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保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

俄国社会民主党负有什么责任呢？《火星报》继续写道："由此自然产生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这就是说，它应该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它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

《火星报》编辑部[7]就是这样论证它的纲领的。

《火星报》是否实现了这个出色的纲领呢？

大家都知道它是怎样努力实现这些极重要的思想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向我们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代表大会以三十五票的多数承认《火星报》为全党的中央机关报。

既然如此，那么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要"谩骂"旧《火星报》，难道不是很可笑的吗？

请看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对《火星报》所发的议论吧：

"它〈《火星报》〉（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斯大林加的。）本应当分析'经济主义'的思想，摈斥谬误的观点，采取正确的观点，并把'经济主义'纳入新的轨道……可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引起了另一个极端，即轻视经济斗争，对它采取鄙弃的态度，只承认政治斗争有首

要的意义。不经济的〈应该说："没有经济的"〉政治，——这就是新的方向。"（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一文）

但是，可敬的"批评家"，这一切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国家发生的呢？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和斯塔罗维尔做了些什么？他们既然在编辑部中占多数，为什么不把《火星报》引上"真理"之路呢？最可敬的"批评家"，在这以前你自己究竟干什么去了？你为什么没有警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是警告了的话，那它就不会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了。

但是，我们且把"批评家"撇开吧。

事情是这样的：《火星报》正确地看出了"迫切的问题"，正是走上了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条道路，并且努力地执行了自己的纲领。

列宁在他卓越的著作《怎么办？》一书中更明确、更令人信服地表明了《火星报》的立场。

我们就来谈谈这本书吧。

"经济派"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但谁不知道自发运动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 28 页），而工联主义是不愿看见资本主义范围以外的任何东西的。谁不知道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在资本主义圈子里踏步不前，在私有制周围徘徊，即使有一天能达到社会革命，但谁知道要在什么时候并且要受多少痛苦才能达到。工人们是在最近时期还是经过一个长时期、是经过容易的道路还是经过困难的道路才能踏上"乐土"，这些问题对于他们难道都是无所谓的吗？显然，谁赞扬自发运动并崇拜自发运动，谁就不由自主地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挖掘鸿沟，谁就轻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意义，谁就把这个思想体系逐出实际生活之外，并且不由自主地使工人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因为他不了解"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

合”（作者注：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央委员会版第 94 页。），不了解“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都是——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 26 页）

我们来比较详细地说明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能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在于前者，即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较后者要老得多，传播的范围要广得多，在生活中扎下的根要深得多，无论在自己人中间或外人中间，到处都可以碰到资产阶级的观点，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则刚刚开始走了几步，刚刚给自己开辟道路。不用说，如果就思想的传播来讲，那么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即工联主义的意识，比刚刚走了几步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传播起来要容易得多，对于自发工人运动的影响也要广泛得多。这一点之所以正确，尤其是因为自发运动——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本来“就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 28 页）。而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就是排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因为这两种思想体系是互相否定的。

有人会问我们：怎么？难道工人阶级不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吗？是的，它是倾向社会主义的。不然的话，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就会是毫无结果的了。然而同样正确的是：反对和阻碍这个倾向的，有另一个倾向，即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

我刚才说过，我国社会生活中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传播起来要容易得多。不要忘记，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这时也并没有打瞌睡，他们照自己的办法装扮成社会主义者，竭力想使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也象“经济派”一样地毫不在意，做自发运动的尾巴（社会民主党采取这种态度时，工人运动就是自发的），那么不言而

喻，自发的工人运动就将沿着这条老路走去并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当然要到长期的摸索和痛苦迫使它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断绝联系而奔赴社会革命的时候为止。

这就叫做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

请看列宁是怎样说的：

“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猖狂地迫使工人接受它。”（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二十九页）正因为如此，所以自发的工人运动，当它还带着自发性的时候，当它还没有和社会主义意识结合起来的时候，就要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并且有受这种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 28 页）。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社会民主主义的批评、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就是多余的了，那么“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也是多余的了。

社会民主党一定要反对这种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而促进另一种倾向，即接受社会主义的倾向。当然，将来有一天，经过长期的摸索和痛苦之后，自发运动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也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会走到社会革命的门前，因为“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但在那时以前怎么办呢？在那时以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象“经济派”那样袖手旁观并且让位给司徒卢威和祖巴托夫一伙人吗？屏弃社会民主主义而促成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思想体系的统治吗？忘掉马克思主义而不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吗？

不！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作者注：马克思《宣言》第 15 页），它的责任是始终走在无产阶级前头，它的责任是“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 28 页）。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是把社会主义意

识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赋予无产阶级斗争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

有些人说，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已经创立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科学的社会主义），并且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也会创立这种思想体系的，因此，他们说，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完全是多余的。但这是极大的错误。要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领导科学，就必须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并善于深刻地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工人阶级，当它还是工人阶级时，是不能领导科学、推进科学并科学地研究历史规律的，因为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卡·考茨基说：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掌握科学的人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体是卡·考茨基用的〉，因为现代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 27 页，那里引用了考茨基发表于“新时代”杂志（见该杂志 1901 年至 1902 年第 3 期第 79 页）的一篇有名论文中的这段话。）[8]

因此，列宁说：凡是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和对它袖手旁观的人，凡是经常轻视社会民主党的意义而让位于司徒卢威—祖巴托夫一伙的人，都以为这个运动本身就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但这是极大的错误。”（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 26 页）有些人以为在九十年代举行罢工的彼得堡工人已经有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但这也是错误的。他们并没有这种意识，“本来也不可能有……这种意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令，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学识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

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 20—21 页）。列宁继续写道：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思想体系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他们两个都是工人〉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 27 页）。

这一切可以大致设想如下。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有工人，也有厂主。他们之间进行着斗争。科学社会主义暂时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出现。当工人已在进行斗争时，科学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却还无影无踪……对的，工人在斗争着。然而他们是各自反对自己的厂主，和自己的地方当局发生冲突：那里在罢工，这里在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那里在向当局要求权利，这里在宣布抵制；有些人在谈论政治斗争，另一些人则在谈论经济斗争，如此等等。但这并不是说工人已经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也不是说：他们的运动的目的是要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确信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象确信旭日必然东升一样，他们认为争取自己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工具等等。

与此同时，科学在发展着。工人运动逐渐引起科学的注意。大部分学者有了一种想法，认为工人运动是些不安分守己的人的骚乱，不妨用皮鞭去开导他们。另外一些学者则以为富人应该分给穷人一点残羹剩饭，即认为工人运动是乞丐运动，目的是要讨得一些施舍。在一千个这样的学者中间，也许只有一个能够科学地观察工人运动，科学地研究全部社会生活，注意阶级间的冲突，倾听工人阶级的怨声，并且终于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决不是什么永恒的东西，它也和封建制度一样是暂时的，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把它否定了的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只能由无产阶级经过社会革命来建立。一句话，科学社会主义正在被创立着。

当然，假如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但同样正确的是：少数的几个人，比方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假如他们没有掌握科学的知识，也就不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

什么是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呢？——这好象是放在船上不用的罗盘，只会生锈，结果只好把它扔到海里去。

什么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呢？——这好象是一只没有罗盘的大船，虽然也能驶到彼岸，但是有了罗盘，到达彼岸就会快得多，危险也会少一些。

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会有一只很好的大船，它会一直驶向彼岸，安然靠近码头。

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就会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它会一直向前猛进，到达“乐土”。

所以，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因而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

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某些人断定说，似乎在列宁和“多数派”看来，工人运动如果不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联结起来，就会趋于灭亡，不能达到社会革命。然而这是一种臆说，是一些闲人的臆说，这种臆说恐怕只能从阿恩之流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头脑中产生出来（见《旅行家》杂志[9]第6期《什么是党？》一文）。

列宁确定地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9页）列宁之所以没有详细说明这一点，只是因为他认为用不着去证明本来已经证明了东西。此外，列宁并没有打算研究自发运动，他只是想向实际工作者说明他们应该自觉地做些什么。

列宁在和马尔托夫论战的另一个地方又说过如下一段话：

“‘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此，所以力求使‘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的这一倾向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么我们的党……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作者注：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53页）

可见在列宁看来，即使不能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那种阶级斗争和阶级搏斗，也必然会把工人阶级引向社会革命的。

如果你们对另外一些“多数派”代表的意见也感兴趣，那么就请你们听听吧。他们中间的哥林同志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道：

“如果让无产阶级自行其是，那么事情会怎样呢？这就会和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所发生的事情相似。资产阶级革命家未曾有过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然而资产阶级制度还是产生了。没有自己的思想家的无产阶级，当然，归根到底也会朝着社会革命方面工作的，不过是本能地工作……无产阶级也会本能地实行社会主义，但它不会有社会主义理论。这一过程不过是缓慢而较为痛苦罢了。”（作者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29页。）

这段话是无须解释的。

总之，自发的工人运动，即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必然会变得烦琐而带有工联主义的性质，它一定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就是一切，工人运动却是微不足道的呢？当然不能！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这样说。经过很长时期以后，总有一天经济的发展必然把工人阶级引向社会革命，因而将迫使它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断绝任何联系。问题只在于这将是一条很漫长很痛苦的道路。

另一方面，没有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不管它是在什么样的科学基础上产生的，终究还是一句空话，毫无意义。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运动就是一切，社会

主义却是微不足道的呢？当然不能！只有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发出这样的议论，他们认为意识既然是社会生活本身产生的，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意义。社会主义可以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而由空洞的词句变成锐利的武器。

结论呢？

结论就是：工人运动必须和社会主义相结合，实践活动和理论思想必须融合为一，从而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因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作者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央委员会版第 94 页）。于是，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就会由空洞的词句变成工人手中极大的力量。于是，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自发运动就会循着正确的道路迅速地走向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何在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们的责任，社会民主党的责任，就是使自发的工人运动离开工联主义的道路而走上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意识（作者注：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意识。）灌输到这个运动中去，并把工人阶级的先进力量团结成一个集中的党。我们的任务就是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毫不倦怠地和一切阻碍这些任务实现的人作斗争，不管他们是敌人也罢，“朋友”也罢。

大体说来，“多数派”的立场就是如此。

我们的“少数派”不喜欢“多数派”的立场，他们说，这个立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最可敬的先生们，真是这样的吗？究竟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行星上有这种事情呢？他们说：读一读我们的论文，你们就会相信我们是对的。好，我们就来读一读吧。

我们面前有一篇叫做《什么是党？》的文章（见《旅行家》杂志第 6 期）。“批评家”阿恩是怎样责备党内“多数派”的呢？“他们〈“多数派”〉……自称为党的首脑……硬要别人服从他们……为了替自己的行为辩护，甚至常常臆造出

一些新理论，譬如说，工人群众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领会〈黑体是我用的〉‘崇高理想’等等。”（见《旅行家》杂志第 6 期第 71 页）

试问：“多数派”现在或过去什么时候是否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呢？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出过！恰恰相反，“多数派”的思想代表列宁同志十分确定地说，工人阶级很容易领会“崇高理想”，很容易领会社会主义。请听吧：

“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在下述意义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断定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 29 页）

可见在“多数派”看来，工人是很容易领会那些叫做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的。

那么阿恩为什么要异想天开，他这个奇怪的“发现”是从什么地方挖掘出来的呢？读者们，原来“批评家”阿恩所指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指的是《怎么办？》一书中的一段话，列宁在那里讲到了创造社会主义并断言工人阶级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但你们会说：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创造社会主义是一回事，领会社会主义则是另一回事。为什么阿恩忘记了列宁明白地说到领会“崇高理想”的那些话呢？读者们，你们是对的，但阿恩既然很想做一个“批评家”，他应该怎么办呢？你们想一想，这是多么英勇的事情：编造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把它硬套在对方的头上，然后就对准自己幻想出来的果实开火。这就是所谓批评！阿恩“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领会”列宁的《怎么办？》一书，这倒是毫无疑义的。

现在我们就打开所谓《社会民主党人报》来看看吧。《多数派还是少数派？》（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一文的作者说了些什么呢？

他勇气十足、大喊大叫地攻击列宁，因为在列宁看来，“工人运动的自然的〈应当是“自发的”〉发展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走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者注：《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 14 版。）。可见作者并不懂得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让作者去证明不是这样吧！），而这样的运动一定会受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的支配，一定会倾向于它，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只能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凡是前者不存在的地方，后者就一定出现并占据其地位（你证明这是相反的吧！）。是的，列宁正是这样说的。但同时他并没有忘记工人运动所特有的另一种倾向，即社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不过是暂时被那种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所遮蔽罢了。列宁直截了当地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 29 页），并且正确地指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除其他办法外，也采取和“经济派”作斗争的办法来加速这种倾向的胜利。可敬的“批评家”，为什么你的文章里不引用列宁的这些话呢？难道这些话不也就是这位列宁说的吗？这样做是于你不利的，对不对？

作者又说：“依照列宁的意见……工人按其地位〈黑体是我用的〉来说，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资产者……”（注：《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 14 版）真是蠢话，即使这样的作者我也没有料到会说出这样的蠢话！难道列宁指的是工人的地位吗？难道他断言工人按其地位来说是资产者吗？该要多么蠢的人才会说被剥夺了生产工具、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工人按其地位来说是资产者呢？不！列宁所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问题在于一个人按其地位来说可能是无产者而不是资产者，但他同时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因而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这里谈到的工人阶级的情形正是如此。而这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作者总是爱说空话，不加思考就脱口而出！例如作者一味固执地说“列宁主义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注：《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 15 版），他这

样反复地说，却不了解这种“思想”会把他引到哪里去。假定我们暂时相信他，以为列宁主义确实“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往下又怎样呢？由此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如下：“列宁主义把《火星报》〈旧《火星报》〉拉过去了”（这是作者也不否认的），可见《火星报》也“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三十五票的多数承认《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并且对它的功绩大加称赞（作者注： 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147 页。记录里载有一项次议， 把《火星报》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真正维护者。)，可见这次代表大会及其纲领和策略也“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读者们，这岂不可笑吗？

作者仍继续说:“照列宁的意见，自发的工人运动是去和资产阶级结合的……”是的，是的，作者无疑是去和愚蠢结合了，如果他能离开这条道路，那就好了。

但是，我们且把“批评家”撇开，来请教马克思主义吧。

可敬的“批评家”一味固执地说，“多数派”及其代表——列宁的立场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因为无论是考茨基，或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都和列宁所坚持的相反！真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吧！

作者告诉我们说：“卡·考茨基在他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写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互相对立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这两个阶级的意向不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内相一致。在每个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中，工人阶级之参加政治活动迟早会使工人阶级脱离资产阶级政党而成立独立的工人政党。’”

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无产阶级“迟早”要脱离资产阶级而成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请记住：是工人政党而不是社会民主工党）。作者以为考茨基在这里是和列宁的意见分歧的！其实列宁是说无产阶级迟早不仅要和资产阶级脱离，而且要实行社会革命，即推翻资产阶级。（作者注：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 53 页）他又

补充说：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竭力使社会革命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并且自觉地实现。是的，正是自觉地而不是自发地实现，因为列宁所说的正是这种自觉性。

这位"批评家"继续从考茨基的书中引证说："……在情况已经发展到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地方，这个党如果不是一开始就受到社会主义倾向的感染，迟早也必定能领会社会主义倾向，最终它一定会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即社会民主党。"（注：《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 15 版）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只是说工人政党将领会社会主义的倾向。难道列宁否认这一点吗？根本没有这回事！列宁直截了当地说：不仅工人政党，而且整个工人阶级也在领会社会主义。（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 29 页）既然如此，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它那位大撒其谎的英雄为什么要胡说八道呢？他们为什么要乱说一通呢？俗语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这位迷糊了的作者正是这样。

可见考茨基在这里是和列宁没有丝毫分歧的。但这一切却异常清楚地证明了作者的思考不周。

考茨基是否说过什么有利于"多数派"立场的话呢？请看，这就是他在一篇分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出色论文中说过的一段话：

"在我们那些修正主义的批评家〈伯恩施坦的信徒〉中，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是必要的那种意识〈黑体是卡·考茨基用的〉。于是这些批评家就反驳道，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对于这种意识却是最陌生的。根据草案〈奥地利草案〉可以想见：……这一……观点，奥地利纲领的起草委员会也是赞成的。草案上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使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无产阶级也就越是不得不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也越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意识就成了无

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但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掌握科学的人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体是卡·考茨基用的〉。因为现代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科学社会主义〉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10]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作者注：见"新时代"杂志（1901 年至 1902 年）第 20 卷第 3 期第 79 页。考茨基的这篇精彩论文曾被引用于列宁的《怎么办？》一书第 27 页。）

读者们，你们能否回忆起列宁对这一问题的类似的思想？你们能否回忆起"多数派"的那个众所周知的立场？为什么"梯弗利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要隐瞒真情呢？为什么可敬的"批评家"讲到考茨基的时候在自己论文中却不引证考茨基的这几句话呢？那些最可敬的人是在欺骗谁呢？为什么他们这样"轻视"读者呢？莫非因为他们……害怕真理，躲避真理，以为真理也是可以隐瞒的吗？他们正象一种鸟，把头藏在翅膀下面，就以为谁都看不见它了！他们正象这种鸟一样糊涂。

既然社会主义意识是在科学基础上创立的，既然这种意识要由社会民主党（作者注：不仅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努力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那么很明显，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工人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的时候，就不能领导科学，不能靠本身的力量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

卡·考茨基在他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说过如下一段话：

"……无产者至多只能领会资产阶级学者们所创造的一部分知识，并使之适合于自己的目的和需要，然而当他们还是无产者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空闲时间和经费来独立地把科学发挥到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达到的范围之外的。所以天生的工人社会主义不免带有空想主义〈空想主义就是虚假的非科学的理论〉的一切重要特征。"（作者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央委员会版第93页。）

考茨基继续说：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往往带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可是"……大家知道，凡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即指无产阶级空想主义而言。——卡·考茨基注〉真正深入群众而成为阶级运动的地方，尽管这种运动在表面上还带有激进的色彩，但迟早总要变为最狭隘的纯粹的工会运动"（作者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央委员会版第94页。）。

换句话说，工人运动若不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就不免会变得烦琐而具有"狭隘工会运动的"性质，因而受工联主义思想体系的支配。

"这是蔑视工人，这是抬高知识分子呀！"我们的"批评家"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大喊大叫起来……不幸的"批评家"，可怜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他们把无产阶级看成一位任性的小姐，对她不能说实话，永远只能恭维她，使她不至于跑掉！不，最可敬的人们！我们相信，无产阶级会表现出超过你们所想象的坚强性来。我们相信它不会害怕实话！而你们……究竟对你们有什么可说：你们现在还是害怕实话，而且在自己的文章中没有把考茨基的真实观点告诉读者……

总之，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永远是些随便说说的空话。

另一方面，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一种工联主义的摸索，固然它有一天也会导致社会革命，可是要付出长期的磨难和痛苦的代价。

结论呢？

"工人运动应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作者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第94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已经看到《火星报》（旧《火星报》）和“多数派”也是这样说的。

我们已经看到列宁同志也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

可见“多数派”是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

很明显，孟什维克“批评家”喋喋不休地说出的所谓“蔑视工人”、“抬高知识分子”、“多数派的非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诸如此类的奇谈，不过是梯弗利斯“孟什维克”的胡说和空想罢了。

相反地，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是梯弗利斯“少数派”自己，是“梯弗利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但这一点容我们以后再说。我们暂时把注意力放在下面一点上吧。

为了证明自己的言论正确，《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的作者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说：“某一阶级的理论家在理论上得出的结论，乃是该阶级本身在实践中已经走到了的结论。”（作者注：《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15版。）

二者必居其一。不是作者不懂格鲁吉亚文，就是排字工人弄错了。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不会说“已经走到了的结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已经得出了的结论”或者“正要得出的结论”。如果作者是指后一种说法（正要得出的结论），那就应当指出：他把马克思的话转述错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这类的话。如果作者是指前一种说法，那么他引证的句子就应当是这样的：“某一阶级的理论家在理论上得出的结论，乃是该阶级本身在实践中已经得出了的结论。”换句话说，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得出了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结论，那么，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实践中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生活！

不幸的马克思！谁知道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会把多少荒谬的言论加在他的头上呵！

马克思真是这样说的吗？事实上他说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上的代表“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位在实践中所得出的那些任务和决定。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作者注：如果读者手边没有《雾月十八日》，就请请参看《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111 页，那里引用了马克思所说的这段话。）。

由此可见，马克思根本没有说“已经走到了”。这些“哲学”词句是可敬的“批评家”捏造出来的。

在这种场合，马克思的话完全是另外一种意思。

马克思在上述论点中所发挥的是什么思想呢？他所发挥的不过是：无论哪个阶级的理论家都不能创造出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具备要素的理想，他只能看出未来事物的要素，并据此在理论上创造出本阶级在实践中要达到的理想。差别就在于理论家超过本阶级而先看出未来事物的萌芽。这也就叫做“在理论上得出什么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宣言》中说：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即社会民主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是的，思想家是“起推动作用”的，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看得远得多，全部要点也就在这里。思想家起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对于运动具有伟大的意义。

可敬的“批评家”，你就是为这一点攻击“多数派”吗？那么你就和马克思主义诀别吧，你要知道“多数派”正是以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自豪的。

“多数派”在这种场合同恩格斯在九十年代的情形很相似。

唯心主义者硬说思想是社会生活的泉源。在他们看来，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借以建立的基础，所以他们被称为唯心主义者。

因此必须证明，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思想是生活本身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了历史舞台并且卓绝地完成了这个使命。他们证明：社会生活是思想的泉源，因此社会生活是社会意识借以建立的基础。这样，他们也就替唯心主义挖掘了坟墓，而替唯物主义扫清了道路。

某些半马克思主义者却这样了解：似乎意识、思想在生活中只有极小的意义。

因此必须证明思想的伟大意义。

于是恩格斯出来发表意见，在他的书信（1891—1894 年）中强调说：诚然，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生活本身所产生的，可是它一旦产生出来，就会获得巨大的意义，它把人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并且在产生它的社会生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思想在历史运动中有巨大的意义。

伯恩施坦及其伙伴高声叫道：“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叛变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付之一笑而已……

俄国也有过一些半马克思主义者，即“经济派”。他们硬说，既然思想是社会生活产生的，那么社会主义意识对于工人运动也就只有微不足道的意义。

因此必须证明，社会主义意识对工人运动有重大的意义，没有这种意识，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摸索，无产阶级不知何时才能从这种摸索中摆脱出来而到达社会革命。

于是《火星报》出现了，它卓绝地完成了这个使命。《怎么办？》一书出版了，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强调社会主义意识的伟大意义。党的“多数派”形成了，它坚定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然而这时一些伯恩施坦的喽罗们却跑出来叫喊道，这“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

“经济派”的喽罗们，你们可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吗？

读者会说：真奇怪！读者会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普列汉诺夫写了一篇批评的文章反对列宁（见新《火星报》第 70 号和第 71 号）？他为什么非难“多数派”呢？难道梯弗利斯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不是重复着普列汉诺夫发表过的意见吗？是的，他们是在重复，但重复得很蠢笨，简直令人讨厌。是的，普列汉诺夫发表了批评的意见。然而你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普列汉诺夫跟“多数派”和列宁是没有分歧的。不止普列汉诺夫一人，而且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也是如此。真的，就我们上面讲的那个问题来说，“少数派”的领袖和旧《火星报》是没有分歧的。而旧《火星报》乃是“多数派”的旗帜。不要惊讶！请看事实吧。

我们读过旧《火星报》上的一篇纲领性的论文（见上）。我们知道，这篇论文完全表明了“多数派”的立场。这篇论文是谁的呢？是当时的《火星报》编辑部的。谁参加了这个编辑部呢？列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和斯塔罗维尔。他们中间现在只有列宁一个人是“多数派”，其余五个人都在领导“少数派”，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火星报》的这篇纲领性的论文是在他们负责编辑时发表的，因此他们不应当自食其言，他们大概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吧。

但是，好吧，我们就撇开《火星报》不谈。

且看马尔托夫写些什么：

“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思想最初并不是在工人群众中间产生的，而是在资产阶级出身的学者的书房中产生的。”（作者注：马尔托夫《红旗》第 3 页。）

再看维拉·查苏利奇写些什么：

“甚至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的思想……也不是这么简单而能从每个工人的头脑中独立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也决不是在工人的头脑中‘自然而然’

生长起来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由生活和知识的全部发展过程准备起来的……并且是由具有这种知识的天才头脑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中间的传播，几乎在整个欧洲大陆上，都是由那些在上层阶级的学校里受过教育的社会主义者开始的。”（注：《曙光》杂志[11]第 4 期第 79—80 页。）

现在我们来听一听在新《火星报》（第 70 号和第 71 号）上郑重其事地反对列宁的普列汉诺夫所说过的话吧。事情发生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驳斥马尔丁诺夫而为列宁辩护。当时，普列汉诺夫责备马尔丁诺夫，说他抓住了列宁的一句话，而忽略了《怎么办？》一书的全文，然后普列汉诺夫继续说：

“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手法使我想起了一个书报检查官的话：把“我们的父”[12]那篇祷告词给我，让我从中抽出一句话来，我可以给你们证明，它的作者是应该判处绞刑的。’然而，不仅马尔丁诺夫同志一个人而且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对这句倒霉话〈列宁的话〉的一切责难全是出于误解。马尔丁诺夫同志引证恩格斯的话：‘现代社会主义是现代工人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列宁同志也同意恩格斯的意见……但要知道，恩格斯的话乃是一般原理。问题在于究竟是谁最先阐述了这一理论上的表现。列宁所写的不是一篇论述历史哲学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篇反对‘经济派’的辩论文章，‘经济派’硬说：我们应当静待工人阶级不用‘革命霉菌’〈即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而独自达到的结局。其所以禁止社会民主党向工人进行宣传，正因为它是‘革命霉菌’，正因为它具有理论的意识。但如果你们把‘霉菌’去掉，那就只剩下没有觉悟而必须从外面把意识灌输进去的群众了。假如你们愿意公正地对待列宁并把这部书仔细地读一遍，那么你们就会看到列宁所说的正是这一点。”（作者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123 页。）

普列汉诺夫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是这样说的。

然而，正是受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维尔等等唆使的同一位普列汉诺夫，过了几个月再出来说话的时候，竟抓住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

上所辩护过的列宁的同一句话，宣称列宁和“多数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知道，如果从“我们的父”那篇祷告词中抽出一句话来断章取义地加以解释，那么它的作者恐怕要因背叛上帝而受绞刑的。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公正的，一个公正的批评家是不会这样做的，但他还是从列宁的书中抽出这句话来，他还是不公正地做去，当众打自己的嘴巴。而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斯塔罗维尔则附和着他，由他们自己负编辑责任，把普列汉诺夫的文章登在新《火星报》（第70号和第71号）上，因而再一次使他们自己丢脸。

为什么他们表现得这样没有气节，为什么“少数派”的这些领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为什么他们否认由自己署名登在《火星报》上的那篇纲领性的论文，为什么他们自食其言呢？什么时候听说社会民主党内有过这样颠倒是非的丑事？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和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发表以前这几个月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从原有的六个编辑中只选出了三个即普列汉诺夫、列宁和马尔托夫来担任《火星报》的编辑。至于阿克雪里罗得、斯塔罗维尔和查苏利奇三人，代表大会则指定他们去担任别的职务了。代表大会当然有权这样做，而且每个人都应服从它的决定，因为代表大会是全党意志的体现者，是党的最高机关，谁反对它的决定，谁就是践踏党的意志。

可是这些固执的编辑却没有服从党的意志，没有服从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也就是党的意志）。原来党的纪律是专为我们这种普通工作者编造的！他们痛恨代表大会没有把他们选为编辑，于是退到一边，并把马尔托夫勾引过去组成了反对派。他们对党宣布抵制，拒绝党的工作，并开始威吓党说，把我们选进编辑部、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注：党总委员会　是在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党章建立的全党最高机关。它的基本任务是协调并统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活动。党总委员会由五名委员组成：中央机关报编

辑部代表二人（列宁、列·叶·加尔佩林），中央委员会二人（弗·威·林格尼克、弗·亚·诺斯科夫）以及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委员一人（格·瓦·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担任总委员会主席。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一段时期，党总委员会曾站在布尔什维克的正确立场上。在普列汉诺夫转向机会主义、孟什维克夺去了中央机关报以后，党总委员会就成了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工具。1905 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以党的中央委员会为统一的中央领导机关，撤销了党总委员会。）去，不然我们就要制造分裂。于是分裂开始了。这样，他们又一次践踏了党的意志。

下面就是这些罢工的编辑提出的要求：

“恢复《火星报》旧编辑部〈就是说，让我们在编辑部占三个位置〉。

把一定数量的反对派分子〈即“少数派”〉加进中央委员会去。

让反对派分子在党总委员会中占两个位置等等……

我们提出的这些条件是使党内不至发生威胁全党生存的冲突的唯一保证。”（就是说，要满足我们的要求，不然我们就要在党内制造大分裂。）（注：《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第 26 页。）

党怎样回答他们呢？

党的代表者（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同志向他们声明说：我们不能违反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选举是代表大会的事情，可是我们仍然企图恢复和平和一致，老实说，争位置已经是可耻的了，而你们却为了争位置要来分裂党，等等。

罢工的编辑们生气了，他们不大自在，——他们确实是为了争位置而发动斗争的，——他们把普列汉诺夫拉了过去[13]，开始干起他们的英雄事业来了。他们必须在“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硬找出某种更“厉害的”“意见分歧”，借以证明他们并不是为了争位置。他们东找西找，结果在列宁的书中找到了一段话，如果把这段话同原文割裂开来，断章取义地加以解释，确实可以吹毛求疵地骂一

通。“少数派”的领袖们暗中想道：这个主意妙极了，列宁是“多数派”的领导人，我们糟蹋了列宁，就能把党拉到自己方面来。于是普列汉诺夫那一套论调就来了，说什么“列宁及其追随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诚然，他们今天拚命攻击的，就是他们昨天还在拥护的列宁书中的那种思想，但有什么办法：机会主义者之所以称为机会主义者，正因为他们是不尊重原则性的。

这就是他们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缘故，这就是他们颠倒是非的根源。

但还不止于此。

过了一些时候，他们看出，除了几个幼稚的人而外，谁也没有理睬他们反对“多数派”和列宁的那种煽动，他们看到“事情”不妙，于是决定再来粉饰一番。同一个普列汉诺夫、同一个马尔托夫和同一个阿克雪里罗得又于 1905 年 3 月 10 日用党总委员会的名义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同志们！〈他们向“多数派”说〉……双方〈即“多数派”和“少数派”〉都曾屡次表示自己确信：现有的策略上组织上的意见分歧，并不是一种使双方不能在统一的党组织范围内进行工作的意见分歧。”（作者注：《火星报》第 91 号第 3 版。）他们说，因此我们要召集同志裁判会（由倍倍尔等组成）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小小争执。

一句话，党内的意见分歧不过是一种可以由同志裁判会来解决的意气之争，而我们大家——他们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然而怎么会这样呢？人家居然号召我们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到党组织中去，说我们大家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等等……这是什么意思呢？“少数派”的领袖们，要知道这是你们叛变了党！难道可以委任“非马克思主义者”担负党的领导职务吗？难道社会民主党内有“非马克思主义者”立足的余地吗？或许是你们也叛变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改变了阵线吧？

然而，若要等待他们回答，就未免太幼稚了。原来这些妙不可言的领袖们在口袋里装着几种“原则”，需要哪一种就掏出哪一种来。你看他们是多么反复无常呵！……

所谓“少数派”的领袖就是这样的。

不难想象，跟随在这种领袖后面的喽罗们，即梯弗利斯的所谓“少数派”该是些什么样的人了……还有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尾巴有时不听头脑的指挥，不肯服从它。例如在“少数派”的领袖们认为可能调解并号召党的工作人员取得一致时，而梯弗利斯的“少数派”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却继续在那里大闹特闹，说“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作者注：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所以我们一定要厮杀一番！真是各人唱各人的调子。

“少数派”埋怨我们把他们叫作机会主义者（无原则的分子）。可是，既然他们自食其言，既然他们出尔反尔，既然他们始终动摇，试问，这不叫作机会主义又叫作什么呢？难道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能常常改变自己的信念吗？要知道，就连手帕也不是这样经常更换的。

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味固执地说，“少数派”具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性格。真是这样的吗？好，我们来看看吧。

考茨基说：“无产者比较容易接受党的原则，他倾向于不以一时情绪、不以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为转移的原则性的政策。”（作者注：见《爱尔福特纲领》第88页，中央委员会出版。）

而“少数派”呢？他们也是倾向于这种不以一时情绪和其他东西为转移的政策吗？恰恰相反，他们经常摇摆，他们永远动摇，他们憎恨坚定的原则性的政策，他们宁愿采取无原则的立场，他们听从一时的情绪的驱使。至于事实，我们早已知道了。

考茨基说：无产者喜爱党的纪律，“无产者在他还是孤零零的个体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进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是从**组织**中……汲取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不为个人利益所诱，不为个人荣誉所惑，他“在指定的任何岗位上都履行自己的职责，自愿地服从那贯穿在他的全部情感和全部思想中的纪律”。（作者注：《进一步，退两步》第 93 页，那里引证了考茨基的这段话）

而“少数派”呢？他们也是这样被纪律性所贯穿的吗？恰恰相反，他们藐视党的纪律，嘲笑党的纪律（作者注：见《同盟代表大会记录》）。“少数派”的领袖们就是天字第一号破坏党内纪律的人。请你们回想一下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维尔、马尔托夫及其他不服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人们吧。

考茨基继续说：“知识分子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服从党的纪律是很勉强的，是迫不得已，而不是出于自愿的。“他认为纪律只有群众才需要去遵守，而上等人物是不必遵守的。至于他自己，当然是属于上等人物之列的……李卜克内西是……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榜样，他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情绪，他……在指定给他的任何岗位上工作，他使自己完全服从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并鄙视……知识分子一落到少数地位时……的那种颓丧的啜泣。这里还可以举马克思为例，他从来没有想要出什么风头，他在国际中不止一次地处于少数地位，每次他都十分严格地服从党的纪律。”（作者注：《进一步，退两步》第 93 页，那里引证了考茨基的这段话）

而“少数派”呢？他们在什么地方表现过“无产阶级的情绪”呢？他们的行为象李卜克内西和马克思那样吗？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少数派”的领袖们并没有使自己的“我”服从于我们的神圣事业；我们看到正是这些领袖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落到少数地位时”，就沉溺于“颓丧的啜泣”；我们看到，在代表大会后，正是他们为了争夺“头等位置”而痛哭起来，并且正是为了争夺这种位置而挑起了党内的分裂……

可敬的孟什维克，这就是你们的“无产阶级性格”吗？

孟什维克向我们问道：那么，为什么某些城市的工人站在我们这方面呢？

是的，不错，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是站在“少数派”方面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也跟着修正主义者（德国的机会主义者）走，但这并不是说修正主义者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有一次，连乌鸦也找到了玫瑰花，但这并不是说乌鸦就是夜莺。难怪俗语说：

乌鸦一找到了玫瑰花，

就把自己当作夜莺夸。

※ ※ ※

现在很清楚，党内的意见分歧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发生的。显然，我们党内暴露了两种趋向：**无产阶级坚定性**的趋向和**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趋向。现在的“少数派”就是这种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表现者。梯弗利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个“少数派”的驯服的奴隶！

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诚然，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叫喊说他们反对“知识分子的心理”，并且他们还企图责备“多数派”有“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但这很象一个贼偷了别人的钱，却大声叫喊：“捉贼呀！”

此外，大家知道，谁害什么病，谁就老谈这种病。

注释：

[1]《略论党内意见分歧》这本小册子是斯大林于 1905 年 4 月底写成的。它是对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领袖诺·尼·饶尔丹尼亚的几篇论文（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多数派还是少数派？》和在《旅行家》杂志上发表的《什么是党？》等等）的答复。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很快就知道了《略论党内意见分歧》出版的消息，1905 年 7 月 18 日，国外局秘书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索取这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南高加索各布尔什维克组织中传播得很广泛，先进工人们根据这本小册子认识了党内的意见分歧，认识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这本小册子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秘密印刷所（阿弗拉巴尔印刷所）用几种文字（1905 年 5 月用格鲁吉亚文，同年 6 月用俄文和亚美尼亚文）印刷的，每种文字印了一千五百册至二千册。

[2]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于 1903 年 7 月 17 日—8 月 10 日（公历 7 月 30 日—8 月 23 日）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火星报》提出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建立真正的政党。列宁在大会上为在俄国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讨论党纲时，列宁坚决主张在党纲中肯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着重指出农民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并坚持把民族自决权列入党纲，维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大会通过了《火星报》提出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在讨论党章，特别是关于党员资格的第一条条文时，列宁及其拥护者同尔·马尔托夫等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大会通过了列宁拟订的党章，但关于党章第一条，却以一票弃权，二十八票对二十二票的多数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在选举中央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人获得多数票，反对列宁的人获得少数票。从这时起，前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后者被称为孟什维克。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3]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1898 年 3 月 1—3 日（公历 13—15 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六个组织的九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一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两名和崩得的代表三名。列宁因被流放西伯利亚未能出席。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委员会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但实际上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建立起来，因为这次大会既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

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各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大会闭幕后不久，中央委员们就被捕了，因此中央委员会也没能开展工作。

[4]注：《火星报》（《Искр》）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 1900 年 12 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在慕尼黑、伦敦出版，自 1903 年春起在日内瓦出版。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自 1901 年 4 月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的秘书。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1900—1903 年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五十多篇论文，阐述了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对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了评论。《火星报》从国外秘密运进俄国散发，其中一部分曾由国内秘密印刷所翻印。《火星报》在俄国国内有代办员网，代办员在俄国传播《火星报》思想和建立火星派组织。《火星报》在建立俄国工人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它为党的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在 1903 年 10 月出版第五十一号后，被普列汉诺夫支持下的一些孟什维克分子所篡夺。列宁于 1903 年 11 月 1 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五十二号起，《火星报》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因此，人们把五十一号以前的《火星报》称作旧《火星报》，以后的称作新《火星报》。

[5]作者注：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燃起了“批评”的热情（见创刊号《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一文），不过我应该指出，它对“经济派”和“工人事业派”（他们彼此的区别不大）估计得不正确。问题并不在于他们“蔑视政治问题”，而在于他们做运动的尾巴和只是重复运动所提示给他们的东西。过去有一个时期仅仅举行罢工。那时他们宣传的是经济斗争。到了游行示威的时期（1901 年），发生了流血事件，产生了失望情绪，于是工人就采用恐怖手段，以为这能拯救他们，使他们不受暴君的统治。这时“经济派—工人事业派”也加入总的合唱队并且神

气十足地宣称：现在应该采取恐怖手段，袭击监狱，释放狱中同志等等了（见《工人事业》杂志《历史性的转变》一文）。可见这决不能说他们是“蔑视政治问题”的。该文作者是借用马尔丁诺夫的话来进行“批评”的，但如果他去了解一下历史事实，那就比较有益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高加索孟什维克的秘密报纸，由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领袖诺·尼·饶尔丹尼亚领导，于 1905 年 4 月 20 日—11 月 26 日在梯弗利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共出了六号。《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机关报”出版的，后来该报自称“高加索社会民主工人组织机关报”。

*《工人事业》（《Рабочее 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不定期机关刊物。主要编辑是经济派著名领袖弗·巴·伊万申、波·纳·克里切夫斯基、亚·萨·马尔丁诺夫等人。1899 年 4 月—1902 年 2 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十二期（九册）。

[6]注：指列宁所写的《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

[7]作者注：当时《火星报》编辑部由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斯塔罗维尔*和列宁六人组成。

*斯塔罗维尔是坡特列索夫的笔名。

[8]注：《新时代》（《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1923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 年 10 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 年 10 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4 年该杂志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和帮助杂志编辑部的工作，并且不时地对它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批评。1895 年恩格斯逝世后，《新时代》开始系统地刊登修正主义者的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采取中派主义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

[9]注：《旅行家》是一种格鲁吉亚文的历史－考古学和地理－民族学杂志，于1901—1905 年 11 月在梯弗利斯出版。从 1905 年 1 月起，《旅行家》成了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文艺政治周刊，由菲·马哈拉泽主编。它除刊登布尔什维克的文章外，还刊登孟什维克的文章。

[10]注：海因菲尔德纲领是 1888 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海因菲尔德召开的建党大会上通过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原则部分包含一些正确阐明社会发展进程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的论点。后来，在 1901 年维也纳代表大会上，它被含有修正主义原则的新纲领取代。

[11]注：《曙光》（《Заря》）是列宁创办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杂志，和《火星报》由同一个编辑部编辑，1901—1902 年在斯图加特公开出版，共出了四期（第 2、3 期为合刊）。

[12]注：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6 章第 9—13 节。——编者注

[13]作者注：也许读者要问：这位热烈拥护过"多数派"的普列汉诺夫怎么会转到"少数派"方面去了呢？原来是他和列宁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当"少数派"暴怒起来并宣布抵制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就认为必须完全让步。列宁不同意他的意见。普列汉诺夫就渐渐倾向"少数派"了。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更加扩大了，普列汉诺夫终于变成了列宁和"多数派"的反对者。关于这一点列宁写道：

"……过了几天，我真的同一位总委员会委员一起去见普列汉诺夫，当时，我们和普列汉诺夫的谈话是这样进行的：

——要知道，世界上有一种爱吵闹的老婆〈即指'少数派'〉，对这样的老婆必须让步，免得她疯疯癫癫、当众大吵大闹起来。——普列汉诺夫这样说道。

——也许是这样，但即使是让步，自己也要保持力量，使更大的'吵闹'不致发生。——我回答说。"（见《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第三十七页，那里引证了列宁的信）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没有达成协议。从这时起，普列汉诺夫就开始转到“少数派”方面去了。

我们根据可靠的消息得知，普列汉诺夫又在离开“少数派”，并已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主办的不定期杂志，1905 年 3 月—1912 年 4 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十六期。1916 年《日志》曾在彼得格勒复刊，但只出了一期。

答“社会民主党人报”[1]

斯大林

（1905 年 8 月 15 日）

〔〕发表在“无产阶级斗争报”第十一期的斯大林的“答‘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受到侨居外国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热烈欢迎。列宁在“无产者报”上简括地说明斯大林这篇论文的基本内容时写道：“在‘答“社会民主党人报”’这篇论文里，我们看到对于‘从外面灌输意识’这一有名问题的绝妙提法。作者把这个问题分成四个独立部分：*

（一）关于意识对存在的关系的哲学问题：存在决定意识。由于存在着两个阶级，所以也就创造出两种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是适合于无产阶级地位的。

（二）‘谁能创造和谁在创造这种社会主义意识（科学社会主义）呢？'‘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湛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考茨基），这就是说，这种意识的创造工作‘是几个具有为此所必需的经费和闲暇时间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事。’

（三）这种意识怎样深入到无产阶级中去呢？‘在这里也就出现了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它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

（四）社会民主党到无产阶级中去宣传社会主义时在无产阶级那里遇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能的倾向。‘与无产阶级产生的同时，无产者本身和那些领会无产阶级观点的人中间，必然也会产生社会主义倾向。社会主义倾向的产生是应当这样解释的。’（考茨基）

孟什维克却由此得出一个可笑的结论：‘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并不是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的，恰恰相反，它是从无产阶级中间产生出来，然后灌输到

那些领会无产阶级观点的人们头脑中去的。'!"（见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一日（二十四日）"无产者报"第二十二期"党内生活"栏第六页。）——（正文第 119 页）。

首先我应当向读者道歉，答复迟了一点。可是又没有办法：环境迫使我做别的工作，所以不得不把我的答复暂时搁下；你们知道，我们是不能支配自己的。

我还要指出一点：许多人认为"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书是联盟委员会写的，而不是某一个人写的。我应当声明，写这本书的就是我。联盟委员会只负编辑的责任。

现在我们来讲本题吧。

反对者责难我，说我"看不见争论的对象"，说我"模糊了问题"[见"答联盟委员会"第四页。——著者注] [1]，说"所争论的是组织问题而不是纲领问题"（第二页）。

只要有一点观察能力，就可以发现作者的这种断语是荒谬的。问题在于我那本书是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的答复，等"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二期出版时，我那本书已经付印了。这位作者在创刊号上说了些什么呢？只是说"多数派"走上了唯心主义的道路，他们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矛盾"的。**这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组织问题。我那时应该怎样回答呢？我只能这样回答："多数派"是站在真正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如果"少数派"不了解这一点，那就表明"少数派"自己离开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凡是稍微懂得论战的人都一定会这样做。可是作者一味固执己见地说：你为什么不谈组织问题呢？可敬的哲学家，我之所以没有谈到组织问题，是因为你当时对这些问题一个字也没有提。问题既没有谈到，当然就无从回答。所谓"模糊了问题"、"回避争论对象"等等，都显然是作者的臆造。恰恰相反，我倒有理由怀疑作者自己在回避某些问题。他说："所争论的是组织问题。"其实我们之间还存在着**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这种意见分歧比组织上的意见分歧更重要得多。然而我们的"批评家"在他的小册子中，对这种意见分歧却只字未提。这才真是"模糊了问题"。

我那本书究竟谈些什么问题呢？

现代的社会生活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安排的。这里存在着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们之间进行着决死的斗争。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迫使资产阶级去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则迫使无产阶级去破坏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这两个阶级相适应也就创造出两种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是适合于无产阶级的地位的。因此，无产阶级接受这种意识，领会这种意识，加倍努力地和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不用说，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意识。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谁在创造、谁有可能创造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即科学社会主义）。考茨基说（我是重述他的意见）：无产者群众还处于无产者地位的时候，是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创造社会主义意识的。考茨基说："现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湛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见列宁"做什么？"第二十七页所引证的考茨基的论文。（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一〇页）——著者注]科学的代表人物是知识分子，其中包括那些既有时间又有可能来领导科学并创造社会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如马克思、恩格斯等。显然，创造社会主义意识乃是少数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事，因为他们既有时间又有可能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社会主义意识没有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它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不过是空话罢了！如果这种意识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情形就会完全不同：无产阶级就会认清自己的地位，并用**加速的**步伐向社会主义生活迈进。在这里也就出现了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它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考茨基说"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见列宁"做什么？"第二十七页所引证的考茨基的论文。（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一〇页）——著者注]，指的也就是这一点。

可见创造社会主义意识的是少数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而把这种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则是整个社会民主党，它使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具有自觉的性质。

我那本书里所说的就是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和“多数派”的立场就是如此。

我的论敌提出什么理由来反对这一点呢？

老实说，他并没有提出任何重大的理由。他忙于谩骂而少作说明。看来他是很生气了！他既不敢公开提出问题，也不敢直接回答问题，却像个胆小的“斗士”，回避争论的对象，口是心非地抹杀已明确提出的问题，并且还要大家相信：“我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都弄清楚了！”譬如说，这位作者根本没有提出**关于创造**社会主义意识的问题，不敢直率地说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究竟赞同谁的意见：赞同考茨基的意见，还是赞同“经济派”的意见。诚然，我们的“批评家”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上作过颇为大胆的声明，当时他是直接用“经济派”的口吻讲话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当时是一回事，而现在他已有“另一种心情”了；他不进行批评而回避这个问题，这也许是因为他已深信自己犯了错误，不过不敢公开承认罢了。总之，我们的作者已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根本弄不清楚究竟应该赞同谁的意见。如果赞同“经济派”的意见，他就必须同考茨基和马克思主义决裂，而这是对他不利的；如果和“经济主义”决裂而赞同考茨基的意见，他就一定要赞同“多数派”的说法，但他没有足够的勇气这样做，所以他始终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那末我们的“批评家”还有什么办法呢？他认为在这里最好是闭口不言，而他真的懦怯地回避了上面所提出的问题。

关于**灌输意识**这一点，作者说了些什么呢？

他在这里也表现了同样的动摇和懦怯。他偷换了问题，刚愎自用地宣称；考茨基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知识分子从外面把社会主义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第七页）。

好极了，可是“批评家”先生，我们布尔什维克也并没有这样说过，你为什么要同风车搏斗呢？按照我们的意见，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意见，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是社会民主党[见“略论党内意见分歧”第十八页。——著者注]，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这一点你怎么不能了解呢？为什么你以为社会民主党内只有知识分子呢？难道你不晓得，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里，先进的工人要比知识分子多得多吗？难道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不能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吗？

看来作者自己也感到他这个“证据”不能令人信服，于是就改用另一个“证据”。

我们的“批评家”继续说：“考茨基写过‘与无产阶级产生的同时，无产者本身和那些领会无产阶级观点的人中间，必然也会产生社会主义**倾向**；社会主义**倾向**的产生，是应当这样解释的’。”我们的“批评家”继续解释说：“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并不是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的，恰恰相反，它是从无产阶级中间产生出来，然后灌输到那些领会无产阶级观点的人们的头脑中去的。”（“答联盟委员会”第八页）

我们的“批评家”就是这样写的，并自以为把问题弄清楚了！考茨基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只是说：社会主义**倾向**是在无产阶级中间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这句话当然是对的。但我们所争论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倾向问题，而是社会主义**意识**问题呀！两者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难道倾向和意识是一个东西吗？难道作者辨别不出“社会主义倾向”是不同于“社会主义意识”的吗？他从考茨基的话中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不是从外面灌输进去的”，这难道不是表明自己思想的贫乏吗？“社会主义倾向的产生”和社会主义意识的灌输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难

道同一位考茨基不是说过“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见“做什么？”第二十七页）吗？

看来作者已感到自己陷入荒谬的境地，所以在结语中不得不补充一句：“从考茨基这段话中确实可以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意识是从外面灌输到阶级斗争中去的。”（见“答联盟委员会”第七页）但他终究不敢公开大胆地承认这一科学真理。这里我们的孟什维克在逻辑面前也表现了和先前一样的动摇和懦怯。

这就是“批评家”先生对两个主要问题所作的模棱两可的“回答”。

对于从这两个大问题中必然产生出来的其余的小问题，又能说些什么呢？最好是读者自己拿我这本书和我们这位作者的那本小册子作个比较。不过这里还要提到一个问题。如果相信这位作者的话，就会觉得好像我们认为“分裂的发生是由于代表大会......没有选举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斯塔罗维尔当编辑......”（“答联盟委员会”第十三页）因而我们也就“否认分裂，掩盖其高度的原则性，并把反对派的全部活动都看做三个‘造反的’编辑所干的事情”（同上，第十六页）。

这里作者又把问题混淆起来了。原来这里摆着两个问题：分裂的**原因**和意见分歧的表现**形式**。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直截了当地回答：“现在很清楚，党内的意见分歧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发生的。显然，我们党内暴露了两种趋向：**无产阶级坚定性**的趋向和**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趋向。现在的‘少数派’就是这种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表现者。”（见“略论党内意见分歧”第四十六页）可见在这里我**认为**意见分歧是由于我们党内存在着知识分子的趋向和无产阶级的趋向，而不是由于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的行为。马尔托夫等人的行为不过是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表现**。看来我们的孟什维克并没有了解我那本书中的这一段话。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确实说过，并且永远要说："少数派"的头目们为了争夺"头等位置"而痛哭流涕，他们的确使党内斗争具有了这种**形式**。我们的作者不愿承认这一点。然而这是事实："少数派"的头目们会宣布抵制党，他们公开要求中央委员会里的位置，要求中央机关报里的位置，要求党总委员会里的位置，并且宣称："我们提出的这些条件是使党内不致发生威胁全党生存的冲突的唯一保证。"（见"述评"[即"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译者注]第二十六页）这岂不是表明，写在"少数派"头目们旗帜上的不是思想斗争而是"争位置"吗？大家知道，谁也没有阻碍他们进行思想原则的斗争。难道布尔什维克没有向他们说过：你们去创办单独的机关报，并坚持自己的观点，党可以允许你们创办这种机关报（见"述评"）吗？如果他们真正是关心原则而不是关心"头等位置"，那他们为什么不同意这样做呢？

我们把这一切叫做孟什维克领袖们没有政治气节。先生们，我们这样直言不讳，请不要见怪。

关于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这一点，"少数派"的领袖们先前并没有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发生过意见分歧（见"火星报"创刊号所载的纲领性的论文）。可是后来他们却动摇起来，开始和列宁作斗争，把他们自己昨天崇拜过的东西都推翻了。我把这叫做反复无常。孟什维克先生们，也不要因此见怪。

昨天你们崇拜中央机关，对我们大发雷霆，责备我们为什么不信任中央委员会。今天你们却不仅破坏中央机关，而且破坏集中制（见"第一次全俄代表会议"）。我把这叫做无原则性。孟什维克先生们，希望你们也不要因此对我发脾气。

如果把没有政治气节、争位置、不坚定、无原则以及诸如此类的特点综合在一起，那我们就会看出一个总的特性，即**知识分子的动摇性**，这种动摇性是知识分子最常犯的毛病。很明显，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就是"争位置"、"无原则"等等所由产生的土壤（基础）。而知识分子的不坚定性又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的。

我们就是这样解释党内分裂的。我们的作者，你究竟是否懂得了分裂的原因和分裂的形式之间的区别呢？我很怀疑。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它那位奇怪的“批评家”所采取的多么荒谬和模棱两可的立场。但这位“批评家”却又在另一方面大显身手。这位作者在他那本总共不过八张纸的小册子里，居然异想天开地一连八次诽谤布尔什维克，简直诽谤得令人发笑。不相信吗？请看事实。

谎言第一号。照作者的意见，“列宁想把党缩小，把党变成狭小的职业家组织”（第二页）。而列宁说的却是：“不要以为党的组织只应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我们需要有各色各样、或大或小的各种不同的组织——从极狭小而秘密的组织起，一直到极广大而自由的组织为止。”（见“记录”第二四〇页）

谎言第二号。照作者的说法，列宁想“只把委员会的委员们吸收到党内来”（第二页）。而列宁说的却是：“一切**集团、小组、分委员会等等**都应当和委员会的机关或委员会的分部列于同等的地位。其中有一些将公开声明愿意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一经委员会批准**就可以加入**。”（见“给一位同志的信”第十七页）

[可见照列宁的意见，不仅中央委员会，而且地方委员会也可以把一些组织吸收到党内来。——著者注] [2]

谎言第三号。照作者的意见，“列宁要求在党内建立知识分子的统治”（第五页）。而列宁说的却是：“委员会应当......尽可能包括工人运动中工人出身的所有主要**带头人物**。”（见“给一位同志的信”第七页至第八页）这就是说，不仅在其他一切组织里，而且在委员会里，先进工人也应当占大多数。

谎言第四号。作者说，我那本书第十二页上所引证的“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等语，“完全是臆造的”（第六页）。其实这句话是我直接从“做什么？”一书翻译过来的。该书第二十九页有以下一段话：“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时刻刻以各种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厉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在我那本书第十二页上所翻译

的正是这一段话。我们的“批评家”就把这叫做臆造的引证！我不知道这是由于作者的粗心大意，还是由于他有意骗人。

谎言第五号。照作者的意见，“列宁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工人‘自然而然要’走向社会主义”（第七页）。而列宁说的却是：“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见“做什么？”第二十九页）

谎言第六号。作者硬说我认为“社会主义是由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的”（第七页）。而我说的却是：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运动中去（第十八页）。

谎言第七号。照作者的意见，列宁说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完全不依赖工人运动”而产生的（第九页）。而列宁却分明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列宁说：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见“做什么？”第二十一页）。

谎言第八号。作者说我所讲的“普列汉诺夫**正在离开**‘少数派’”这句话似乎是“造谣中伤”。然而我这句话被证实了：普列汉诺夫已经离开了“少数派”……[这位作者竟敢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五期上责备我们，似乎我们曲解了有关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事实！——著者注]

至于作者慷慨地用来点缀他那本小册子的许多琐碎谎言，我就不必再提了。

不过应该承认，作者毕竟说了句唯一的真话。他向我们说：“任何一个组织要是造谣中伤，那它的末日就快到了。”（第十五页）这当然是确确实实的真理。问题只是谁在造谣中伤：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它那位奇怪的骑士呢，还是联盟委员会？这一点要由读者来判断了。

再讲一个问题，我们就结束了。作者郑重其事地宣称：“联盟委员会责备我们，说我们重复普列汉诺夫的意见。重复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及其他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我们认为是一种美德。”（第十五页）可见你们认为重复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意见是一种美德。好极了，先生们，那就请听一听吧：

考茨基说：“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见“做什么？”第二十七页所引证的考茨基的一段话）同一个考茨基又说：“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同上）孟什维克先生，我们希望你把考茨基的这些话重复一下，借以消除我们的疑问。

现在我们来谈谈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说：“......我也不懂，为什么有人认为列宁的草案[这里指的是列宁所拟定的党章第一条和马尔托夫所拟定的党章第一条。——著者注]一被通过，就会使我们党对很多工人关起大门。愿意入党的工人是不怕参加组织的。他们并不害怕纪律。怕参加组织的只是许多被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浸透了的知识分子。这倒很好。这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通常也就是各种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我们要使他们远远地离开我们。列宁的草案可以作为防止他们侵入党内的堡垒，所以单凭这一点，凡是反对机会主义的人也都应当赞成这个草案了。”（见“记录”第二四六页）

“批评家”先生，我们希望你摘下假面具，并且以无产阶级的爽直精神重复一下普列汉诺夫的这段话。

如果你不这样做，那就表示你在报纸上所作的声明是轻率的，不负责任的。

注释：

[1]“答联盟委员会”一文是以一九〇五年七月一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三期附张的形式出版的。该文作者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领袖饶尔丹尼亚，他的观点在斯大林的“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书及其他著作中受到无情的批评。——（正文第 120 页）。

[2]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六卷第二一九页。——正文第 126 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

列宁

（1899 年 8 月）

某地［注：《工人事业》杂志的单行本增加了“（俄国境内）”几个字。——俄文版编者注］17 个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会议，

一致通过如下的决议，并决定把它公布，

交全体同志讨论

近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出现了一种离开俄国社会民主党基本原则的倾向，即离开由党的创始人和先进战士们——“劳动解放社”[2]成员宣布过，又由 90 年代俄国工人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宣布过的原则的倾向。下面所引的《信条》，旨在表明某些（所谓的“青年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观点，它试图系统而明确地叙述“新观点”。这个《信条》的全文如下。

西欧存在过行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这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全部历史，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资产阶级必须争得自由的形式和力求摆脱束缚生产的行会规章，所以它（资产阶级）就成了革命的因素；它在西欧各国都是从主张 liberté，fraternité，égalité（自由、博爱、平等），从争取自由的政治形式开始活动的。但是，正如俾斯麦所说的，它争得了这种形式，却给了自己的对手即工人阶级一张将来必须兑现的期票。在西欧，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争得过民主制度，而只是坐享其成。有人可能会反驳我们，说工人阶级参加过革命。但是从历史上加以考证就会推翻这种意见，因为正当 1848 年西欧确立宪法的时候，工人阶级还只是城市手工业者，还只是小市民民主派；工厂无产阶级当时几乎还不存在，而大生产中的无产阶级（如霍普特曼所描写的德国织工，以及里昂的织工），还是一群粗野的人，只会骚动，根本不能提出什么政治要求。1848 年的宪法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是由资产阶级和小市民、手艺匠争得的。另一方面，

工人阶级（手艺匠与手工工场工人，印刷工，织工，钟表匠等等）从中世纪起，就习惯于参加各种组织，参加互助储金会、宗教团体等等。西欧熟练工人中间至今还保持着这种组织精神，这也就使他们同工厂无产阶级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要组织工厂无产阶级既很难又很慢，他们只能加入所谓 lose Organisation（临时组织），而不能参加订有规章的永久性组织。这些手工工场的熟练工人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核心。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比较容易和完全可能进行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又有可能把那些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受到训练的工人吸收来有计划地组织这个斗争。在这种背景下，西欧就形成了理论的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它以议会政治斗争为出发点，其前途（只在表面上近似布朗基主义，成因的性质则完全不同）一方面是夺取政权，另一方面是 Zusammenbruch（崩溃）。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比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在比利时、法国，特别是在德国，工人组织政治斗争非常容易，而组织经济斗争则感到困难重重，意见纷云。直到现在，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比较起来（除开英国不说），仍然异常薄弱，极不稳定，到处都 laissent à désirer quelque chose（尚嫌不足）。在政治斗争的精力尚未消耗殆尽之前，Zusammenbruch 曾是一个必要的、起组织作用的 Schlagwort（流行提法），它本应起巨大的历史作用。在研究工人运动时所能得出的基本规律就是阻力最小的路线。在西欧，这样的路线就是政治活动，而《共产党宣言》表述出来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是运动当时所应采取的最合适不过的形式。但是，由于目前政治活动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政治运动已经搞得过于紧张，以至难以进展，甚至无法进展（近来选票数目增长得很慢，集会的群众情绪冷淡，书报上的论调低沉），另一方面，由于议会活动软弱无力，以及无组织的和几乎无法组织的工厂无产阶级愚昧群众走上舞台，所以，在西欧造成了现在称为伯恩施坦主义的东西，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工人运动从《共产党宣言》发表时起到伯恩施坦主义出现时止的发展

时期是一种最合事物逻辑的进程，把这全部进程加以细心研究，就能象天文学家那样准确地断定这个“危机”的结局。这里说的当然不是伯恩施坦主义的成败问题，因为这并没有多大意义；这里说的是党内早已逐渐发生的实际活动方面的根本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使党更加努力进行经济斗争，巩固经济组织，并且最重要的是促使党改变对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态度。固执己见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阶级的划分持过分死板的看法），将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党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也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党**将承认**社会；党的狭隘小团体的、多半是宗派主义性的任务，将扩大为社会的任务，而它的夺取政权的意图，就会变成适应现代实际情况和根据民主原则改变或改良现代社会的意图，以求最有效最充分地保护劳动阶级的权利（各种各样的权利）。“政治”这一概念的内容，就会扩大得具有真正的社会意义，而目前的一些实际要求就会具有更大的份量，就会引起比以前更大的注意。*

从上面关于西欧工人运动发展进程的概述中，不难得出对于俄国的结论。我们这里阻力最小的路线，绝对不在政治活动方面。不堪忍受的政治压迫虽然使人们不得不时常谈到这种压迫，并专心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它却始终不会推动人们采取实际行动。在西欧，力量薄弱的那部分工人，一卷入政治活动就在其中成长壮大起来，我国的情形却与此相反，力量薄弱的工人面对很沉重的政治压迫，不仅没有什么实际的办法来同这种压迫作斗争，从而求得本身的发展，而且还经常为这种政治压迫所窒息，甚至发不出纤弱的幼芽。更何况我国工人阶级又不象西欧战士那样具有组织精神的传统，所以我们这里的情景将会十分悲惨，连那些认为每增加一个工厂烟囱就是一件莫大幸事的最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感到沮丧。进行经济斗争也很困难，极其困难，但它终究还是可能进行的，并且群众自己也已经在实际进行了。俄国工人既然能在经济斗争中学习如何组织，并能时时

刻刻在这个斗争中触及政治制度问题，他们就终究会建立起称得上工人运动形式的一种东西，建立起某个或某些最适合俄国实际情况的组织。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俄国工人运动还处在原始状态中，还没有建立起任何形式。罢工运动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因此还不能称为俄国运动的固定形式，至于不合法组织，单从数量来看，也是不值得注意的（更不必说这种组织在现时条件下有什么益处了）。

*情形就是这样。此外，还有饥荒和农村破产现象助长着破坏罢工的行为，因而也就更难把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提到比较过得去的程度……试问，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究竟能有什么办法呢？！关于独立工人政党的议论，无非是把他人的任务，把他人的成绩搬到我国土地上来的结果。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现在还处在一种可怜的状态。他们现在的实际任务还很渺小，而他们的理论知识——由于**不是用作研究的工具**，而是当作活动的公式，——甚至对执行这些渺小的实际任务也没有什么价值。而且，从他人手中接过来的这些公式，从实践的意义来说也是有害的。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忘记了西欧工人阶级是在已经打扫干净的政治活动场所行动的，因此也就过分藐视了其他一切非工人的社会阶层所进行的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只要有人对带有自由主义政治性质的社会现象稍表关注，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就会表示反对，他们忘记了，许多历史条件使我们不能成为西欧那种马克思主义者，而要求我们拿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一种适合俄国条件并且为俄国条件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每个俄国公民都缺乏政治感觉和政治嗅觉，这一点显然不能靠对政治的高谈阔论或者向根本不存在的势力呼吁来求得弥补。政治嗅觉只能用教育来培养，就是说，只有参加俄国的现实生活（尽管它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性的）才能得到。在西欧，“否定”曾是（一时）适宜的，在我国就有害了，因为由一个有组织有实力的团体提出否定是一回事，而由没有组织起来的散漫的一群人提出否定，又是另一回事。*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出路只有一条：参加，也就是帮助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且参加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以"否定者"的身分出现了，这种否定削弱了他本应用在政治激进主义方面的那一份精力。这一切暂时还不可怕，可是，如果阶级公式妨碍俄国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实际生活，并且使之远离各个反对派集团，结果就会使所有在争取法的形式时只好不同尚未提出政治任务的工人阶级携手合作的那些人受到重大损失。俄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那种以政治空谈来掩盖的政治上的天真，可能使他们上一个大当。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会有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赞成这种观点。但是，无疑总会有人赞成这种思想的。所以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并且告诫全体同志务必防止俄国社会民主党脱离既定路线，这条路线就是组织一个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的、以争取政治自由为当前任务的独立的工人政党。

上面引录的《信条》，第一，是"西欧工人运动发展进程的概述"，第二，是"对于俄国的结论"。

首先，《信条》作者们对于以往西欧工人运动的看法就是完全不正确的。说西欧工人阶级没有参加过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和政治革命，这是不正确的。宪章运动[3]的历史，1848 年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就是一种反证。"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比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这句话，是完全不正确的。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是正当非政治的社会主义（欧文主义、"傅立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4]等等）流行的时候出现的，所以《共产党宣言》立即出来反对非政治的社会主义。甚至当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全副理论武装（《资本论》），并且组织了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5]的时候，政治斗争也绝不是一种流行的实践（当时在英国有狭隘的工联主义，在罗曼语国家有无政府主义和蒲鲁东主义）。在德国，拉萨尔的伟大历史功绩，就是他使工人阶级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变成了独立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

和政治斗争结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信条》作者们企图把这两种斗争形式分开，就是一种最拙劣最可悲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

其次，《信条》作者们对于西欧工人运动的现状以及作为这个运动旗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持有完全不正确的见解。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下流文人无聊的议论，他们竭力想把社会党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争论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会党的分裂。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6]，按照广大公众特别是《信条》作者们通常所了解的含义来说，就是企图缩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变为改良主义者的党，而这种企图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谴责。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派别已经出现过不止一次，但是每次都遭到忠实地恪守革命国际社会民主党原则的党的谴责。我们深信，把机会主义观点搬到俄国来的一切企图，也会遭到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样坚决的回击。

与《信条》作者们所说的相反，也根本谈不到西欧工人政党有什么“实际活动方面的根本变化”，因为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承认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 40 年代就已经驳斥了否认经济斗争的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91—198 页。——编者注]

过了 20 年左右，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在 1866 年日内瓦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工会和经济斗争的意义的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确切地指明了经济斗争的意义，警告社会党人和工人既不要夸大这种斗争的意义（当时在英国工人中间有过这种表现），也不要对这种斗争的意义估计不足（在法国人和德国人中间，特别是在拉萨尔派中间，有过这种表现）。决议认为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工会不仅是合乎规律的现象，而且是必然的现象；认为工会对于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本的日常斗争和消灭雇佣劳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决议认为工

会不应该仅仅注意“反对资本的直接斗争”，不应该回避工人阶级的一般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工会不应该抱着“狭小的”目的，而应该争取千百万被压迫工人大众普遍的解放。从那时起，各国工人政党已经不止一次提出，将来当然还会不止一次提出一个问题：在某个时候是否应该偏重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或者偏重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但是总的或原则的问题，现在还是同马克思主义原先提出的一样。至于无产阶级的统一的阶级斗争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信念，则早已深入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血肉之中了。其次，历史经验又确凿地证明，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

工人政党对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态度更谈不到有什么重大变化。就是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也指明了一个正确的立场，一方面反对夸大政治的意义，反对密谋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另一方面又反对轻视政治，或者把政治缩小为对社会进行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修补（无政府主义，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7]，教授社会主义等等）。无产阶级应该努力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把其他阶级和政党看作“反动的一帮”[8]，恰恰相反，它应该参加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应该支持进步阶级和进步政党去反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党，应该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应该成为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或种族的保护者，成为一切被压制的宗教以及无权的女性等等的保护者。《信条》作者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只是证明他们力图抹杀无产阶级斗争的阶级性质，用所谓空洞的“承认社会”来削弱这个斗争，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庸俗的改良主义的思潮。我们深信，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会坚决屏弃这种曲解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的观点。由于《信条》作者们关于西欧工人运动的前提不正确，他们得出的“对于俄国的结论”就更不正确了。

硬说俄国工人阶级“尚未提出政治任务”，这只能证明他们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无知。1878 年成立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9]和 1875 年成立的“南俄工人协会”[10]，就已经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了政治自由的要求。经过 80 年代的反动时期以后，工人阶级又在 90 年代不止一次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断定“关于独立工人政党的议论，无非是把他人的任务，把他人的成绩搬到我国土地上来的结果”，这也只能证明他们完全不懂得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迫切的任务。《信条》作者们自己提出的纲领，显然是想使工人阶级“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局限于经济斗争，而让“自由主义反对派”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参加”下去争取“法的形式”。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这样的纲领，就等于政治上自杀，就等于大大阻碍并降低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运动（我们认为这两个概念是一样的）。仅仅是这样一个纲领能够出现一事，就足以证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一位先进战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所表示的忧虑是多么有根据。他在 1897 年底谈到有可能出现这种前途：

“工人运动不越出工人和企业主间的纯经济冲突的狭小范围，它本身整个说来也就缺乏政治性质，而无产阶级先进部分在为政治自由斗争的时候，就会追随由所谓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小组和派别。”（阿克雪里罗得《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 年日内瓦版第 19 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对《信条》所表述的整个思想体系坚决宣战，因为这种思想会直接使上述的前途得以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极力设法实现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下面所说的另一种前途：

*“另一种前途就是社会民主党把俄国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独立政党，它在争取自由的时候**一方面**要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因为［注：以下无手稿。——俄文版编者注］将来会有这种派别）**并肩战斗并结成联盟**，另一方面要把知识界中最热*

爱人民的最革命的分子直接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或者引导他们前进。”（同上，第 20 页）

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写这段话的时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声明清楚地表明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持这种观点的。固然，有一家彼得堡工人报纸，即《工人思想报》[11]，好象同意了《信条》作者们的思想，竟令人遗憾地在发刊词（1897 年 10 月创刊号）中发表了一种根本错误的、同社会民主主义相对立的思想，说“运动的经济基础”可能“由于力求牢记政治理想而模糊起来”。但是同时彼得堡另一家工人报纸，即《圣彼得堡工人小报》[12]（1897 年 9 月第 2 号），却坚决主张，“只有组织坚强而且人数众多的工人政党，才能推翻专制制度……”，工人“组成强有力的政党”，“就能使自己和整个俄国从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还有一家报纸，即《工人报》[13]，在第 2 号（1897 年 11 月）的社论上写道：“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是俄国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俄国工人运动要是成为具有共同名称和严密组织的统一而严密的整体，就会使自己的力量增加十倍……”“各个单独的工人小组应当组成一个共同的政党。”“俄国的工人政党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当时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完全赞同《工人报》的这种信念，下面的事实就是证明：1898 年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14]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党的宣言，并且承认《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可见，《信条》作者们竟从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达到了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上明文确定了的发展阶段大大倒退了一步。现在，俄国政府的残酷迫害使党的活动暂时削弱，使党的正式机关报停刊，因此，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是要竭力使党彻底巩固起来，制定党纲，恢复党的正式机关报。象上面分析过的《信条》那样的纲领竟能出现，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现在存在着一种思想动摇，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把《宣言》中所阐述的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基本原则着重说明一下。第一，俄国社会民主运动“自

始至终都要成为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阶级运动”。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社会民主党的座右铭，应当是不仅要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而且要帮助工人进行政治斗争；不仅要针对当前的经济要求进行鼓动，而且要针对一切政治压迫进行鼓动；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设法继续发展并且实现这个理论，同时要保卫它，使它不致象许多“时髦理论”（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成就已经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时髦”理论了）那样常常被曲解和庸俗化。现在社会民主党应当全力以赴地到工厂工人和矿业工人中去进行活动，同时不应该忘记，随着运动的扩大，一定会有家庭工人、手工业者、农村工人以及千百万破产的饥寒交迫的农民加入它所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队伍。

第二，“俄国工人阶级应当而且一定能够用自己健壮的肩膀承担起争取政治自由的事业”。社会民主党既然把推翻专制制度作为当前任务，它就应当做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而且仅仅为了这一点也必须从各方面援助俄国居民中所有的民主分子，吸引他们来做自己的同盟者。只有独立的工人政党才能成为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坚固堡垒，其余一切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只有同这样一个政党结成同盟并且给它援助才能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第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派别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继承俄国以前一切革命运动的事业和传统；社会民主党把争取政治自由当作全党当前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向着老‘民意党’[15]的光荣活动家早已明确提出的目标前进”。俄国以前一切革命运动的传统，要求社会民主党现在集中全力来组织党，加强党内纪律并发展秘密活动的技术。如果说老“民意党”的活动家在俄国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当时拥护这些为数不多的英雄的社会阶层十分狭小，运动的旗帜也根本不是革命的理论，那么社会民主党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一定能

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以便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作斗争，直到社会主义完全胜利。”

我们请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团体和一切工人小组都来讨论上面引用的《信条》和我们的决议，并且明确表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以便消除各种意见分歧，促进组织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事业。

各团体和各小组的决议，可以报告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16]，该联合会按 1898 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决议第 10 条的规定，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并且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注：在《指南》中缺最后一段。——俄文版编者注］

注释：

[1]《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是列宁在流放地接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彼得堡寄来的一个经济派文件之后于 1899 年 8 月写的。列宁的姐姐称这个文件为“青年派的信条”，它的作者叶·德·库斯柯娃当时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成员。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在米努辛斯克专区叶尔马科夫斯克村召集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开会讨论了这个经济派文件和列宁起草的《抗议书》。与会的 17 人一致通过并签署了这个《抗议书》，他们是：列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瓦·瓦·斯塔尔科夫、A.M.斯塔尔科娃、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涅夫佐罗娃、弗·威·林格尼克、叶·瓦·巴拉姆津、阿·亚·瓦涅耶夫、Д.В.瓦涅耶娃、米·亚·西尔文、维·康·库尔纳托夫斯基、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波·勒柏辛斯卡娅以及彼得堡工人奥·亚·恩格贝格、亚·西·沙波瓦洛夫、H.H.帕宁。赞同《抗议书》的还有未出席会议的伊·卢·普罗明斯基、M.Д.叶菲莫夫、切卡利斯基、柯瓦列夫斯基以及图鲁汉斯克的流放者（尔·马尔托夫等人）和维亚特卡省奥尔洛夫市社会民主党人流放者。

列宁把《抗议书》寄到了国外。格·瓦·普列汉诺夫收到后立即将它发排，供《工人事业》杂志最近一期刊用。然而，参加该杂志编辑部的国外联合会青年派成员，没有通知普列汉诺夫，就于 1899 年 12 月将《抗议书》单另印出，并附一篇编后记，说《信条》只反映某些人的看法，这些人的立场对俄国工人运动并无危险，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内部不存在经济派，等等。1900 年初，普列汉诺夫把《抗议书》收入他所编辑的批评经济派的文集《〈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收载的本文献，前一部分按手稿刊印，后一部分按《工人事业》杂志单行本刊印，并和《〈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一书核对过。——144。

[2]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伊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 1883 年 8 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 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 1885 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301 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

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 1903 年 8 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144。

[3]宪章运动是 19 世纪 30—50 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 1836 年成立，1837 年起草了给国会的争取普选权的请愿书。这个请愿书于 1838 年 5 月定名为《人民宪章》，并用法案形式公布。宪章提出了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 21 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 年 7 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国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治·哈尼、厄内斯特·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150。

[4]“真正的社会主义”，亦称“德国的社会主义”，是 19 世纪 40 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代表人物有莫·赫斯、卡·格律恩、奥·吕宁、赫·克利盖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德国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他们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一些范畴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进行唯心主义的改造，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实现真正的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他们还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拒绝进行政治活动，从小市民的利益出发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反对在德

国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用超阶级的“博爱”和“人性”等道德说教来代替革命的阶级斗争。——150。

[5]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组织，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建立。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规定其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为完全解放工人阶级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领导机关是总委员会，马克思是总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积极支持了 1871 年的巴黎工人起义。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工人运动处于低潮。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 1876 年 7 月在费城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150。

[6]“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 年）一书是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150。

[7]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企图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主要代表为约·卡·洛贝尔图斯和费·拉萨尔。洛贝尔图斯主张由普鲁士王朝

制定工资标准，实施社会改革，以逐步实现土地和资本的国有化。拉萨尔主张工人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抹杀国家的阶级性，企图加强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对讲坛社会主义有相当大的影响。——152。

[8]指拉萨尔派的一个论点：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个论点写入了 1875 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哥达纲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这个论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24—25 页）。——152。

[9]“俄国北方工人协会”是俄国工人阶级最早的革命政治组织之一，1878 年底在彼得堡成立。创建人是钳工维克多·奥布诺尔斯基和木工斯捷潘·哈尔图林。会员和同情者各约 200 人。协会只吸收工人参加，其活动是秘密的。协会的纲领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先进阶级，工人争得政治权利和自由是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必要条件。纲领号召俄国工人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一道进行阶级斗争，并提出协会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国家现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个纲领也还带有民粹主义影响的某些痕迹。协会在彼得堡各工厂进行革命宣传，领导并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1880 年 2 月 15 日，它出版了俄国最早的秘密工人报纸《工人曙光报》创刊号。此后不久，报纸的印刷厂被破坏，协会也由于主要成员被捕而停止活动。——153。

[10]“南俄工人协会”是俄国第一个工人革命政治组织，1875 年 7 月间由革命知识分子叶·奥·扎斯拉夫斯基在敖德萨创立。协会有会员 60 人，同情者 150—200 人。协会章程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到工人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指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工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承认，并且和 70 年代前半期一些民粹主义纲领截然不同，提出了必须进行政治斗争的问题。但是这个章程总的说来还未摆脱民粹主义的世界观。协会成员阅读和传播革命书刊，积极参加组织罢工，并

试图在南俄其他工业城市开展协会的活动。协会于 1875 年底—1876 年初被沙皇政府破坏。——153。

[11]《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机关报，1897 年 10 月—1902 年 12 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 16 号。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见本卷第 209—238 页)和《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154。

[12]《圣彼得堡工人小报》(《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Рабочий　Листок》)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秘密报纸，共出过两号：第 1 号于 1897 年 2 月(报上印的是 1 月)在俄国油印出版，共印 300—400 份；第 2 号于同年 9 月在日内瓦铅印出版。该报提出要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广泛的政治要求结合起来，并强调必须建立工人政党。——154。

[13]《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基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秘密报纸，波·李·埃杰尔曼、巴·卢·图查普斯基、尼·阿·维格多尔契克等任编辑，在基输出版。共出过两号：第 1 号于 1897 年 8 月出版；第 2 号于同年 12 月出版(报纸上印的日期是 11 月)。图查普斯基曾受编辑部委派出国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得到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等给报纸撰稿的许诺。《工人报》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也有联系。《工人报》参与了 1898 年 3 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被这次代表大会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代表大会以后不久，

《工人报》的印刷所被警察破获和捣毁，已编好待发排的第 3 号没能出版。1899 年该报试图复刊，没有成功。——154。

[14]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1898 年 3 月 1—3 日（13—15 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倡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早在 1895 年 12 月列宁就在狱中草拟了党纲草案，并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由于彼得堡等地的组织遭到警察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基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担任。出席代表大会的有 6 个组织的 9 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 1 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 2 名，崩得的代表 3 名。大会通过了把各地斗争协会和崩得合并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在民族问题上，大会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决权。大会选出了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代表斯·伊·拉德琴柯、基辅《工人报》代表波·李·埃杰尔曼和崩得代表阿·约·克列梅尔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在会后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把争取政治自由列为首要任务，并把它和将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被宣布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而且大会闭幕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遭逮捕，所以统一的党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154。

[15]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 1879 年 8 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费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

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 1881 年 3 月 1 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 1881 年以后就瓦解了。列宁批判了民意党人的乌托邦式的纲领，但十分敬重他们同沙皇制度英勇斗争的精神。——156。

[16]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 1894 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 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 年 3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 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 年 11 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和列宁的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 1899 年 4 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 年 4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 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156。

为《工人报》写的文章[1]

列宁 （不早于 1899 年 10 月）

给编辑部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

寄上应约为你们报纸写的三篇文章。我认为有必要就我的撰稿问题，特别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说几句话。

看了你们上次的通知，我以为你们是想创办一个出版社，并且要我来编纂一套社会民主主义丛书。

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你们成立了编辑部，并且着手出版报纸和约我撰稿。

这个建议我当然也愿意接受，但是同时必须说明，顺利的合作**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有可能：（1）编辑部和撰稿人之间要保持**密切的**联系，把有关一切来稿的处理情况（刊用，不刊用，修改）**通知**撰稿人，并且**把你社的一切出版物告知**撰稿人；（2）我的文章都用笔名（如果我写去的笔名遗失，就请代选一个）；（3）编辑部和撰稿人对理论问题、当前的具体任务和怎样编好报纸（或丛书）的基本看法要一致。

我希望编辑部会同意这些条件，为了让我们尽快地达成协议，现在我谈一谈与第三个条件有关的问题。

正如来信所说，你们认为"旧思潮很强大"，因此同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反映进行论战没有多大必要。我认为这种看法太乐观了。伯恩施坦曾经公开宣称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他的观点一致[2]；国外"青年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与"旧思潮"的奠基者、代表者和最忠实的捍卫者"劳动解放社"已经分裂[3]；《工人思想报》拼命宣扬一些时髦的言论，拼命反对"广泛的"政治任务，竭力

赞美一些小事情和手工业方式，庸俗地讥笑“革命理论”（见该报第 7 号上《随笔》一文）；最后，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界完全处于混乱状态，其中许多人明目张胆地要求采纳伯恩施坦主义的时髦“批评”，——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清楚地说明，复兴“旧思潮”、坚决捍卫“旧思潮”正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你们从我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我怎样看待报纸的任务和办报的计划，我很想知道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致到什么程度（文章是写了，可惜仓促了一点，总之，我极需知道最迟什么时候截稿）。

我认为，同《工人思想报》**必须直接展开论**战，为此请寄给我**第 1—2 号、第 6 号和第 7 号以后的《工人思想报》以及《无产阶级斗争》**[4]。我需要这本文集还为了在报纸上发表对它的评论。

你们来信说篇幅不受限制。我认为，既然有了报纸，最好登载一些报纸论文，这些论文甚至可以探讨一些专题，以备日后改编成小册子。我最近拟写作的问题如下：（1）即将寄上的纲领草案[5]；（2）下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6]将要讨论的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3）关于工人和社会党人在行动自由时、在狱中或流放地行动准则的小册子。拟以波兰的《行动准则》这本小册子为蓝本（如有可能，请寄给我一本）；（4）谈谈罢工（一、罢工的意义；二、反罢工法；三、近年来几次罢工的概况）；（5）《妇女和工人事业》小册子，等等。

我很想大体知道编辑部拥有哪些材料，以免重复和再谈已经“谈透的”问题。

等待编辑部的回信，来信可通过原转送站。（**除了这个途径，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无法同你们取得联系。**）

弗·普·

我们的纲领

目前国际社会民主党正处于思想动摇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凡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打算出版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人，都应该以明确的态度对待这个不仅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才关心的问题。

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说明了雇用工人、购买劳动力怎样掩盖着一小撮资本家、土地占有者、厂主、矿山主等等对千百万贫苦人民的奴役。它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怎样使小生产逐渐受大生产的排挤，怎样创造条件，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成为可能和必然。它教导我们透过那些积习、政治手腕、奥妙的法律和诡辩的学说看出**阶级斗争**，看出形形色色的有产阶级同广大的贫苦人民、**同**领导一切贫苦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密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组织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现在要问，那些纠集在德国社会党人伯恩施坦周围、在这一时期大喊大叫要“革新”这个理论的人，究竟对这个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什么也没有**，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他们并没有教给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他们只是向后退，借用一些落后理论的片言只语，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对无休止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党人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实行让步的理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的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的最时髦的“批评”

作了无情的批判[7]，他做得完全正确。现在连德国工人的代表人物也屏弃了伯恩施坦的观点（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8]。

我们知道，说这些话会受到百般的责难，有人会大叫大嚷，说我们想把社会党变成一个“正统教徒”会，迫害那些背弃“教条”、具有独立见解等等的“异端分子”。我们熟悉所有这些时髦的刻薄话。不过这些话一点也不正确，也毫无意义。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这决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因此我们很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

在俄国运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共同的纲领时，究竟会产生哪些主要问题呢？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纲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为经济斗争（反对个别资本家或个别资本家集团，争取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和政治斗争（反对政府，争取扩大民权，即争取民主和争取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有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办《工人思想报》的那些人大概可以包括在内）认为经济斗争重要得多，而政治斗争则似乎可以推延到比较遥远的将来。这种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

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到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即帮助工人去同厂主进行日常斗争，叫他们注意压迫的种种形式和事实，从而向他们说明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忠实拥护者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的忠实拥护者，甚至不止一次地试图组织纯经济性的工会来引诱工人离开“政治”，离开社会主义。俄国政府也很可能会采取某种类似的办法，因为它总是设法给人民小恩小惠，确切些说，假仁假义地施与人民小恩小惠，目的只是使人民不去考虑自己毫无权利和备受压迫的状况。如果工人不能象德国工人和欧洲其他一切国家（土耳其和俄国除外）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的集会这些权利，那么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给他们带来持久的改善，甚至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任何经济斗争。而要想获得这些权利，就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在俄国，不但工人而且全体公民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俄国是一个专制君主制即无限君主制的国家。沙皇独自颁布法律，任命官吏，监督官吏。因此，看来**好象**俄国沙皇和沙皇政府不从属于任何阶级，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官吏都来自有产者阶级，而且都受大资本家的支配。大资本家可以任意驱使各个大臣，可以为所欲为。俄国工人阶级受着双重压迫：他们受资本家和地主的抢劫和掠夺，为了使他们不能反抗，警察还把他们的手脚束缚起来，把他们的嘴堵住，对一切试图维护民权的人进行迫害。每次反对资本家的罢工都会引起军警对工人的袭击。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既然彼得堡一个城市的工人在社会党人的帮助不大的情况下能够很快地迫使政府让步——颁布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9]，那么整个俄国工人阶级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领导下就一定能够通过顽强的斗争获得无比重大的让步。

俄国工人阶级即使得不到其他任何阶级的帮助，也能单独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但是在政治斗争中工人并不是孤立的。人民毫无权利，强盗官吏横行霸道，也激怒了一切对限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行为不能容忍的比较正直的知识界人士，激怒了受迫害的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和俄国的教派信徒，激怒了受官吏和警察欺压而又无处投诉的小商人、小企业主和小农。所有这些居民集团是无力单独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的，但是只要工人阶级举起斗争的旗帜，他们就会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伸出援助的手。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旦成为一切争民权、争民主的战士的领袖，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观点，我们将在我们的报纸上系统而全面地发挥这些观点。我们深信，这样做我们就能沿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所指引的道路前进。

我们的当前任务

俄国工人运动现在处于过渡时期。西部边疆区、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其他城市工人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良好的开端，结果是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8 年春）。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迈出了这一大步以后，好象暂时用尽了全部力量，又重新回到过去各地方组织分散活动的状态。党并不是不存在了，它只是在致力于积聚力量，把团结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事业放在牢固的基础上。实现这种团结，为这种团结创造适当的形式，彻底摆脱狭隘的地方分散性，——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什么是阶级斗争呢？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起来反对他们的厂主，这是不是阶级斗争呢？不是，这只是阶级斗争娇弱的萌芽。只有当全国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切先进人物都意识到自己是属于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并且开始同**整个**资本家**阶级**和维护这个

阶级的政府进行斗争，而不是同个别厂主进行斗争的时候，工人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只有当个别的工人意识到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员，认识到他每天同个别厂主和个别官吏进行小的斗争就是在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整个政府的时候，他们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75 页。——编者注］，——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工人同厂主的任何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斗争，那就错了。这句话应当这样理解：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随着**这个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而必然成为**政治**斗争。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工人组织起来，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和鼓动，从而把他们反对压迫者的自发斗争**变成**整个阶级的斗争，**变成**一定的**政党**争取实现一定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单靠地方工作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工作在我国已经有相当大的开展。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种子已经散播在俄国各地；从彼得堡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从高加索到乌拉尔，全俄国的工人都已经熟悉了第一种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工人传单。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正是把所有这些地方工作汇合成一个**政党**的工作。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克服的主要缺点，就是地方工作的狭隘性和“手工业”性。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俄国工人运动中的许多表现都成了纯粹地方性的事件，大大失去了它们作为俄国整个社会民主运动的范例和作为俄国整个工人运动的阶段的意义。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工人不能充分意识到全俄国工人的利益的共同性，不能很好地把俄国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自己的斗争结合起来。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同志们对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各种不同看法不能在中央机关报上公开讨论，不能供我们在制定共同的党纲和策略时参考，而是消失在狭隘的小组习气中，或者使得偶然出现的地方特点过分夸大。我们已经尝够这种手工业方式的苦头了！我们已

经足够成熟，完全有可能**来共同工作**，制定共同的党纲和一起讨论我们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

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批判各种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旧理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它并没有仅仅局限在批判和抽象议论上；它证明了它的纲领并不是悬在空中，而是适应人民群众即工厂无产阶级的大规模自发运动的需要的；它现在需要采取下面这个特别艰巨的但也是特别重要的步骤：给这个运动制定一种适合于我国条件的组织形式。社会民主党不能只是简单地为工人运动服务，因为它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体**"（这里用的是卡·考茨基的定义，它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它的任务是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明确的社会主义理想，把这个运动同合乎现代科学水平的社会主义信念结合起来，同争取民主这一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的有步骤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一句话，就是要把这种自发运动同**革命政党**的活动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我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制定我们党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所必须掌握的**材料**。但是对这些材料应该进行独立的"整理"，现成的范例是无处可寻的。一方面，俄国工人运动的条件与西欧工人运动完全不同，所以在这一点上抱某种幻想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党同俄国过去的一些革命政党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固然必须向俄国老一辈的卓越革命家和秘密活动家学习（我们毫不犹豫地承认这种必要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不对他们抱批判的态度，不能因此而不独立制定自己的组织形式。

由于提出了这个任务，下面两个主要问题就特别重要。（1）社会民主党地方性活动必须完全自由，同时又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这两者应该怎样结合起来呢？社会民主党是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汲取全部力量的，这种运动在各个不同的工业中心的表现形式和发生的时间都不同；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的活动是党的全部活动的**基础**。但是，如果这是一些孤立的"手工业者"的活动，

那么严格说来，就不能把它叫作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因为这并不是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2）社会民主党力求成为一个以争取政治自由为主要目标的革命政党，同时又坚决不策划政治密谋，坚决不“号召工人修筑街垒”（按照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正确说法[10]），或强迫工人去接受某些革命者所拟定的某种袭击政府的“计划”，这两者又应该怎样结合起来呢？

俄国社会民主党完全有权利认为，它**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再谈这些问题，就会重复《我们的纲领》一文说过的话了。现在应该谈的是怎样**实际**解决这些问题。实际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小组所能胜任的，只有整个社会民主党有组织地进行活动才能办到。我们认为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为此就必须把**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作为我们的当前目标。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把这个工作作为最近期间的**全部**活动内容。没有这样的机关报，地方工作仍然是狭隘的“手工业方式”的。不通过一种报纸把党的正确的代表机关建立起来，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句空话。不通过中央机关报把经济斗争联合起来，经济斗争就不可能成为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如果全党不在一切政治问题上发表意见，不指导各个斗争，那么政治斗争就不可能进行。不在中央机关报上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不集体确定一定的**活动方式和活动准则**，不通过中央机关报来确立每个党员对全党**负责**的原则，要想组织革命力量，进行纪律教育，提高革命技术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说必须集中党的**一切**力量——一切写作力量、一切组织才能、一切物资等等来创办和办好全党机关报，丝毫也没有想把其他活动，例如把地方性的鼓动、游行、抵制、追查奸细、攻击资产阶级和政府中个别的人、示威性的罢工等等推到次要地位。恰恰相反，我们深信这种种活动构成了党的活动的**基础**，但是，如果**不**通过全党机关报把它们结合起来，所有这些革命斗争的形式就会**失去十分之**

九的意义，就不能创造党的共同经验，树立党的传统和继承性。党的机关报不但不会同这些活动对立，反而会给这种活动的扩展、加强和系统化以极大的影响。

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来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的机关报，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处境独特，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俄国旧的革命政党大不相同。德、法等国的工人除了出版报纸以外，还有许多公开活动的形式和组织运动的方法，如议会活动、竞选鼓动、人民的集会、参加地方社会团体（乡村的和市镇的）、公开领导手工业者联合会（工会、行业工会）等等，等等。而我们在取得政治自由以前，则必须用革命的报纸来**代替这一切**，而且正是代替这一**切**。没有革命报纸，我们**决**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我们不相信密谋手段，我们拒绝用个别的革命行动去摧毁政府；我们的实际行动口号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所说的：“Studieren，propagandieren，organisieren”，即学习，宣传，组织，而能够并应当成为这些活动的中心的，只有**党的机关报**。

但是，是否有可能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才有可能把这样的机关报办得正规，办得比较扎实呢？这一点我们下次再谈。

迫切的问题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我们的迫切任务是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的机关报，我们还提出了这个目标是否可能达到和在什么条件下可能达到的问题。现在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的几个最重要的方面。

首先，有人会反对我们说，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先**开展地方小组的活动。我们认为这种相当普遍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必须立即着手把党的机关报，进而把党本身建立和巩固起来。采取这个步骤所必需的条件已经具备：地方工作在进行，而且显然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因为愈来愈频繁的暴行只能造成短时间的中断，战斗中牺牲的人很快就由新生力量补充。党不仅在国外而且在

国内也有出版经费和写作力量。可见问题在于，是应该继续按“手工业”方式进行**已在进行的**工作呢，还是应该把这种工作搞成一个党的工作，使它全部反映在一个共同的机关报上。

这样我们就涉及到我们运动中一个迫切问题，即运动中的一个症结——组织问题。我们急需健全革命的组织和纪律，改进秘密活动的技术。应该坦白承认，我们在这方面落后于俄国旧的革命政党，因此必须全力以赴地赶上和超过它们。不健全组织，就不可能使我国工人运动有任何进展，尤其不可能建立一个能正常出版报纸的积极政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党的现有机构（指机关、小组和报纸而言）必须更多地注意组织问题，并在这方面影响地方小组。

手工业方式的地方工作，总要过于频繁地进行个人联系，总要养成一种小组习气。可是我们已经成长起来，不适合于小组活动了，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来说，小组就显得太狭窄，而且会造成力量的严重浪费。只有联合成一个党，才能逐步贯彻分工和节省人力的原则。为了减少损失和建立一个比较巩固的堡垒来反抗专制政府的压迫和疯狂的迫害，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在我们面前，在俄国各地处于“地下”状态的社会党人小组面前，有极其强大的现代国家的庞大机构，它竭尽一切力量来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我们深信，我们最后一定能摧毁这个警察国家，因为一切健康的和发展着的人民阶层是赞成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但是为了有条不紊地进行反政府的斗争，我们必须使革命的组织、纪律和秘密活动的技术达到最完善的地步。必须使每个党员或每个党组织在党的工作的某一方面专业化：有的翻印书报，有的从国外转运书报，有的把书报分送俄国各地，有的在各城市分送，有的安排秘密活动的处所，有的筹募经费，有的传送有关运动的通讯和一切消息，有的负责联络，如此等等。我们知道，这种专业化比起平常的小组工作来，要求我们更坚毅，更善于集中精力从事平凡的、细小的、打杂的工作，更加发挥真正的英雄气概。

俄国社会党人和俄国工人阶级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作出英勇的事迹，因此，一般说来，抱怨我们缺乏人手是不对的。青年工人迫不及待地渴望接受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尽管监狱和流放地已有人满之患，帮助工人的人却不断从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涌现出来。如果能向所有这些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来的新兵广泛宣传必须使组织更加严密的思想，那么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报的计划就不再是一种幻想了。实现这个计划的条件之一，是要保证报纸正常地收到各地的通讯和材料。在我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各个时期，连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也完全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一点难道历史没有证明吗？如果在各地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把党报看成**自己的**报纸，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同它保持经常的联系，在党报上讨论自己的问题，在党报上反映本地整个运动的情况，那么即使采用的秘密活动方式并不特别巧妙，也完全能保证报纸收到关于运动的各方面消息。另一方面，即把报纸正常地送到俄国各地，是一项更艰巨的任务，比俄国革命运动旧形式下的同样任务要艰巨得多，因为那时报纸的对象还不是现在这样广泛的人民群众。但是社会民主党办报的宗旨使报纸很容易散发。报纸应当正常而大量发行的主要地方，是工业中心、工业城镇和大城市的工厂区等等。这些中心地区的居民几乎全是工人；工人在这些地方实际上居于主人地位，他们可以千方百计地瞒过机警的警察；这些地方同附近工业中心的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代（从 1878 年到 1890 年）[11]，德国政治警察干得不比俄国警察差，甚至可能比他们还好，但是德国工人由于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强，终于使他们每周出版的秘密报纸正常地从国外运到国内，而且送到每个订阅者家里，连大臣们也不能不佩服社会民主党的邮政（“红色邮政”）。这种成绩我们当然不敢奢望，但是我们只要全力以赴，就完全能使我们的党报每年至少出 12 次，并且能正常地送到运动的各个主要中心的所有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工人手里。

我们在回过来谈专业化问题的时候，还必须指出，专业化所以不够，一方面是由于工作的“手工业方式”占优势，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各地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平常关于组织问题谈得太少了。

只有把全党机关报创办起来，才能使革命事业中“做局部工作的人”意识到他是在“步伐整齐的行列”里行进，他的工作直接为党所需要，他是那根一定要勒死我国专制政府，即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全体人民的死敌的链条上的一环。只有严格实行这种专业化，才能节省人力：不仅可以用更少的人来完成每一项革命工作，而且可以使目前活动的若干方面**合法化**（即为法律所许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前进报》[12]早就建议俄国社会党人使自己的活动**合法化**，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活动。骤然看来，这种建议使人感到惊讶，但是实际上很值得重视。差不多每一个在城市的地方小组中工作过的人都会很容易地回忆起来，在他所做的许多各种各样的工作中，有些本身就是合法的（如收集有关工人生活状况的材料，研究涉及许多问题的合法书刊，阅读某些外国书刊并作介绍，进行某种联络工作，帮助工人学文化，研究工厂法，以及其他许多工作）。把这类工作交给专门的人员去做，就会减少积极的、“在火线上”的革命大军的人数（但丝毫不会削弱它的“战斗力”）和增加替补“伤亡人员”的后备力量。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使战斗人员和后备人员在全党机关报上看到自己活动的反映，感觉到自己同党报的联系。当然，不管我们怎样彻底实行专业化，工人和地方小组的地方性会议总是需要的。但是人数众多的革命集会（这种集会受警察破坏的危险性特别大，因此与会议的效果相比往往是得不偿失的）将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各种不同的革命工作由专人负责就更有可能用合法的会议形式如娱乐会、合法社团的会议等等来掩护这种会议。既然拿破仑第三时代的法国工人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德国工人都能够千方百计地掩护他们的政治性会议和社会主义会议，那么俄国工人也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其次，只有改善党的组织和创办全党机关报，才能使社会民主党宣传和鼓动的内容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刻。我们很需要做到这一点。地方工作几乎必然会夸大地方特点，会……［注：部分手稿遗失。——俄文版编者注］没有中央机关报（它同时也是先进的民主机关报），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把社会民主党变成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的**愿望**才能**实现**。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制定明确的策略。社会民主党屏弃了“反动的一帮”[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页。——编者注]这一谬论。它认为利用各个进步阶级的合作来反对反动阶级，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如果各个组织和机关报仍然是地方性的，那么这项任务几乎不可能执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能同个别“自由派”取得联系和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合作”外，别的什么也谈不上。只有彻底贯彻政治斗争原则和高举民主旗帜的全党机关报，才能把一切战斗的民主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才能利用俄国一切进步力量来争取政治自由。只有到那时候，才能把工人对警察和当局的敢怒而不敢言的憎恨变成对专制政府的自觉的憎恨，变成为工人阶级和俄国全体人民的权利而进行殊死斗争的决心！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将成为现代俄国的一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以后几号，我们将登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并且将开始更详细地讨论一些组织问题。

注释：

[1]《我们的纲领》、《我们的当前任务》和《迫切的问题》这三篇文章是列宁在流放中为《工人报》写的。1899年崩得中央委员会试图恢复《工人报》时，编辑部曾先后建议列宁参加编辑和撰稿。由于《工人报》复刊未成，这些文章当时也就没有发表。——157。

[2]爱·伯恩施坦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附注中（第1版第169—170页）声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大多数同意他的观点的。格·瓦·普列汉诺夫曾于1898年7月在《新时代》杂志第44期上发表了《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一文，同年10月底—11月初又在《萨克森工人报》第253—255号上发表了《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一文，批判伯恩施坦从1896年起以《社

会主义问题》为题在《新时代》杂志发表的那一组修正主义文章。上述伯恩施坦的话意在反驳普列汉诺夫对他的批判，为自己辩解。——158。

[3]指 1898 年 11 月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分裂。——158。

[4]《无产阶级斗争》文集第 1 期是俄国乌拉尔社会民主党小组在 1898 年冬出版的。文集的撰稿者站在经济主义的立场上否认成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必要性，认为用总罢工的方法就能完成政治革命。列宁在《怎么办？》第 4 章第 2 节中，对文集的观点作了评述（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158。

[5]指《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一文（见本卷第 186—208 页）。——158。

[6]这里说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倡议于 1900 年春在斯摩棱斯克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得到崩得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支持。1900 年 2 月，参加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代表伊·克·拉拉扬茨曾到莫斯科同列宁商谈由代表大会恢复《工人报》和由列宁、亚·尼·波特列索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该报编辑部的问题。列宁和劳动解放社的成员都认为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为时尚早（见本卷第 284—285、315—316 页），但是劳动解放社没有拒绝参加，而委托列宁代表它出席，还从国外把代表证书寄给了列宁。代表大会由于 1900 年 4—5 月间各社会民主党组织有许多人被捕而没有开成。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158。

[7]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和《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两篇文章中对爱·伯恩施坦的批判。——161。

[8]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于 1899 年 10 月 9—14 日举行。奥·倍倍尔就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击”作了报告。代表大会议程所以列入这个问题，是因为以爱·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要修改马

克思主义理论，并要求重新审查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政策和策略。代表大会通过的专门决议否决了修正主义者的要求，但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开展起来。列宁对倍倍尔的报告给予很高评价（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3 卷《奥古斯特·倍倍尔》一文）。——161。

[9]指 1895 年特别是 1896 年以纺织工人为主的彼得堡工人罢工。1896 年的罢工开始于 5 月底，起因是工厂主拒绝给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并波及机器、橡胶、造纸、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 3 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会散发了传单和宣言，号召工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 10＋（1/2）小时，提高计件单价，按时发放工资等。列宁称这次罢工为著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它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 1897 年 6 月 2 日（14 日）颁布了将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缩短为 11＋（1/2）小时的法令。——163。

[10]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所写序言中的一段话：“任何一个天真的读者也决不会认为，作者是建议人们去号召工人修筑街垒或者唆使工人搞密谋。……作者是要工人政党发展和壮大到自己感到足以同专制制度进行决战时再来解决‘给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的手段问题……”——168。

[11]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 1878 年 10 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 1000

多种书刊被查禁，300 多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 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 1890 年 10 月被废除。——172。

[12]《前进报》(《Vorwarts》) 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 1876 年 10 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 年 10 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 年 10 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 1884 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 1891 年 1 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 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 年停刊。——173。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

列宁（1899 年底）

《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出版了《〈工人思想报〉增刊》（1899 年 9 月），希望“消除对《工人思想报》倾向的许多误解和模糊看法（例如说我们“否定”“政治”等）”（《编辑部的话》）。我们非常高兴，《工人思想报》终于公开地提出了它似乎一直不想涉及的纲领性问题。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工人思想报》的倾向就是俄国先进工人的倾向”的说法（如编辑部在《增刊》中所作的声明）。不，如果《工人思想报》编辑部想走上述《增刊》所规划（目前只是**在规划**）的道路，那就是说，它错误地理解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所制定的、全体在俄国活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历来所遵循的纲领；那就是说，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达到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阶段比起来，它**倒退了一步**。

《增刊》的社论《我国的实际情况》（署名：**尔·姆·**）表述了《工人思想报》的倾向。因此我们现在应该详细地分析一下这篇社论。

社论一开头就表明，**尔·姆·非常错误地**描述了“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我国的工人运动，暴露了他对工人运动的理解是极其狭隘的，暴露了他企图无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领导下创造出来的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尔·姆·**在社论的开头就这样说：其实，“我国工人运动具有各种各样组织形式的萌芽”，从罢工协会一直到合法的（法律许可的）团体。读者会困惑地问道：就是这些吗？难道**尔·姆·**在俄国再没有看到工人运动**更高级**、更先进的组织形式吗？显然，他是不愿意看到这些组织形式的，因为在下一页他更加肯定地重述了自己的论点，他说：“当前运动的任务，俄国工人的真正工人事业，就是要工人**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改善自己的状况”，而他所列举的方法，又**只**限于罢工组织和合法团体！这样一来，俄国工人运动似乎就**只限于**罢工和组织合法团体了！但是这绝对**不符合事实**！早在 20 年

前，俄国工人运动就已经创立了广泛的组织，提出了较广泛的任务（现在我们就更详细地来谈这一点）。俄国工人运动创立了圣彼得堡“斗争协会”[1]、基辅“斗争协会”[2]、犹太工人联盟[3]这一类组织。但是**尔·姆·**说，犹太工人运动带有“独特的政治性”，是一个例外。这又不符合事实，假如犹太工人联盟是一个“独特的”组织，它就**不会**同俄国的一些组织**联合起来**，就不会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是俄国工人运动同俄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重大步骤。这一步骤清楚地表明，俄国工人运动**并不限于**罢工和组织合法团体。为什么给《工人思想报》撰文的俄国社会党人不愿意看到这一步骤，不愿意理解这一步骤的意义呢？

这是因为**尔·姆·**既不了解俄国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关系，也不了解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尔·姆·**写道：“我国运动方向的最显著的标志，当然就是工人提出的要求。”我们要问，为什么不把**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要求看作**我国运动**的标志呢？尔·姆·凭什么理由把工人的要求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要求分割开来呢？**尔·姆·**在整篇文章中采取的这种做法，同《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在每号报纸中所采取的做法是一样的。为了说明《工人思想报》的这个错误，我们必须说明**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关系这个总问题。在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最初都是互不相关的。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组织罢工和建立工会，而社会主义者则站在工人运动之外，著书立说，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要求用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这种制度。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相关，使得两者都软弱无力，难以发展。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不同工人斗争相结合，就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善良的愿望，对实际生活不会发生影响；而工人运动则只会陷于零散状态，不会有政治意义，也不会得到当时先进科学的指导。因此我们看到，欧洲各国已愈来愈趋向于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样结合起来，工人的阶级斗争就成了**无产阶级**争

取从有产阶级剥削下解放出来的**自觉斗争**，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也就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就是引导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创立的革命理论，阐明了这种结合的必要性，指出了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在俄国，情况也完全一样。我国社会主义在长达数十年的时期内一直**脱离**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脱离**工人的罢工等等。一方面，这是因为社会党人不了解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它不适用于俄国；另一方面，是因为俄国工人运动还完全处于萌芽状态。1875 年成立了“南俄工人协会”，1878 年成立了“俄国北方工人协会”，这些工人组织没有受俄国社会党人思潮的影响；这些工人组织要求给人民政治权利，想为争取这些权利进行斗争，可是当时俄国社会党人错误地认为，进行政治斗争是违背社会主义的。但是，俄国社会党人并没有停留在自己不成熟的错误的理论上。他们前进了，他们领会了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了适用于俄国的工人社会主义理论，即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是“劳动解放社”即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他们的朋友们的主要功绩。[注：我们有位同志写了一本小册子《红旗在俄国。俄国工人运动史纲》。在这本书中，他从历史上研究了俄国社会主义和俄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这本小册子即将出版。[4]] 俄国社会民主党建立（1883 年）以后，每次广泛的俄国工人运动都是直接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关的，并且力求同他们结合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1898 年春），是大踏步向这种结合迈进的标志。现在，俄国一切社会党人和一切觉悟工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这种结合，巩固和整顿“社会民主工党”。谁不愿意了解这种结合，谁企图在俄国把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人为地分割开来，谁就会给俄国工人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事业带来**害处**，而不是带来好处。

我们再往下看。**尔·姆·**写道：“至于广泛的要求，即政治要求，我们认为只有 1897 年彼得堡织工……的要求，是我国工人第一次不很自觉地提出的这类广泛的

政治要求。”我们又要说，这是**绝对错误的**。《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刊登了这类言论，这表明：第一，它忘掉了俄国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历史，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不可原谅的；第二，它狭隘地理解工人事业，这也是不可原谅的。在1898年圣彼得堡斗争协会的五月传单中，在《圣彼得堡工人小报》和《工人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先进组织在1898年承认该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正式机关报）上，俄国工人都提出过广泛的政治要求。《工人思想报》忽视这些事实，向后倒退，这就完全证实了以下看法：《工人思想报》代表的不是先进工人，而是无产阶级中不开展的水平低的部分（**尔·姆**·本人在文章中也说到已经有人向《工人思想报》指出了这一点）。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不知道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尔·姆**·也不知道这个历史。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不懂得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尔·姆·也不懂得这种关系。为什么90年代的俄国工人没有象70年代的俄国工人那样建立自己的独立于社会党人的特殊组织呢？为什么他们没有独立于社会党人而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呢？**尔·姆**·显然是这样解释的：“俄国工人在这方面的修养还很差”（他的文章第5页），但是，这种解释只不过再一次证明他只有权利代表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说话。工人中水平低的部分在90年代运动的过程中没有意识到运动的政治性质。虽然如此，但是大家都知道（**尔·姆**·自己也谈到这一点），90年代的工人运动具有广泛的政治意义。这是因为先进工人随时随地使运动具有这种性质；工人群众是跟着他们走的，因为他们向工人群众证明自己有决心有能力为工人事业服务，取得了工人群众的充分信任。而这些先进工人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其中许多人甚至还亲身参加过民意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论，这种争论表明俄国革命运动从农民和密谋家的社会主义转向工人的社会主义。由此不难了解，为什么这些先进工人现在没有脱离社会党人和革命者而建立特殊的组织。在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分离的时候，这种脱离是有意义的，是必要的。一旦先进工人看到了工人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这种脱离就

不可能而且也没有意义了。先进工人同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结合**是极其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即 90 年代俄国两个深刻的社会运动汇合的结果：一个是工人阶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另一个是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学说的社会思想运动。

从下面可以看出，《工人思想报》对政治斗争的理解是多么狭隘。**尔·姆·**在谈到广泛的政治要求时写道："为了使工人能够完全自觉地、独立地进行这种政治斗争，必须由工人自己的组织来进行这种斗争，工人的这些政治要求必须建立在工人已经意识到的共同的政治要求和眼前利益上〈请注意这一点!〉，这些要求必须是工人组织〈行业组织〉自己的要求，必须真正是这些工人组织根据自己的愿望共同拟定共同提出的……"接着下面解释道，工人当前的共同政治要求暂时（!!）还是十小时工作制和恢复 1897 年 6 月 2 日法令所取消的节假日。尽管如此，《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听到别人指责它否定政治竟还感到诧异！把政治归结为行业工会争取局部改革的斗争，这难道不是否定政治吗？这难道不是抛弃全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宗旨吗？按照这个宗旨，社会民主党人应该竭力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组织成为独立的工人政党，由这个党来争取民主，**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我们一些歪曲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时髦的人物，竟极其轻率地抛弃了社会民主党人珍视的一切，抛弃了使人们有权把工人运动看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运动所凭借的一切。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欧洲民主主义运动长期积累的经验教导我们必须设法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他们对这无动于衷。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经过漫长的、艰苦的道路终于使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使伟大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他们对这无动于衷。俄国先进工人已经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奠定了基础，他们对这无动于衷。这一切都去他的吧！我们要丢掉过多的思想包袱，摆脱过重过苛的历史经验，仅仅让一些行业工会（除了合法团体以外，目前在俄国还无法证明建立行业工会是可能

的）“暂时存在”就行了，让这些行业工会“根据自己的愿望”拟定要求——“眼前的”要求，微不足道的改良要求吧！！什么话？这简直是鼓吹倒退！这简直是宣传瓦解社会主义！

请注意，《工人思想报》所谈的不仅仅是要地方组织自己拟定当地的斗争形式、局部性的鼓动内容和鼓动方法等等，——对这种想法谁也不会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历来都不打算在这方面限制工人的独立性。不，《工人思想报》是想**完全抛开**俄国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任务，是想“暂时”“仅仅”争取“眼前的利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一直的作法是根据每个眼前的要求进行鼓动，以便组织无产阶级同专制制度斗争，并且把这一点作为无产阶级的当前目标。《工人思想报》则想把无产阶级的斗争**限制**在为小要求作小斗争的范围内。**尔·姆·**明明知道，他同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是相违背的，却对谴责《工人思想报》的人作如下的反驳。有人说，推翻沙皇制度是俄国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尔·姆·**问道：指的是什么工人运动呢？“**是罢工运动？是互助会？是工人小组**？”（该文第 5 页）对此我们回答他说：你只能代表你自己说话，代表你的集团和它所代表的一个地方的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说话，你不能代表俄国先进工人说话！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分子往往不知道，只有革命政党才能进行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这一点**尔·姆·**也不知道。但是俄国先进工人知道。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分子往往不知道，俄国工人运动不限于罢工斗争、互助会和工人小组，俄国工人运动早就希望建立一个革命政党，而事实上也实现了这个希望。这一点**尔·姆·**也不知道。但是俄国先进工人知道。

尔·姆·竭力把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无知说成是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有特别的见解。我们现在来仔细地看一看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

尔·姆·写道：“关于专制制度这个概念……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多谈，想必每个交谈者都是非常明确和清楚地了解这类名词的。”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尔·姆·**本人

对这类名词的了解就是最不明确最不清楚的，不过我们不妨先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工人算不算是**尔·姆·**的交谈者呢？当然是的。如果是的，那么怎样才能使他们非常明确地了解专制制度这个概念呢？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非常广泛非常系统地宣传一般政治自由的思想，必须进行鼓动，把专制制度这个“明确的概念”（在工人头脑中的）同每一次警察的暴行、官吏的压迫联系起来。看来这是很清楚的。如果是的，用纯粹地方性的宣传鼓动来反对专制制度能见效吗？把全俄国的宣传鼓动**组织**成统一的有计划的活动即一个政党的活动，不是绝对必要的吗？**尔·姆·**为什么不把组织系统的反对专制制度的宣传鼓动这项任务作为俄国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呢？这只能是因为他对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了解最**不**明确最**不**清楚。

尔·姆·接着解释专制制度，说它代表着巨大的“人的力量”（按军事方式严格训练出来的官僚）和巨大的“经济力量”（财政资源）。我们不想谈他的解释的“不明确的”地方（“不明确的”地方是很多的），我们想直接谈谈最主要的地方：

尔·姆·向着俄国社会民主党问道：“这样说来，岂不是现在就要建议俄国工人把推翻这种人的力量和夺取这种经济力量作为自己现在的（处于萌芽状态的）组织的当前首要任务吗？（更不用说那些认为先进工人小组应该承担这项任务的革命家了）”

我们很惊讶，全神贯注地再三重读了这段奇文。难道我们弄错了吗？不，我们没有弄错。**尔·姆·真的不知道什么叫作推翻专制制度**。这真不可想象，但这是事实。在**尔·姆·**的糊涂思想暴露之后，还能认为这是不可想象的吗？

尔·姆·把革命者夺取政权和革命者推翻专制制度这两者混淆起来了。

俄国老一辈的革命者（民意党人）所争取的是由革命政党夺取政权。他们认为，夺得政权，“党就能推翻”专制制度的“人的力量”（即任命自己的人代替官吏），“就能夺取经济力量”（即夺取国家的全部财政资源）并实行社会革命。如果

按照**尔·姆·**的这些笨拙的话来说，老民意党人的确想“推翻”专制制度的“人的力量和夺取经济力量”。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坚决反对这种革命理论。普列汉诺夫在《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 年）和《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 年）这两部著作中，无情地批判了这种理论，并且指出了俄国革命者的任务：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党，其当前目标应该是推翻专制制度。但是，什么叫作推翻专制制度呢？要对**尔·姆·**说清楚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专制制度？专制制度（专制政体，无限君主制）是一种最高权力完全地整个地（无限制地）由沙皇一人独占的管理形式。沙皇颁布法律，任命官吏，搜刮和挥霍人民的钱财，**人民对立法和监督管理一概不得过问**。因此，专制制度就是官吏和警察专权，而人民无权。俄国全体人民备受无权的痛苦，有产阶级（特别是富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却可以任意左右官吏。工人阶级的痛苦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由于全国人民的无权；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人受迫使政府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资本家的压迫。

推翻专制制度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沙皇放弃无限权力，人民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来颁布法律，监督官吏的行为，监督国家资财的收支。这种由人民参与立法和管理的管理形式叫作**立宪**管理形式（宪法是人民代表参与立法和管理国家的法律）。总之，推翻专制制度就是用立宪管理形式来代替专制管理形式。由此可见，推翻专制制度根本不需要“推翻人的力量和夺取经济力量”，而只需要迫使沙皇政府放弃自己的无限权力和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来制定宪法（“争取民主的〈人民的、有利于人民的〉宪法”，如“劳动解放社”1885 年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上所说的那样）。

为什么推翻专制制度应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呢？这是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工人阶级不能广泛地展开自己的斗争，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能夺取任何巩固的阵地，不能建立巩固的群众性的组织，不能在全体劳动群众面前举起社会革命的旗帜，也不能教会他们为社会革命而斗争。只有争得了政治自

由，整个工人阶级才能坚决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真正是“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人的力量和夺取经济力量”，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决不把**这种**夺取政权看作俄国工人的当前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一向认为，只有争得了政治自由，只有广泛地展开群众性的斗争，俄国工人阶级才能建立争取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必需的组织。

但是，俄国工人阶级怎样才能推翻专制制度呢？《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甚至嘲笑了“劳动解放社”，因为“劳动解放社”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并且在自己的纲领中说：“那些即使目前还是未来俄国工人政党的萌芽的工人小组，也必须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工人思想报》（见该报第 7 号和我们分析的这篇文章）认为由工人小组来推翻专制制度是可笑的！我们回答《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你们嘲笑谁？嘲笑你们自己！《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埋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非同志式地**同他们争论。让读者自己来判断吧，究竟是哪一方在非同志式地争论：是俄国老年派社会民主党人呢，还是“青年派”社会民主党人。前者明确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直截了当地说明了“青年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哪些观点是错误的，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后者则**不指出**自己的论敌是谁，躲在角落里时而刺一下“写了一本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德文书的人”（即普列汉诺夫，他们毫无根据地把他和一些合法的著作家混为一谈），时而刺一下“劳动解放社”，断章取义地**歪曲**它的纲领，而又不能相对地提出自己稍微明确一点的纲领。是的！我们承认有同志的义务，承认有支持一切同志的义务，有容纳同志意见的义务，**但是在我们看来，对同志的义务从属于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义务，而不是相反**。我们承认对《工人思想报》负有同志的义务，这并不是因为该报的编辑们是我们的同志，而只是因为他们在俄国的（因而也是国际的）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工作，仅仅由于这一点，我们才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同志。

因此，当我们确实看到“同志们”离开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而后退，“同志们”缩小和歪曲工人运动的任务时，我们就认为自己**有责任**非常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刚刚说过，《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歪曲了“劳动解放社”的观点，这一点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尔·姆·**写道：“我们不想理解有些同志为什么认为‘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只是回答了‘从哪儿取得同专制制度斗争的力量？’这一问题。”（在另一个地方写道：“我们的革命者把工人运动看作推翻专制制度的最好的手段。”）打开 1885 年“劳动解放社”出版并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转载在《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 年日内瓦版）这本小册子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纲领的**基础**是：从资本的压迫下彻底解放劳动，使全部生产资料变成公有财产，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党。**尔·姆·**歪曲这个纲领，**不想**理解这个纲领，这是很明显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小册子的开头说，“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回答了”从哪儿取得同专制制度斗争的力量的问题，**尔·姆·**就死死抓住这句话。但是要知道，“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回答了俄国革命者和俄国整个革命运动所提出的这个问题，这是**历史事实**。“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回答了这个问题，难道这就是说“劳动解放社”把工人运动仅仅当作一种手段吗？**尔·姆·**的这种“**不理解**”不过是证明他对众所周知的“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一无所知。

其次，“推翻专制制度”怎么能是工人小组的任务。**尔·姆·**不理解这一点。请打开“劳动解放社”的纲领看一看，那里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工人阶级中间进行鼓动，进一步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广泛建立革命组织，是工人小组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这些联系密切、结成一个严密整体的组织，并不满足于同政府进行局部冲突，在适当时机，它们将毫不迟疑地一致向政府展开坚决的进攻。”1898 年春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俄国各地组织所遵循的

正是这个策略。这些组织证明了自己是俄国的巨大政治力量。如果这些组织组成一个政党，广泛进行反对极权政府的鼓动，并且利用一切自由主义反对派分子，那么这个政党无疑地会实现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如果《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不想理解”这一点，那么我们“想”奉劝他们：先生们，学习学习吧，这些道理本身并不是很难懂的。

但是，我们还是回过来谈**尔·姆·**吧，在谈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时我们把他撇在一边了。至于**尔·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则更加清楚地说明了《工人思想报》新的倒退倾向。

尔·姆·写道：“专制制度的末日可以看得很清楚。”“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一切生气勃勃的社会成员健康发展的条件之一。”读者也许以为，从这里总该得出工人阶级也必须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结论吧？不，别忙。**尔·姆·**有他自己的逻辑和术语。他在斗争这个词前面加上“社会”两个字，就把斗争完全理解成另外一种东西了。**尔·姆·**描述了俄国许多居民阶层对政府采取的**合法的反对派立场**，最后断定说：“争取地方和城市社会自治的斗争，争取社会教育的斗争，争取给饥民以社会救济的斗争等等，都是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一切觉悟和进步的居民阶层和集团都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同官僚专制制度作社会斗争。不仅如此，这种社会斗争由于某种令人莫解的原因，没有受到俄国许多革命著作家的关切，但是我们看到，俄国社会进行这种社会斗争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当前的问题在于，怎样使这些个别的社会阶层……能更有成效地进行这种〈请注意这一点！〉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而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我国工人应该怎样进行这种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

尔·姆·的这些议论又充满了大量的糊涂思想和错误。

第一，**尔·姆·**把**合法的反对派立场**同反对专制制度、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混为一谈。由于对“同专制制度作斗争”一语不加解释，他制造了社会党人所不该

有的这种混乱。这句话既可以了解为（有条件地）**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也可以了解为在这个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反对专制制度个别措施的斗争。

第二，**尔·姆**·把合法的反对派立场算作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并且说，我国工人应该进行“这种社会斗争”，这样一来，他就变成了要我国工人不同专制制度作革命斗争，而是对专制制度采取合法的反对派立场，也就是说，把社会民主主义弄得庸俗不堪，把它和俄国最庸俗最贫乏的自由主义混为一谈。

第三，**尔·姆**·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著作家[诚然，**尔·姆**·宁愿采取“同志式的”不指名的责难。但是，如果他指的不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他的话就白说了] 似乎不肯注意到合法的反对派，这**简直是胡说**。恰恰相反，无论是“劳动解放社”或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无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或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版，阿克雪里罗得把它叫作《宣言》的**解说**），都不仅注意到了合法的反对派，而且还非常确切地说明了合法的反对派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

现在来一一加以说明。我们的地方自治机关、一般的自由派团体和自由派报刊是怎样“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呢？它们有没有进行反对专制制度、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没有，这种斗争它们从来没有进行过，现在也没有进行**。进行这种斗争的只是一些往往出自自由派的博得社会同情的革命者。但是，进行革命斗争决不等于同情革命者和支持革命者；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决不等于对专制制度采取合法的反对派立场。俄国自由派只是采取专制制度本身**所许可的**形式即专制制度认为对它没有危险的形式，来表示自己对专制制度的不满。自由主义反对派最突出的表现，也不过是自由派向沙皇政府**请愿**，请求吸收人民参加管理。自由派一次又一次地忍受了警察对这种请愿的粗暴的拒绝，忍受了宪兵政府甚至对他们合法申述自己意见所施加的非法的野蛮迫害。把采取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立场干脆说成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这简直是**歪曲**事实，因为俄国自由派**从来**没有组

织革命政党来进行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虽然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能够筹集经费和取得国外的俄国自由派的支持。**尔·姆**·不仅歪曲事实，而且还把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牵连在内。**尔·姆**·写道："在这个斗争中，工人的同盟者是俄国社会的一切进步阶层，这些阶层捍卫自己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团体，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共同利益，'从来不忘记〈**尔·姆**·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政府自己决定实行某项改革或者**根据社会的正式要求**实行某项改革，这两者的差别'有多么大。"如果象**尔·姆**·那样，以为这是对一切进行"社会斗争"的人们即对俄国整个自由派的评价，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话**。俄国自由派从来没有向政府提出过正式的要求，正因为如此，俄国自由派从来没有担任而且现在也不可能担任**独立的**革命角色。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同盟者，不可能是"社会的一切进步阶层"，而只能是这个社会的成员所建立的革命政党。自由派一般只能作为而且应当作为革命工人政党的辅助力量的**一个来源**（这一点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上述小册子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正因为这样，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才无情地嘲笑了"俄国社会的进步阶层"，说它们不懂得必须向政府提出正式要求，眼看着它们中间的革命者在专制政府的打击下牺牲。**尔·姆**·在这里也象在《增刊》的第二篇文章中那样，毫无意义地摘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在那里他企图表明，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空想主义者，似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充分评价这位"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全部作用。普列汉诺夫在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本书（由《社会民主党人》[5]文集中的几篇文章编成，用德文出版的单行本）中，充分评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用，并且阐明了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态度。《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只是暴露了自己不能比较系统而全面地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他的长处和短处。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现实问题"决不在于自由派应该怎样进行"社会斗争"（我们知道，**尔·姆**·认为这种斗争就是采取合法的反对派立场），而在于应该怎样

建立为推翻专制制度而斗争的革命工人政党，这个政党能够依靠俄国的**一切**反对派分子，能够**利用**反对派的一切活动来进行革命斗争。为此，必须有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因为在俄国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争取民主的坚定不移的战士，因为没有这种政党的积极推动，自由派分子"就会依旧萎靡不振，沉睡不醒"（上引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第 23 页）。**尔·姆**·说，我国"最进步的阶层"进行着"真正的〈!!〉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尔·姆**·的文章第 12 页），"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我国工人应该怎样进行**这种**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他的这种言论实质上是完全背离社会民主党的。我们只好郑重地劝告《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好好地想一下：他们想向何处去，他们实际上是站在什么地方，是站在把社会革命的旗帜带到劳动阶级中去，并且想把它们组织成一个革命政党的革命者中间，还是站在进行"社会斗争"（即采取合法的反对派立场）的自由派中间。所谓工人的"社会独立性"的理论，所谓"社会互助"和行业工会"暂时"只能争取十小时工作制的理论，所谓地方自治机关、自由派团体等等同专制制度进行"社会斗争"的理论，根本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根本没有自由派所不承认的东西！要知道，《工人思想报》的全部纲领（如果可以说是纲领的话）实质上是要使俄国工人陷于不开展和分散的状态，使他们成为**自由派的尾巴**！

尔·姆·有些话特别奇怪。**尔·姆**·一本正经地说道："不幸的是，我们遭受政治警察残酷迫害的革命知识分子，把反对这种政治警察的斗争当成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这样说有什么意义呢？政治警察之所以叫作政治警察，就是因为它迫害专制制度的敌人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正因为如此，目前还没有变成自由派的《工人思想报》，才象俄国全体革命者、社会党人和全体觉悟工人那样同政治警察作斗争。政治警察残酷地迫害社会党人和工人，专制制度拥有"严密的机构"和"机灵能干的国务活动家"（**尔·姆**·的文章第 7 页），从这个事实只能得出两种结论：胆小怕事的可恶的自由派的结论是，我国人民，特别是工人，还缺少

斗争的准备，必须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机关、自由派报刊等等的“斗争”上，因为这是“真正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而不只是反对政治警察的斗争。社会党人和每个觉悟工人的结论是，工人政党也必须用一切力量来建立“严密的机构”，从先进工人和社会党人中培养出“机灵能干的革命活动家”，从而使工人政党真正成为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并把一切反对派分子吸引到工人政党方面来。

《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站在斜坡上，并且将沿着斜坡一直滑向前一种结论！

还有，**尔·姆·**写道：“这些纲领〈即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还有使我们吃惊的地方，就是它们始终偏重工人在议会〈我国现时所没有的议会〉中活动的好处，而完全忽视……工人参加”厂主立法会议、工厂事务会议和城市社会自治机关工作的“重要意义”。（第 15 页）如果不强调议会的好处，工人怎么能知道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呢？如果象《工人思想报》那样不谈这些问题，那不是支持工人中水平低的部分不问政治吗？至于谈到工人参加城市社会自治机关，那么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没有否定过工人**社会主义者**参加城市自治机关的好处和重要性，但是在俄国来谈这一点是可笑的，因为在俄国，社会主义还不可能进行任何公开的活动，在俄国诱导工人参加城市自治机关（如果这是可能的话），实际上就是使先进工人脱离工人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走向自由主义。

尔·姆·说道：“工人中的先进部分对待这种〈专制〉政府的态度……正如工人对待厂主的态度一样易于理解。”这就是说（按照正常的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工人中的先进部分是觉悟程度并不低于知识分子出身的**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人，因此，《工人思想报》想把这两者分开是荒谬的，有害的。这就是说，俄国工人阶级已经为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造就了和独立地提供了人才。但是《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根据工人中的先进部分具有政治觉悟这一点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把这些先进分子拖回来，使他们踏步不前！**尔·姆·**问道：“工人进行哪种斗争

最合适呢？”他自己回答道：最合适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工人“正在进行”的斗争!!! 很难找出一句更加突出的话，来表达热中于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所感染的这种毫无意义、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了！最合适的是可能的，而可能的就是现在有的！这正象一个人准备走上一条遥远而艰难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会遇见许多阻碍和许多敌人，这个人问道：我应向何处去呢？回答说：最好去可能去的地方，而可能去的地方就是你现在正在去的那个地方！这正是虚无主义，不过这不是革命的虚无主义，而是机会主义的虚无主义，表现出这种虚无主义的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尔·姆·**“号召”俄国工人进行“局部的”、“政治的”斗争（在这里，政治斗争不是指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而只是指“争取改善全体工人生活状况的斗争”），公然号召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后退一步**，实质上就是号召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党人从而抛弃欧洲和俄国所取得的一切经验！如果为了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如果仅仅为了进行这种斗争，工人就根本不需要社会党人。在一切国家里都有这样的工人，他们为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而斗争，但是丝毫不了解社会主义，甚至还敌视社会主义。

尔·姆·写道：“最后，简单谈谈我们对工人社会主义的理解。”读了以上的说明以后，读者不难想象这是怎样一种“理解”了。这简直是伯恩施坦那本“时髦的”书的翻版。我国“青年派”社会民主党人不提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提“工人自主的社会和政治的活动”。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尔·姆·**是怎样理解**社会**“斗争”和“政治”的，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他直接回到俄国某些合法著作家的“公式”上去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实质）是：把土地、工厂等等即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全社会的财产，取消资本主义生产，代之以按照总的计划进行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生产。**尔·姆·**没有确切地指出这个目的，却首先指出要发展行业工会和消费合作社，只是顺便谈了一下社会主义就是要使全部生产资料完全社会化。但是他

却用最显著的黑体字刊印了伯恩施坦的一句话："社会主义只是现代社会进一步的高度发展"，这句话不仅没有说明社会主义的意义和实质，反而把它们弄模糊了。一切自由派和一切资产者无疑是赞成"现代社会发展"的，所以他们都会因为**尔·姆**·的话而高兴。尽管如此，资产者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问题在于，"现代社会"包含许多不同的方面，而人们在使用这一共同用语时也各有所指。也就是说，**尔·姆**·没有向工人说清楚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而只是引用了一些含糊不清、令人莫解的话。最后，**尔·姆**·没有指出现代社会主义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即由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只是说把生产转归他们（工人）进行社会管理或由民主化的社会政权管理，而社会政权民主化的"方法是让他们〈工人〉积极参与工厂的一切事务会议，参加仲裁法庭，参加一切制定有关工人的法律的各种会议和委员会，参加社会自治机关，以及参加国家的总的代表机关"。由此可见，《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只是把用**和平的**方法能够得到的算作工人社会主义，而排除了革命的方法。这种缩小社会主义和把它变成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做法，又是背弃俄国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和绝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而倒退了一大步。当然，工人阶级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权（我们早就说过，只有受过阶级斗争锻炼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才能这样取得政权），但是无论从理论上或从政治实践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放弃**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就是**轻率的行为**，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有产阶级的可耻让步。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紧要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这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极其可能的。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别无出路。正因为如此，"工人社会主义"的纲领只是一般地谈夺取政权，而**不确定**夺取政权的方法，因为选择哪一种方法取决于将来的情况，而将来情况如何我们还不能肯定。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把和平的"民主化"作为无产阶级唯一的活动方式，那么我们再说一遍，就是任意缩小工人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且把这一概念庸俗化。

我们不想再详细分析《增刊》上的其他文章。关于纪念车尔尼雪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的那篇文章，我们已经谈过了。至于《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所宣扬的伯恩施坦主义，即全世界社会主义的敌人，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抓住不放，而绝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和德国觉悟工人坚决反对的伯恩施坦主义，这里不想细谈。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伯恩施坦主义是一种极端混乱的思想，根本没有独立的见解，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比较起来它倒退了一大步。至于德国的伯恩施坦主义，最好让德国人来讲。我们只指出一点：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要比德国的差得多。伯恩施坦虽然有许多错误，虽然在理论方面和政治方面有明显的倒退倾向，但是他还有一定的头脑和一定的良心，他不自己另立新理论或新纲领，**不要求修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而且在最后的决定关头他声明接受倍倍尔的提案，这个提案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遵循原有的纲领和策略。而我们俄国的伯恩施坦派怎样呢？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及伯恩施坦的百分之一，他们甚至干脆不想知道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在1898年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党的《宣言》，并且宣布《工人报》是党的机关报，他们不想知道这些出版物全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旧”纲领为依据的。我们的伯恩施坦派好象也没有意识到，既然他们屏弃这些旧见解而另立新见解，那么从道义上来讲，他们对于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对于曾经倾全力来筹备和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现在大部分被关进俄国监狱的社会党人和工人，就有责任直截了当地公开声明，究竟不同意谁，究竟不同意什么，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新见解和新纲领来代替旧见解和旧纲领，而不要一味躲在角落里笼统地刺“我们的革命家”。

我们还要研究一个恐怕是最重要的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里产生了这种倒退倾向，这怎样**解释**呢？我们认为，单单说这是由于《工人思想报》编辑们的个人品质，单单说这是由于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是解释不通的。我们认为，

这主要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发展的历史特点造成的，这种特点使人们对工人社会主义产生了狭隘的理解，这在**短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

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实际工作的时候，他们面对着两种人，一种是民意党人，他们责备社会民主党人逃避俄国革命运动传统的政治斗争，而社会民主党人则坚持不懈地同他们进行论战；另一种是俄国自由派，他们也不满意革命运动从民意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同这两种人的论战，都是围绕着政治问题而进行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民意党人把政治狭隘地理解为密谋活动时，只能一般地反对政治，有时也的确这样反对过（因为当时这种对政治的狭隘理解占优势）。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沙龙中，社会民主党人常常能够听到为革命者放弃恐怖手段感到惋惜的论调。那些贪生怕死、在紧要关头不支持打击专制制度的英雄的人们，假仁假义地指责社会民主党人不问政治，一心只想再有一个政党为他们火中取栗。自然，社会民主党人恨透了这种人和他们的言论，并到工厂无产阶级中去进行规模虽小却很重要的宣传工作。这个工作在开始时有狭隘性是不可避免的，某些社会民主党人的狭隘言论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但是这种狭隘性吓不住那些念念不忘俄国工人运动的远大历史目的的社会民主党人。即使社会民主党人有时讲一些狭隘的话，那有什么要紧呢，**他们的事业**总是广阔的。他们不搞无益的密谋活动，不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巴拉莱金之流[6]来往，而到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中去，并促进这个阶级发展自己的力量！他们认为，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逐步扩大，这种狭隘性是会自行消失的。事实上结果大体也正是这样。宣传已经开始转向广泛的鼓动。广泛的鼓动自然会使觉悟的先进工人愈来愈多地涌现出来；革命组织（圣彼得堡、基辅等地的“斗争协会”和犹太工人联盟）也相继建立起来。这些组织很自然地要求合并，而且终于如愿以偿，它们联合起来并创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看来，旧日的狭隘性现在已经失去任何基础，它将被彻底消除。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

鼓动工作的广泛开展，使社会民主党人接触到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最不开展的部分；要把这部分人吸引过来，鼓动员必须善于适应最低的理解水平，习惯于把“眼前的要求和利益”提到首位，暂时不宣传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远大理想。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具有分散的手工业的性质，各个城市的小组和小组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国外学识比较渊博、革命经验比较丰富、政治眼光比较远大的同志间的联系又非常差，这自然会使社会民主党活动的这个（**十分必要的**）方面被过分夸大，使个别人忘掉其他方面，特别是每遭到一次失败，作战队伍的行列里就要减少一些最觉悟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牢固的革命传统和继承性也就无法建立。我们认为，有些人之所以可悲地背弃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想，其主要原因就是过分夸大社会民主党工作的这一方面。再加上对那本时髦的书的迷恋，对俄国革命运动史的无知，以及标新立异的幼稚妄想，——这就是形成“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的全部因素。

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详细地谈谈无产阶级中先进部分与水平低的部分的关系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在这两部分人中进行工作的意义问题。

各国工人运动史表明，最先和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是条件最好的那部分工人。从历次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主要来自这个部分，他们能够取得工人群众的充分信任，他们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事业，他们完全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甚至独立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历次生气勃勃的工人运动中，都产生了象蒲鲁东和瓦扬、魏特林和倍倍尔这样的工人领袖。我们俄国工人运动看来也不会在这方面落后于欧洲。正当有教养的社会对说真话的不合法书刊失去兴趣的时候，工人强烈的求知欲和追求社会主义的热情却日益增长，工人中间的真正英雄人物也不断出现，他们虽然生活环境极坏，在工厂中从事着使人变蠢的苦役劳动，但是有顽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意志来不断学习，学习，再学习，使自己成为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工人知识分子”。现在俄国已经有这

种“工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他们的队伍不断扩大，使他们崇高的精神需求充分得到满足，从他们的队伍中间产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物。因此，报纸如果想成为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它就必须具有先进工人的水平；它不仅不应该人为地降低自己的水平，反而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注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中的一切策略问题、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只有这样，工人知识分子的需求才能得到满足，他们也就能独立地领导俄国工人事业，**从而**也就能独立地领导俄国革命事业。

继人数不多的先进分子之后有广大的中等水平的工人。这些工人也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社会主义，加入工人小组，阅读社会主义的书报，参加鼓动工作，他们和前者的差别仅仅在于他们还不能独挡一面地领导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中等水平的工人可能会看不懂党的机关报上的某些文章，会不能完全弄清楚复杂的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报纸应该降低到广大读者的水平。相反，报纸正应该提高他们的水平，并且从他们中间培养出先进工人。一个工人只要致力于**地方**实际工作，极其关心工人运动的动态和当前鼓动中的问题，他一举一动就应该想到俄国整个工人运动及其历史任务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因此，拥有大量中等水平的工人读者的报纸，必须把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同每一个地方性的狭隘的问题联系起来。

最后，中等水平的工人之外就是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广大群众。他们很可能完全看不懂或者几乎完全看不懂社会主义报纸（大家知道，在西欧投票选举社会民主党的人比社会民主党报纸的读者要多得多），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应该迁就工人的最低水平，那就荒谬了。从这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应该用别的宣传鼓动手段，如通俗小册子、口头鼓动、报道当地事件的小报（这是主要的），来影响这些人。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决不能以此为限，很可能在启发水平低的工人的觉悟的时候，首先应该进行合法的教育工作。对于**党**来说，

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正是要到最需要做教育工作的地方去做教育工作，要派合法的活动家去开荒，再让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员去播种。对水平低的工人进行鼓动，当然应该充分发挥每个鼓动员的个人特长，全面照顾地区、职业及其他方面的特点。考茨基在反对伯恩施坦的书中说道：“不要把策略同鼓动混淆起来。鼓动的方法应该适应个人的和当地的条件。应该让每一个鼓动员发挥他自己的特长进行鼓动：有的鼓动员靠他鼓舞人心的本领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有的靠他辛辣的讽刺，有的靠他会举大量例子，等等。鼓动既应该照顾到鼓动员，也应该照顾到听众。鼓动员应该讲得使人能听懂，他应该从听众熟悉的事物出发。所有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并且也不只是适用于对农民的鼓动。对马车夫讲话应该不同于对水手讲话，对水手讲话应该不同于对排字工人讲话。**鼓动**应该**因人而异**，但是我们的**策略**，我们的政治**活动**则应该是**一致的**。”（第 2—3 页）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先进代表的这些话，对鼓动在党的总的活动中的作用作了绝好的评价。这些话表明，担心建立一个领导政治斗争的革命政党会妨碍鼓动工作，会把鼓动工作推到次要地位或者束缚鼓动员的自由，这是没有根据的。相反，只有有组织的政党才能广泛地进行鼓动，才能在各种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为鼓动员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材料），才能通过每一个地方的成功的鼓动来教育俄国全体工人，才能把鼓动员派到他们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和人群中去。有鼓动才能的人，只有在有组织的政党中，才能够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这个事业，——这无论对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或其他方面的工作都有好处。由此可见，谁只注意经济斗争而忘记政治鼓动和宣传，忘记把工人运动组织成政党的斗争的必要性，谁就根本不可能坚持不懈和卓有成效地把无产阶级中水平最低的部分吸引到工人事业方面来，别的就更谈不到了。

但是，这种夸大活动的一个方面而损害其他方面甚至力图完全抛弃其他方面的做法，会给俄国工人运动带来极为有害的后果。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如果

听到有人诽谤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只是把工人当作推翻专制制度的工具，听到别人要他们提出恢复假日和行业工会的请求，而不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和政治斗争的当前任务，他们就可能真的被腐蚀。这种工人常常可能落入（而且肯定会落入）政府和资产阶级的种种小恩小惠的圈套。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即很不开展的工人，在《工人思想报》的鼓吹影响之下，可能被资产阶级反动透顶的思想所迷惑，即工人除了要求增加工资和恢复假日（“眼前的利益”）之外，不能够而且不应该关心别的东西；工人群众只能够而且只应该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主动精神”来从事工人事业，不必使工人事业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不必把工人事业变成全人类所迫切需要的先进事业。再说一遍，最不开展的工人可能被这种思想所腐蚀，但是我们深信，俄国先进工人，那些领导工人小组和社会民主党整个活动的工人，那些被关在从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到东西伯利亚的监狱和流放地的工人，一定会愤怒地驳斥这类理论。把整个运动归结为争取眼前的利益，就是投不开展工人之机，就是投其所好。这就是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先进工人的明确的政治要求和群众的自发的抗议之间的联系，人为地割裂开来。正因为如此，必须特别注意《工人思想报》提出另一种方针的企图，并且应该大力反对。显然，《工人思想报》为了迁就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而竭力回避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和政治斗争，但是没有提出自己的方针，在这个时候，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在摇头，指望随着工作的开展和扩大，《工人思想报》集团的成员自己会容易地摆脱这种狭隘性。但是，当那些做过有益的预备阶段的工作的人，居然抓住机会主义的时髦理论，开始在全欧洲吵吵嚷嚷，扬言希望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长期（甚至永远）停留在预备阶段的时候——换一种说法，就是当那些一直为一桶蜜辛勤劳动的人，居然开始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焦油一勺勺倒入蜜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坚决起来反对这种倒退倾向！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不论是它的创立者，即“劳动解放社”的成员，或者是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都始终承认下面两条基本原理：(1)社会民主党的实质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目的在于夺取政权，把全部生产资料交给全社会，用社会主义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经济；（2）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建立俄国工人的革命政党，它的当前目的在于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谁背弃这些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在“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中都有确切的表述），谁就是背弃社会民主党。

注释：

[1]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 1895 年 11 月创立的，由彼得堡的约 20 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1895 年 12 月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它的领导机构是中央小组，成员有 10 多人，其中 5 人（列宁、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领导中心。协会分设 3 个区小组。中央小组和区小组通过组织员同 70 多个工厂保持联系。各工厂有收集情况和传播书刊的组织员，大的工厂则建立工人小组。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 1895 年和 1896 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印发了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人事业报》。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好几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它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全市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协会一成立就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895 年 12 月 8 日（20 日）夜间，沙皇政府逮捕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协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共 57 人。但是，协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它组成了新的领导中心（米·亚·西尔文、斯·伊·拉德琴柯、

雅·马·利亚霍夫斯基和马尔托夫)。列宁在狱中继续指导协会的工作。1896 年 1 月沙皇政府再次逮捕协会会员后，协会仍领导了 1896 年 5—6 月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896 年 8 月协会会员又有 30 人被捕。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协会的领导成分发生了变化。从 1898 年下半年起，协会为经济派（由原来协会中的“青年派”演变而成）所掌握。协会的一些没有被捕的老会员继承协会的传统，参加了 1898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210。

[2]指基辅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基辅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 1897 年 3 月根据基辅代表会议的决议成立的，这个代表会议认为俄国所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都应以彼得堡组织为榜样称作“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基辅斗争协会联合了若干社会民主党小组，共有会员 30 多人。它同彼得堡斗争协会建立了联系。彼得堡斗争协会曾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的手稿寄给基辅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导人阅读。基辅斗争协会在工人中间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它的一个特别小组在 1897 年出版了两号全俄社会民主党报纸《工人报》。它的非法书刊在南俄各城市广为流传。基辅斗争协会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做了大量工作。1898 年，在代表大会开过以后不久，协会被警察所破坏。未被逮捕的社会民主党小组成员很快恢复了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的地下组织。——210。

[3]犹太工人联盟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简称崩得，1897 年 9 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 1898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

出了党。在 1906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 1901 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 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 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 年 3 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210。

[4]小册子的作者是尔·马尔托夫。列宁所说从历史上研究了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见这本小册子的结尾部分，标题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社会民主工党的当前任务》。小册子于 1900 年 10 月在国外出版。——214。

[5]《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文学政治评论集，由劳动解放社于 1890—1892 年在伦敦和日内瓦用俄文出版，总共出了 4 集。第 1、2、3 集于 1890 年出版，第 4 集于 1892 年出版。参加《社会民主党人》评论集工作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等。这个评论集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列宁提到的普列汉诺夫的几篇文章（总标题为《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刊载在评论集第 1—4 集上。——226。

[6]巴拉莱金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温和谨慎的人们》和《现代牧歌》中的人物，一个包揽词讼、颠倒黑白的律师，自由主义空谈家、冒险家和撒谎家。巴拉莱金这个名字后来成为空谈、撒谎、投机取巧、出卖原则的代名词。——233。

论《宣言书》[1]

列宁（1899 年底或 1900 年初）

基辅委员会起草的《宣言书》，虽然还只是一个草稿，而且基辅委员会说根本没有时间来详细研究和加工，但是它已经能够使人对基辅委员会的观点具有相当确切的了解。这些观点，毫无疑问会引起坚持社会民主党原有原则（这些原则“劳动解放社”在俄国宣布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出版物也一再阐述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也确认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反对。基辅委员会的观点，显然**表明**是受了“青年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这一新派别的很大影响，这一派别发展到最后已经和伯恩施坦派同流合污，并且出了有名的《工人思想报》增刊（1899 年 9 月）和同样有名的《信条》这样的产物。

现在虽然还不能说《宣言书》同这个机会主义的反动派别完全一致，但是《宣言书》已经向这方面跨出了严重的几步，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方面表现了很大的混乱，对革命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动摇，我们认为有责任告诫基辅同志，并且对他们偏离早已确立了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原则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原则的行为作详细的分析。

《宣言书》的第一句话，就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基辅委员会承认，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是俄国工人运动当前的总任务，但是它认为不可能在目前号召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活动，换句话说，就是目前不可能进行**政治**鼓动，因为大多数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我们不谈这段话的措辞，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在这里和在《宣言书》的其他地方重复了（请注意这一点）多次的思想，这些思想只能使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这竟是社会民主党人写的吗？”

“大多数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如果真是这样，那无异于宣判了整个社会民主党的死刑，因为这就是说，大多数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

到能够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其实，世界上不论什么地方，不论过去或现在，不和政治斗争紧密相联的社会民主党是没有的。社会民主党不进行政治斗争，那就等于干涸的江河，这真是一个莫大的矛盾，这不是倒退到我们那些忽视“政治”的老祖宗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倒退到无政府主义或者是倒退到工联主义。

世界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宣言书《共产党宣言》，已经确立了一个从那时起就成了一种起码常识的真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工人运动只有转向政治斗争，才能脱离萌芽状态和幼年时期，才能成为**阶级的**运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一个宣言书，1883 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证实这个真理适用于俄国，说明俄国革命运动究竟怎样和究竟为什么一定会使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使工人群众的自发运动和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使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基辅委员会一方面持有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同时却认为“在目前号召广大群众进行政治活动”是不可能的，这实质上就是完全离开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而它想继续坚持这些原则，就陷入了一系列重大的矛盾。

其实，既然认为进行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是不可能的，怎么还谈得上工人的“政治教育”呢？难道还需要向社会民主党人证明，**离开**政治斗争和政治活动就谈不上任何政治教育吗？难道可以设想除了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还能够用什么课程或书本等等来对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吗？难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回到农奴主的观点上去，认为首先必须教育农民，然后才能解放农民吗？或者必须回到向政府献媚的那些文痞的观点上去，认为首先必须教育人民，然后再给人民政治权利吗？既然认为号召工人进行政治活动是不可能的，既然认为进行政治鼓动是不可能的，那怎么能把促使工人认识到必须为政治权利而斗争“当作自己的任务”呢？要促使工人认识到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同时却不号召他们进行政治斗争？！这算什么话呢？这怎么行呢？这种混乱情况，决不是因为在草稿中讲得不

太清楚或考虑得不太周到，这是贯串在基辅委员会全部观点中的两重性和不彻底性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它想继续保留早已确立了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它却迷恋于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的词句，如“必然性”、“渐进性”（基辅委员会《宣言书》第一部分结尾）、“运动的直接的经济性质”，说什么不可能进行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必须以实际需要作为牢固的基础（为政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好象不是由实际需要引起的！），总之，是迷恋于那些用来编造出《信条》和《工人思想报》增刊这类时髦作品的时髦词句。现在我们想着重谈这样一个论点，这个论点是问题的焦点，它集中了我们所分析的《宣言书》的全部弱点，这个论点就是：“不可能在目前号召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活动”，换句话说，就是目前不可能进行政治鼓动，因为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幸而上面这个论断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说“幸而”，是因为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它必然会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拖到工联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庸俗化的泥潭中去，而《信条》和《工人思想报》的作者以及他们在我国合法书刊中的许多喽罗们，正努力在这样做）。大多数俄国工人不仅已经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而且已经多次表现了自己的成熟，多次采取过政治斗争的行动，而且常常是自发地行动的。

说实在的，难道大量散发斥责政府、抨击政府的传单不是政治斗争吗？难道大多数俄国工人没有用“自己的手段”惩办过作威作福的警察和士兵吗？难道他们没有用暴力营救过自己被捕的同志吗？难道他们没有在很多地方直接同军警进行过巷战吗？难道大多数俄国工人没有在 20 多年中把最优秀、最开展、最真诚、最勇敢的同志送进革命小组和革命组织的队伍吗？但是，为了讨好资产阶级庸俗化的时髦学说，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就应该忘记这一切，应当认为号召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活动是不可能的！有人也许会反驳说，上述的许多事实，往往与其说是政治斗争，不如说是自发的活动。我们回答说，在社会党人的革命

小组还没有进行广泛鼓动，没有号召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反对压迫者的自觉斗争以前，难道我们的罢工不只是一些自发的活动吗？在历史上有哪一个人民运动，有哪一个阶级运动不是从无组织的自发活动开始的，不是在本阶级知识分子的自觉参与下，采取了有组织的形式，建立了政党的？如果工人阶级不可遏止地自发地追求政治斗争的行动，直到现在大半还只是表现为没有组织的活动，那么，只有《莫斯科新闻》[2]和《公民》[3]才会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大多数的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接受政治鼓动。社会党人却从这里得出这样的结论：时机早已成熟到必须进行政治鼓动，必须最广泛地号召工人群众从事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不发出这个号召，我们就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实质上就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资产阶级的狂热拥护者，随时随地都在鼓吹成立不进行政治斗争的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因此，象《工人思想报》那样一贯对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政治任务讳莫如深，只能被看作是犯罪，是可耻的。这种作法无异是腐蚀工人的政治意识。工人看到了并感到了政治压迫，自发地起来反对这种压迫，然而他们从自己的社会党人领导者那里得到的却是冷遇，或者甚至是一场反对政治斗争思想的争论。有人说我们应该把政治自由思想"逐渐地"灌输给群众，好象我们一直把这些思想向群众灌输得太快了，应该放慢一点，节制一点，这不能不说是态度冷淡和目光短浅!！有人说，要"从政治上说明工人阶级的地位"，只有"在每一具体场合都有这样做的理由时"才可以，好象工人生活中日常的大量普通事实，都不能成为政治鼓动的"理由"似的，这能不能说是态度冷淡和目光短浅呢？！

想用在每一具体场合都有理由这一点来限制政治鼓动，这是没有意义的，或者只是表明他们要朝着《信条》和《工人思想报》后退一步，要缩小我们本来就已非常狭小的宣传和鼓动工作的范围。有人也许还要反对我们说，工人**群众**还不能理解政治斗争的思想，这种思想只有少数比较开展的工人才能理解。对于这种

经常可以从“青年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听到的反对意见，我们的回答是：第一，社会民主党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是、并且**不能不是**觉悟工人的代表，而不是不觉悟工人的代表；故意迎合工人的不开展状态，是最危险和最有罪的事情。如果把广大群众马上就能充分理解的东西作为活动的准绳，那就只能鼓吹反犹太主义，或者叫大家去向喀琅施塔得的约翰神父求救了。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而不是做没有政治权利的群众的尾巴。第二（这是主要的），说群众不能理解政治斗争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这种思想，连文化水平很低的工人也能理解，当然，这是要有条件的，就是要鼓动员或宣传员善于做他们的工作，能够把这种思想告诉他们，在传达这种思想时，要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且能够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在说明经济斗争的条件时，这样做也是必需的，因为在这个领域内，中下等水平的群众中文化水平低的工人也是掌握不了总的经济斗争思想的。能够掌握这种思想的，是少数有知识的工人，跟着他们走的，是受本能和目前切身利益支配的群众。

在政治领域内也是如此。能够掌握总的政治斗争思想的，当然只是有知识的工人，群众会跟着他们走，因为群众深深地感到自己在政治上没有权利（正如基辅委员会在《宣言书》的某一处所承认的那样），而最切身的日常利益，经常使他们和各种政治压迫现象发生抵触。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中，在任何一个国家里，一定阶级的群众或人民群众同该阶级或人民的少数知识分子代表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这样的：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一个阶级的领袖永远是该阶级最有知识的先进代表人物。俄国工人运动也不能例外。因此，忽视工人的这个先进部分的利益和要求，企图把它**降低**到水平低的部分的认识水平（而不是经常去**提高**工人的觉悟程度），这必定会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并且为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想和非革命思想侵蚀工人准备温床。

现在来结束对基辅委员会政治斗争观点的分析。整个《宣言书》最奇怪和最突出的地方是，委员会认为在目前号召广大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活动是不可能的，认为最好是“根据广大群众能够理解的理由”来组织**局部性的**游行示威，其目的纯粹是为了进行鼓动（而不是为了对政府发生影响）。社会党人号召工人**不要**对政府发生影响！！！这真是妙透了……不好理解的只是，怎么可能有**不**对政府发生影响的游行示威呢？大概是叫工人关起门来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游行示威吧！或者是叫工人把拳头揣在兜里游行示威吧！这样大概就不会“对政府发生”有害而致命的“影响”了！什么叫“局部性的游行示威”？我们同样不能理解。是不是指职业性的游行示威，即只是为了职业性问题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再说一遍，这又和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是为了局部性的政治问题，而不是为了反对整个政治制度，反对整个专制制度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难道不是最纯粹的《信条》的和极端机会主义的思想吗？不是最纯粹的极端贬低和抹杀工人阶级政治觉悟和政治任务的思想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难道不是重复了京城中一位“青年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那句“至理名言”：“要使专制制度在工人中威信扫地，还不是时候”？

《宣言书》的极端狭隘的观点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问题上。我们还看到这样一段话：“鼓动工作对群众的影响，目前首先只能表现在促进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上；因此，委员会利用工人和业主的每一次冲突，或业主的每一个严重胡作非为的表现来唤起工人，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地位，号召他们起来反抗，并在罢工中起领导作用，申述他们的要求，向他们指出实现这些要求的最好途径，用所有这些方式来提高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就是这些，关于经济斗争再没有别的话了。这竟然叫作宣言书！再仔细读一读这些地方，就知道这又是《信条》的语言和《信条》的思想（这又一次证明《工人事业》[4]编辑部的极端错误，它执意要掩盖“青年经济派”的观点，认为这只是个别人的偏向）。

对于社会党人来说，经济斗争是把工人组织到革命政党中去的基础，是团结工人和开展工人的阶级斗争来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如果把经济斗争当作某种独立的东西来看待，那它就毫无社会主义的气味，欧洲各国的经验也证明不仅存在着大批社会主义的工会，而且也存在着大批反社会主义的工会。

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任务，是要“促进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社会党人的任务，是要以经济斗争去促进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工人政党的胜利。社会党人的任务，是要使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成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因此，基辅委员会《宣言书》的含糊说法，为伯恩施坦思想大开方便之门，使得对经济斗争的狭隘得不能容忍的看法合法化了。

要使鼓动工作对群众发生影响，就应该根据压迫的种种事实和表现来广泛开展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我们应该利用鼓动吸收更多工人参加革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鼓励各种政治斗争的表现，把自发的政治斗争形式组织成统一政党的斗争形式。因此，鼓动工作应该成为广泛传播政治性抗议和推行更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形式的**手段**。目前，我们鼓动工作的范围太窄，涉及的问题太少，所以我们的职责不是要使这种狭隘性合法化，而是要设法摆脱这种狭隘性，设法使我们的鼓动工作进行得深入和广泛。

《宣言书》中的这种狭隘性，不但造成了上述理论错误，而且还缩小了实际任务。这种缩小表现在他们希望“把当前的迫切任务规定为用调查表和其他方法来调查各地工厂工人的生活状况”。当然，我们不能一律反对调查表，它是鼓动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项目，但是，从事调查就会浪费本来就感不足的革命力量。

要知道，从我国合法的调查材料中就可以得到许多东西。当前的迫切任务应该是扩大鼓动和宣传（特别是政治鼓动和宣传），而且，在我们工人中流行着一种把他们自己写的通讯寄给社会主义报纸的良好习惯，这又可以保证我们有充分的材料。

把实际任务缩小得更厉害的情况表现在储金会问题上，他们认为只有“工会罢工”储金会是最理想的储金会，但是一句也没有谈到要这些储金会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它们为政治斗争服务。

要我们的秘密储金会只从事经济活动，这对《信条》的作者来说，是很自然的，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个委员会的《宣言书》来说，却是不可理解的。

在关于合法团体的问题上，《宣言书》的观点同样是很狭隘的，同样表现了他们想向臭名昭著的伯恩施坦主义让步。社会民主党的委员会要帮助成立储金会，这又是在分散力量，混淆文化主义的活动和革命工作之间的区别。革命政党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合法团体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工作，把它们作为进行鼓动的基地，作为建立联系以及进行其他工作的方便的隐蔽所，但是，只能为了这些目的。用社会党人的力量去帮助成立合法团体，是非常不合算的；使这些合法团体具有独立性，是错误的；认为在合法团体中可以“完全摆脱业主的干预和压迫”，是很可笑的。

最后，在基辅委员会的组织计划上，也反映了它观点的狭隘性和独特性。诚然，我们完全同意基辅委员会所说的，现在宣布恢复党和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还不是时候，但是我们认为，“运动具有直接的经济性质”、俄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接受政治鼓动”等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等待“地方小组巩固起来，数目增加起来，和工人的联系加强起来”，这同样是错误的，这种巩固往往会使它们马上遭到破坏。

不，我们应该立刻着手做统一工作，先从统一刊物做起，就是要先创办一个全俄机关报，这个机关报应当从事恢复党的准备工作，成为整个俄国的机关刊物，收集全国各地小组的通讯和材料，开辟专栏讨论争论的问题，扩大我们宣传和鼓动的范围，特别注意组织问题、策略问题和活动的方法，满足最开展的工人的各

种要求，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中水平较低的部分的觉悟（用工人通讯和其他东西来吸引他们），使他们愈来愈自觉地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和政治斗争。

我们确信，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为党的统一和重建创造实际条件，只有进行直接和公开的论战，反对狭隘的“经济主义”和日益流行的伯恩施坦思想，才能保证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正确发展。

注释：

[1]《论〈宣言书〉》一文提到了《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写的编后记（参见本卷第 279 页），所以可以确定写于 1899 年底或 1900 年初。

鉴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公布经济派的《信条》和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中公布经济派的一系列文件，都因未经这些文件的作者同意而招致了一些责难，列宁曾打算在征得基辅委员会的同意后把《宣言书》连同他的批驳文章一起发表，但终因基辅委员会不赞成而未果。从弗·阿基莫夫（马赫诺韦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发展概略》一书（1906 年圣彼得堡版）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曾经和《宣言书》一起散发过，因为该书摘引了列宁这篇文章，并且说：《宣言书》是在其出现后一年半，即 1900 年底由经济派的反对者公布出来的，目的不是为了传播，而是为了批判。文章于 1928 年正式发表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7 卷。——272。

[2]《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 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 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 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 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担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 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 年 10 月 27 日（11 月 9 日）被查封。——275。

[3]《公民》(《Гражданин》)是俄国文学政治刊物,1872—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创办人是弗·彼·美舍尔斯基公爵。作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3—1874年担任过它的编辑。原为每周出版一次或两次,1887年后改为每日出版。19世纪80年代起是靠沙皇政府供给经费的极端君主派刊物,发行份数不多,但对政府官员有影响。——275。

[4]《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 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杂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П·Ф·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萨·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工人事业》杂志的观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279。

《哈尔科夫的五月》小册子序言

列宁（1900 年 10 月—11 月上旬）

这是一本叙述有名的 1900 年哈尔科夫五一游行示威的小册子，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科夫委员会根据工人自己的记叙编辑而成。这本小册子是当作通讯寄来的，但是我们认为有必要出版单行本，这不仅因为它的篇幅相当大，而且也为了使它更易于尽可能大量地、广泛地流传。再过半年，俄国工人就要庆祝新世纪第一年的五一节了，因此现在就要注意使下次的庆祝活动能够在尽可能多的城市里展开，能够更加振奋人心，使参加者不仅人数多，而且组织性强，自觉性高，同时还决心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争取俄国人民的政治解放，从而争取无产阶级的阶级发展和为社会主义公开斗争的自由天地。现在就要着手准备下一次的五一游行示威了，而最重要的准备措施之一，应当是介绍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取得的成就，分析我们整个运动，特别是五一游行示威还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我们怎样弥补这些不足之处，以争取更好的成绩。

哈尔科夫的五一游行示威表明，庆祝工人的节日，能够变成声势多么浩大的政治性游行示威，要使这种庆祝活动真正成为觉悟的无产阶级伟大的全国游行示威，我们还有哪些不足之处。是什么使哈尔科夫的五月成为著名的事件呢？就是大批工人参加罢工，大街上举行成千上万人的大会，会场上红旗招展，大会宣布传单中提出的各种要求，这些要求都具有革命的内容，例如八小时工作制和政治自由。说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进行政治斗争的程度，说他们的主要事情应该是纯经济斗争，顶多只能慢慢地、悄悄地加上一部分政治鼓动，目的也不是反对俄国的整个政治制度，而是争取某些政治改良。这种鬼话已经被哈尔科夫的五一游行示威彻底驳倒了。但是，这里我们打算着重谈一下事情的另一方面。哈尔科夫

的五一游行示威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了俄国工人的政治才能，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对于充分发挥这种才能还有哪些不足之处。

哈尔科夫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准备五一游行示威，事前散发了小册子和传单；工人们还拟订了总游行示威和在马场演说的计划。可是为什么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呢？哈尔科夫的同志们这样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觉悟的工人社会党人“总部”的力量分配不平衡，这个工厂多，那个工厂少；其次，因为工人们的计划“被当局知道了”，当局自然就采取了一切措施来离间工人。结论很清楚：我们缺少一个**组织**。工人群众已经行动起来了，并且准备跟着社会主义的领袖们走，但是“总部”还没有能够组织成一个坚强的核心，来合理部署觉悟工人的全部力量，保证工作进行得非常秘密，使事前拟订的行动计划不仅不让政府当局知道，而且也不让组织外的人知道。这个组织应当是**革命的**组织，它的成员应当非常明确地了解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任务，决心同现行政治制度作百折不挠的斗争，它应当把俄国革命知识分子在几十年的教训中积累起来的社会主义知识和革命经验同先进工人所特有的对工人群众的了解以及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和引导群众前进的本领结合起来。我们首先和主要应当关心的就是这种结合，而不是划分知识分子同工人之间的人为的界限，不是建立“纯工人的”组织。这里我们想起了格·普列汉诺夫下面的一段话：

“团结已有的革命力量，是这种活动〈鼓动活动〉的必要条件。小组宣传可以由彼此没有任何联系、甚至彼此不知道对方是否存在的人们来进行。当然，没有组织总是会影响宣传的，但是这还不致使宣传不可能进行。而在社会动荡的时代，政治空气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里或那里常常会由于各种各样未能预料的情况而发生越来越多的爆发，预示革命风暴即将到来，总之，不进行鼓动，就会落后，——在这样的时代**只有组织起来的**革命力量才能对事变进程发生

巨大的影响。单枪匹马是无能为力的，只有最高级的组织——**革命组织**，才能肩负起革命事业。”（格·普列汉诺夫《社会党人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第 83 页）

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正是这样一个由于各种各样情况引起动荡和爆发的时代到来了，如果我们不想“落后”，就应当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善于领导一切个别爆发的全俄组织，从而使即将到来的风暴（哈尔科夫工人在小册子的结尾也谈到这个问题）不致成为自发的风暴，而成为无产阶级领导全国人民反对专制政府的自觉运动。

哈尔科夫的五一游行示威除具体表明我们的革命组织团结不够、准备不够外，还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有实际意义的证明。小册子里写道：“在五一节和游行示威之际，令人意想不到地提出了各种没有经过适当酝酿的实际要求，因此，总的说来，当然注定要失败。”例如，在铁路工厂工人的 14 项要求中，有 11 项是在现行政治制度下也完全可以达到的个别的小改善，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消除胡作非为的现象。除这些要求以外，还有三项同它们性质完全一样的要求，如（4）实行八小时工作制，（7）保证五月事件后工人人身不受侵犯，（10）由工人和厂部组成联合委员会来调解双方的种种纠纷。其中第一个要求（即第 4 项）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要求。显然，提出这项要求，说明先进的哈尔科夫工人懂得要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团结一致。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不应该把这种要求同工头态度要和蔼、工资要提高 10％这样一些局部要求混在一起。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的要求，各行各业的工人可以向（而且应当向）他们的业主提出，这种要求是行业性的要求，是个别工种工人的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是整个无产阶级的要求，这个要求不应向个别业主提出，而是要向国家政权即整个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代表提出，向掌握全部生产资料的整个资本家阶级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具有特殊意义，它是一项声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声明。我们应当让工人们了解这种差别，使他们不要把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降低到象要求发给免票或开除

守卫那样的水平。一年来，这里那里的工人们经常向业主提出各式各样的局部要求并为其实现而斗争，社会党人在支援这种斗争时，应当随时指出这种斗争要同各国无产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联系起来。因此五一节应当成为庄严地宣布工人们意识到这种联系并坚决参加这种斗争的日子。

拿成立纠纷调解委员会的要求（第 10 项）来说，由工人和厂部分别选出的代表组成的这个委员会，当然可以带来很多好处，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就是选举完全自由和代表完全独立。假若那些反对选举厂方走狗、激烈抨击厂部、揭露厂部的一切迫害行为的工人会被开除，那这个委员会还能带来什么好处呢？这样的工人不仅会被开除，而且还会被逮捕。这就是说，要让这个委员会给工人带来好处，第一，必须使代表不受厂方的左右；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成立工人的自由工会，即包括许多工厂、拥有自己的储金会并且能保卫自己的代表的工会。只有在本行业的许多工厂，最好是全部工厂都联合起来的时候，调解委员会才会有好处。第二，必须使工人的人身不受侵犯，也就是说，警察和宪兵不能任意逮捕工人。这项要求即保证工人人身不受侵犯（第 7 项）已经提出来了。试问，工人能向谁要求到保证人身不受侵犯和结社自由（我们认为这是调解委员会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呢？只有向国家政权要求，因为人身不受侵犯和结社自由有没有保证，取决于俄国国家的根本法律，甚至取决于俄国的国家管理形式。俄国的管理形式是无限君主制。沙皇专制独裁，独自颁布法律，任命全部高级官员，人民和人民代表无权过问。在这种国家制度下，人身不可能不受侵犯，公民结社，特别是工人结社不可能自由。因此向专制政府要求保证人身不受侵犯（和结社自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种要求无异于为人民要求政治权利，而专制政府之所以叫作专制政府，正是由于它不给人民政治权利。只有当**人民的代表**能够参与颁布法律和管理整个国家的时候才有可能保证人身不受侵犯（和结社自由）。现在没有人民代表机关，专制政府一只手给工人一点小小的让步，另一只手又总想把它夺回来。

哈尔科夫的五一游行示威再一次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省长接受工人群众的要求，释放了被捕者，几天之后，彼得堡又下令把几十名工人重新抓起来！省和工厂当局"保证"代表不受侵犯，而宪兵队却把他们抓起来投入单人牢房或赶出城市！这种保证对人民能有什么好处？

正因为如此，工人应当要求沙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国民代表会议。今年五一节前在哈尔科夫散发的传单中，曾经提出了这种要求，我们看到一部分先进工人完全了解它的意义。我们应当让**所有的**先进工人都清楚地了解这种要求的必要性，让他们不仅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宣传这种要求，而且在接近工人和很想知道社会党人和"城市"工人为什么而斗争的各阶层人民中广泛宣传这种要求。今年，在工厂视察员提出工人究竟需要什么的问题时，只有一个人高呼"要宪法"，由于这个喊声是孤零零的，一个记者多少带点嘲笑的口吻说："一个无产者**放了一炮**。"另一个记者干脆说，"在这种场合"这个回答是"半可笑的"（见《工人事业》出版的《哈尔科夫的工人运动》，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科夫委员会"总结报告。1900 年 9 月日内瓦版第 14 页）。老实说，这个回答并没有什么可笑的，可笑的只是这个孤零零地提出的改变整个国家制度的要求同缩短工作日半小时和在工作时间发放工资的要求极不协调。但是这后两项要求同要求宪法之间的联系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我们能使（我们一定能使）群众都了解这种联系，那么"要宪法！"的呼声就不会只是从一个人口中喊出来，而是从成千上万人的口中喊出来了，那时这个呼声就不是可笑的，而是可畏的了。据说，有人 5 月份路过哈尔科夫时问一个马车夫，工人要的是什么，马车夫回答说："他们要求八小时工作和办自己的报纸。"这个马车夫已经懂得，工人是不会满足于一些小恩小惠的，工人希望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希望自由而公开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并且为实现这些要求而奋斗。但是从他的回答中还看不出他意识到工人是在为全国人民的自由、为他们取得参加管理国家的权利而斗争。当俄国一切工业城市和工人区的工人群众

完全自觉和坚定不移地反复提出沙皇必须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要求的时候，当工人使全体城市居民和一切进城的农民都懂得社会党人的要求是什么，工人是为什么而斗争的时候，人民从警察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伟大日子就为期不远了！

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

列宁（1900 年 11 月初）

俄国社会民主党不止一次地声明过，俄国工人政党的当前政治任务应该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这一点在十五六年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即“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声明过；两年半以前，1898 年春，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成员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作过这一声明。虽然有过不止一次的声明，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问题，现在又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们运动中有许多人，对上述问题的解答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他们说经济斗争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们把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推到次要地位，缩小和限制这些任务，他们甚至声称，要在俄国成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言论，只是人云亦云，工人只要进行经济斗争就行了，政治可以让知识分子联合自由派去搞。新信条（臭名远扬的《信条》）的这个最近的声明，竟公开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还很幼稚，并且完全否定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而《工人思想报》（特别是《增刊》）所谈的，实质上也是这个意思。俄国社会民主党现在正处于动摇时期、怀疑时期，甚至到了自我否定的程度。一方面，工人运动正在脱离社会主义：有人在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但是有关整个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和政治任务，却根本不向工人解释，或解释得很不够。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也在脱离工人运动：俄国社会党人又在纷纷议论，说反对政府的斗争应该由知识分子单独进行，因为工人只能进行经济斗争。

我们认为，这些可悲的现象，是由三种情况造成的。第一，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活动初期，只进行一些小组宣传工作。等到我们转向群众鼓动工作的时候，有时不免陷入另一极端。第二，在活动初期，我们不得不经常同民意党人进行斗争，来保卫我们存在的权利。民意党人把“政治”理解为脱离工人运动的活动，把政治缩小到只进行密谋活动。而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这种政治的时候，走上了

另一个极端，竟笼统地把政治推到了次要地位。第三，当社会民主党人分散在地方工人小组内进行活动的时候，没有很好地重视，必须组织革命政党来统一各地方小组的一切活动，并正确地安排革命工作。工作分散占优势的情况，自然同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情况是有关联的。

上述的一切情况，使大家热中于运动的一个方面。“经济派”（如果可以说是一个“派”的话）企图把这种狭隘观点，提高为一种专门的理论，为此他们就企图利用那种打起新的旗帜传播旧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时髦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这种企图的危险性就是削弱了俄国工人运动同俄国社会民主党这个争取政治自由的先进战士之间的联系。而我们运动的最迫切任务，就是要巩固这种联系。

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它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维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为只从事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他党派的尾巴，背叛“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1]这一伟大遗训。各国都经历过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联系、各行其是的时期，这种相互脱节的现象，削弱了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所有的国家里，只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奠定了二者的牢固基础。但是，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在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必要性，在理论上早就讲过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结合只是到现在才开始形成。这个形成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各种动摇和怀疑，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

从过去的历史中，我们得出的教训是什么呢？

整个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最迫切任务是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是集中在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上的。另一方面，历史表明，社会主义思想脱离劳动阶级先进人物的现象，在俄国要比其他国家厉害得多，因此俄国革命运动必然软弱无力。由此自然产生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随着运动的发展，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场所会越来越广，工作的方面会越来越多，需要越来越多的搞运动的人集中力量去解决宣传和鼓动的日常需要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局部任务。这种现象完全是合乎规律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现象迫使我们特别注意，要使局部的活动任务和个别的斗争手段不致成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要使准备工作不致成为主要的和唯一的工作。

促进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组织，是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谁把这个任务推到次要的地位，不使一切局部任务和个别斗争手段从属于这个任务，谁就会走上错误的道路，并给运动带来严重的危害。把这个任务推到次要地位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他们号召革命者依靠某些脱离工人运动的密谋小组的力量，去同政府作斗争；第二种人，他们经常缩小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内容和范围，他们认为只有在工人生活中的特殊时刻，只有在庄严的场合，用“政治”来款待工人才是可能和适当的，他们过分注意把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化为要求专制制度作个别让步，而不太注意把这些要求变成革命工人政党反对专制制度的有计划的坚决的斗争。

“组织起来！”《工人思想报》用各种调子一再向工人这样宣传，“经济派”的一切拥护者也一再向工人这样宣传。我们当然完全同意这个呼吁，但是一定要补充一句：不但要组织互助会、罢工储金会和工人小组，而且要组织政党，组织起

来同专制政府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无产阶级就不能去进行自觉的阶级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工人运动就会软弱无力，只靠一些储金会、工人小组和互助会，工人阶级永远不能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任务：使自己和全体俄国人民摆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奴隶地位。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俄国工人阶级已经表明它能够推举出这样的人物，最近五六年来俄国工人所广泛开展的斗争，表明工人阶级中蕴藏着无穷的革命力量。它表明，追求社会主义、追求政治觉醒和政治斗争的工人，不仅没有因为政府的疯狂迫害而减少，而且还增加了。我们的同志在 1898 年召开的代表大会，正确地提出了任务，不是人云亦云，不是只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憧憬……我们把党的纲领问题、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以后，就应该坚决着手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对我们纲领的基本原则的看法，已经讲过了，详细阐述这些原则，不是本文的任务。关于组织问题，我们打算在最近几号报纸上写一些文章。这是我们最伤脑筋的问题之一。在这方面，我们大大落后于俄国革命运动的老一辈活动家；我们应该坦白承认这一缺点，应该想尽一切方法使我们的活动更加秘密，有系统地宣传活动准则以及蒙蔽宪兵和躲避警察耳目的方法。我们应该培养一些不仅能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大的组织，大到可以使我们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之间进行严密的分工。至于策略问题，我们只能在这里谈这样一点：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它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并且在现有条件下能够使我们取得最大的成绩。有了坚强的组织严密的党，某一次的罢工也能够变成政治示威，变成对政府的一次政治胜利。有了坚强的组织严密的党，个别地区的起义也能够发展成胜利的革命。我们应当记住，为满足个别要求，为取得个别让步而同

政府展开的斗争，不过是和敌人的小小接触，不过是小小的前哨战，决战还在后面。我们面对着一座强大的敌人堡垒，从那里向我们发射出雨点般的炮弹和枪弹，夺去了我们的优秀战士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夺取这座堡垒。只要我们能够把日益觉醒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和俄国革命者的一切力量联合成一个党，并能使俄国一切生气勃勃和正直的人都倾向于这个党，我们就一定能够拿下这座堡垒。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实现俄国工人革命家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的伟大预言："等到千百万工人群众举起筋肉条条的拳头，士兵刺刀保卫着的专制枷锁就会被粉碎！"[2]

注释：

[1]见注 88。——335。

[2]工人革命家彼·阿·阿列克谢耶夫的这句话出自他 1877 年 3 月 10 日（22 日）在彼得堡沙皇法庭上发表的演说。这篇演说于 1877 年第一次刊登在伦敦的《前进》杂志上，后来经许多秘密报刊转载，在俄国工人中广为流传，对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338。

从何着手？[1]

列宁（1901 年 5 月）

“怎么办？”这个问题，近几年来特别突出地提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面前。问题不在于选择道路（象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那样），而在于我们在已经确定的道路上应当采取哪些实际步骤，到底应当怎么做。问题在于实际行动的方法和计划。斗争性质和斗争方法问题对于从事实际活动的党来说是一个基本问题；应当承认，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还没有解决，还有一些重大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暴露出令人感到痛心的思想上的不坚定和动摇。一方面，力图削减和缩小政治组织工作和政治鼓动工作的“经济主义”派别[2]还远没有死亡。另一方面，只会迎合每个新的“潮流”而不会区别眼前要求同整个运动的基本任务和长远需要的无原则的折中主义派别，还和过去一样趾高气扬。大家知道，这一派的巢穴就是《工人事业》[3]。它最近的“纲领性的”声明，即那篇采用《历史性的转变》这样一个堂皇的标题的堂皇的文章（《〈工人事业〉杂志附刊》[4]第 6 期），十分清楚地证实了我们的上述看法。昨天还在向“经济主义”献媚，对严厉谴责《工人思想报》[5]愤愤不平，把普列汉诺夫关于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问题的提法加以“缓和”，今天却已经在引用李卜克内西的话：“假使形势在 24 小时内发生变化，那么策略也必须在 24 小时内加以改变”，现在已经在谈论建立“坚强的战斗组织”来向专制制度发动直接的攻击，向它发动冲击，谈论“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革命的政治的鼓动”（请看，多么带劲，又是革命的，又是政治的！），“不断号召举行街头抗议”，“举行带有鲜明的〈原文如此！〉政治色彩的街头示威”，等等，等等。

《工人事业》这样快就领会了我们在《火星报》创刊号上提出的纲领[6]，知道要建立一个不仅争取个别的让步，而且还要直接夺取专制制度堡垒的坚强的有

组织的党，对于这一点，我们本来可以表示满意，但是这些人没有任何坚定的观点，这种情况却可能把我们的满意完全打消。

当然，《工人事业》抬出李卜克内西来是徒劳无益的。在 24 小时内可以改变某个专门问题上的鼓动策略，可以改变党组织某一局部工作的策略，可是，要改变自己对于是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需要战斗组织和群众中的政治鼓动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不要说在 24 小时内，即使在 24 个月内加以改变，也只有那些毫无原则的人才办得到。借口什么环境不同和时期变化，这是滑稽可笑的。在任何“平常的、和平的”环境中，在任何“革命士气低落”的时期，建立战斗组织和进行政治鼓动都是必要的。不仅如此，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和在这样的时期，上述工作尤其必要，因为到了爆发和发动时期再去建立组织那就太晚了；组织必须建立好，以便随时能够立即展开自己的活动。“在 24 小时内改变策略”！但是要改变策略，就必须先要有策略；没有一个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组织，就谈不到什么系统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计划，而只有这样的计划才配称为策略。请看实际情况：人们对我们说，“历史时机”向我们党提出了一个“完全新的”问题——恐怖手段问题。昨天，政治组织和政治鼓动问题是“完全新的”问题，今天，恐怖手段问题又是“完全新的”问题了。听到这些完全忘掉自己身世的人谈论起根本改变策略的问题，不是令人感到奇怪么？

幸亏《工人事业》说错了。恐怖手段问题完全不是什么新的问题，我们只要简略地提一下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既定观点就够了。

在原则上，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而且也不可能拒绝恐怖手段。这是一种军事行动，在一定的战斗时机，在军队处于一定的状况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完全适用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问题的实质就在于：目前提出来的恐怖手段，并不是作为作战军队的一种行动，一种同整个战斗部署密切联系和相适应的行动，而

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同任何军队无关的单独进攻的手段。的确，在没有中央革命组织而地方革命组织又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恐怖行动也只能是这样。因此，我们坚决宣布，这种斗争手段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合时宜的，不妥当的，它会使最积极的战士抛开他们真正的、对整个运动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它不能瓦解政府的力量而只会瓦解革命的力量。请回想一下最近发生的事件吧。我们亲眼看到广大的城市工人和城市“平民”群众奋起投入斗争，而革命者却没有一个领导者和组织者的总部。在这样的条件下，最坚决的革命者采取恐怖行动，不是只会削弱那些唯一可以寄予极大希望的战斗队伍么？不是只会使革命组织同那些愤愤不平的、起来反抗的、准备斗争的、然而分散的并且正因为分散而显得软弱无力的群众之间的联系中断么？而这种联系正是我们胜利的唯一保证。我们决不想否认单独的英勇突击的意义，可是我们的责任是要竭力告诫人们不要醉心于恐怖行动，不要把恐怖行动当作主要的和基本的斗争手段，而现在有许许多多的人非常倾心于这种手段。恐怖行动永远不能成为经常的军事行动，它至多只能成为发动决定性冲击时的手段之一。请问，我们现在是否可以号召发动决定性的冲击呢？《工人事业》显然认为是可以的。至少，它是在高喊：“组成冲击队吧！”可是这仍旧是一种失去理智的狂热。我们的军事力量大部分是志愿兵和起义者。我们的常备军只是几支人数不多的队伍，而且就是这几支队伍也还没有动员起来，它们彼此之间没有联系，还不能组成作战队伍，更不用说组成冲击队了。在这种情况下，凡是能够认清我们斗争的总的条件，而且在事变历史进程的每个“转变”中不忘记这些条件的人都应当懂得，我们当前的口号不能是“发动冲击”，而应当是“对敌人的堡垒组织正规的围攻”。换句话说，我们党的直接任务，不能是号召现有的一切力量马上去举行攻击，而应当是号召建立革命组织，这一组织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统一一切力量，领导运动，即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并以此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军事力量。

二三月事件[7]的教训是很深刻的，现在大概不会有人在原则上反对这种结论了。可是现在要求我们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要求我们不仅懂得需要有什么样的组织来进行什么样的工作，而且要制定出一定的组织**计划**，以便能够从各方面着手建立组织。鉴于问题的迫切重要性，我们想提出一个计划草案来请同志们考虑。关于这个计划，我们在准备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将作更详细的发挥。[8]

我们认为，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线。首先，我们需要报纸，没有报纸就不可能系统地进行有坚定原则的和全面的宣传鼓动。进行这种宣传鼓动一般说来是社会民主党的经常的和主要的任务，而在目前，在最广大的居民阶层已经对政治、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兴趣时，这更是特别迫切的任务。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进行集中的和经常的鼓动工作，用以补充靠个人影响、地方传单、小册子等方式进行的零散的鼓动工作；而要进行这种集中的和经常的鼓动工作，就必须利用定期的报刊。报纸出版（和发行）号数多少和是否按时，可以成为衡量我们军事行动的这个最基本最必要的部门是否坚实可靠的最确切的标准，这样说看来并不是夸大。其次，我们需要的是全俄的报纸。假使我们不能够用报刊上的言论来统一我们对人民和对政府的影响，或者说在我们还不能够做到这点以前，要想去统一其他更复杂、更困难然而也是更有决定意义的影响手段，那只能是一种空想。无论在思想方面，或者在实践、组织方面，我们的运动的缺点首先就在于自己的分散性，在于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几乎完全陷入纯粹地方性的工作中，这种地方性的工作会缩小他们的眼界和他们的活动范围，限制他们从事秘密活动的技能和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不坚定和动摇的最深刻的根源，正是应当从这种分散性中去寻找。而为了克服这个缺点，为了把各个地方的运动合成一个全俄的运动，**第一步**就应当是创

办全俄的报纸。最后，我们需要的报纸还必须是**政治**报纸。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没有政治机关报，就绝对实现不了我们的任务——把一切政治不满和反抗的因素聚集起来，用以壮大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已经在工人阶级中间激起进行“经济”揭露，即对工厂进行揭露的热情。我们还应当再前进一步，在一切稍有觉悟的人民阶层中激起进行**政治**揭露的热情。不必因为目前政治揭露的呼声还显得无力、稀少和怯懦而感到不安。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容忍警察的专横暴虐，而是因为那些能够并且愿意进行揭露的人还没有一个说话的讲坛，还没有热心听讲并且给讲演人以鼓舞的听众；他们在人民中间还完全看不到那种值得向它控诉“至高无上的”俄国政府的力量。而现在这一切都在极其迅速地变化着。这样一种力量现在已经有了，这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已经证明它不仅愿意听从和支持政治斗争的号召，而且决心勇敢地投入斗争。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就应当是这样的讲坛。俄国工人阶级与俄国社会其他阶级和阶层不同，它对政治知识经常是感兴趣的，它经常（不仅在风暴时期）迫切要求阅读秘密书刊。在有这样广泛的要求的条件下，在已经开始培养有经验的革命领导者的条件下，在工人阶级的集中化已经使工人阶级实际上成为大城市工人区、大小工厂区的主人的条件下，创办政治报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完全办得到的事情。而通过无产阶级，报纸还可以深入到城市小市民、乡村手工业者和农民中间去，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政治报纸。

但是，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依靠报纸并通过报纸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这个组织

不仅从事地方性工作，而且从事经常的共同性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员密切注视政治事件，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及其对各个不同居民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的党对这些事件施加影响的适当措施。单是技术上的任务——保证正常地向报纸提供材料和正常地发行报纸——就迫使我们去建立统一的党的地方代办员网，这些代办员彼此间要密切联系，了解总的情况，习惯于经常按时执行全国性工作中的各种零星任务，并组织一些革命行动以检验自己的力量。这种代办员网［注：自然，这样的代办员只有在同我们党的各地的委员会（团体、小组）密切联系的条件下，才能有成效地进行工作。而且一般说来，我们所拟订的整个计划，当然也只有在各地的委员会的积极支持下才能实现。这些委员会在党的统一方面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我们相信它们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一定能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争取到这个统一。］将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组织的骨干。这种组织，其规模之大使它能够遍布全国各地；其广泛性和多样性使它能够实行严密而精细的分工；其坚定性使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转变关头”和意外情况下都能始终不渝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其灵活性使它善于一方面在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集中全部力量于一点的时候避免同他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他最难料到的地点和时间攻其不备。今天我们面临的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支持在大城市的街头游行示威的学生。明天我们就可能面临更困难的任务，例如，支持某个地区的失业工人的运动。后天我们就必须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革命的姿态参加农民的暴动。今天我们必须利用政府向地方自治机关进攻所造成的紧张的政治形势。明天我们就必须支持人民反对沙皇的某个凶恶的走狗的骚动，帮助人民用抵制、抨击、游行示威等等方法来教训他，使他不得不作公开的让步。只有靠正规军经常活动才能使战斗准备达到这种程度。假如我们集中自己的力量来办共同的报纸，那么，这样的工作不仅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能干的宣传员，而且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有

才干的组织者，最有才能的党的政治领袖，这些领袖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提出进行决战的口号并且领导这个决战。

最后，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误会，我还想再说几句话。我们一直都只是讲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准备，可是我们决不是想以此说明，专制制度只有在正规的围攻或有组织的冲击下才会垮台。这种观点是一种荒谬的学理主义。相反，专制制度完全可能由于各方面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某一次自发的爆发或无法预料的政治冲突的压力而垮台，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种可能性是更大的。但是，任何一个政党，只要不是陷入冒险主义，就决不会把自己的活动建筑在指望这种爆发和冲突上面。我们应当走自己的路，坚持不懈地进行自己的有系统的工作。我们愈是不指靠偶然性，我们就愈不会由于任何“历史性的转变”而手足无措。

注释：

[1]《从何着手？》一文原为《火星报》第 4 号社论，在俄国国内和国外流传很广。俄国国内一些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还曾把它印成单行本。

列宁在本文中提出的和后来在《怎么办？》一书中详细发挥的组织思想和策略思想，是在俄国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践活动的指针。——1。

[2]经济主义派别是指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派这一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的主要报刊是《工人思想报》（1897—1902 年）和《工人事业》杂志（1899—1902 年）。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

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44—156 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1。

[3]《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　Дело》）是俄国经济派的杂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因该杂志在其附刊第 6 期上发表，《历史性的转变》一文，所以列宁称它是无原则的折中主义派别的巢穴。该杂志从第 10 期起重新转向经济主义。该杂志于 1899 年 4 月—1902 年 2 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 12 期（9 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1。

[4]《〈工人事业〉杂志附刊》（《Листок《Рабочего　Дела》》）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的不定期附刊，1900 年 6 月—1901 年 7 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 8 期。——1。

[5]《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经济派的报纸，1897 年 10 月—1902 年 12 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 16 号。头几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 5 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209—238 页）和《怎

么办？》（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1。

[6]指《火星报》创刊号的社论《我们运动的当前任务》一文（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333—338 页）。

《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 1900 年 12 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 年 7 月起）和日内瓦（1903 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 年 4 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 年 1 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俄国火星派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于 1903 年 10 月 19 日（11 月 1 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 52 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后的《火星报》为新《火星报》。——2。

[7]指 1901 年 2—3 月间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哈尔科夫、喀山、雅罗斯拉夫尔、华沙、比亚韦斯托克、托木斯克、敖德萨和俄国其他城市发生的大学生和工人的大规模政治游行示威、集会和罢工。游行示威和罢工的导火线是当年 1 月沙皇政府把参加大学生集会的 183 个基辅大学生送去当兵（参看列宁的《183 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一文，《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346—351 页）。各地游行队伍被沙皇政府派来的警察和哥萨克驱散，游行群众遭到毒打。3 月 4 日（17 日）在彼得堡喀山教堂附近广场上举行的游行示威，遭到特别残酷的镇压，参加游行示威的数千名大学生和工人中有数百人受到毒打，其中数人被打死，多人受伤致残。1901 年二三月事件证明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工人参加政治性运动这一事实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6。

[8]指列宁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该书于 1902 年 3 月由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6。

新的激战

列宁（1901 年 6 月）

看来，目前我国的工人运动又以不可阻挡之势导向尖锐的冲突，使政府和一切有产阶级胆战心惊，使一切社会党人欢欣鼓舞。是的，尽管军事镇压造成的牺牲是惨重的，但是这些冲突使我们欢欣鼓舞，因为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反抗证明，他们不能再忍受自己的处境，不愿继续做奴隶，不愿在暴力和专横之下忍气吞声了。现今的制度，即使在最和平的日子里，也会经常不可避免地使工人阶级遭受无数的牺牲。千千万万终生为别人创造财富而劳动的人，由于饥饿和长期吃不饱而死亡，由于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由于十分低劣的居住条件，由于得不到足够的休息而染病早亡。宁可同这个可憎的制度的保卫者直接斗争而死，也不愿象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驯服牛马那样慢慢地死去，这才确确实实称得上英雄。我们绝不是说赤手空拳同警察搏斗是最好的斗争方式。相反，我们始终向工人指出，要更冷静更沉着地进行斗争，力求把种种不满引向支持革命政党的有组织的斗争，这样做对他们才是有利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汲取力量的主要源泉，正是工人群众的反抗精神，工人被经常受到的压迫和暴力逼得走投无路，他们的反抗精神有时不能不爆发成为殊死的斗争。这种突然爆发的斗争唤起受贫困和愚昧压抑的广大工人阶层去自觉地生活，使他们普遍地对压迫者、对自由的敌人产生正当的憎恨。正因为如此，我们听到象 5 月 7 日奥布霍夫工厂发生激战的消息，就不能不高呼："工人起义被镇压了，工人起义万岁！"

在过去，就在不久以前，工人起义只是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发生的绝无仅有的事情。现在可就不同了。几年前，我们处于工业繁荣时期，那时商业昌盛，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但是，工人为了争取改善劳动条件，还是举行了一系列的罢工，因为他们懂得，不应该错过时机，应该抓住厂主利润特别高，容易迫使厂主让步

的时机。可是，现在危机代替了繁荣，厂主的商品无法脱手，利润减少，破产数量增多，工厂缩减生产，解雇工人，工人成群地流浪街头，没有饭吃。工人不得不进行拼死的斗争，但已经不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境况，而是为了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为了减少厂主转嫁给他们的损失。这样，工人运动就日益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起初只是个别特殊场合下的斗争，接着是工业复苏和商业昌盛时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最后是危机时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说，工人运动已成为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它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发展起来。

工业复苏为危机所代替，这一事实不仅会使工人懂得必需经常不断地进行团结一致的斗争，同时还会破除在工业繁荣时期形成起来的有害幻想。在某些地方工人采取罢工手段比较容易地取得了厂主的让步，于是人们就夸大这种“经济”斗争的意义，忘记了工人的工会（行业工会）和罢工最多也只能使出卖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条件略微有利一些。当这种“商品”由于危机而找不到销路时，行业工会和罢工就无能为力了，它们不能改变使劳动力变为商品、使劳动群众极端贫困和陷于失业的条件。要改变这些条件就必须同现在的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革命的斗争，而工业危机将会使愈来愈多的工人深信这个真理。

我们回过来谈谈 5 月 7 日的激战吧。下面我们引用一下我们现有的关于五月罢工和彼得堡工潮的报道[1]。我们在这里也要分析一下警察局关于 5 月 7 日激战的公报。近来我们对政府（还有警察局）关于罢工、游行示威、同军队冲突的公报已经有些听惯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材料，可以判断这些公报的正确程度，我们有时能够从警察局谎言的烟雾中看出人民愤怒的火焰。

官方的公报说：“本月（5 月）7 日，在施吕瑟尔堡大街旁的亚历山大村的奥布霍夫炼钢厂，有不同部门的工人近 200 人在午间休息以后停了工，并且在同厂长助理伊万诺夫中校进行交涉时，提出了种种无理的要求。”

即使工人没有在两个星期以前预先通知就停了工（假定停工不象以往经常发生的那样是由厂主的不法行为所引起的），那么，甚至按照俄国的法律（近来，对它作了系统的补充，加强了对工人的迫害），这也不过是归治安法官处理的普通的违警过失。可是，俄国政府却要采取严厉手段，这就使它愈来愈陷入令人可笑的境地：它一方面颁布法律，规定了新的罪行（例如，擅自拒绝工作或聚众闹事，损害他人财产，或以暴力反抗武装力量），加重了对罢工等等的惩处，另一方面，无论在实际上或政治上它都不可能执行这些法律，不可能依据这些法律来治罪。在实际上它不可能向成千成万的人就拒绝工作、罢工、“聚众闹事”等问题追究责任。在政治上它也不可能每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进行法院审理，因为不管怎样安排审判人选，怎样阉割公开报导，审判还是不能不透露一点风声，而“受审”的当然不是工人，而是政府。那些直接为了帮助政府同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同时又是为了用“国家”为“社会秩序”着想等借口来**掩盖**斗争的政治性质）而颁布的刑法，由于**直接的**政治斗争，由于公开的巷战，也就根本无法起到重要的作用了。“司法机关”撕下了公正和崇高的假面具，逃之夭夭，听任警察、宪兵和哥萨克恣意横行，结果这些人受到了石块的款待。

请回忆一下，政府是怎样以工人的“要求”为借口的。从法律上来看，停工就是一种过失，和工人提出什么要求毫无关系。但是，政府确实不可能依据不久前才颁布的法律来行事，于是就声明说工人的要求是无理的，力图借以证明“用自己的手段”进行镇压是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谁是公断人呢？原来就是厂长助理伊万诺夫中校，也就是工人所指控的厂方领导人！难怪工人要用石块来回敬当权者的这种辩解了！

就这样，工人全都涌上街头，阻碍了有轨马车的通行，一场真正的战斗开始了。工人**两次**击退了警察、宪兵、骑警和驻厂武装分队［注：顺便说一下。政府的公报说，“驻厂武装分队”“在厂内早已作好准备”，而宪兵、骑警和巡警只是后

来才召集来的。到底从什么时候和为什么驻厂**武装**分队要在厂内**作好准备**呢？是不是从 5 月 1 日开始的？是不是预料到工人要游行示威？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毫无疑问，政府故意隐瞒它所掌握的实际材料：是什么引起了工人的不满和激愤，这种情绪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的进攻。看来，他们竭尽全力进行了战斗，尽管他们的唯一武器只是石块。不错，人群中是响起了“几声枪声”（姑且相信警方的公报），然而没有伤一个人。只是石块“**如冰雹一般**”四处横飞。工人不仅表现出顽强的反抗精神，而且也表现出机智，表现出善于随机应变和选择最好的斗争方式的本领。他们占据了邻近的院子，**从围墙内**把石块投向沙皇的走狗。甚至在遭到三排枪射击**之后**，在一个工人被打死（就只一人？），八人受伤（？）（一人在第二天死亡），人群开始逃散的时候，战斗还在继续进行，奉命赶来的鄂木斯克步兵团的几个连还得把邻院内的“工人清除出去”。

政府胜利了。但是每次这样的胜利必然会促进它的最后失败的到来。每一次同人民交战，都会使更多的工人激于义愤而立志投入战斗，都会培养出一些经验更丰富、武装得更好、行动更勇敢的领导者。至于领导者应该尽力按照什么样的计划行动，我们已经谈过了。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绝对必须建立坚强的革命组织。但是说到 5 月 7 日这样的事件，还应该注意下面几点。

最近人们纷纷议论说，同现代化的军队进行巷战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希望的；那些自作聪明的“批评家”特别坚持这个论点，他们用资产阶级学术的破烂货冒充公正的科学的新结论，并曲解恩格斯的话，其实恩格斯当时所谈的（而且是有保留地谈到的）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暂时的策略[2]。我们甚至从这一个搏斗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所有这些议论完全是胡说八道。巷战是可能的，一旦政府要同不仅是一个工厂的工人较量，那么，没有希望的不是斗争者的处境，而是政府的处境。工人在 5 月 7 日的搏斗中除了石块外没有别的武器，但是市长的禁令显然不能阻止他们在下一次准备好其他武器。这次工人并没有作好准备，而且总

共也只有 3500 人，但是他们还是击退了数百名骑警、宪兵、巡警和步兵。请想一下，警察进攻施吕瑟尔堡大街 63 号的**一座**房屋是很容易的吗！[3]再想一下，如果不仅要把两三个院子和两三座房屋里的“**工人清除出去**”，而且要把彼得堡的一个个工人区的“**工人清除出去**”，那会是很容易的吗！一旦事情发展到进行决定性斗争的时候，难道可以只是把工人“**清除出去**”，而不必把那些没有忘记 3 月 4 日的无耻屠杀[4]，没有向警察政府屈服，只是受到警察政府威吓而不相信自己力量的人从首都所有的房屋和院子里全部“**清除出去**”吗！

同志们！一定要设法把 5 月 7 日伤亡者的姓名全部收集上来。让首都所有的工人都来悼念他们，并且作好准备，为了人民的自由，同警察政府进行新的决定性的斗争！

注释：

[1]指《俄国的五一节》这篇通讯，载于 1901 年 6 月《火星报》第 5 号《工运新闻和工厂来信》栏。——13。

[2]指恩格斯的《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91—612 页）。《导言》是恩格斯于 1895 年 2 月 14 日和 3 月 6 日之间为在柏林出版的马克思这部著作的单行本而写的。在《导言》随单行本发表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强调“帝国国会在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国内局势紧张”，坚决要求恩格斯把其中“过分革命的调子”改得温和一些。在当时的条件下，恩格斯不得不考虑执委会的意见，在校样中作了某些删改。这样做虽使原稿受到一些损害，但没有影响整个《导言》的革命精神。

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袖们曾经利用这篇《导言》为他们推行的放弃革命、否认无产阶级武装起义和街垒战的必要性的路线辩护。

《导言》的全文最初于 1930 年在苏联发表。——15。

[3]指彼得堡涅瓦关卡外的麦克斯韦尔工厂的工人于 1898 年 12 月罢工期间同警察发生的冲突。12 月 15 日深夜，沙皇警察当局派遣骑警、巡警包围了施吕瑟尔堡大街 63 号的该厂工人宿舍，试图逮捕组织罢工的工人积极分子。手无寸铁的工人及其家属起而自卫，英勇抵抗达数小时之久。——15。

[4]指 1901 年 3 月 4 日（17 日）沙皇政府镇压彼得堡喀山教堂附近广场上举行的游行示威一事（参看注 7）。——15。

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

列宁（1901 年 12 月 6 日〔19 日〕）

现把我们的一位代表寄给我们的一封信全文抄录如下：

“给俄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的一封信

我们在流放地的同志建议我们对《火星报》发表一些意见，为此，我们决定陈述一下我们同这个机关报不一致的原因。

我们认为创办一种专门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来专门探讨政治斗争问题是完全适合时宜的，但是我们认为，《火星报》在解决自己所担负的这个任务方面做得不能令人满意。《火星报》的主要缺点在于它过分强调参加运动的思想家对于运动的方向的影响，这个缺点贯穿在报纸的各栏中，并由此产生它的其他大大小小的缺点。同时，《火星报》很少考虑运动的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不知道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形成工人运动的一定形式并且决定着运动的道路，而思想家们，即使他们受到最出色的理论和纲领的鼓舞，作出一切努力，也不可能使运动脱离这个道路。

把《火星报》和《南方工人报》[1]加以对比，这个缺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南方工人报》象《火星报》一样举起政治斗争的旗帜，但能把这个斗争同南俄工人运动的前一阶段联系起来。《火星报》则完全不是这样对待问题的。《火星报》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使‘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但是忘记了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适当的燃料和有利的外部条件。《火星报》极力排斥‘经济派’，但是没有看到正是‘经济派’的活动为工人参加二三月事件作了准备，而工人参加这些事件却是《火星报》所特别强调的和显然过分渲染了的。《火星报》对 90 年代末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持否定态度，而忽略了那个时候除了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外没有条件进行别的工作，并且也忽略了这一斗争的巨大的教育意义。《火星报》

由于完全不正确地和非历史地评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活动的这个时期和这个方向，结果就把他们的策略同祖巴托夫的策略等同起来，没有看到'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和'微小的让步'的不同之处：前者能够扩大和加深工人运动，后者却以瓦解任何斗争和任何运动为目的。

《火星报》浸透着社会运动幼年时期的思想家们所特有的宗派主义的偏执，所以总是把任何不同意见不仅斥责为背离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甚至斥责为投敌行为。它对《工人思想报》的极端无礼的、应当受到最严厉最无情谴责的攻击就是这样。它竟在那篇评论祖巴托夫的文章中大谈特谈《工人思想报》，硬说祖巴托夫在一部分工人中间的胜利是由于《工人思想报》的影响。《火星报》对其他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凡是在俄国工人运动的进程和任务问题上与自己看法不同的，都持否定的态度，在同它们进行激烈的论战时就常常不顾事实，吹毛求疵地抓住个别确实不恰当的词把一些莫须有的观点硬加在论敌的头上，强调那些往往并不重要的分歧之点，而绝提大量的一致的观点。我们这里指的是《火星报》对待《工人事业》的态度。

《火星报》的这种争论癖首先是由于它夸大'思想'（纲领、理论……）在运动中的作用而产生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西欧国家俄国侨民中间发生的内讧的余波，关于这场内讧，他们已急急忙忙地通过一系列论战性的小册子和文章公之于世了。在我们看来，他们的所有这些分歧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实际进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也许只是在那些在进行工作的同志中间引起令人遗憾的分裂，从而损害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因此，我们不能不对《火星报》的这种争论嗜好持否定态度，尤其是当它超出礼貌许可的范围的时候。

《火星报》的这个主要缺点也就是它在社会民主党对待各社会阶级和派别的态度这个问题上前后不一致的原因。《火星报》根据理论的推理，提出关于立即转入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任务，但是它大概也感觉到，在目前情况下解决这个任

务对于工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而它又没有耐心等待工人继续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所以就开始到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去寻找同盟者，而在寻找同盟者的时候，它常常离开阶级观点，掩饰阶级矛盾，把对政府不满这一共同点放在第一位，尽管各种'同盟者'产生这种不满的原因和不满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如《火星报》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就是这样。地方自治机关往往因为政府对于地方自治人士先生们的土地要求的保护不及对工业的保护多而深表不满，《火星报》力图从这种不满中煽起政治斗争的火焰，并且答应给不满足于政府的小恩小惠的贵族以工人阶级的援助，而只字不提这些居民阶层之间的阶级纷争。当然，谈论地方自治人士的觉醒，指出它是一种反对政府的因素，这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必须讲得清楚明了，不要使我们同这些人之间可能达成的协议的性质含糊不清。而《火星报》在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问题上的提法，在我们看来，只会模糊阶级意识，因为在这里它的提法与宣扬自由主义和各种文化创举的人一样，是同社会民主党书刊的基本任务相对立的（社会民主党书刊的基本任务是批评资产阶级制度和阐明阶级利益，而不是掩饰它们之间的对抗）。《火星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是这样。然而在其他一些文章中《火星报》却又尖锐地斥责一切'妥协'，比如说，替盖得派的偏激行为辩护。

我们不准备分析《火星报》的其他比较次要的缺点和失误了，最后我们认为应当说明一下，我们进行批评绝对不是要贬低《火星报》可能具有的意义，也不是闭眼不看它的优点。我们向这份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报纸致以敬意。我们认为它及时发表了一些文章，对恐怖手段问题作了恰当的说明，这是它的重大功绩。最后，我们不能不指出，《火星报》使用的是标准的、规范的语言，它能按时出版并且经常登载许多新鲜有趣的材料，这在秘密出版物中是不可多得的。

一群同志

1901 年 9 月"

读了这封信，我们首先要说，我们衷心欢迎写信人的直爽和坦率。早就应当停止玩捉迷藏的游戏了，不要再隐瞒自己的“经济主义的”“信条”（象从其中分离出“政治派”的敖德萨委员会的一部分人所做的那样），或者歪曲事实，说什么目前“根本没有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犯有‘经济主义’错误”（《工人事业》出版的《两个代表大会》一书第 32 页）了。——现在让我们来谈正题。

写信人的主要错误，和《工人事业》所犯的错误（着重参看第 10 期）完全相同。他们搞不清运动的“物质的”（用《工人事业》的话来说是自发的）因素和思想的（自觉的，“按计划”进行活动的）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他们不懂得，“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为了真正地“考虑运动的物质因素”，必须批判地对待它们，必须善于指出自发运动的危险和缺点，必须善于把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说思想家（即自觉的领导者）不能使运动脱离由环境和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这就是忘记一个起码的真理：自觉性是**参加**这种相互作用和这种决定的。欧洲的天主教的和君主派的工会也是环境和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不过参加这一相互作用的是神父和祖巴托夫之流的自觉性，而不是社会党人的自觉性。写信人（以及《工人事业》）的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拙劣的模仿，醉心于这种模仿的是我们的“批评家们”和伯恩施坦派，这些人不懂得如何把自发的进化和自觉的革命活动结合起来。

在目前时期，这一严重的理论错误必然导致极其严重的策略错误，这种策略错误过去和现在都使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受到极大的危害。问题在于，工人群众和其他社会阶层（由于受到工人群众的影响）的自发高潮近几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起来。运动的“物质因素”甚至同 1898 年相比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自觉的领导者**（社会民主党人）**却落后于这一发展**。这是目前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出现危机的基本原因。群众的（自发的）运动缺少有很高理论修养的、决不会发生任何动摇的“思想家”；缺少有广阔政治眼界的、有革命毅力有组织才能的、能在新的运动的基础上建立战斗的政党的领导者。

但是，这一切还算不得太大的不幸。理论知识也好，政治经验也好，组织才能也好，都是可以学到的，只要有学习和养成这些品质的愿望就行。但是从 1897 年年底以来，特别是从 1898 年秋季以来，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里有一些人和一些机关刊物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不仅闭眼不看这个缺点，而且还把它说成是一种特殊的美德，他们把对自发性的崇拜和卑躬屈节提升为一种理论，他们鼓吹说，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走在运动的前面，而应当跟在运动的后面**做尾巴**。（这样的机关刊物不仅有《工人思想报》，而且有《工人事业》，它从宣传“阶段论”[2]开始，直到从原则上为自发性、为“现时运动的正当性”、“策略－过程”等等辩护。）

这才是真正的不幸。这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派别**，这个派别叫作经济主义（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它的基本特征是不认识甚至**维护落后现象**，也就是不认识甚至维护我们上面说过的那种自觉的领袖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的现象。这个派别的特点是：在原则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在机会主义的最新变种现代“批评”面前表现得软弱无能；在政治方面，力图缩小和分散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不懂得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把一般民主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不能够推翻专制制度；在策略方面，表现得极不稳定（《工人事业》在春季曾在恐怖手段这个“新”问题上犹豫不决，只是过半年之后，经过多次的动摇，才在一项非常暧昧的决议中表示反对恐怖手段，象往常一样跟在运动后面做尾巴）；在组织方面，不懂得运动的群众性质不但没有减轻而且加重了我们建立一个巩固的、集中的革命家组织的责任，这个组织既能领导准备性的斗争，又能领导任何突然的爆发，并且也能领导最后的决定性的进攻。

我们同这个派别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今后仍将进行这一斗争。写信人看来也是属于这个派别的。他们对我们说，经济斗争为工人参加游行示威作了准备。是的，正是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早更深刻地对这种准备作出评价，我们早在 1900 年 12 月（创刊号）就发表了反对阶段论的意见［注：参看《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328—333 页。——编者注］，2 月间（第 2 号），在把大学生送去当兵的事件刚刚发生以后和游行示威发生以前，我们就已经号召工人支援大学生[注：同上，第 371—375 页。——编者注]。二三月事件并没有“推翻”《火星报》的“担心和害怕”（如马尔丁诺夫所认为的那样——《工人事业》第 10 期第 53 页——他的这种看法暴露出他根本不理解问题），而是完完全全地证实了这种担心和害怕，因为领导者已**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表现出对于完成领导者的责任缺乏准备。这种准备在目前也还是极不充分的，所以关于“夸大思想的作用”或者夸大自觉因素的作用而贬低自发因素的作用等等各种论调，正在继续对我们党产生最有害的实际影响。

所谓从阶级观点出发必须少强调一下不同的居民阶层对政府不满的共同性的论调，也在产生同样有害的影响。相反，我们感到骄傲的是，《火星报》能在一**切**居民阶层中唤起政治上的不满，不过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够以更大的规模来进行这一工作。说我们在这里模糊了阶级观点，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写信人没有举出而且也不可能举出任何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我们怎样模糊了阶级观点。但是，作为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社会民主党应当不顾《工人事业》第 10 期第 41 页上的意见，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的活动，向他们说明他们同政府的局部性的和职业性的冲突的普遍的政治意义，动员他们支持革命政党；应当从自己的队伍中培养出一批善于从政治上影响一切反政府阶层的领袖。任何放弃这种作用的做法，无论用多么漂亮的话，例如要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等等作掩护，都等于是以新的形式“维护”社会民主党人的“落后现象”，即落后于全民民

主运动高潮的现象，等于是把领导作用让给资产阶级民主派。写信人应当仔细想一想，为什么春季事件并没有使社会民主党的声望和威信提高，却使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派别这样活跃起来！

我们也不能不反对写信人在关于侨民中间的争论和内讧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惊人的目光短浅。他们重复着老调，说什么在那篇评论祖巴托夫的文章中大谈特谈《工人思想报》是“不礼貌的”。他们是否想否认传播经济主义就是帮助祖巴托夫先生们去完成任务呢？我们所说的正是这一点，而决不是把“经济派”的策略同祖巴托夫的策略“等同起来”。而至于谈到“侨民”（如果写信人不是不可宽容地漠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继承性，那么他们一定知道，“侨民”——也就是“劳动解放社”——关于经济主义的警告已经得到了最光辉的证实！），那就请听一下 1852 年在莱茵河流域工人中间进行活动的拉萨尔是怎样评论伦敦侨民中的争论吧：

拉萨尔在给马克思的信里写道：“出版你那篇反对金克尔、卢格等‘大人物’的文章，未必会受到警察方面的阻难……我觉得，政府甚至会欢迎这样的文章发表，因为它以为这是‘革命者在自相残杀’。至于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党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党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这些都是官僚的逻辑所想象不到和不感到担忧的。”（摘自拉萨尔 1852 年 6 月 24 日给马克思的信）[3]

请目前为数众多的反对尖锐性、不调和性、争论癖等等的心地善良的人读读这段话吧！

最后我们要说明一下，我们在这里只能大致地谈谈争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还要专门写一本小册子来作详细的分析，这本小册子我们希望能在一个半月以后问世。

注释：

[1]《南方工人报》(《Южный Рабочий》)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秘密报纸，1900年1月—1903年4月出版，共出了12号。第1、2号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出版，以后各号由南方工人社（有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等南方城市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代表参加）出版。报纸的印刷所先后设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斯摩棱斯克、基什尼奥夫、尼古拉耶夫等城市。参加编辑和撰稿的有伊·克·拉拉扬茨、阿·札·维连斯基（伊里亚）、奥·阿·科甘（叶尔曼斯基）、B·H·罗扎诺夫等。《南方工人报》反对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但是不同意列宁的在集中制原则基础上建党的计划，而主张建立区域的社会民主党联合组织。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南方工人社的代表采取中派立场。根据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南方工人社被解散，《南方工人报》停刊。——324。

[2]阶段论是工人事业派编造的一种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提出广泛的革命任务之前，必须经过一系列的阶段：开始是纯粹的经济鼓动，然后是同经济斗争直接联系的政治鼓动，最后才是政治鼓动。——328。

[3]列宁从拉萨尔1852年6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摘译的这段话，其中一部分后来用作《怎么办？》一书的题词。——330。

游行示威开始了

列宁（1901 年 12 月）

两星期前，我们纪念了 1876 年 12 月 6 日在彼得堡喀山广场举行的俄国第一次社会革命示威二十五周年，指出了今年年初游行示威运动的巨大高涨。我们曾谈到，示威者应当提出比“土地和自由”（1876 年）[1]更加明确的政治口号，比“废除暂行条例”（1901 年）更加广泛的要求。这种口号应当是**政治自由**，这种全民的要求应当是**要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示威运动在种种理由下又在下诺夫哥罗德，在莫斯科，在哈尔科夫等地重新开始了。民愤到处在增长，把这种愤懑汇成一股**反对**到处横行霸道、欺压人民和肆虐逞凶的**专制制度**的洪流，愈来愈必要了。11 月 7 日下诺夫哥罗德那次规模不大的然而却是成功的示威，是为了给马克西姆·高尔基送行而举行的。专制政府不经审讯，就把这位全欧闻名的作家驱逐出他的故乡。一位在下诺夫哥罗德游行示威时发表演说的人说得很对，这位作家的全部武器就是自由的言论。那位演说者代表俄国所有对光明和自由哪怕抱一线希望的人说：杀人强盗指控他对我们起了不良的影响，可是我们声明说：这是良好的影响。沙皇的爪牙在暗中胡作非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的罪恶行径公之于众。捍卫自己改善生活的权利的工人，在我国遭到殴打；抗议暴政的大学生，在我国也遭到殴打；一切真实大胆的言论，在我国都受到压制！这次也有工人参加的游行，在大学生的庄严的朗诵声中结束：“暴政就要垮台！坚强、自由和充满力量的人民就要起来！”

在莫斯科，有数百名学生在车站上迎候高尔基。惊慌失措的警察在列车行进途中就把高尔基**逮捕了**，禁止他（不顾原来的特许）进入莫斯科，强迫他从下诺夫哥罗德铁路直接转搭库尔斯克铁路的火车。抗议驱逐高尔基的游行示威没有成功，但是在 18 日那天，一群大学生和“局外人”（按我们大臣的说法）在总督官

邸前面举行了一次毫无准备的规模不大的游行示威，抗议当局禁止举行纪念尼·亚·杜勃罗留波夫逝世四十周年（11 月 17 日）的晚会。人们对专制政权在莫斯科的代表发出嘘声，他们同俄国一切有教养的和有思想的人一样，爱戴这位痛恨暴政、热切期待人民起来反对“国内土耳其人”[2]，即反对专制政府的作家。莫斯科大学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在 11 月 23 日的公报中正确地指出，这次毫无准备的游行示威是不满和抗议的鲜明标志。

在哈尔科夫，大学生问题引起的游行示威已经转为真正的街头搏斗，参加者已经不只是大学生了。对于大学生来说，去年的经验不是毫无用处的。他们看到，只有人民的支持，主要是工人的支持，才能保证他们的胜利。为了获得这种支持，他们不仅应当争取学院（大学生）的自由，而且应当争取**全民的自由**，争取**政治自由**。哈尔科夫大学生联合会在十月传单中就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这一点。从彼得堡、莫斯科、基辅、里加、敖德萨的大学生的传单来看，他们也开始懂得，在人民处于暗无天日的受奴役的状况下，学院自由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幻想”。万诺夫斯基将军在莫斯科发表卑鄙的辟“谣”演说，否认他曾经许诺过什么；密探在彼得堡进行空前未有的蛮横活动（抓走了电工学院的一个学生，为的是夺取信差交给他的一封信），警察在街头和段警察局里野蛮地殴打雅罗斯拉夫尔的大学生，——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成千上万件事实，都显然证明必须同整个专制制度斗争，斗争，再斗争。哈尔科夫兽医学生事件更是令人忍无可忍。一年级学生提出了要求辞退拉格尔马尔克教授的请愿书，控诉他处理问题的官僚主义态度以及令人难以忍受的粗暴行为：他竟把授课提纲甩到学生的脸上！政府的答复是不问情由开除全年级的学生，而且还在公告中诬蔑学生，说他们要求有任命教授的权利。于是哈尔科夫的全体大学生都行动起来了，决定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哈尔科夫今年第二次变为“国内土耳其人”同抗议专制暴政的人民作战的战场。一边是“打倒专制制度！自由万岁！”的呼声。另一边是用军刀砍，

用皮鞭抽，用马蹄踩踏人民。警察和哥萨克不问男女老少，无情地毒打所有的人，他们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人们，并且在庆祝胜利……

难道我们能让他们庆祝胜利吗？

工人们！你们对于侮弄俄国人民的邪恶势力了解得太清楚了。这种邪恶势力，在你们为改善生活、维护人的尊严而同厂主进行的日常斗争中，束缚住了你们的手脚。这种邪恶势力夺走了你们成百成千的好同志，把他们投入监狱，发配流放，而且还侮辱他们，宣布他们是“品行恶劣的人”。这种邪恶势力在 5 月 7 日向高呼“我们需要自由！”的彼得堡奥布霍夫工厂的工人开枪射击；接着还安排了一出审判的滑稽剧，把那些没有中弹的英雄判处苦役。这种邪恶势力今天毒打大学生，明天就会更加残暴地毒打你们工人。抓紧时机吧！要记住，你们应当支持一切反对专制政府杀人强盗的抗议和斗争！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同游行示威的大学生协同行动，你们要建立迅速传播消息和散发传单的小组；你们要向所有的人说明你们奋起斗争是为了争取全体人民的自由。

当人民愤懑和公开斗争的火星在各地开始迸发出来的时候，首先最需要的是供给大量的新鲜空气，使这些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

注释：

[1]“土地和自由”是土地和自由社的口号。

土地和自由社是俄国民粹派的秘密革命组织，1876 年在彼得堡成立，起初称为北方革命民粹主义小组、民粹派协会，1878 年底改称土地和自由社（19 世纪 60 年代初出现的一个俄国革命组织也叫土地和自由社）。该社著名活动家有：马·安·和奥·亚·纳坦松夫妇、亚·德·米哈伊洛夫、阿·费·米哈伊洛夫、阿·德·奥博列舍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奥·瓦·阿普捷克曼、德·亚·克列缅茨、尼·亚·莫罗佐夫、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土地和自由派认为俄国可以走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其基础就是农民村社。他们的纲领提出全部土地归“农村劳动等级”并加以

“平均”分配、村社完全自治、“按地方意愿”把帝国分为几个部分等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农民。他们在坦波夫、沃罗涅日等省进行革命工作，企图发动农民起义来反对沙皇政府。他们还出版和传播革命书刊，参加70年代末彼得堡的一些罢工和游行示威。他们的组织原则是遵守纪律、同志之间互相监督、集中制和保守秘密。由于对农村中革命运动日益感到失望，以及政府迫害的加剧，在土地和自由社内部逐渐形成了主张把恐怖活动作为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的主要手段的一派。另一派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1879年8月，土地和自由社最终分裂，前者成立了民意党，后者组织了土地平分社。——333。

[2]“国内土耳其人”暗指沙皇政府、农奴主以及他们的精神奴仆，出典于俄国文艺批评家尼·亚·杜勃罗留波夫为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写的评论文章《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前夜》的主人公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决心把自己的祖国从土耳其占领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指出：俄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需要象英沙罗夫那样的革命家，但他们应是俄国式的英沙罗夫，因为俄国现在有许多国内的“土耳其人”；俄国需要有同大量的“国内土耳其人”作斗争的英雄。——334。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

列宁（1901 年秋—1902 年 2 月）

【志愿者的话：请读者自行寻找文章，本文件不提供。】

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

列宁（1902 年 2 月 1 日〔14 日〕）

我们从一个例子谈起。

读者大概还记得，奥廖尔省贵族代表米·亚·斯塔霍维奇在传教士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法律必须承认**信仰自由**的报告引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以《莫斯科新闻》[1]为首的保守派报刊，暴跳如雷地指责斯塔霍维奇先生，简直不知道怎样骂他才好，由于奥廖尔省全体贵族又选了斯塔霍维奇先生当代表，差点儿没有指控这些贵族犯了叛国罪。这次选举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贵族反对警察专横暴虐的示威性质。

《莫斯科新闻》断言：“斯塔霍维奇与其说是贵族代表，还不如说是米沙·斯塔霍维奇、滑稽家、社交界的主角、饶舌妇……”（1901 年第 348 号）维护棍棒的先生们，这对你们更糟糕。如果连滑稽家－地主也谈起了信仰自由，那就说明我们的神父和我们的警察所干的丑事确实数不胜数了。——“……我们那一群使斯塔霍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应运而生并为他们拍手叫好的轻率的‘知识分子’，同我们的圣物即正教、同我们对待正教的虔诚态度有什么关系呢？……”维护专制制度、正教、民族性的先生们，这对你们同样更糟糕。假如我们的警察专制制度甚至使宗教也浸透了牢狱气味，以至连“斯塔霍维奇之流”（他们对宗教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坚定的信念，但是对宗教的巩固持久是关心的，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也对这个臭名昭彰的“人民的”圣物非常冷淡（甚至敌视），那么这个专制制度就简直太好了！——“……他们认为我们的信仰是误入迷途！！他们嘲笑我们，说我们由于‘误入迷途’而害怕和躲避罪恶，说我们毫无怨言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不管它多么艰巨；他们嘲笑我们，说我们在寻找忍受痛苦和困苦的力量和勇气，说我们在成功和走运的时候也不骄傲……”这正是实质所在！正教的圣物

之所以宝贵，就是由于它教导人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痛苦！的确，这是多么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圣物啊！既然社会制度使得极少数人有钱有势，而群众经常忍受“困苦”并且承担着“艰巨的义务”，那么剥削者同情宗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宗教教导人们为了升入所谓的天堂而“毫无怨言地”忍受尘世间的地狱之苦。《莫斯科新闻》由于一时冲动而说漏了嘴，甚至**无意中道破了真相**。请往下看：“……他们也不怀疑，同样由于‘误入迷途’，他们，斯塔霍维奇之流的先生们，才吃得饱饱的，睡得香香的，过得好好的。”

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在人民群众中大力散布了宗教的“迷途”，无论斯塔霍维奇之流，还是奥勃洛摩夫[2]之流，或者所有那些靠人民群众的劳动过日子的资本家以及《莫斯科新闻》本身，才能“睡得香香的”。但是教育在人民中愈普及，宗教偏见愈被社会主义意识所排挤，无产阶级胜利的日子就愈近，这个胜利将把一切被压迫阶级从现代社会的奴役下拯救出来。

但是，《莫斯科新闻》说漏了这一点之后，却过于轻松地回避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他们认为，斯塔霍维奇之流“不怀疑”宗教的上述意义并要求进行自由主义的改革仅仅是出于“轻率”，很明显，这是误解。这样解释敌对的政治派别，既幼稚又天真！斯塔霍维奇先生在这里恰恰是整个自由派的代言人，《莫斯科新闻》自己就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不然为什么要对一个报告大肆讨伐呢？为什么不说斯塔霍维奇，而说斯塔霍维奇之流、说“一群知识分子”呢？

《莫斯科新闻》的这种误解当然是一种自私的误解。不言而喻，《莫斯科新闻》与其说是不会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他们所痛恨的自由主义，不如说是不愿意这样做。如果是不愿意，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是不会，那对我们来说就有了很大的普遍意义，因为很多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有这个毛病。《火星报》第12号上的一封信的作者们就有这样的毛病，他们指责我们缺乏“阶级观点”，原因是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竭力不放过自由派的不满和抗议的一切表现；《无产阶

级斗争》文集的作者们和《社会民主主义丛书》[3]的某些小册子的作者们也有这样的毛病，他们以为我们的专制制度就是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还有马尔丁诺夫之流，他们号召我们脱离反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揭露运动（也就是脱离最广泛的政治鼓动），而主要进行争取经济改良的斗争（给工人阶级“实惠”，代表他们提出“能够产生某种显著结果”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还有纳杰日丁之流，他们就我们报道统计人员冲突这件事困惑莫解地问道：“天哪，这个机关报岂不是为地方自治人士办的吗？”[4]

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忘记了，专制制度的利益仅仅在某些情况下并且仅仅同有产阶级的某些利益相一致，而且往往不是同所有这些阶级的利益相一致，而是同它们的个别阶层的利益相一致。资产阶级其他阶层的利益，**整个**资产阶级的更广泛的利益，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必然要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例如，如果说专制制度保证资产阶级有可能采用最粗暴的剥削方式，那么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却给生产力的广泛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设置无数障碍，因此不仅引起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有时还引起大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如果说专制制度保证（？）保护资产阶级防备社会主义，那么另一方面，这种保护在居民无权的情况下必然要变成警察专横，从而激怒所有的人。这两种对立趋势的结果怎样，资产阶级保守情绪或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情绪或自由派这时的关系怎样，是不能从几个一般原则得出结论的；这取决于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一切特点。要确定这些，就必须详细地了解这种情况，密切注意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同政府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冲突。正是由于“阶级观点”，才**不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对“斯塔霍维奇之流”的不满和抗议漠不关心。

上面提到的那些社会主义者，不论是他们的议论或行动，都证明他们对自由派漠不关心，从而暴露出他们不懂得《共产党宣言》这个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福音书”的一些基本原理。例如，我们还记得这样的话：资产阶级自己用它夺取政

权的斗争，用它的各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冲突等等，给无产阶级提供了政治教育材料。［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76 页。——编者注］只有在政治上自由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才能自然而然地得到这种材料（而且还只是一部分）。而在奴隶式的俄国，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应该积极地帮助工人阶级获得这种“材料”，也就是说，应该**承担起**反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政治鼓动即全民揭露运动的任务。这个任务在政治动荡时期尤其迫切。应该记住，在政治活跃时期无产阶级一年所能受到的革命教育，比平静时期几年所能受到的还要多。因此，上述社会主义者有意无意地**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和内容的倾向是特别有害的。

其次，我们还记得这样一句话：共产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504 页。——编者注］这句话往往被理解得太窄，不把支持自由主义反政府派包括在内。但是不应该忘记，常常有这样的时期，在进步的社会利益基础上同政府发生的一切冲突，不论它本身多么小，在一定条件（**我们的支持就是这些条件之一**）下都可以燃成熊熊大火。俄国大学生因学院的要求而同政府发生冲突，或者法国所有进步分子因一起用伪造手段解决的案件[5]而同军阀发生冲突，只要想一想这些冲突发展成了怎样的社会运动就够了。因此，我们的直接责任就是向无产阶级进行解释，设法扩大并用工人积极参加的方法来支持自由派和民主派的一切抗议活动，而不管它是由地方自治人士同内务部的冲突发展成的，还是由贵族同警察正教部门的冲突，统计人员同庞巴杜尔[6]的冲突，农民同“地方官”的冲突，教派信徒同巡官的冲突等等发展成的。谁要是轻蔑地嗤之以鼻，认为这些冲突中有一些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认为想把这些冲突变成熊熊大火是“没有希望”的，那他就是不懂得，全面的政治鼓动正是一个焦点，在这个焦点上，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的迫切利益同整个社会发展和全体人民（指人民中的全体民主分子）的迫切利益一致起来了。我们的直接责任就是要过问自由派的每一个问题，确定自己即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些问题的态度，

采取措施使无产阶级积极参加解决这些问题，并且迫使问题按照我们的意图解决。谁要是躲在一旁不去过问，那他实际上（不管他的意图如何）就是在自由派面前甘拜下风，把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事业交给自由派掌握，把政治斗争的领导权让给那些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首领的人。

社会民主运动的阶级性质不应当反映在把我们的任务局限于“纯粹工人”运动的直接和最近的需要上，而应当反映在对无产阶级这个现代社会唯一的真正革命阶级的伟大解放斗争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表现的领导上。社会民主党应当始终坚持不懈地扩大工人运动对现代社会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和政治生活领域的影响。它不仅应当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而且应当领导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它应当时刻不忘我们的最终目的，随时进行宣传，保卫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被歪曲，并使之继续发展。我们应当坚决地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不管它披着怎样时髦而华丽的外衣。我们上面谈到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背离了“阶级”观点，还因为他们对同“批评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个任务漠不关心。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种“批评”在俄国所以流行得最快，俄国自由主义政论界对此所以反响得最热烈，正因为它是正在形成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现在已经是自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要素之一。

至于特别说到政治斗争，那正是“阶级观点”要求无产阶级把一切民主运动推向前进。在政治要求方面，工人民主并不是在原则上而只是在程度上与资产阶级民主有所区别。在为经济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则站在另一个原则基础上，而且只有这一个阶级站在这个基础上（小生产者只是鉴于他们正在转入或者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才给予无产阶级以帮助）。在争取政治解放的斗争中，我们有许多同盟者，对他们漠不关心是不容许的。可是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盟者在为自由主义的改革而进行斗争时，总是向后看，竭力把事情安排得使他们能够象以前那样靠别人的血汗“吃得饱饱的，睡得香香的，

过得好好的”，而无产阶级却向着终点勇往直前，决不反顾。当尔·恩·斯·（维特记事序言的作者）[7]之流的先生们就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或宪法问题同政府讨价还价时，我们却要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只是我们不要忘记，为了推动别人，就要始终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善于在任何一个自由派打算移动一寸的时候及时抓住他，强迫他移动一尺。如果他固执不动，我们就抛开他，越过他而继续前进。

注释：

[1]《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担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246。

[2]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247。

[3]指《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

《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是1900年夏彼得堡和维尔诺的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建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社的出版物。该社出版这套小丛书是为了把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重心由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上来。在这一工作中，社里的彼得堡成员负责文字编辑工作，维尔诺成员负责技术编辑工作。该社同莫斯科、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城市都有联系，它的出版物在彼得堡和彼得堡区通过社会主义者社发行。由于奸细米·伊·古罗维奇的出卖，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社于1901年1月30日（2月12日）夜被沙皇警察破获，所有与该社有关的人员全部被捕。

在此以前已出版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有《〈工人丛书〉编辑部的话》、《德兰士瓦和中国。凯尔－哈第和李卜克内西的两次演说》、《俄国立法的基本特点》等数种。《火星报》对该社所提出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的任务表示赞赏，同时批评了它的某些小册子中的不正确论点，如"俄国资产阶级目前不再有什么要求了"、"在我国，资产阶级已被恩准得到一些尽管是很可怜的政治自由了"等等。——248。

[4]列宁引用的这句话出自《革命前夜。理论和策略问题不定期评论》这本小册子的第 129 页。小册子是尔·纳杰日丁（叶·奥·捷连斯基）编辑的，由自由社于 1901 年出版。关于《火星报》报道统计人员冲突一事，参看本卷第 90—91 页。——248。

[5]指德雷福斯案件，即 1894 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告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案。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 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 1906 年 7 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250。

[6]庞巴杜尔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庞巴杜尔先生们和庞巴杜尔女士们》。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借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尔这个名字塑造了俄国官僚阶层的群象。"庞巴杜尔"一词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昏庸横暴、刚愎自用的官吏的通称。——250。

[7]尔·恩·斯·是彼·伯·司徒卢威为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由曙光杂志社于 1901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写序言用的笔名。列

宁在《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中批判了这篇序言（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5 卷第 18—64 页）。——252。

《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报告[1]

列宁（1902 年 3 月 5 日）

同志们！我们前天才接到定于 3 月 21 日召开会议的通告，同时接到完全出人意料的通知说，原定召开代表会议的计划改为召开党代表大会的计划。这个不说明理由的突然改变是谁决定的，我们不知道。就我们来说，我们认为这个改变极不妥当，我们反对这样匆忙地改变这种对党来说非常复杂并且又很重要的步骤，我们坚决主张召开代表会议的原定计划不变。

要使人们确信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认为，只要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也是前天才发给我们的代表大会议程（Tagesordnung）就够了。这个议程草案是否只是一个组织或几个组织提出来的，我们也不知道。议程规定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有九个问题，程序如下（我把这些问题的内容压缩了一下）：（1）经济斗争；（2）政治斗争；（3）政治鼓动；（4）五一；（5）对待反政府派的态度；（6）对待没有加入党的革命团体的态度；（7）党的组织；（8）中央机关报；（9）国外代表机关和党的国外组织。

第一，这个议程就其本身的结构和各个问题的编排来看，无可辩驳地给人一种“经济主义”的印象。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提出这个议程的组织至今还坚持“经济主义”观点（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请同志们不要忘记：应当考虑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舆论，应当注意在我们这里还广为流行的“经济主义”残余。请想一想，进行政治斗争的先进政党，在国内一切革命力量和反政府力量开始直接冲击专制制度的最紧张时刻召开代表大会，而我们却突然把“经济斗争”提到首位，在这**之后**才是“政治”！！难道这不是重犯我国“经济

派”的传统错误，认为政治鼓动（或斗争）应当在经济鼓动之后吗？难道可以设想，有哪一个欧洲社会民主党居然想在革命关头把工会运动问题提到一切问题的首位吗？其次，再看看把政治鼓动问题同政治斗争问题分开这种做法吧！难道这里不是表现出把政治鼓动当作某种有原则区别、某种属于不同阶段的东西而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的常见错误吗？最后，在议程中把游行示威**首先**当作**经济斗争手段**，这又作何解释！？？不要忘记，现在的确有**许多**敌视社会民主党的分子在指责整个社会民主党搞“经济主义”，如《前夕》呀，《俄国革命通报》呀，《自由》呀，都在这样指责，甚至（甚至！）《俄国财富》也在这样指责。不要忘记，不管代表会议作出怎样的决议，议程本身将成为历史文件，人们将根据它判断我们全党的政治发展水平。

第二，议程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它提出的（在代表大会前几天！）这些问题，只有在经过充分准备，在有可能通过真正明确、真正可以理解的决议时才应当讨论，否则最好暂时根本不讨论。例如，第 5 项和第 6 项关于对待反政府派和其他革命派的态度问题就是如此。必须事先全面地讨论这些问题，起草关于这些问题的报告，阐明现有各种派别的差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决议，才能真正提供某些新的东西，才能成为全党的实际**指南**，而不只是重复某些传统的“套话”。请实事求是地想一想，在对待“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或对待新出现的“社会革命党”这些问题上，我们能不能几天之内就制定出详细的、说明理由的和估计到运动的一切实际需要的决议？我们且不说，在提到没有加入党的革命团体的同时，避而不谈如何对待崩得和修改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中论述崩得的条款这种重要问题，这至少会给大家留下多么奇怪的印象？

第三（而且这是主要的），议程有一个不可饶恕的缺陷，即完全闭口不谈现代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立场**和它的**党纲**。在全世界都在叫喊“马克思主义危机”，全俄国的自由派政论家甚至叫喊马克思主义崩溃了**和消灭了**的时候；在

“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两派”这个问题不仅提上了日程，而且甚至已经列入了各种系统的教学大纲，列入了宣传员的报告提纲和自学小组的学习提纲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闭口不谈上述问题是根本不行的。同志们，我们的对手已经**在刊物上**（见纳杰日丁的《革命前夜》）挖苦我们说，我们习惯于“作作报告，一切顺利”！……

我们认为，议程的上述一切缺点令人信服地证明：把已经决定召开的代表会议改为代表大会是不合理的。我们当然懂得，大家对 1898 年以来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这件事的反应是多么强烈；把筹备代表会议所作的一切努力用来结束“没有党的机关的党”这种现状的思想是多么吸引人。但是，为了这些实际理由而忘记下述情况就大错特错了：现在大家都在期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作出真正符合于当前**一切**革命任务的决议；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真正紧要关头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把社会民主党想在政治斗争中取得领导权的一切希望葬送掉；最好不要舍不得花几千卢布和几个月时间搞组织筹备工作，并且要利用这次代表会议来筹备将在夏天召开的真正**全党的**代表大会，以便能够彻底解决理论方面（原则纲领）和政治斗争方面的一切迫切问题。

请看一看社会革命党人吧，他们愈来愈善于利用我们的缺点，并且靠损害社会民主党求发展。他们刚刚成立了“党”，又是办**理论性**机关刊物，又是决定出政治性**月**刊。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在**这种事件**以后**不能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取得**至少是这样的**成绩，人们会怎样谈论社会民主党人呢？难道我们不怕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从纲领的明确性和组织的革命性来看，社会民主党人还不如这个明明把各种不坚定分子、未定型分子、甚至身分不明分子集结在自己周围的“党”吗？

由于这一切，我们认为，不应当把只有各委员会代表参加的这次大会宣布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而应当宣布为**非正式的代表会议**，并规定这个代表会议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是组织和筹备将在夏天召开的真正

全党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既要能批准党纲，又要能彻底调整好党的政治周刊，还要能在原则坚定性即忠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并为政治**攻势**做好实际战斗准备的基础上，做到把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委员会、甚至一切小组（印刷小组等等）真正地全部团结起来。

从这个基本思想出发，我们提出代表会议的下列议程请同志们考虑：

1. 原则性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必须十分明确地反对不久以前广为流行的企图缩小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任务的那些令人痛心的做法。党的代表会议如果坚决驳斥这一切企图，就为在原则基础上把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团结起来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并且会提高曾经被动摇过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威信。可能会有一些同志担心，讨论原则性的决议要占去大量时间，要影响实际问题的讨论。我们完全不赞成这样的看法，我们认为，在秘密报刊上进行的长期辩论已经把问题谈清楚了，我们一定会很快很容易地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上取得一致意见。没有原则性的决议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此外，即使从代表会议的议程上取消了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取消不了，因为在讨论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等等决议时，这个问题同样必然会出现，不过比较零散就是了。因此，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把我们关于政治鼓动、罢工等等的决议割裂开来，而是有联系地叙述对我们基本任务的看法，这样做要好得多。

至于我们，我们打算草拟一个这样的决议案，把它作为这个报告的附件（如果来得及这样做的话）。

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这里，我们指的是初步（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是暂定）解决下列问题：代表大会的时间（夏天，或至迟秋天，因为最好在下一个“季节”到来之前结束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地点（而且应当仔细考虑保密条件）；召开代表大会所必需的经费（从我们来说，《火星报》现在就准备为此目的从它得到的一笔特别捐款中拨出 500 卢布；可能我们很快还会搞

到一笔同样数目的款项或者甚至更多。应当讨论，召开这次大会大约需要几千卢布，不足之数怎样筹集）；最后，关于选举代表的一般原则和尽可能广泛的代表性（就是说，要使事先已经明确确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各委员会、某些团体，甚至某些小组都有代表参加，至于确定社会民主党两个国外组织的代表这一比较容易的任务，就不用谈了；还必须确定一项议程，讨论关于邀请在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间隔时间内所产生的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问题，以及其他等等）。

3. 选举组织委员会。一般说来，这个组织委员会的任务是执行代表会议的决议，筹备和召开代表大会，最后确定代表大会的日期、地点，代表大会的实际组织工作，筹备运输工作，在俄国设立党的印刷所（在《火星报》的协助下，在俄国已经有了两个同情我们刊物的地方印刷小组[2]，这两个小组在自己两个印刷所中印出了《火星报》第 10 号和第 11 号，印出了《今后怎样？》、《莫罗佐夫工厂罢工十周年》、《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的演说》、《奥布霍夫事件的起诉书》等许多小册子，以及一些传单。我们希望，这些地方小组的代表能够参加代表会议的工作，并尽力协助全党任务的实现），以及协助各种地方组织、工会（工人）组织、学生组织等等。这个组织委员会在各个组织的支持下，要能够在三四个月的时间内充分准备条件，来成立能够事实上领导我们党的一切政治斗争的真正的中央委员会。

我们认为，由于组织委员会的任务又多又杂，它的组成人员不能太少（5—7人），建议他们选出一个常务委员会，分分工，并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开几次会。

4．选举党纲起草委员会。因为《火星报》编辑部（“劳动解放社”也包括在内）从事这项困难的工作历时已久，所以我们愿向同志们提出这样的计划。我们已经完成了纲领实践部分的全部草案，其中包括土地纲领草案，此外还草拟了纲领的原则部分的**两个**方案。如果大家认为有必要，如果我们的代表没有遇到阻力，他将向代表会议介绍这些草案。现在，我们正在根据这两个方案拟定一个总的草案，我们当然不希望在这项工作完成之前，用草稿的形式予以公布。如果代表会

议选出几个人同我们的编辑部一起来制定纲领，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实际的办法。

至于我们，至少现在可以向同志们正式保证，再过几个星期就能提出党纲草案的定稿，并且想预先在《火星报》上发表，供**全体**同志研究和提出意见。

5．中央机关报。由于创办正常出版的、在文字和技术方面都很完善的定期刊物困难很大，代表会议可以按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先例行事，指定一个现有刊物为机关报。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还是确定办一个全新的机关报，不管怎样，都应该委托一个专门委员会，最好还是委托组织委员会，来筹备这项工作，并会同现有的编辑部或新选的编辑部加以全面讨论。

我们认为，必须吸收“劳动解放社”参加讨论，因为没有“劳动解放社”的参加和领导，我们就不能办好又坚持原则又可以满足运动的一切需要的政治性机关报。

既然在代表会议以前就有办双周刊的意图，那么党应该规定最近的任务是办**周报**。只要**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真正**共同**来办这种刊物，这是完全可能的。

6．草拟党代表大会的议程和关于各项议程的报告。代表会议应当部分地由自己拟定这个议程，部分地委托组织委员会承担，并且**必须**指定（或挑选）每个问题的报告人。只有预先指定报告人，才能保证真正全面地讨论问题（某些报告可以先发表全文或摘要，并在报刊上展开讨论，例如，我们希望很快就把编辑部一个成员几乎已经完成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的报告［注：见本卷第281—320页。——编者注］等等发表出来）。并且在代表大会上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

7．运动的当前实际问题。例如，（一）讨论和通过五一传单（或讨论《火星报》和其他组织提出的传单草稿）；

（二）五一游行示威——举行游行示威的时间和方式；

（三）委托组织委员会协助举行抵制、游行示威等等，使党员在思想上、使党在人力物力上对全民起义逐步有所准备；

（四）关于组织委员会的经费**和其他等等的**各种财务问题。

关于我们代表大会的任务和议程问题的报告就到此结束，我们只指出一点：由于时间非常少，我们根本不可能起草关于《火星报》活动的详细报告。因此，我们只能提出下面这个简要的草稿。

（注意）决议**草案**

1．代表会议坚决反对企图把机会主义引进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运动的种种行径，其表现就是所谓“批评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主义和“经济主义”。在全世界资产阶级为臭名远扬的“社会主义危机”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代表会议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义宣布自己同革命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团结一致，并坚信：社会民主党经过这次危机将更加巩固，并决心为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进行无情的斗争。

2．代表会议宣布自己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并确认，党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是推翻专制制度。代表会议宣布，为了实现这个最近的任务和自己的最终目的，社会民主党认为自己的工作重点是开展全面的和全民的政治鼓动，号召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反对强加于任何一部分居民的一切经济、政治、民族和社会的压迫。代表会议宣布，党将支持反对现存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一切革命运动和进步的反政府运动。代表会议特别推荐举行抵制、在戏院等处示威、以及有组织的群众性游行示威这样一些实际的斗争手段。代表会议建议党的一切委员会和团体重视为举行全民武装起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所必须采取的准备措施。

3．代表会议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党将一如既往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关心这个斗争的扩大和深入发展，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这个斗争同社会民主主义

工人运动的联系；竭力利用这个斗争的各种表现来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吸引无产阶级参加政治斗争。代表会议宣布，首先只在经济方面进行鼓动，或者认为经济鼓动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广泛适用的手段，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注意：在这里再次**揭露《工人事业》**是很重要的!!］

4.（是否需要按我们的土地纲领的精神谈一谈农民？我尽力设法写出，随后送上。）

注释：

[1]列宁写的这篇报告是准备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委员会和组织代表会议提出的。这次代表会议是经济派筹办的，于 1902 年 3 月 23—28 日（4 月 5—10 日）在波兰比亚韦斯托克举行。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崩得中央委员会及其国外委员会、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火星报》编辑部（它的代表费·伊·唐恩持有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的委托书）。经济派和支持他们的崩得分子起初打算把这次代表会议改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指望这样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并抑制《火星报》日益增长的影响。但是，由于代表会议的代表面太窄（只有 4 个在俄国国内有活动的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派代表出席，比第一次代表大会还少），而代表会议上暴露出来的原则性意见分歧又很大，尤其是《火星报》代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这一企图没有得逞。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确定会议性质的决议，通过了崩得中央委员会代表提出的原则决议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代表提出的修正案（《火星报》代表提出了自己的原则决议草案，因而投了反对票），批准了以《火星报》编辑部拟订的草案为基础的五一传单。为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选出了由下列代表组成的组织委员会：《火星报》的代表唐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的代表奥·阿·叶尔曼斯基、崩

得中央委员会的代表 К．Я．波尔特诺伊。代表会议召开后不久，会议的大多数代表，包括组委会的两名成员即被警察逮捕。1902 年 11 月在普斯科夫会议上成立了新的组织委员会，其成员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代表弗·潘·克拉斯努哈、《火星报》国内组织代表伊·伊·拉德琴柯和南方工人社代表叶·雅·列文。——272。

[2]指《火星报》的基什尼奥夫印刷所和巴库印刷所。

基什尼奥夫印刷所是列·伊·戈尔德曼于 1901 年 4 月创建的，存在到 1902 年 3 月 12 日（25 日）。印刷所印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今后怎样？》（《曙光》杂志第 2—3 期合刊抽印本）、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小册子《女工》、《奥布霍夫工厂五月骚乱事件的起诉书》（《火星报》第 9 号抽印本并附列宁《新的激战》一文）、列宁的文章《同饥民作斗争》（《曙光》杂志第 2—3 期合刊抽印本）和《游行示威开始了》（《火星报》第 13 号抽印本）以及一系列声明和传单。这个印刷所还翻印了《火星报》第 10 号。

巴库印刷所（秘密通信中代号“尼娜”）是巴库的火星派小组（弗·扎·克茨霍韦利、列·波·克拉辛、列·叶·加尔佩林、Н．П．科泽连科、瓦·斯图鲁阿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的协助下于 1901 年 9 月建立的。印刷所用俄文和格鲁吉亚文印过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蜘蛛和苍蝇》、希·迪克施坦的小册子《谁以什么为生？》、《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的演说》、《莫罗佐夫工厂罢工十周年》以及一些宣言和传单。巴库印刷所还翻印了《火星报》第 11 号。格鲁吉亚秘密的马克思主义报纸《斗争报》也是在这里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巴库印刷所成为党的中央印刷所，按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布置的任务进行工作。1905 年 12 月，印刷所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撤销。——277。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信[1]

列宁（1902 年 4 月）

恩·恩·给北方协会的信

（对北方协会“纲领”的意见）

首先应当指出“纲领”**行文上**的一个主要缺点：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一时一地的狭隘的具体任务混为一谈了。只要看一看纲领所有 15 节的内容，这个缺点就马上昭然若揭。我们就来看一下。

第 1 节——整个工人运动的目的。

第 2 节——达到这个目的的基本条件。

第 3 节——**俄国**社会民主党最近的政治任务。

第 4 节——俄国社会民主党对自由派和其他派别的态度。

第 5 节——同上。

第 6 节——“阶级”和“政党”的概念（同“经济派”的部分意见分歧）。

第 7 节——实际的鼓动任务。

第 8 节——宣传的意义。

第 9 节——关于游行示威。

第 10 节——关于庆祝五一。

第 11 节——2 月 19 日的传单和游行示威[2]。

第 12 节——经济斗争和社会改革。

第 13 节——工人不仅必须进行防御性斗争，而且还必须进行进攻性斗争。

第 14 节——对待罢工，不仅要起消极作用，而且要起积极作用。

第 15 节——罢工是斗争的最好手段。

很容易看出，这些内容如此多种多样的章节，本来应该分为几个部分（否则那些不能把基本原则同当前实际任务区别开来的读者可能会产生相当多的误解）。既指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又对“经济派”进行解释或者对罢工的意义作出说明，这样相提并论的做法不仅是笨拙的，而且简直是不正确的和含糊不清的。应当首先明确地对自己的整个信念作出原则性声明；其次，根据“北方协会”的理解，指出党的政治任务；再次，把一个组织（“北方协会”）关于实际运动中各种问题（第 7—11 节和第 13—15 节）的**决议**同这些真正纲领性的原理区别开来。第 6 节应当单独列出，说明“北方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意见分歧所抱的态度。而第 12 节则应当并入原则性声明（因为争取小小改善和改革的日常斗争同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的斗争的关系，是一个普遍性问题，而不是俄国特有的问题）。

谈了这个一般性的意见以后，现在来逐节分析。

第 1 节指出了一般社会民主党的共同目的。这种目的讲得太简短、太不完整。诚然，地方组织的纲领，不能象党纲那样**必须**涉及各种详情细节。我完全承认这一点，并且认为，“北方协会”决定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的纲领中也不应该不谈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这是很有益的和很重要的。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指出对基本原则作比较详细的阐述。例如，应当指出“北方协会”坚持**国际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纲领没有一处指出运动的国际性）和赞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这样**一般地**指出了自己的原则以后，可以提出第 1 节那样的论点，但是，单就它（第 1 节）本身来说，是不够的。

“北方协会”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组织，应当指出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而且最好也指出“北方协会”甚至赞同“劳动解放社”在 80 年代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指出这几方面，虽然不能预先解决对这个草案进行必要修改的问题，但是可以比较确切地表明“北方协会”的原则立场。

只能二者择一：**要么**应当自己**全面地**阐述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基本原则（即自己草拟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原则性部分），**要么**应当完全肯定地声明，“北方协会”**接受**相当著名的既定原则。而纲领所选择的第三条道路，即十分不完整地指出最终目的，是不合适的。

第 2 节一开头是一个极其不确切的、含糊不清的和危险的声明：“认为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这句话似乎是把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划成等号。这样划等号**是完全不正确的**。正是在现在，当人们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非常普遍地理解得**极其狭隘**的时候，提出这样的公式简直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只有把“阶级利益”理解得**非常广泛**，才能勉强地承认这个公式。“阶级利益”迫使无产者联合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考虑自己解放的条件。“阶级利益”使他们易于接受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体系，它服从思想体系的发生、发展和巩固的一般条件，就是说，社会主义以人类知识的一切材料为基础，以科学的高度发展为先决条件，要求科学的工作等等，等等。社会主义是由思想家**输送到**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上自发地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第 2 节的条文对社会主义同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阐述得十分不正确。同时，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第 2 节也没有谈到。这是它的第二个缺点。

第 3 节对专制制度的说明是不够的（例如，没有指出它同农奴制残余的联系），部分是高谈阔论（说什么“无限度的”）和含糊不清（说什么“忽视”**个人**）。其次，争取政治自由（应当指出，“北方协会”是向**全党**提出这个任务的）之所以必需，**不仅仅**是为了工人的阶级斗争的充分发展；应当用某种形式指出，其所以必需也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专制制度仅仅代表各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是不确切的，或者说是不正确的。专制制度满足各统治阶级**一定的**利益，部分是依靠农民群众和全体小生产者

的因循守旧而存在，部分是依靠各种对立利益之间的平衡而存在，而在某种程度上，专制制度也是独立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第 3 节的条文之所以特别不能容许，是因为我们这里十分流行一种把俄国专制制度同资产阶级统治混为一谈的荒谬看法。

“与民主原则不相容。”既然一点儿还没有谈到民主，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难道推翻专制制度和争取政治自由的要求不正是表明民主“原则”吗？这句话是不合适的。不要这样说，应该更确切地指出我们在理解“民主原则”方面的彻底性和**坚定性**（同资产阶级民主相比较），例如，用某种方法描述“民主宪法”的概念**和内容**，或者说明我们要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原则性”要求。

第 4 节特别不能令人满意。不要说“充分”利用“广泛的”自由（这句话实在不明确，完全可以而且必须用民主共和国和民主宪法这种确切的说法来代替，因为“充分”也就在于彻底的民主制），不要这样说，**必须**说关心政治自由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闭口不谈这一点，就是为“经济主义”的最坏形式大开方便之门，就是忘记了我们的一般**民主主义的**任务。

对无产阶级来说，实现（？？获得，争取）政治自由同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有“同样的”必要性，这种说法**完全不对**。恰恰**不是同样的**，因为**这是另一种**必要性，是比提高工资等等的必要性**复杂得多的**一种必要性。这两种“必要性”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只要**工人阶级的个别阶层或集团顺从专制制度，专制制度就准备给（**有时候确实给**）这些阶层或集团改善处境。我们分析的这句话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它表明“经济”唯物主义被庸俗化到了极点，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被降低到了工联主义的观点。

其次，“有鉴于此”……**由于**上面所说的……应该删去“在当前斗争中”（即在同沙皇制度的斗争中，是吗？）……“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明确的阶级纲领和要求……”。我们**政治**纲领和**政治**要求的**阶级**性，恰恰表现在民主主义的充分和

彻底上。如果说的不仅仅是政治要求，而是我们的整个纲领，那么纲领的阶级性应该自然而然地从我们纲领的内容中表露出来。用不着说什么“**明确的**”阶级纲领，而应当自己直接地和确切地**确定**、叙述、表达和拟定这种阶级纲领。

“……不服从自由派的纲领……”这简直可笑。我们是作为先进的民主主义政党出现的，而突然说什么“不服从”!！真象是刚刚摆脱“服从”的孩子！

我们“不服从”自由派，不应当表现在关于不服从的词句里，而应当表现在我们纲领（**当然还有我们的活动**）的整个性质中。把自由的必要性和提高工资的必要性等同起来（或者至少是同等看待）这样一种对政治任务的理解，恰好**表现出社会民主党服从自由派**。

第 4 节的结尾部分也不合适；上述一切也是对它的批评。

第 5 节把我们对待所有一切民主派的一般态度归结为一种在实际工作中同其他政党的合作。这太狭隘了。既然有这些政党存在，就应当（不是在纲领中，而是在代表大会的专门的决议中）确切地列举它们的名称，并且确切地确定对待社会革命党人、“自由社”等等的态度。如果说的不是具体的政党，而是泛指对待其他革命派（**和反政府派**）的态度，那么就应当更广泛地表述这一点，用某种形式重述《共产党宣言》关于我们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的论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504 页。——编者注］。

第 6 节不宜放在纲领中。应当把这一节放在专门的决议中，并且**直接**说出，这里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意见分歧（或两个派别）。这比“很多的误解”更严重。关于意见分歧的论述太狭隘了，因为意见分歧**决不限于**把阶级同党混为一谈。应当更坚决更明确地用相应的论点反对“批评马克思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缩小我们的政治任务。

至于第 6 节的第二部分，因为它由其他节（第 7、14 节及其他各节）**作了说明**，所以对这部分的批评，包括在对那几节的批评里。

第 7 节和以下所有各节（除第 12 节外）都应当放在专门的决议中，而不要直接放在**纲领**中。

第 7 节把自己活动的“任务”表述得很狭隘。我们不仅应当“提高无产阶级的自觉”，而且也应当把他们**组织**到政党中来，然后**领导**他们的斗争（既要领导经济斗争，也要领导政治斗争）。

说无产阶级处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是多余的。或者删掉这句话，或者由自己**明确**提出这些条件（但是，这应当写在纲领中别的地方）。

鼓动是实现我们任务的“唯一的”手段，这种说法不对。远不是唯一的。

确定鼓动是“影响广大工人阶层”，这不够。应当说明这种影响的性质。应当更直接、更坚决、更明确和更详细地说明**政治**鼓动，否则，纲领不谈政治鼓动本身而花了整整两节（第 14 节和第 15 节）去谈经济鼓动，就会变成（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经济主义”。应当特别强调指出，对**居民中任何阶级或任何阶层所受到的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生活的和民族的压迫现象都必须进行鼓动，在同政府等等发生各种冲突时必须（对社会民主党来说）站在一切人的前列；然后再指出鼓动的方法（口头、报刊、传单、示威和其他等等）。

第 8 节。开头是多余的重复。

“承认宣传**只是**由于”等等，这不对。宣传不仅有这个意思，不仅是“培养鼓动员”，而且也传播一般的意识。纲领过分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如果需要反对某人在进行宣传时过分脱离鼓动任务的话，那么最好是这样说：“在宣传中，**特别**不应当忽略培养鼓动员的任务”，或者诸如此类的说法。但是不要把**整个**宣传归结为培养“有经验的和有才干的鼓动员”，不要简简单单地“否定”“只培养个别觉悟工人”。我们认为这是不全面的，但是我们不“否定”这一点。因此，第 8 节的第二部分（自“否定地对待”起）应当完全删去。

第 9 节。就实质来说，我完全同意。不过可以作如下补充："关于社会生活的各种**极**不相同的事实和政府措施……"

"最好的手段"换成"最好的手段**之一**"，更为确切。

只是本节的结尾部分不能令人满意。游行示威和示威所团结的和必须团结的**不仅仅是**工人（而且，既然我们想有组织地、直接地和永远地团结，而不只是在一个事件中团结，那么光靠示威来"团结"是**不**够的）。"……在他们中间**用这种方式**来提高……"这或者说是不确切的，因为**单靠**示威不能提高意识；或者说是多余的（已经说过是最好的手段之一）。

要是加上必须**组织**示威、筹备示威、举行示威等等也不无益处。

总的说来，纲领中一处也没有指出必须密切注意**革命组织**（而且是全俄的战斗组织）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既然已经谈到鼓动、宣传、罢工等等，那么闭口不谈**革命组织**就简直不可宽恕了。

第 10 节。应当加上：我国的五一节还应当成为**反对专制制度**的游行示威，成为要求政治自由的斗争。只指出节日的国际意义是不够的。应当把争取最迫切的**本国的**政治要求的斗争同国际意义联系起来。

第 11 节。想法很好，但是讲得太狭隘。是不是再加上"此外"，因为为了纪念公社的周年和其他许多事情也必须组织游行示威。或者说"特别是"，否则会以为似乎对其他事情就不需要组织游行示威了。

其次，纪念 2 月 19 日，不要只对工人发出号召（在传单上）。况且，凡是举行游行示威和为此而印发的传单中我们总是向全体人民，甚至向全世界发出号召——2 月 19 日，也必须对农民发出号召。而对农民发出号召，就是要拟定社会民主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政策。纲领没有谈到这个问题，而我们完全理解，地方组织可能没有时间或者没有精力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哪怕用某种形式指出这个问题，以及通过某种尝试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上和我们运动的实践［注：例

如，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对农民的鞭笞等等的尝试。] 中提出这个问题，则是绝对必需的。

第 11 节的结尾部分不合适（“只有**一个阶级**的力量”——哪个阶级？光一个工人阶级吗？）。应当删去。

第 12 节。在现有条件下，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不能“用各种方式”帮助改善工人状况。例如，我们现在就不能按祖巴托夫方式帮助改善工人状况，甚至将来也不能在祖巴托夫腐蚀的条件下帮助改善工人状况。我们所争取的只是能**提高**工人进行阶级斗争能力的那种改善，就是说，改善条件**不会**使政治意识受腐蚀、**不会**受警察监护、**不会**被拴在一个地方、**不会**受“行善者”的奴役、**不会**使人格受侮辱，等等，等等。正因为在俄国，专制制度非常喜欢（并且**愈来愈**喜欢）用各种小恩小惠和虚假的改革来**赎免**革命，所以我们应当坚决同各种各样的“改革家”划清界限。我们也同样为改革而斗争，但不是“用各种方式”，而是**只**按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按革命的方式。

第 13 节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删去了。这一节是应当删去的。

第 14 节对经济鼓动的内容和任务的表述太狭隘了。经济鼓动并不仅仅限于罢工。我们之需要“良好的条件”，不仅是为了无产阶级的文化发展，而正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展。社会民主党在罢工中的“积极作用”并不仅仅限于发动**争取改善经济状况**的斗争。还应当**经常**利用罢工（以及整个经济鼓动）来发动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应当利用罢工来进行**政治**鼓动。

第 15 节也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罢工不是斗争的“最好的”手段，而仅仅是手段**之一**，甚至不一定总是最好的手段之一。应当承认罢工的作用，经常利用罢工，领导罢工，但是，“经济主义”把罢工的作用夸大得愈厉害，夸大罢工的作用就愈危险。

接下去关于罢工所讲的是多余的，因为在第 14 节中已经讲过了。只要指出领导一般的经济斗争就够了。有时候，这种领导也表现为制止罢工。纲领讲得过分绝对了，因此也就过分狭隘了。应该概括地谈谈任务：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使它更有组织和更有觉悟，建立工人的工会并努力把它们扩大为全俄的工会，利用每一次罢工、经济压迫的各种表现等等来进行最广泛的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宣传鼓动。

第 15 节的结尾部分把这种鼓动的任务**缩小了**，似乎警察的发动等等限制了政治鼓动的进行。实际上，应当在“天使长们”发动**之前**并且**不管**他们的发动，努力进行政治鼓动（而在某些有才干的领导者的领导下，这是完全可能的）。要讲得笼统些：“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进行政治鼓动”等等。

第 15 节的结尾部分也是不正确的。在我们俄国**准备**“总罢工”的可能性愈少，谈论“总罢工”就愈不相宜。而且一般说来，在纲领中**专门**谈论“总”罢工是没有道理的（请回忆一下《谁来实现政治革命？》这本小册子中的荒谬的“总罢工”吧。要知道，产生这种误解也是可能的）。宣布罢工“是提高**意识**的**最好的**手段”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总之，很希望这个纲领能认真地修改一下。整个说来，希望“北方协会”既积极参加**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党的**统一工作，也参加制定党纲的工作。而《曙光》和《火星报》编辑部希望最近就把自己的草案（草案的大部分已经拟好了）提交“北方协会”，并希望“北方协会”参加草案的修改、散发和准备提交全党通过等工作。

恩·恩·

注释：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于 1902 年 1 月 1—5 日（14—18 日）在沃罗涅日举行代表大会，通过了协会的纲领。列宁在这封信里批评了这个纲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也称北方工人协会（秘密通信中称“谢苗·谢苗诺维奇”），是俄国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尔和科斯特罗马三省的社会民主党地区联合组织。该协会是根据奥·阿·瓦连佐娃和弗·亚·诺斯科夫的倡议于 1900—1901 年在沃罗涅日建立的。参加该协会的有一些是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协会的中央委员会（在 1902 年 1 月代表大会上选出）由瓦连佐娃、米·亚·巴加耶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Н．Н．帕宁（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因参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等组成，1901—1905 年，协会领导了这一工业地区的工人运动。

北方协会成立之初就同《火星报》建立了联系，并赞同《火星报》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计划。协会的代表积极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协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是莉·米·克尼波维奇和亚·米·斯托帕尼。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北方协会改组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委员会。1905 年 7 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各组织的代表会议上撤销了北方委员会，建立了独立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雅罗斯拉夫尔委员会和科斯特罗马委员会。——349。

[2]这里说的是在 1861 年农民改革纪念日（2 月 19 日）这一天组织游行示威的问题。北方协会纲领第 11 节中写道：在传单中应就这件事“向工人指出，他们对专制政府不要有所指望”，“要努力破除这样一种错觉，似乎解放是沙皇个人所为，是他的善行”。——350。

关于游行示威[1]

列宁（1902 年 10 月 6 日〔19 日〕以后）

我们觉得，写信人把问题提得有点过分直率，而且对游行示威的组织性的意义估计不足。在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所做的工作还很少，我们应该首先把主要力量投入组织工作。只要我们还没有紧密团结的革命组织，能够调动几支精锐的人民队伍去从各方面领导游行示威，失败总是在所难免的。一旦这样的组织建立起来，并且在工作过程中通过一系列试验得到巩固，那么它（也只有它）就能解决该在何时和怎样武装起来，以及该在何时和怎样使用武器的问题。这个组织应当认真地加快“动员速度”（这个问题写信人强调得完全对，也极其重要），扩大积极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数，培养指挥人员，开展对群众的鼓动工作，吸引“旁观的人群”参加“游行示威”，把军队“引入歧途”。正因为这个向武装街头斗争过渡的步骤非常“残酷”，而且“迟早难免”，所以只有直接领导运动的坚强的革命组织才能够采取而且必须采取这一步骤。

注释：

[1]《关于游行示威》这篇短评是列宁为彼得堡大学学生 A. 奥弗相尼科夫 1902 年 10 月 6 日（19 日）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写的编后记。奥弗相尼科夫的这封信以《谈游行示威问题》为题，评论了 1902 年 9 月 15 日《火星报》第 25 号发表的彼得堡一位同志的信——《怎么办？》。列宁原打算把短评和奥弗相尼科夫的信同时在《火星报》第 27 号发表，后来短评和信都没有刊出。——19。

新事件和旧问题

列宁（1902 年 12 月 1 日〔14 日〕）

最近半年或 9 个月以来，我国革命运动的特征是出现了短暂的“平静”时期，——同过去革命运动暴风骤雨般的迅速发展相比而言——看来，这一时期就要结束了。尽管这种“平静”时期是短暂的，尽管任何一个细心的了解情况的观察者都很清楚，工人们普遍的愤懑情绪（短期内）没有公开表现出来决不意味着这种情绪已经停止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了，然而，在我们那些倾向革命、但往往既同工人阶级没有巩固的联系、在明确的社会主义信念方面又没有坚固基础的知识分子中间，一方面有人发出了许许多多悲观失望、对群众性工人运动丧失信心的论调；另一方面，有人主张重新采用个人政治暗杀的旧策略，作为当前必须采用的政治斗争手段。自去年一段时期的游行示威以来的几个月里，我国已经成立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党”，他们大声叫嚷说游行示威留下了令人沮丧的印象；说什么“可惜，人民还不能很快……”；又说什么在口头和文章上谈论武装群众当然容易，但是现在必须着手进行“个人的反抗”，不要总是借口在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鼓动和组织群众性冲击这一个任务（在对工人运动不再抱“教条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看来，这个任务是单调“乏味”的！），来否认个人恐怖手段的绝对必要性。

然而，乍看起来极为普通而“平常的”一次罢工[1]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爆发了，这次罢工所引起的事件清楚地表明，社会革命党人企图重犯民意主义及其理论上和策略上的全部错误，是多么荒谬，多么有害。这次有成千上万工人参加、由纯粹经济性质的要求引起的罢工，很快就演变成了政治事件，尽管有组织的革命力量极少参与。群众（据某些参加者说，达到两三万人）举行了就严肃性和组织性来说均令人惊讶的政治集会，在这些会上人们热切地宣读和介绍了社会民主党的传单，发表了政治演说，向完全是并非有意集合在这里的、没有受过训练的劳动

人民讲解了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初步常识，给他们上了关于怎样对待士兵和怎样号召士兵的具体的“实物”课。行政当局和警察张皇失措（也许一部分原因是军队不可靠？），无力阻挠在俄国从未有过的一连几天在露天举行的群众性政治集会。最后出动了军队，群众拼死进行抵抗，而一位同志的被枪杀，又成了第二天抬着遗体举行政治游行示威的导火线……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对这件事也许另有看法，在他们看来，在罗斯托夫被枪杀的六位同志如果为暗杀某些警察恶棍而牺牲，想必“更相宜”吧？

我们则认为，只有这种能向大家表明工人阶级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明显提高的群众运动，才称得上是真正革命的行动，才能够真正激励为俄国革命进行斗争的人。这不是那种同群众的联系仅仅限于口头声明、限于已发表的判决书等的臭名远扬的“个人的反抗”。这是一大群人的真正的反抗，而这种反抗之缺乏组织性、缺乏准备和带有自发性质又使我们想到：夸大自己的革命力量，那实在不聪明；群众就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了真正的斗争，应该使他们更有组织性，更有准备，忽视这一任务，那简直是犯罪。不应靠枪杀来制造激动人心的理由，制造进行鼓动和提高政治思想的材料，要学会整理、利用和掌握俄国生活所提供的绰绰有余的材料，——这才是革命者唯一应该承担的任务。社会革命党人对那些在自由派客厅和民间小酒馆里引起那么多窃窃私议的政治暗杀的巨大“鼓动”作用赞不绝口。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用发动政治事件来代替（或者甚至是补充）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是毫无价值的（反正他们已摆脱了稍微肯定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狭隘的教条！）。我们则认为，只有由群众亲自登场、由群众的情绪引起，而不是由某个组织“抱着特殊目的”排演的事件，才能够起到真正重大的“鼓动的”（激励人心的）作用，并且不仅仅有激励人心的作用，同时还有（这点更加重要得多）教育的作用。我们认为，成百次暗杀沙皇的行动决不会起到这种激励人心的作用和教育的作用，这只能靠数万名工人参加集会，讨论他们的切身利益和政治同这

种利益的联系，——这只能靠参加斗争，以真正唤起无产阶级中愈来愈多“没有触动过的”阶层奔向更加自觉的生活，投入更加广泛的革命斗争。有人对我们说政府（它不得不以普列韦先生之流更换西皮亚金先生之流，把最卑鄙无耻的恶棍“选来”供职）在解体，而我们确信，牺牲一个革命者的生命即使可以干掉十个恶棍，也无异于使我们自己的队伍解体，因为我们的队伍本来人数就太少，少得连工人们“要求”他们做的一切工作都做不过来。我们认为，表明政府真正解体的是这样一些情况，也只能是这样一些情况：通过斗争本身真正组织起来的广大群众使得政府张皇失措；街头的群众明白了，甚至派来“绥靖”的军队中的一部分人也开始明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要求是正当的；当局在采取军事行动对付数万人民以前，就已经犹豫动摇，感到无法实际估计这些军事行动会引起怎样的后果；群众认定并感到内战战场上牺牲的人是自己的同志和自己的同伴，满怀着新的仇恨，准备去同敌人决一死战。这里，人民的敌人已经不是个别的恶棍，而是整个现存制度，与人民为敌的是地方和彼得堡的当权者、警察、哥萨克和军队，至于宪兵和法庭就更不用说了，只要举行人民起义，它们始终都要插手，历来如此。

不错，是起义。尽管一个遥远的外省城市的这次罢工运动开始时看来离“真正的”起义还很远，可是它的发展和结局使人不禁想到的正是起义。罢工的起因很平常，工人提出的要求也微不足道，这既特别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它一下子就认识到铁路工人的斗争是他们的共同事业）团结的强大力量，又表明他们容易接受政治思想和政治宣传，也表明他们有决心在同军队的直接战斗中挺身捍卫自由生活和自由发展的权利——这些权利已成为一切有思想的工人共同的和最基本的东西。顿河区委员会在传单（传单全文，我们在下面予以转载）中对“全体公民”说，罗斯托夫的罢工是俄国工人要求政治自由的总高潮中的一次爆发，这是千真万确的[2]。在这类事件中，我们确已亲眼目睹反对专制政府的全民武装起

义正在成熟，它已经不仅是革命者头脑和纲领中的思想，而且是运动本身必然的、实际上很自然的下一个步骤，是群众从俄国实际生活中吸取了宝贵教训和接受了出色教育，以至愤懑日益加深、经验日益丰富和勇气日益增大的结果。

我讲了必然的和自然的步骤，现在来赶紧附带说明一下：除非我们一步也不偏离我们那日益迫近和已经面临的任务，即帮助这些已经奋起的群众更勇敢、更齐心地进行斗争，派给他们不是两个，而是几十个街头演说家和领导者，建立能够指导群众的真正的战斗组织，而不是建立指导（假如说是指导的话）一些抓不住的个人的所谓“战斗组织”。自不待言，这项任务是很艰巨的，不过我们完全可以把近来人们常常引用得很不恰当的马克思的话改动一下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个人暗杀和个人反抗“更重要”，比数百个清一色知识分子的组织和“党派”更重要。[3]

除了罗斯托夫战役以外，在最近政治事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游行示威者判处苦役。政府决定采用从鞭笞到判处苦役的种种办法来吓唬人们。而工人对政府作了多么出色的回答啊（他们在法庭上的演说[4]我们将在下面引用），这个回答对于所有叫嚷游行示威产生了令人沮丧效果的人来说是极有教益的，他们这样叫嚷不是为了激励人们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开展工作，而是为了鼓吹臭名远扬的个人反抗！工人的这些演说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对罗斯托夫这类事件作出的精采解释，同时也是一则出色的声明（我要说，这是一个“公告”，假如这个词不是警察的专用语的话），它对运动的“实际”步骤方面所作的长期而艰苦的努力是极大的鼓舞。这些演说的出色之处，在于它们通俗地、极其确切地描述了，工人在现代社会中“受压迫、遭贫困、被奴役、受屈辱和被剥削”的这些平时千百万次重复着的事实，怎样促使工人觉悟起来，使他们愈来愈“愤懑”，并且用革命行动来表现这种愤懑（为了说明下诺夫哥罗德工人们演说的特色，我不得不使用上面的几个词，这些词我都加上引号，因为这些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最后几页上的名

言，它们曾使“批评家”、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等等大肆鼓噪、徒劳无益地企图反驳和揭露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讲得不对［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31 页。——编者注］）。

正因为发表这些演说的是普通工人，而不是觉悟程度很高的先进分子，甚至不是以某个组织成员的身分，而只是以普通群众的身分发表演说，正因为他们所强调的不是他们个人的信念，而是俄国每一个无产者或半无产者生活中的事实，他们的结论才会产生十分令人鼓舞的印象，这个结论是：“这就是我们自觉地参加反对专制政府的游行示威的原因。”他们作出这个结论所依据的事实极为寻常、“比比皆是”，这就能保证几千、几万、几十万人都能够作出而且也必然作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能够坚持、扩大和加强对他们的经常不断的、坚持原则的、全面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教育的话。下诺夫哥罗德的四个工人说，既然我们感觉到了自由的气息，我们为了反对政治奴役和经济奴役甘愿去服苦役。罗斯托夫的几千名工人夺得了几天政治集会的自由，击退了多次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的武装进攻，他们仿佛在同这四个工人遥相呼应地说：我们甘愿献身。

现在我们只需对那些有眼可看、有耳可听的人[5]说：以此将取胜。

注释：

[1]指 1902 年 11 月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发生的罢工。1902 年 11 月 2 日（15 日），该市铁路工厂锅炉车间工人为抗议厂方克扣工资开始罢工。11 月 4 日（17 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发出传单，号召全体铁路工厂工人参加罢工，并提出了实行九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取消罚款、开除最令人痛恨的工长等要求。11 月 6—7 日（19—20 日）罢工扩展到了全市，并发展成为政治罢工。工人们在市外的一个小山谷里连续举行群众大会。11 月 11 日（24 日），警察和哥萨克袭击了集会的罢工工人，死 6 人，伤 17 人。罢工工人群众大会仍继续举行了两个星期。罢工坚持到 11 月 26 日（12 月 9 日）结束。这一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

区委员会印发了传单《告全俄公民》。这次罢工震动了全俄国，在西欧各国也引起了反响。——43。

[2]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于 1902 年 11 月 6 日（19 日）印发的传单《告全体公民》。1902 年 12 月 1 日《火星报》第 29 号转载了这份传单。——45。

[3]指马克思在 1875 年 5 月 5 日给威·白拉克的信中说的一句话：“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13 页）——46。

[4]指下诺夫哥罗德工人彼·安·扎洛莫夫、阿·伊·贝科夫、米·И．萨梅林和Г．Е．米哈伊洛夫在法庭上发表的演说。这四位工人是因参加 1902 年 5 月 1 日和 5 日（14 日和 18 日）的五一节游行示威而被捕和受审的。这次游行示威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领导下准备的。在游行中，工人们高举红旗和“打倒专制制度!”、“政治自由万岁!”的标语，同前来镇压的警察发生了冲突。1902 年 10 月 28—31 日（11 月 10 一 13 日），莫斯科高等法院在下诺夫哥罗德和索尔莫沃开庭审判游行示威的参加者。共有 23 人受审，其中 13 人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马·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反映了这次游行示威。小说主人公巴维尔的原型就是工人扎洛莫夫。

四位工人的演说最初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以石印单页的形式散发。1902 年 12 月 1 日《火星报》第 29 号转载了这几篇演说并发表了列宁为演说写的前言。——46。

[5]有眼可看、有耳可听的人一语出自圣经《新约全书》。耶稣在传道时多次对众人说，有眼可看的人都应当看，有耳可听的人都应当听。意思是说，对于善于观察，用心领会的人，无论什么隐蔽的事物，一听也就明白，一看也就清楚。——47。

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

列宁（1904 年 12 月 22 日〔1905 年 1 月 4 日〕）

我国社会的有产阶级中的现代立宪运动，与过去 50 年代末和 70 年代的这类运动截然不同。现在自由派的立宪要求本质上还是那些。激进的演说家们的演讲不断重复着地方自治自由派的老调。无产阶级参加运动却是件巨大而十分重要的新事。俄国工人阶级（它的运动曾是近十年来整个革命运动的主轴）早已转入公开的斗争，走上街头，举行民众大会，不顾警察的镇压，在南方各城市的街头直接跟敌人搏斗。

而现在，由于无产阶级鲜明地、坚决地、无比果断和无比勇敢地登上舞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运动立刻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圣彼得堡的游行示威（可惜，由于“孟什维克”进行瓦解组织活动，这里工人参加游行示威的声势不大）和莫斯科的游行示威。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工人们在斯摩棱斯克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宴会上，在下诺夫哥罗德教育协会的集会上，在各城市的学者、医生协会和其他协会的会议上的出现，看一看萨拉托夫的工人大会，看一看 11 月 6 日在哈尔科夫法学家协会，11 月 20 日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市杜马，11 月 18 日在敖德萨人民保健协会，以及稍后在敖德萨地方法院的示威，而在敖德萨的两次示威和哈尔科夫的一次示威中，工人们还进行了街头游行，他们手持旗帜在市内行进，高唱革命歌曲等等。

最后这四次示威在《火星报》第 79 号上标题为《无产阶级的示威》的专栏内也有叙述，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些叙述。首先我要转述一下《火星报》刊载的事实，然后再来转述《火星报》的议论。

在哈尔科夫，委员会组织工人去参加法学家协会的会议；有 200 多个无产者出席了会议，一部分工人不好意思去参加庄严的会议，一部分“大老粗被谢绝入

场”。自由派主席在第一篇革命演说发表后就溜走了。接着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发表演说，传单纷飞，马赛曲的歌声高扬，有将近 500 名工人涌上街头，手持红旗唱着工人歌曲前进。最后，有一部分人被殴打和逮捕。

叶卡捷琳诺达尔。杜马的大厅来了大批听众（因为传说自由派要发表演说）。电话被弄坏了。委员会的一个演说家带着 30—40 名工人闯进大厅，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充满革命精神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演说。鼓掌。散发传单。议员们目瞪口呆。市长白白抗议了一番。示威者最后安然退场。夜间大肆搜捕。

敖德萨。第一次示威。有近 2000 人举行集会，其中有大批工人。一系列革命演说（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雷鸣般的掌声，革命的欢呼声，传单。高唱革命歌曲上街游行。解散，没有发生冲突。

敖德萨。第二次示威。数千人集会。象上次一样举行了规模巨大的人民革命集会和街头游行。发生冲突。大批人受伤，一些人受重伤。一名女工死亡。60 人被捕。

这就是事情的实际情况。这就是俄国无产者的示威。

我们再来看看某些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的议论。这些议论是针对叶卡捷琳诺达尔示威的。整篇文章全是谈的这次示威。请听：“在这次示威中，俄国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第一次跟我国倾向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正面相遇！……”这次示威是“政治斗争方式发展中的又一新的进展”，它“毕竟是一种能够产生十分显著有益的结果的真正的新的政治斗争手段”，工人们在这样的示威中“感觉到他们是作为一定的政治单位出现的”，他们获得“自己可以作为党的政治战士的权利能力感”。“社会的最广大阶层”逐渐认识到，“党是一种十分确定的、定型的而且主要是具有**要求**权的组织”。人们习惯于把整个党看成“是积极的、战斗的、明确宣布自己的要求的政治力量”。必须“在杜马、地方自治机关和社会人士的一切会议上更广泛地运用新的斗争方式”。于是，《火星报》编辑部就附和发表这些议论的

人，也谈论什么“新型示威的思想”，什么“特别是在叶卡捷琳诺达尔，我们的同志们得以向‘社会’表明，他们是作为一个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影响事态的进展并力图做到这一点的独立政党进行活动的”。

够了。够了。什么“特别是在叶卡捷琳诺达尔……”新的进展，新的方式，新的手段，第一次正面相遇，十分显著有益的结果，一定的政治单位，政治权利能力感，要求权……从这些浮夸的深奥的议论中，我闻到一种陈腐的，早已过时的，几乎被人遗忘的气味。但是在认清这种陈腐的东西之前，我不禁要问：可是，先生们请原谅，为什么“特别是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呢？为什么这确实是新的方式呢？为什么哈尔科夫人也好，敖德萨人也好，都不吹嘘（恕我用字粗俗）方式的新颖、显著有益的结果、第一次正面相遇和政治权利能力感呢？为什么几十个工人和数百个自由派在杜马大厅的四壁之内集会的结果竟比成千的工人不仅在医生协会和法学家协会，而且**在街头**集会的结果更显著有益呢？难道街头集会（在敖德萨以及从前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和其他城市）真的不如杜马里的会议更能增强政治权利能力感和要求权吗？……的确，我必须承认，当我抄写最后这个词（**要求**权）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不自在——这个词也太不妙了，不过歌里的词是不能随便删改的。

然而，在一种情况下这个词是有某种意义的，而且不单单是这个词，《火星报》的一切议论也都是如此。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假定议会制存在，我们暂时设想叶卡捷琳诺达尔市杜马已迁到泰晤士河畔，与威斯敏斯特教堂比邻[1]。在这种小小的假定之下，人们就可以明了，为什么在代表聚会的四壁之内能够比在街头上具有更大的“要求权”，为什么同首相斗争，不，是同叶卡捷琳诺达尔市市长斗争，比同巡警斗争更有益，为什么政治权利能力感和作为一定的政治单位的自觉恰恰是在下院的大厅里或在地方自治会议的大厅里提高了。真的，既然没有真正的议会，为什么不玩一下议会制的游戏呢？在这里可以绘声绘色地设想出“正面相遇”

和“新的方式”等等等等。不错，这些想象必然会使我们的思想离开**争取**议会制的真正的群众斗争问题，而放到**玩**议会制的游戏上去，但这都是小事情。可是结果是多么鲜明、显著啊……

显著的结果……这种说法使我立刻想起马尔丁诺夫同志和《工人事业》。不回过头来谈一谈后者，便不能正确评价新《火星报》。关于叶卡捷琳诺达尔的示威的“新的斗争方式”的议论，完全是重复编辑部在它的《给各党组织的信》（附带说一句，把原稿藏起来秘而不宣，而只是把抄本对大家公开，这是否明智呢？）里的议论。编辑部的议论是在另外的问题上再现了《工人事业》平常的思路。

工人事业派关于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关于工人同业主和政府的经济斗争，关于向政府提出必将带来某些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的必要性的“理论”，究竟有什么错误和危害呢？难道我们不应该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性质吗？完全应该。但是，《工人事业》从“经济”（工会）斗争中引伸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政治任务，这样它就不可原谅地把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缩小和庸俗化了，它就贬低了无产阶级全面的政治斗争任务。

现在新火星派关于新的方式，关于动员无产阶级力量的高级形式，关于增强工人的政治权利能力感和他们的“要求权”的新的途径等等的理论，究竟有什么错误和危害呢？难道我们不应该在地方自治会议上和在召开地方自治会议之际举行工人示威吗？完全应该。但是，对无产阶级的漂亮示威我们不应该尽说些知识分子的蠢话。如果我们把我们日常示威的那些恰恰同积极斗争最无相似之处的特点，那些只是为了取笑才说它们能够产生特别有益的结果，特别能够提高政治权利能力感等等的特点，称赞为新的方式，那我们就只能腐蚀无产阶级的意识，我们就只能使它的注意力离开迫在眉睫的真正的严重的公开斗争的任务。

我们的老相识马尔丁诺夫同志和新《火星报》的过错，就在于他们都对无产阶级的力量，对它的整个组织能力，特别是对它建立党组织的能力，对它进行政

治斗争的能力抱着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态度。《工人事业》过去以为，无产阶级还不能，或者说，长时期内还不能进行超出反对业主和政府的经济斗争范围的政治斗争。新《火星报》现在以为，无产阶级还不能，或者说，长时期内还不能进行独立的革命活动，因此它把数十名工人在地方自治人士面前发表讲话称之为新的斗争方式。无论是旧《工人事业》杂志或是新《火星报》，都象宣誓一样地重复着关于无产阶级的主动性和自我教育的词句，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这些誓词可以掩盖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的真正力量和迫切任务的无知。无论是旧《工人事业》杂志或是新《火星报》，对于显著而鲜明的结果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具体对立的特殊意义，都发表了一通毫无道理的深奥的无稽之谈，借此把无产阶级的注意力吸引到议会制的游戏上来，使它离开日益逼近的、以人民起义为主导的直接冲击专制制度的任务。无论是旧《工人事业》杂志或是新《火星报》，都在**修正**（订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旧的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忙于寻找新的词句和“新的方式”，实际上是把党拉向后退，提出一些落后的、甚至是十分反动的口号。

这种不过是旧破烂的新修正，我们已经领教够了！现在是前进和停止用臭名远扬的组织－过程论来掩盖瓦解组织行为的时候了，现在是强调工人示威中那些使它们愈来愈接近于争取自由的真正的公开斗争的特点并把它们提到首位的时候了。

注释：

[1]在伦敦，与威斯敏斯特教堂比邻的是英国议会大厦。——120。

《无产阶级斗争报》[1]

列宁（1905 年 10 月 11 日〔24 日〕）

在《答〈社会民主党人报〉》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对于“从外面灌输意识”这一著名问题的绝妙提法。作者把这个问题分成 4 个独立部分：（1）关于意识对存在的关系的哲学问题：存在决定意识。由于存在着两个阶级，所以也就创造出两种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是适合于无产阶级地位的。（2）“谁能创造和谁在创造这种社会主义意识（科学社会主义）呢？”“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考茨基），也就是说，创造这种意识“是几个具有为此所必需的财力和空闲时间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事”。（3）这种意识怎样深入到无产阶级中去呢？“在这里也就出现了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它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4）社会民主党到无产阶级中去宣传社会主义时在无产阶级那里遇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本能的社会主义**倾向**。“与无产阶级产生的同时，无产者本身和那些领会无产阶级观点的人中间，必然也会产生社会主义倾向。社会主义倾向的产生，是应当这样解释的。”（考茨基）孟什维克却由此得出一个可笑的结论：“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并不是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的，恰恰相反，它是从无产阶级中间产生出来，然后灌输到那些领会无产阶级观点的人们头脑中去的！”

注释：

[1]这是 1905 年 10 月 11 日（24 日）《无产者报》第 22 号刊登的一篇书评中列宁写的一段，写于 10 月 4 日和 11 日（17 日和 24 日）之间。书评的这一段评论了斯大林写的《答〈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见《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143—

154 页）。整篇书评是评介高加索联合会机关报《无产阶级斗争报》俄文版第 3 号（1905 年 8 月 15 日）的。——389。

巴布石金的回忆

伊凡·瓦西里维契·巴布石金（简历）

伊凡·瓦西里维契·巴布石金，在为建立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专制政权、争取无产阶级革命在我国获得胜利的光荣战士中占着显著的地位。列宁称巴布石金是民族英雄，因为他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解放工人阶级的斗争。列宁在叙述巴布石金的革命活动时写道："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俄罗斯人民将永远当奴才，永远当农奴。现在俄罗斯人民正在和这样的人一起，为彻底摆脱一切剥削而战斗着。"（《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 16 卷第 334 页）

巴布石金于 1873 年 1 月 15 日生在沃洛果得省莱静克村一个贫农的家庭里。他早年丧父，还在童年时期就尝尽了贫穷和饥饿的滋味。巴布石金还是个十岁孩子的时候就被送到杂货店去当学徒。他在那里认识了老板的无情压迫和残酷剥削。

十四岁的少年巴布石金就进入了喀琅斯塔得的鱼雷工厂做工。他在那里有生第一次知道了工人争取美好生活的斗争。当了四年徒工以后，巴布石金进了彼得堡的塞棉尼可夫工厂（现名：列宁工厂）。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工人运动在俄国已日渐增长。在这些年代里，初期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相继建立，它们的成员中也包括先进工人。巴布石金知道有工人的政治小组，便渴望着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他很幸运，参加了列宁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同列宁的会面确定了巴布石金尔后的一生和他的活动。列宁极其推崇巴布石金的毅力、他的杰出的才能、尤其是他对革命事业的无比的忘我的忠诚。在列宁的直接影响下，巴布石金成了职业革命家，把他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1895 年，巴布石金积极地参加了列宁建立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工作。在列宁和"斗争协会"的其他成员被捕以后，仍然自由的巴布石金便全力从事"斗争协会"的活动，不让它停顿。这时，他写了并

且出版了通俗的宣传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者和政治犯？》。他在小册子内向工人表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追求什么和得到什么。他继续在涅瓦关外的塞棉尼可夫、亚历山大、斯契克良等工厂的工人中间从事革命活动，建立政治小组，创办图书馆。

1896 年初，巴布石金因“斗争协会”案件被捕了。他在拘留所的一间单人牢房里消磨了十三个月的光阴。沙皇的暴官恶吏没有能够摧毁这个列宁式的革命家从事正义事业的斗争意志。巴布石金利用这种和革命实践活动隔绝的不得已的时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1897 年 2 月，巴布石金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被选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德涅伯彼特罗夫斯克）。巴布石金在这里进了一家工厂，很快就和当地的革命组织接上关系，并且怀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热情参加了这个组织的工作。

经过巴布石金和其他革命者的努力，1897 年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建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巴布石金成了这个协会的积极的活动者之一。1898 年初，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斗争协会”出版了八份告城市工人的传单。每一张传单都揭露了当时笼罩着整个俄国的专横和强暴，给工人指明了解放的道路，号召他们积极地参加革命的斗争。巴布石金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建了一所地下印刷厂，利用它来出版秘密的革命书籍。

巴布石金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三年工作，结了果实：该城的革命工人，都团结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的周围。

尽管地下工作做得十分细致，但是警察当局还是弄清了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党委会各个成员的革命活动的情况。1900 年开始大批逮捕社会民主党人，巴布石金虽得幸免，但他只好离开叶加特林诺斯拉夫。

这时候，列宁已经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回来，着手筹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全俄报纸——《火星报》。《火星报》必须把彼此分散的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联接

起来，同时准备在俄国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列宁认为最好在国外出版报纸，使它免于遭到可能的摧残。这份报纸还必须和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列宁的计划得到了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热烈支持。

巴布石金积极参加建立列宁主持的《火星报》的工作。1900 年夏天，他在玛·伊·乌里扬诺娃的帮助下，和列宁取得了联系，成了《火星报》的最早的代理人之一，并且是它的活跃的通讯员。

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艰苦斗争中，列宁把特殊的期望寄托在巴布石金的身上，而后者也没有辜负他的这种期望。巴布石金成了当时为《火星报》和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建立联系而尽力的活动家之一。巴布石金将舒雅、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奥列霍沃－祖耶沃等城市工人写的几百篇通讯交给列宁主持的《火星报》。列宁曾经说道："只要巴布石金没有被捕，《火星报》就不会缺少纯粹由工人写的通讯。"

为了逃避沙皇警察的迫害，巴布石金不得不经常搬家。他在斯摩梭斯克、波洛茨克、波克洛甫、莫斯科、奥列霍沃—祖耶沃、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等地进行了革命工作。巴布石金在他到过的各个地方，努力扩大和加强《火星报》和工人群众的联系。这时，巴布石金遵照列宁的嘱咐，写了一本通俗小册子《为捍卫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而斗争》。这本小册子是秘密发行，广泛地传布在各个工业城市的工人中间。

遵照列宁的嘱咐，巴布石金还同巴乌曼一起，从事繁重的组织工作，力求把莫斯科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团结在《火星报》的周围。

1901 年底，巴布石金又被捕了，但是 1902 年夏天，他终于越狱潜逃国外，逃到《火星报》编辑部所在地的伦敦。巴布石金在伦敦和列宁会面了。列宁委托他参加草拟火星派组织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今后工作的计划。列宁谈到他和巴布石金的会面时说道："我们在那里谈了很多，共同讨论了很多问题。"

巴布石金一心想离开伦敦，回到俄国去，打算积极参加实现列宁建立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的工作。列宁好容易才说服巴布石金，叫他留在国外几个月，写作有关他的生平和革命活动的回忆。列宁认为，写出这样一本宣传小册子，对青年工人来说，具有莫大的益处。青年工人可以按照这个小册子来学习：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究竟应当怎样生活，怎样行动。巴布石金所写的这些回忆文章，包括他这个职业革命家从 1893 年到 1900 年的生活和活动。他的这些回忆文章，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才第一次公布于世。写完了回忆录，巴布石金才按照列宁的吩咐，回到了当时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正和“经济派”展开尖锐斗争的彼得堡。巴布石金在彼得堡立刻投入当地火星派组织的工作，站在坚决的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对待革命活动的一切问题，列宁极其赞扬巴布石金的工作。1903 年 1 月 16 日，列宁写道：“我们热烈欢迎诺维茨克（巴布石金的笔名。——俄文版编者）的果敢行为，我们要求他再接再厉地保持这种战斗精种，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第 34 卷第 112 页。）

列宁把莫大的希望寄托在巴布石金的身上。列宁在寄往彼得堡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们那儿只要有波格丹（巴布石金的另一个笔名。——俄文版编者）在，就不能抱怨没有人。”（《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 34 卷第 111 页）然而，巴布石金在彼得堡的组织内没有工作多久，又被捕了。过了一个漫长的、拘禁的夜以后，他被押往遥远的亚库梯流放地去了。

巴布石金待在极北的维尔赫林斯克流放地，和党的生活隔绝了，同亲友们离开了。尽管有各种困苦和不幸，但是他决不沮丧，而且深信他将毕生为之斗争的事业一定会胜利。

巴布石金在流放地把犯人组成小组，自己也学习了很多东西，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

1905 年革命的日子来到了。俄罗斯的工人阶级挺身起来反对沙皇的专制制度。巴布石金领导了伊尔库茨克的革命运动。作为伊尔库茨克党委会的一个成员，他对孟什维克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号召发动群众，对沙皇制度作武装斗争。

十二月武装起义在莫斯科失败以后，革命开始逐渐转向低潮。工人阶级一面恶战，一面退却。赤塔的工人顽强地战斗着。布尔什维克在赤塔建立和领导的工人、兵士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作为一个革命政权机关而行动着。伊尔库茨克方面感到武器不足。巴布石金竭力为赤塔人组织武装支援。1905 年 12 月底，他和一伙同志离开伊尔库茨克前往赤塔去取军火。在归途中，他和他的五个同志被沙皇政府派往西伯利亚去镇压革命运动的讨伐队截获了。1906 年 1 月 31 日，巴布石金等六人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在梅索瓦依火车站被他们残酷地地枪杀在草草刨好的一个大坟坑边上。他们，这些英雄们死了，他们拒绝答复沙皇的刽子手的逼问，这些刽子手一直没有弄清这些被害者的姓名。伊凡·瓦西里维茨契·巴布石金的英雄形象，一个为劳动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的忘我的战士的英雄形象，是苏联人民——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鼓舞榜样。

悼伊・瓦・巴布石金

列宁（1910 年 12 月 18 日〔31 日〕）

我们活着的这个可诅咒的社会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党的一个伟大的工作者、党的骄傲、一个忘我地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工人事业的同志，竟失踪了。他的至亲妻子和母亲，他的最亲近的同志们，多少年来都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会不会是在哪儿服苦役？会不会在某个监牢里被人害掉？或者在对敌斗争中英勇地牺牲了。这就是过去猜测被连年坎普夫[1]枪杀的巴布石金的情况。我们获悉他的死讯，只是最近的事。

巴布石金的名字，不光社会民主党人熟悉它，爱戴它。凡是认识他的人，都敬爱他，因为他刚强、寡言、革命心坚定、并且热忱地忠诚于革命事业。1895 年，他这个彼得堡工人和另外一批有觉悟思想的同志，热烈地对涅瓦关外的塞棉尼可夫、亚历山大，斯契克良等工厂的工人进行工作。他建立政治学习小组，创办图书馆，自己也总是很用功地学习。

他一心一意地只是想着，怎样开展工作。他积极地参加编写 1894 年秋在圣彼得堡出版的**第一份鼓动传单**——告塞棉尼可夫工厂工人的传单，并且亲自散发这些传单。当圣彼得堡成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时候，巴布石金就成了它的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一直工作到他被捕为止。他在彼得堡工作时的一些老同志——他们都是《火星报》的创始人——和他一起讨论了关于在国外创办一份政治报纸的创意，他热烈地拥护这件事。这份政治报纸的任务，主要是联合和加强社会民主党。只要巴布石金没有被捕，《火星报》就不会缺少纯粹由工人写的通讯。大家可以翻阅一下最初的 20 期《火星报》，那上面的全部通讯，都是来自舒雅、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奥列霍沃－祖耶沃等俄国中心城市。这些通讯几乎全都经过努力替《火星报》和工人之间建立最密切联系的巴布石金的手。巴布石金是《火星报》的最热心的通讯员，也是它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巴布石金从中央地区辗转来到南方的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他在那里被捕了，囚在亚历山大地方的监狱里。他和另外一些同志翻越监牢的铁栅栏窗户，逃离亚历山大。他什么外国话都不懂，却能来到当时《火星报》编辑部所在地的伦敦。我们在那里谈了很多，共同讨论了很多问题。但是，巴布石金没有赶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坐牢和流放迫使他长时期离开队伍。高涨的革命浪潮推动了新的工作者、党的新的活动家，而这时，巴布石金却住在遥远的北方，住在维尔赫林斯克，同党的生活隔绝了。但是，他不是白白把时间浪费掉的，他学习，准备进行斗争，在流放地教导工人和同志，为促使他们成为有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1905

年颁布了大赦令，巴布石金回到了俄国。这时候，西伯利亚方面斗争十分激烈，那里正需要像巴布石金这样的人。他参加了伊尔库茨克的党委会，埋头工作。他这时候必须在各种会议上演说，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鼓动，组织起义。当巴布石金和另外五个同志（我们没有能知道他们的名字）把大批武器装在一挂车皮上，运往赤塔的时候，火车被连年坎普夫的讨伐队追上了。于是，这六个人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立刻被枪杀在草草刨好的一个大坟坑边上。他们，这些英雄们死了。亲眼看见这个屠杀场面的兵士和在这列火车上服务过的铁路员工，说出了他们死时的情况。巴布石金在沙皇爪牙的残酷迫害下牺牲了。然而，他死的时候却知道，他所毕生从事的事业没有死，将会有成千、成万、成百万的人继续这个事业，而且知道其他的工人同志也将为这个事业舍身成仁，这个事业一天不胜利，他们的斗争就一天不罢休……

※　※　※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杜撰了一个寓言，并且正在散播着。这个寓言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知识分子"的政党，工人和它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俄国的工人是没有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这种情况是革命前的特点，而且在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自由主义者散布这种谣言，是出于他们对 1905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领导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的憎恨，而社会主义者中间有些人却无知而又轻率地重复这种谣言。巴布石金的自传，这个**火星派工人**的十个年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有力地驳斥了自由主义者的谣言。先进的工人在革命前的**十年时间内**建成了**工人的**社会民主党。巴布石金就是这些先进工人中的一个。没有无产阶级群众中的**这些**先进者的忘我英勇的顽强劳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要说十年，就是十个月都存在不住。鉴于**这些**先进者的活动和他们的支持，到了 1905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成长为这样一个党：它在伟大的十月和十二月的日子里，和无

产阶级水乳交融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在第二届杜马，就是在第三届黑帮分子所控制的杜马里，它也保持了这种联系。

自由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力图将不久前死去的第一届杜马的主席摩洛姆扎夫变为民族英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错过这个表明人们轻视和憎恨沙皇政府的时机。沙皇政府连像摩洛姆扎夫这种温和而不得罪人的官僚，都要加以迫害。摩洛姆扎夫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官僚。他甚至不是民主主义者。他害怕群众的革命斗争。他不想依靠这个斗争来获得俄国的自由，而是想依靠沙皇专制政权的良心并同俄国人民的这个凶恶无情的敌人**妥协**来得到它。把这样的人看作俄国革命的民族英雄，未免太可笑了。

可是，这样的民族英雄是有的。这就是像巴布石金这样的人。这就是并非一年、两年，而是十年如一日地在革命中把自己完全献给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人。这些人决不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枉然无益的个人的恐怖行为上，而是在无产阶级群众中顽强地而又勇往直前地工作，尽力提高**他们**的认识、**他们**的组织、**他们**的革命独立性。当危机来临、革命爆发的时候，当千百万人行动起来的时候，这些人就起来领导武装的群众斗争，去反对沙皇专制政权。一切都要从沙皇专制政权手里夺回来，都要通过巴布石金这样的人所领导的**特殊的**群众斗争夺回来。俄罗斯人民没有这样的人，便会永远当奴隶，永远当农奴。俄罗斯人民正在和这样的人一起，为彻底摆脱一切剥削而战斗着。

1905 年的十二月起义，已经过去五周年了。我们将要庆祝这个纪念日，追悼那些在对敌斗争中牺牲的先进工人。我们要求工人同志们召开会议，把回忆当时的斗争的记录以及有关巴布石金和其他在 1905 年起义中牺牲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补充材料，寄给我们。我们打算出版一本有关这些工人的生平的宣传小册子。这本宣传小册子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种动摇分子和退缩分子，将是一个很

好的回答。这种宣传小册子对青年工人来说，也是一本良好的读物。他们可以按照它来学习：一个有觉悟的工人究竟应当怎样生活，怎样行动。

注释：

[1]连年坎普夫，帕维尔·卡尔洛维奇（1854—1918）—— 沙俄将军，扼杀革命运动的刽子手之一。1906 年指挥讨伐队，镇压西伯利亚的革命运动。1918 年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枪决。

巴布石金的回忆（上）

我写这本回忆录是这样引起的：我有过一个亲密的朋友，也就是说，有过一个像俄罗斯俗语所说道那样，亲密得知心知意的朋友，甚至比这还要亲，两个人简直合一颗心——至少我个人感到这个友谊是这样的。这个朋友把他回忆自己从一个最平凡的、“只能充个数的”、缺乏严格观点和信念的青年变成一个满怀着能够破除一切旧偏见的深刻的社会主义信念的社会主义者的全部经过，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他心里充满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后，就立刻感到自己有一种能够实现他的信念、影响他周围的同志、熟人和亲朋的力量。接着，他便谈到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地点、什么条件下发生的；什么地方有过什么样的人；他们怎样工作，他们怎样唤起沉睡未醒的思想意识；而这些思想意识的运动又是如何逐渐发展、逐渐扩大、逐渐深刻，乃至最后变成工人的日益增长的自觉心。他和我谈的时候，总是说：“我现在所得，只是我个人对我自己过去到过的那些地方的观察。这些观察不是包罗万象的，也不是完全的，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到过很多地方，也没有在很多地方住过。”因此，我再重复说一遍，这就是说，我是在转述我的朋友的回忆，而且像俗语所说的那样，还是从头说起的。我出身是个农民，14 岁以前，一直住在四面都是树林子的一个村庄里，离开大城市老远老远的；到

15 岁，我才生平第一次看见一座真正地道的城市，接着看到了第二座，第三座，最后见到了首都，另外就是我曾定居过的那座城市，尽管如此，但是我的老家庄子里的生活，庄稼人过的日子，我是完全不了解到，忘记了，显然是终生不会过问的了。命运从来也没有让我有时间回到乡下去，去耕种那块在法律上是我主人的份地。但是城市里的生活，首都的生活，工厂的生活，工长和工人的生活，就不同了，这是我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我所了解的，熟悉的和亲切的。一个工人的家庭，这就是我的家庭，我是能够十分了解和感知的。这种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引起我的奇怪，都不会引起我的不快，也不会让我感到惊讶。“一切本来就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而且将来也还是这样的！”当我还没有过到真正的人的生活，而是混日子的时候；当我还没有思考日常生活问题，而是单靠微薄的工资过活，脑子里还稍微有些宗教偏见，但已迷迷糊糊的想发财过好日子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

有这么一座小城，它占地两平方公里，四面环水，一面岸上筑着许多兵营，另一面岸上是官家的造船厂和拥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工厂的港坞。这座城市中间的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关切地拥抱着许多官家的仓库，无论你走到哪儿，到处都是官家的、军事的、部队的东西。这座城市，就是喀琅斯塔得。正是在这里，在这个喀琅斯塔得，我 15 岁那年，第一次进入喀琅斯塔得港的鱼雷工厂做工了。在三年中间，我一直是每天挣二十戈比，或者说，每月挣四卢布四十戈比到五卢布。我得靠这点钱来养活我自己，因为我从哪里也不能得到帮助。我在这个工厂里一共做了将近三年的工，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张秘密传单或是一本秘密小册子。真的，显然工厂里其余的工人，也都没有见到过任何类似的东西。但是议论倒是什么样的都有，尤其常常发生在某一间屋子里。

大伙什么话都谈，居然还谈到“政治犯”。我很难去表达这些谈话有趣到什么程度，也很难理解这些谈话的意思，尽管别人谈得十分亲切，毫不害怕什么特务、

奸细和一般的告密勾当。这里没有反对现行制度的犯罪言行，有的只不过是一些模糊的回忆和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这些消息常常被人歪曲地理解，被人传说得仿佛是一些有点异乎寻常的、需要严守秘密的、犯法的、很危险的，因而也是很有趣的和非常吸引人的事情。

这时候，听众的脑子里紧张到了极点，四周笼罩着一片迥非寻常的寂静气氛，只有旋转着的传动装置的枯燥无味的喧嚣声和在皮带轮上滑动的皮带的特殊响声，才划破这种寂静气氛，同时从微启的门外几百个正在干活的人和运转着的旋床那里也传来了震耳欲聋的闹声。老天爷，您千万别让宪兵或者像宪兵之类的什么人出人意外地跑到这里来。可以预料到，那时候，这些无辜的听众一定会万分惊恐和慌张。只要管理处某个人悄悄地冷不防的来到这里就够了，很多人都会急得满头是汗——神经紧张状态竟会达到这样的程度。谈话的人讲得自己都魅惑了。他活龙活现地讲述某个阴谋、某件收买勾当、某桩谋杀案子，而且还提到某个在城外受了绞刑的死囚的名字。我现在已经记不起当时谈到的那些姓名和人了；但是印象一直还是很强烈的。同时至今还不明白：那些人到底是为了什么被处死，而他们又干了一些什么事？在谈话的时候，比较懂得事理和脑筋聪明一些的人都会明白，他们（被处死的）准是阅读了或者秘密阅读了些什么东西，阅读了犯法的东西；并且知道他们都不是蠢汉，而是为了袒护工人，但是有些工人却认为，这种袒护工人的行为，正是罪犯们特别狡猾的地方。我记得当时还谈到过一个被带去行刑的军官的情况，谈到他在临刑前的态度等等。我还记得有关一个在这个工厂里做过工的钳工的故事。这个钳工每逢星期天经常到市外城墙上去阅读什么违禁报纸。后来，他被人严密地监视了，种种形迹可疑的人也常到工厂里来了：一个人穿神甫的服装，另一个人是什么官吏，第三个人是乡下人打扮，等等诸如此类的人。他们全都来瞧瞧这个钳工。这个钳工也被这些人猜透了，他们的监视，结果弄得他神经错乱了。

我在十八岁前的生活和工作，大抵上就是这样。到了十八岁，按照当地的规矩，我被人当作成年人看待了，不算徒工，而是工匠了。显然，这是遗留下来的一种手工业行会的规矩。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完完全全的大人，而且不久就担负起独立的、相当复杂的工作了。这种情况并没有使我感到高兴，原因是他们看待我，还是像过去的学徒一样，付给我的工资，少得可怜。我开始打主意，设法到别的地方去干活，但是没有人撑腰，要办到这件事，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因此我只好暂时仍旧在老地方做工。最后，我的愿望好像快要实现了，而且我已经准备动身上彼得堡的巴尔契斯克工厂去了。但是，我尽管得到别人的许多诺言，而事情进展得仍旧很慢，我的几次请客还没有产生出我所期望的那种效果。正是在这时候，我碰到了一件有趣的事，认识了一个彼得堡的工人，这人就住在我已经住了二年多的房子里。由于细心观察了这个彼得堡的工人，我才明白彼得堡的工人都是些好样的。他们尽管酗酒，但是干活却是没天没夜的干，他们每月都能挣到百八十个卢布的工资。对我说来，每月挣到十八个卢布，就已经是应该努力追求的理想了。

看来，我使这个彼得堡人对我产生好感了，接着我们结交了一种特殊的友谊。这个友谊在我身上长久地留下了一个彼得堡的无神论者、一个社会主义者工人给我的好印象。老实说，他本人也还是个没有觉悟的人，不可能给我什么启发，但是他能够把他自己对厂里的资本家和一帮渺小的寄生虫的部分本能上的憎恨和反抗感染给我。他几乎整日整夜地干了一个星期的活，到了周末，完全累垮了，星期六稍微喝了一点酒就醉了。那时，我带着他跑到离开人群很远的什么地方去。在那里，这个做工做得精疲力尽的、被伏特加酒烧得感情冲动的老人，开始慢慢地向我袒露真情，倾吐充满在他心里的憎恨。“瓦尼亚！”他向我说，“你能弄到我们老板用来烂坏金属的那种毒液吗？”

“你要这东西干吗呀？”

“听着：我在乡下有老婆，有孩子，还有房子，因此我想带着这种毒液回到乡下去，打算先毒死所有的畜生：神甫和村里的富农，然后再和老婆孩子去安排别的事情。我告诉你，神甫是最坏不过的人了。你要相信我，相信我这个醉汉，什么上帝都是没有的，全都是捏造出来蒙骗咱们弟兄的，大丈夫每走一步路，都必须当机立断，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杀尽村里的神甫和富农，不然，他们决不会让咱们弟兄安身活命。”

他常常向我说这类话。

“你想想看，”他接下去说：“咱们要这些吸血鬼（老爷们）干吗用啊？他们只会从咱们身上压榨剩下来的工资，坑害咱们，欺侮咱们，骑在咱们的头上。”

不用说，我的这位彼得堡人骂得最厉害的对象，当然是管理处的那帮狐群狗党。从这种谩骂中，我可以接受相当一部分对压迫者的痛恨的话。但是，他不能正确地发挥无神论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因此我就不可能有意识地去接受他的观点，同时也不可能感到像他那样深刻的仇恨。他对一切不公正的事情，真是恨之切骨，显然他是在用啤酒和伏特加酒浇愁泄恨……后来，我打听到，他不久就死了……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到彼得堡的一家工厂去做工了。我进厂就做包工的（补件的）活。我们一帮，共有十八个人。进厂后，我非办不可的第一桩事，就是敬敬我的同伴，也就是请请客。我当时身边分文不名，因而由我们班的全体伙伴担保，由工头借钱，买四桶伏特加酒、五尾青鱼、面包，外加几瓶啤酒。为了庆贺我进厂，同一帮的人全都到场了，除了自家人以外，别的帮会以及和我们这一帮的工作有联系的人，也来了五位。我们大伙聚在门外的院子里围成一个圈子，中间放着酒菜。当然，这里对于任何起码的享乐，都是不存丝毫奢望的。一个人喝伏特加酒，另一个人啃面包，第三人嚼青鱼。青鱼事先就已切成块，现在已经人手一块了。工头手里端着一杯斟满酒的杯子，按照礼节祝贺我的进厂，用这来揭开酒宴的序幕。五到十分钟以后，我们分手了。走出院子，我就感到自己已经

完全被公认是这个我刚花了两个半卢布请了客的帮会里的一员了。虽然这种陋规，是很讨厌的，但是就是现在我也不能对它心怀特殊的恶感。人们在这些请客会上常常不知怎的觉得自己和别人亲密起来。这时候，他们心里都想谈谈自家的事，叙叙重要的问题。在这些请客会上，人们常常教训各班工头，责备他们的饶舌和无端指责。这种教训的痕迹，有时候，过了一两个礼拜，还能从工头的眼神里看出来。当然，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工头们为了珍惜自己的体面，根本不去参加这种请客会。

总之，我就在彼得堡的塞棉尼可夫工厂里做工了，在帮会里做“计件的”活计。工资不是根据个别的人来计算的，而是根据参加这个帮会的全体伙伴来计算的。在这种帮会里做工，非得精明强干、胆大而又能维护自己不可，否则，就要受到别人的欺侮，或者像别人所说的那样，被人从帮会里撵出去，这种情况是十分令人伤心的，因为在帮会里干活，干一个卢布的活，可以拿到五十到六十个戈比，要是不在帮的话，连什么都拿不到了。

我在喀琅斯塔得做工的时候，觉得工作丝毫也没有使我困累过，也很少有过因为干活而感到疲倦的时候；天天做工，人也不觉得烦恼，身体也没有糟得这么快。那时做的，根本就不是这种包干的和计件的活。人一做上这种计件的活，就毫不怜惜自己，完全忘掉了自己的健康，毫不展望一下自己这一生的前途，从来也不考虑到工作会影响他的寿命。

不！他不断地把工作推向前去，汗像雹子似的从他身上倘下来，而没有擦净的汗珠沉重地落到他的活计上，引起他的不满和恶骂，紧跟着用袖口往额角上猛地抹上一把，接着又是工作，急急的、匆忙的工作。这一切都是为了想多挣一个戈比的工资。

要是待在人人都互相监视的帮会里的话，情况就还要坏。最糟糕的情况是，几个人同时干一样的活。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尽力地加油干。工人干

上这样的活，等于是卖命。[1]通常总是会有一两个高明的工人，把活计做得赶过其余的人，而其余的人则拼命加油干，竭力不让自己落在后面，甚至心里自然而然地害怕起来，唯恐白白地放过他几分钟时间，让别人在工作中赶过自己。

我也碰上干这样的活，尽管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被人欺侮的人，但是别人的保护也永远是需要的。在我旁边干活的一个同伴，总是维护我。这是一个上了年岁的、有家室之累的人。不过，他脾气很大，而且不幸他是个文盲。【此处原译文“幸好他是个文盲。”错译。——文库】

我和他处得很好。他常常向我说些从前遇过的各种风潮，还谈到过去有些医生和大学生在霍乱流行的时候怎么坑害老百姓，以及老百姓怎么把他们从尼古拉桥上抛到涅瓦河里去。至今，我一想起他，总是对他当时的这些观点感到十分奇怪。他牢记着民意党人在厂内散发的一本小册子，还记得人们在拷问室里阅读这本小册子的情况。虽然他是个不识字的人，但是他完全同情那些散发这类书籍的人。有时候，他还神秘地附着我的耳朵，向我叙述沙皇被刺的事。他说，据别人说，刺害沙皇是有目的的，只是老百姓不懂得这点而已。没有沙皇，日子会过得比现在好。不用说，他是十分憎恨吸血鬼和形形色色的大人物的。同时，他还把这种仇恨心感染到我的身上，把它烧得越来越厉害。在厂里干活，第一年使我感到很满意，尽管可以说，我不是在过日子，而只是一味地干活。白天干，晚上干，夜里干，有时两天也不回家，虽然家离厂二十分钟就可以走到。我记得，有一个时期，为了做急件的活，一连干了六十个小时，只有吃饭才休息一会。这会弄出什么结果来呢？只要谈一谈下面的情况就明白了。我有时候从厂里出来回家，半道上就打起瞌睡来，瞌睡得碰到电灯杆子上。睁开眼睛，再走，接着又打起瞌睡来，朦胧中好像自己在涅瓦河上划船，忽然船头撞着岸边了，但现实生活立刻证明，这不是什么真的河岸，而是桥边上的粗栏杆。这么做工，既看不到外面的任何情况，脑子里也不想什么，只是一个劲地盼望着赶快过个什么节日，而到节日

那天，又睡到中午十二点钟，甚至下午一点钟；还是看不到什么，什么也不能知道，什么也听不到；第二天还是做工，做那个累人的、连续不断的、要人性命的工，既没有丝毫人生乐趣，也没有丝毫休息。

这到底是为了谁呢？为了资本家！为了让自己变成傻瓜！只有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才会感到快乐，于是也就不可能感到可怕的压迫和惨无人道的行径了。

总之，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凄惨地、忧郁地过着日子。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什么话，但是不明白它，同时也不会分析它。

写到这里，我要结束对我在变成社会主义者以前的那段生活的描写了。那时候，我是一个缺乏严格观点和信念的、只能充个数的平凡人。

有一天，也像过去数不清的那些日子一样，转动机在单调无味地旋动，皮带在皮带轮上滑动，车间里到处都在热火朝天地工作，工人在加紧地劳动，领班也在手忙脚乱地奔跑，一会在车间的这个角落出现，一会又在另一个角落露面，而且还可以看到许多各式各样的好吃懒做的上司也在无谓地忙碌着。这一天，我站在虎头钳箱旁边，全身伏在 18 英寸的锉机上，继续修理机车偏心轮的鸡心卡头。另外还有两个钳工也在修理鸡心卡头。我们在拼命用劲，把衬衣袖口卷到胳膊肘上，而且脱掉了工服和坎肩。浑身冒汗，汗珠涔涔地落在工作台上和地板上，但是谁都没有理会我们。我们这么勤勤恳恳地干活，从来也没有人来夸奖，或是责备，也从来没有人叫我们放下这些做厌了的、劳累的活计，去稍微休息一会。

这一天，工作快完的时候，许多人都东张西望的，看看有没有停工的动静，因为每到星期六，大家照例在厂里拉放工汽笛前十至十五分钟就不干活了。

“任凭你怎么卖劲，活反正是干不完的！”别的帮里的一个钳工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说，他也是一个像我一样的青年人。我抬起头来，伸伸懒腰，习惯地瞅瞅四周，想看看有没有从哪儿蹿出个什么人来的丝毫危险；哪儿都没有这样的人，于是我就一面打量着他，一面回答说：

“我们在干井包的活[2]，因此我不愿意落在别人的后面。”

“明天礼拜天，你们的一帮怎么样？还干活吗？”柯斯嘉（我后来就这么称呼我的这个同志）有用意地问道。显然，他早已发觉我是个愿意走上争取自由、平等和团结的光明大道的人。他有了这些想法以后，马上就有一股教育我的旺盛热力。

“不，明天我们谁都不干活，”我回答道。

“空下来，你在家干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事情要干，不过，不久，我们将要举办一次跳舞晚会，”我聊开了，心里也想叫他参加，去快活地消磨消磨时间。

“你家里有些什么书吗？”他问道。“你有时候看看什么书吗？”

我打心眼里感到惭愧，很久以来，什么书我都没有看，虽然我也有几十本书。但是，我不懂得这些书，因此它们一直躺在我的小书架上，作为年青人房间里的一种体面的装饰。然而，我心里想，我的这些书里，说不定也有柯斯嘉喜欢的书。于是，我就向柯斯嘉提议，哪天晚上或星期天上我家去看看那些书。柯斯嘉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稍微沉默了一会以后，他向我提议要我和他更接近一些，而且要我明天午后上他家去。我对这个友谊感到很高兴。虽然当时，我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朋友，但是还没有像柯斯嘉这样对我的朋友。放工后，我们俩一起走。他常常暂时离开我，去同别人谈几句话，然后再回到我的跟前，最后他把他住的房子指给我看。我们高兴地分手了，我答应明天一定上他那里去。星期天，将近一点钟的时候，我上柯斯嘉那里去了，很容易地就找到了他住的房子。女房东客气地把他的屋子指给我看，我走了进去。屋子不大，是正方形的。除了主人以外，里面还有两个青年人：其中一个，我很熟悉，因为他是和柯斯嘉在同一个帮里干活的，另外一个，好像是他的兄弟。我坐下了。我们一对一地攀谈起来，接着谈话完全停下了。这时候，柯斯嘉从什么地方里拿出一张印刷纸张来，交给他的一

个朋友，要他看一下。这个朋友伸手接过去看着，而我们三个人则默默无言地坐着。我因为不知道这张纸上说些什么，所以没有特别注意柯斯嘉的朋友的阅读情况，也没有去注意这张纸头对这个读者起着什么影响。但是，柯斯嘉和他的另一个朋友却有些异样地注视着阅读的人。看来，他们的神情都很紧张。大家都默不吭声。最后，那个朋友看完了，把印刷纸头折好，交还给柯斯嘉。他这么做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我心想，这准是我不应该知道的私事。“怎么样？好吗？”柯斯嘉向那个仿佛感到很窘的朋友问道。

“行，很好，”那人回答道，接着就不吱声了。空气又肃静下来，好像有些难过似的。

“也许，你也想看着？那你就看一下吧，”柯斯嘉说着，就把那张纸头递给我。

我打开来看了。从开头几句话里，我就知道，这是一件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不平常事情。我看到的头几句话，在我心里激起了—种特殊的感情。思想不禁激动起来，我好容易才接着往底下看去。这张纸头说到神甫，讲到沙皇，也谈到政府，都是用责骂的口气。这上面每一句话都打动了我。我相信，这都是正确的，同时应该像这张纸上所劝告的那样行动起来。这时我的脑子里幻想出一幅情景：我由于确切的行为被处死刑了，我的一生完了。然而，这时好像有一把铁锤对我当头擂了一下，顿时，什么天上的王国都化为乌有了，而且它们从来也不曾有过。这一切完全是捏造出来，愚弄我们老百姓的。我立刻相信纸上说的一切，因而它越加强有力地影响了我。我好容易才把这张纸看完，感到这张纸在用汹涌的思想使我苦恼。心想，把这张纸立刻归还以后，纸上的详细内容就不会存在心里了。但是，纸上的思想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了。从此我就永远成了一个反政府的分子。这张纸是民意党人的。这是第一份秘密读物，我从它里面生平第一遭看到了反对政府的直言不讳的言论。我默默不语地将

纸头递还给柯斯嘉，并且立刻领会到他请我来的用意，同时下定决心应该为这个事业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我深信，柯斯嘉也是用像我一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业的，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已经是弟兄了。至于另外两个朋友怎么看待这件事和心里怎么想，我是无从知道的。我之所以没有讲话，因为他们也像我所做的那样，表现了他们由于这张纸头而引起的愉快和满意。过了一会，这两个朋友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们便谈起心来。显然，我已经取得了柯斯嘉的信任，因为我们的谈话主题是讨论问题：我们怎么才能再弄到这类文章和好的书籍，以便尽可能地增进自己的知识。柯斯嘉开始向我解说他很懂得的圣经，因为直到最近，他还是个虔诚的教徒，爱看宗教书籍。他竭力把神学解释为只是被现在的神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学说。然而，柯斯嘉没有说话的口才，不能把我远远地引到那方面去。接着，我和他一起到我的家里去。我们细看了我那儿的书籍。我力求在这些书籍中发现什么好书。但是，我过去的购书兴趣现在对我们两个人说来是颇成问题的。我们决定下星期日一同到市场上去找好书。不用说，我也再三地询问柯斯嘉，他是怎么弄到这些违法的纸头的。他说，有一天晚上，做完工，正要出厂，在另外一群工人中间，他被一个人喊住了，那人在厂门口塞给他一张纸，说："喂，回家什么事也别干，拿去，看看它！"的确，柯斯嘉看了，而且为了和那个人谈一谈，几乎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不久，我和那个把纸头塞给柯斯嘉的人相识了。当然，他知道我看过了那张纸，知道我对自己完全不明白的事业表示了革命的看法和革命的行动，知道我愿意学习，再学习，愿意按照给我的指示去行动，力求尽可能在一切便利的场合吸收恰当的人，而且进行宣传。

我本来就猜出我们工厂有一个人在领导这个事业，因为我曾经几次看见柯斯嘉同他谈话。有一次，在做工的时候，我和柯斯嘉两个人去找他了。我是被柯斯嘉当作一个可靠的同志来介绍的。我被介绍认识的那个人，身量很高，一个典型的男人，长着一双咄咄逼人的峻厉眼睛。他的目光一直刺到我的心里，我可真的

发慌了。我像犯了过失似地望了他两眼，随即就把眼皮垂一下了，感到好像有一样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我身上似的。间忽，我也胆壮地抬起眼睛偷偷地瞧瞧这个使我感到透不过气的人。这人的一撮又密又宽的淡黄颚髯，激起了我对他的特别敬意，但是一遇上他的目光，我又变得软弱无能了。这些都太奇怪了。以前，我看到这个人，或者从他身边经过，从不注意他，而且也没有感到什么不寻常。他那时在我的眼睛里是个极其平凡的人。但是，现在，当我自己想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却在自己面前看到一个有觉悟、有毅力、有胆量的人。这人现在想洞察我的心灵是否真挚，想弄清我的性格是否坚定，想知道我的愿望是否赤诚，——在他的凝视之下，我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恐怖感觉：以致我没有能够说出一句话。Φ给我的就是这样的印象。有一天，我走到他的机床跟前，打算从他那里听到一些特别有教益的话，然而第一次，他却用严厉的词句和问题把我吓唬走了。

“怎么？你在胡想些什么啊？”

“我想弄一本好书看看，”我喃喃地说。

“你要它干吗用啊？你看了一本好书，打算干什么？”

“情形很糟糕，”我说，“你瞧，别人都欺侮我们，不肯说真话，全都在骗人。”

“知道真话以后，你想干什么？”

当然，我没有吭声，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类问题是好。回到虎钳机床跟前以后，周密地思考起他向我提出的这些问题。不用说，我对Φ很不满意，他自己什么都没有说，却逼着我伤脑筋地去思考这些我应份不会知道、而且完全不懂的问题。但是，我对这一切的看法是，他们想考验我。我并且认为这些是对我的不信任，因此感到有点难过。但是我相信，我是会把这些问题完全弄清楚的，而且一定会弄懂它们。我和柯斯嘉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我们随时随地地都在一起，经常讨论各种问题。很快，我们也有了秘密书籍，大部分都是民意党人写的。我们对于这些书简直入了迷，竭力想办法小心地把它们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看见。

这时，我们的交友圈子也逐渐扩大了，逢到礼拜天，不是我们去看别人，就是别人到我们这儿来。生活情况发生了大变化，家里也好，厂里也好，周围的环境都起了显著的变化，但是我们对这点没有十分注意，仍旧一心一意地干新的工作。用不着说，我们只要发现对方和我们谈得投机，马上就想办法弄一本什么秘密书籍给他看。但是，我们在结交新朋友方面非常谨慎。首先，我们对于那些喜欢三天两头喝两杯的人、平素生活不检点的人，以及和厂里的领导牵亲带故的人，都尽量避开，不和他们来往。既然我们自己非常年青，因此我们也最喜欢和青年人接近。工作上的一两次的失败，已经使我再也不敢接近有家眷的人、中年人，或者中年以上的人了。因此，选择对象的范围，显得十分狭窄。我时常听到工人们谈起革命家们的旧事，谈到他们被捕和被关进什么石牢等等的情形。然而听得最多的是：很多人被捕以后，就永远不再回来，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有时候，我们和一些盲目相信自己的谈话的工人们争辩，但是我们也不是常常在这种争辩中占上风的。毫无疑问，这类谈话之所以形成，是有一部分根据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过去住在工人中间的知识分子常常被抓走，后来再也看不到他们，而且得不到关于他们的丝毫信息。因而，一些无知的工人就异想天开地捏造出各种各样的荒诞无稽的故事。这些故事慢慢地流传开来，同时由别人任意地添上形形色色的恐怖情节。这种恐怖情节过去和现在一直成了吓唬所有多少有些迷信、还不了解工人运动的、见识不广的人的工具。我和我的朋友竭力不同散播这种幻想的人去谈话，去争辩。但是却特别乐意听这样的谈话：塞棉尼可夫工厂过去如何发生风潮，以及从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里到处都有人偷看秘密书籍的情况。由于时常看到各种秘密书籍、接近具有革命信念的人、和

同志们谈论革命的问题、制定各种改变整个生活制度的计划，使我们这两个在严格的辩论中经不住考验的人，生活经常过得非常激动。我们过去认为极其寻常的、还没有发觉到的这种生活，给我们的印象越来越新鲜。

这时候，我们对于加班加点的工作，从心里感到憎恨。傍晚，我们从楼底下走过车间的时候，总是恶狠狠地瞅瞅挂在墙上的亮着的电灯，玻璃上写着一排字："今天小夜班，晚上七点到十点半"，或者"今天大夜班，晚上七点半到深夜二点半"。这两排字天天来回替换，也就是说，今天小夜班，明天大夜班。因此，我们每月都得工作三十天到四十五天，因而塞棉尼可夫工厂里有一些工人常常十分恶刻地说："你我这个月过的日子比上帝过的还要多"，的确，该死的小夜班和大夜班有时候一个月叫我们多过二十天。

这些夜班到底剥夺了每个人的多少健康，是很难想象的。然而，他们把事情安排得十分狡猾，以致每个人在领工资的时候，总是确认，如果他们少做大夜班或者小夜班的话，就要比从不放过一次加班活的人挣得少。结算的情况是这样的：全帮的工资总额按照天数来分，而余下的钱是按照工资的百分比来分的。最好是做不太紧急的活计，那时做完当天的活，就可以如愿以偿地回家，要是碰到做急件，领班就要强迫全帮干活，那时工厂里的放工汽笛的响声，就变成了恶刻的讽刺，好像是开玩笑。这种笛鸣只是说：今天夜里，你还要留下来干几小时活，别人已经关切地从那计工板上摘下你的工号牌，交到领班的办公室里去了，而没有工号牌是决不让你出厂的。你要是到领班那里请求的话，多半是徒劳的，结果不是和领班吵架，就是被解雇。这类事件，天天都会发生。工人们任意恶骂，诅咒工作，但是仍然得干夜班。我和柯斯嘉过去经常在夜里工作，丝毫不觉得特别累，不知道这种工作会损害我们的健康，一直到读了秘密书籍为止。现在，夜班工作却使我们感到相当的疲倦，因而我们开始利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逃避它。我们还鼓动老师出来反对做夜班，说明做夜班的害处。

我和柯斯嘉虽然在工厂里做工，但是丝毫也不明白工人的生活情况。我个人不论在生活起居方面或者在经济方面都过得相当好。同志中间，有一个年青小伙子，过去在工厂里做过工，他的一举一动都和工厂里的工人一样。他对我们谈过一席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很想去看看，实地了解一下我们还不知道的这种生活。我们决定去找工厂里的同志，这样，不仅可以上他们那里去，而且还可以对工人宣传。我们逐渐了解了工厂和工厂的生活，认清了工厂里的现存制度，以及其他等等。

有一次，一个同志谈起工厂生活的时候，想起一个厂主为他的工人建造的一所新房子。据说，这所房子在工人的工厂生活中很特别。然而，我们很难想象出这是一座什么模样的房子。也不知道它是一座设备特殊的房子呢，还是一座工厂气味浓厚、好坏杂处、快乐与丑恶混淆的大工房？更不知道它是否是一座有些恐怖的房子。

因此，我和柯斯嘉决定礼拜天上那儿去一次，仔细地瞧瞧这所房子，看看那儿的居民等等，但是想起外面人很难走进这座工厂宿舍，于是我们决定冒充一下这个厂里的工人。星期六晚上，我到亚历山大市场去，买了一件带腰带的红斜纹布的普通外衫和一顶合适的鸭舌帽。星期天，我装扮成这个厂的青年小伙子的模样，怪不好意思地偷偷走出屋子，去找柯斯嘉了。因为害怕别人注意我们的衣衫，从那里，我们也是非常狼狈地出来，顺着斯里塞布尔格大道往马克斯维尔工厂走去。过半小时，就到达那儿了。

在离大路约莫四十俄丈远的地方，出现一座巨大的钢筋水泥的建筑，它的外表还非常的新。“大概，这就是，”——我和柯斯嘉认定了，接着就沿着一条稍稍狭窄的巷子和铺筑好的轨道向这座诱人的房子走去。我们走进院子以后，就看到一批一批的男女工人。男人，大多是青年人，他们一堆一堆地站着，看来他们是在指手划脚地讨论着什么问题。姑娘们东一处、西一处地坐着，同其余的人离得

远远的，有的到处和小伙子们瞎闹，常常嚷叫着奔到一边，一会工夫又回到原来的人群里去。这一大批青年男女，活像生活在某个省份里的一座大村庄内。姑娘们的五颜六色的衣服，刺人眼目，它们同城市妇女的服装不一样，尤其和首都妇女的衣服不同；年青的小伙子们，有的穿着酒瓶子似的长皮靴，有的拿着手风琴，有的穿着短到小腿肚子的裤子；许多人穿着特别肥大的衣服，有的穿粗布的条杖裤衩，有的穿着红斜纹布或者印花布的短衬衣，用一条不甚美妙的带子束着，脚上套着露出光脚面的破鞋。他们丝毫没有因为穿这些衣服而感到害臊，也没有人羞辱他们中间的任何人。这些衣服的简陋，给我的印象很不愉快，虽然这是一幅我相当熟悉的图画，很像过去在喀琅斯塔得做工的斯摩棱斯克来的粗木工。

我们决定先去看看这所房子的内部情况，然后再到院子里走走，同这些工人们聊聊。这所房子的正中央有一扇大门，一直通到里面，时刻都有人出进，因此我们就走进去了。一座又大又宽的楼梯告诉我们，这所房子能住很多人，墙上涂着普通的白粉，还很干净，结实的铁栏杆使人相信，这所房子是紧严而又牢固的。我们登上一座楼梯，走进过道。一股臭恶的、窒息人的气味像把斧头似的对准我们的脑袋捶了一下，整个过道上都充塞着从不卫生的厕所里传来的臭气。我们不走这层楼的过道了，又上了一层。这里的空气稍为新鲜些，但是也同样有那种讨厌的、窒息人的臭味。我们在这个过道上走了一段，就回头再往上一层楼去了。这里的情况也不美妙，但是我们决定仔细好好看一下，我们沿着过道走进厕所，从那里望望风色，然后鼓足勇气，推开一间小屋的门，往里面张望。显然，我们的行动没有引起别人的奇怪，也没有人问我们找谁。

我们推开一间小屋的房间，里面什么人也没有。我们安然地走了进去，随手关上房门。这间屋子的全部陈设，都摆在我们的眼前了。左右两面墙，每一面墙的旁边都放着两张床。这两张床几乎把整个屋子的长度都占住了，没有丝毫间隙，好像屋子的长度是按两张床的尺寸来量好的，两张床中间的窗户跟前，放着一张

小桌子和一把怪模怪样的小木椅子。这间屋子的整个情况全在这里了。每张床上睡两个人，也就是说，一间屋子住八个单身汉。他们住这个工房，每个月得付……说得正确些，每月得从他们的工资里扣一个半卢布到两个卢布。这等于说，这样的屋子，每月的租金是十四到十六个卢布，而每个工人每月挣的工资，不过在八个卢布和十二到十五个卢布之间。但是厂老板还骄傲地认为，他对待工人是乐善好施的，在雇用他们做工的时候讲定，只要这所房子没有拥挤到水泄不通，都要叫他们住在里面。

我们走出这间工房，又去看了好几间。所有的工房都是大同小异的，给我们的印象很坏。我们心里还想去看看替有家眷的人盖的公共厨房、洗衣房和住屋。有一间屋子，里面的陈设很简陋，只放着一床用数不清的五颜六色的碎布拼缝起来的被单，盖在一张挂着帐子的床铺上。帐子的用处有两个：一方面，它能用来遮穷，另一方面，它又能满足一下做人的起码的羞耻心，因为旁边也是这么一张床和这样的家庭生活。这一切都是很可怕的，它把我这个过着较好生活、具有种种要求的工厂工人压得连气都透不过来。

我们往外面走去。在宽大的楼梯上，我们站下来仔细地望了望救火的器械。但是，这些水龙带、粉管、铅制器具，都不能使我们感到好感和信任；这些亮晶晶的铜制的水龙头和螺钉帽，既不能抹去那些光光的、龌龊的、密集的床铺给人的印象，也不能消除人们在上面抹死无数臭虫的墙壁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后面，过道上有人在大声呻吟，那里还不绝地传来一阵一阵令人厌恶的空气，以致我们心里越来越强烈地痛恨那些压迫人的人，憎恨使人没法弄清不想活下去的原因的愚昧现象。

唉！应当尽可能多地把知识输送到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来。

只有臆想到下面的情况，心里才感到轻快些：这所房子里也许已经有人在对工人做工作了，说不定，聚集在院子里的人中就有有觉悟的工人，他们的人数会

一天比一天地增多起来。柯斯嘉居然还出声地计算着有觉悟的工人累加的数目。然而，这样的计算，是决不能相信的。这种计算有时候会使人十分失望，因为过于乐观了，反倒会悲观。这是顺便谈谈的。

我们走到院子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然后走到一大堆工人跟前。原来，这里在玩掷钱的赌博，几乎所有站在这儿的人都狂热地参加在里面。这些人的脸部都非常紧张，同时还破口恶骂着，以致使我们感到，马上就要大打出手，闹出人命案子来了。我们转到另外一堆人的跟前。这儿在玩扑克牌的赌博，也是骂声响天。这堆青年男女决不会让我们挤到他们中间去，因为这非得具有接近乡下美女和谈话讨她们欢喜的本领不可。不速之客如果这么做的话，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我们只好远远地瞅着他们在大院子的草坪上溜溜。我们看了看地窖和储藏室，还看了一些不太使人感兴趣的东西，接着我们就走出这个特别的工厂宿舍。我们对于我们亲眼见到的事情的印象很坏，而且对于那些在乡下待过、现在住在这里显然很感幸福的人的印象也是坏透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意识地了解工人生活。这种恶劣印象，长时期地印在我们的心里。后来，在另一个地方，那里的工人生活真使我气愤极了，以致我简直无法明白，一个人怎么会忍得住过这样的生活，怎么会只需要这么低的要求，而且对这种穷得可怜的半饥半饿的生活还十分知足。要晓得，就是一堵必须加以推倒的墙，当它刚刚有些倾塌的时候，也不是几推就能把它推倒。我们对于所见到的东西的印象是十分强烈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对它袖手旁观，相反的，是更加努力地去进行深造自己的工作，更加希望赶快地去抵制这种可怕的剥削手段，去扑灭这种对人民的蹂躏和愚弄，同时埋头磨练我们的斗争武器。这就是说，读书和提高自己的觉悟。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没有别人的帮助，我们自己决不可能这么快就弄清许多问题。我们的知识十分肤浅，我们在宣传的时候经常发生争论。我们的对话人提出的多少有些机灵的问题，常常把我们弄得走投无路，尽管我们确信我们的话是

公正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自己是失败了。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和柯斯嘉对某个经济问题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这是一个关于计件工作的问题。我们向别人宣传的时候，总是向对方提出一个预先想好的问题：现在对工人来说，勤俭好呢，还是偷懒好？回答的结果，总是勤俭的好。于是，我们就向他说，要是干活卖劲的话，就可能产生两个后果：第一、会很快地降低工资；第二、一个工人干两个工人的活，会使大部分工人得不到工作做，反过来又会影响工资，使工资急剧降低，等等。但是，要是慢慢磨洋工的话，情况就不同了。那时候，工资会很快地涨起来，至少不会往下落。同时，因为工作完成得慢，又会增加工人的名额。这样，失业的人就会减少，工资也会上涨。看来，我们好像讲得很有道理，但是别人都不乐意赞同我们的这种说法，尽管他们找不出反驳我们的论据。而我们自己呢？虽然觉得自己是个胜利者，其实心里也想不通，懒汉既然比勤俭的人对社会更有用处，那他们怎么没有出头过好日子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常常发生。我们去请教Φ来替我们解释。Φ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很浓厚，但又没有机会和时间同我们谈话，便把我们托给他的一个朋友。这人就住在我们的附近。

我们的这个新的领导，是个很不笨的人。他给我们的印象很好。显然，我们只要一有空，就去请教他。除此以外，他的家庭生活，也像块磁铁似地吸引我们去找他。一间单间的屋子，里面的环境，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使我们感到十分舒适。它给我们绘了一幅我们未来的起居的图案。在我们这个新相识的家里，我们经常感到满意的是，第一，可以常常得到书籍；第二，可以得到他要我们谨慎小心的劝告。我们知道，他在组织内部担任会计职务，而且做我们和城里的组织之间的联络员，并且知道他认识很多知识分子，而又熟悉各方面的情况，因此我们从他这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听到许多卓越的思想和他对我们感到十分不安的问题的意见。真的，他最初给了我们两个人非常好的影响。他特别教导我们，要在对人的关系方面细心谨慎。每当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都要询问我们，问

我们来时是否留神，后面有没有狗腿子跟着。也许，他是为了害怕自己受连累。他在他的妻子的影响之下，经常向我们反复叙述有关特务、搜查和盯梢的事。这些对我们都很有用处。我们学会严格观察自己身后的情况，尽管实际上没有人跟踪我们。我们在工厂里的行动开始谨慎起来，逐渐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别人居然还把红卐会的报告给我们看，此外，还送给我许多好书，还有各种已出版的禁书。

一部分冬天和整个春天就这么过去了，夏天已经来了。又将入秋了，随着秋天的来临，大家盼望已久的星期日学校也将要开学。有关这所学校的事，我们已经听到过很多的话。有人对我们说，这所学校有很多好处：在这所学校里，可以很好地物色人，主要是能得到知识；这所学校的全体女教师，都是义务教书，目的只是为了让老百姓得到知识；她们准备为老百姓忍受政府的一切迫害。柯斯嘉和我心里都很明白，这些女教师是些什么样的人，因此我们迫切地盼望这所学校早日开学。我们竭力劝别人也去报名上学，但是大多数人都回答说，要做小夜班和大夜班，不能上学。这倒是实话。特别阻挠人们无法上学的，是换班的工作。但是，我们至少劝动十五个人报名上星期日学校去念书。关于这所学校的事，我打算留到后面来谈它，现在我想回头重新谈谈我最初了解地下工作的经过情形。

起初使我感到害怕的Φ，当然不会撇下我们不管。他竭力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适当时机来影响我们，给我们解说我们所不懂得的问题。他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拿他当家长看待，特别敬重他。我记得，有一次，为了阅读第一份地下传单，我和柯斯嘉上Φ家里去了。这是一所黑黝黝的房子，好像有两间屋子，租金十分昂贵，屋内的光景简陋得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记得，我为了上那里去，穿得相当讲究。穿着浆领的衬衣，等等。然而，屋子也好，屋子里的住户也好，都好像在仇视我的衣服似的，因此我觉得很窘，好像犯了什么过错似的，一面暗暗地诅咒自己的浆领衬衣。我拿定主意，下次穿得朴实些，而且已经考虑到完全

抛掉这种浮华的装束，尽管后来我又改变了这个主意。在这间屋子里，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我们称他为П·И。他给我们留下的，永远是最好的回忆。他是我所了解的人中间的第一个人。他抱着一个特殊的目的和工人接近，让他们得到知识，懂得生活。为此，他受到了种种的困苦。

很难说明，我和柯斯嘉对这种人的尊敬程度。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我们这些文化很低的人对其他阶层的人如此大公无私地让我们获得知识这类行动，是不可能不感到奇怪的。在同别的知识分子或者同女教师十分接近以后，我们心里还是久久地怀着这种感情。要是失掉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会万分难过。为了他们，我们甘愿去赴汤蹈火，甘愿去忍受一切痛苦。当然，和知识分子们常常见面，也会逐渐对他们失掉了像对待特殊人物那样的特殊感情。同时你又会感到既失掉了最亲近的工人同志，又失掉了有学问的同志。但是，同知识分子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交往以后，结果，那种在初次会面中结成的特殊感情便会渐渐冲淡，而变成平常的真诚的感情了。我和柯斯嘉在Φ家里和П·И初次会面的那个晚上，一直贪婪地倾听别人谈话；我们迫切地希望干一件什么特别的事情，然而我们什么也不懂，只是抱歉地望着别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除了我们以外，还有三个人，再加上屋主Φ。我记得，还有一个人也在场。哪知道，这人后来竟当了奸细。这人就是柯兹洛夫。我和柯斯嘉特别信赖他，这个情况只是在我们最初相识的一段时间。

我现在很难表明，我们当时的观点和民意党人意图之间的分歧，究竟尖锐到什么程度。然而，这些分歧是存在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上面提到那个知识分子给我们拿来了一份民意党人写的传单，交给Φ，同时问他，这份传单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是否合适？看上去，好像Φ否定了那份传单。我们也没有见到那份传单。后来，当我们问到那份传单的时候，他的答复是，传单丢了。我们没有参加过我们的人同民意党人进行的辩论，因此不知道双方在观点上有哪些分歧，

但是我们还是站在社会民主党方面，也许，这是受Φ、知识分子和我们的友人的影响。民意党人的传单不大在我们的地方出现了，而且我们也不大喜欢赞成民意党人的活动的人，最讨厌那个——我说后来当了狗腿子的柯兹洛夫。我们还特别厌恶一个民意党人，这人和我们同在一个车间里做工。他经常在谈话中谈他的谋刺沙皇的计划。但是，这些只是一种幻想和计划罢了。我们从来也没有看到我们的民意党人有过什么真正的行动。这类话，我们都听腻了。事情明摆着：要是他真有勇气去行刺沙皇，或者去杀害和沙皇相等的人，他就应该是个阴谋家，要不，也得是个秘密活动分子，他要是重视自己的计划，就会惦念着去执行它。因此，他应该对自己的活动讳莫如深。等到暗杀计划一旦成功，人们一定会像敬重英雄那样地去敬重他，不过他的理想决不可能对群众起大的影响，因为群众不可能了解他的这些理想。敬仰他的人，虽然很多，然而决不会拥护他。可是，这样的人，我还没有见过，不过，我却见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光喜欢空谈各种暗杀勾当，除此而外，什么都不会，甚至也不努力去宣传一下他们的思想。因此，很多纯洁的人等着要我们去宣传。当我们去寻找我们认为可靠的人，并给他一本禁书和一本合法的书，或者向他提出有关学校和学习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发觉，还没有人同他这么谈过话，还没有人影响过他。但是，我们认为，单凭我们的能力，要去说服一个比我们活在世上年岁多得多的人，是很不够的。

有一次，我在班上去找一个民意党人。这人把他的一个爆炸冬宫、谋刺沙皇的荒诞计划，告诉给我听。我虽然认为这个计划没有特殊意义，但是自己却老是嘀咕着这个问题，竭力想说服自己，由我们来执行这个计划。这个计划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它要求有一个幻想，而这个幻想又要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因此，计划本身完全是捏造的，但是我自己解释不了这个问题。我怀着这个情绪去找Φ，谈到了那个民意党人的计划。Φ听完后，冷冰冰地回答道，要是有人想谋刺沙皇的话，可以不必费这么大的心思，只要跑到涅瓦大街，租一幢上等房子，或者到旅

馆里去租一间屋子，等他路过的时候，开枪打他就行了。人能够开枪打得死麻雀，难道打沙皇就这么难吗？妙极了！这样的答复，可真把我窘死了，而Φ那张老是绷得板板的脸上的嘲笑太羞辱人了。我为我的这个思考那个荒诞计划的笨脑袋，感到万分的遗憾。受到Φ目光羞辱的我，回到家里，拿定主意，再也不同他谈这类问题了，并且对他很冷淡，自己埋头读书看报。我甚至常常头伏着书本，在椅子上睡着了。醒来，慌忙熄灯，不让大街上的警察在夜里看到我的屋子有亮光。

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地过去，我们常常几乎每天都做大夜班和小夜班，甚至星期天还干活，因此我们没有空余时间看书，即使间或碰到一点闲工夫，也白白地消磨过去了。虽然，我还在最好的年岁，但是我已经感到某种特别的疲倦和困乏。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大大地影响我的健康。Φ从来不做大夜班。我们了解到，他每天和领班吵架，结果总能顺利拿到自己的工牌回家去睡觉。这都是因为Φ是个资方缺他不行的工人，只要管理层威胁开除他，他立马要求算帐走人。【此处译文有校正——文库注】我和柯斯嘉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厂方第二天就能用新工人来替代我们。因此，我们只好一道待在车间里，甚至一个星期总要有两次在机床底下过夜，为了免得把时间浪费在路上。每个星期六的早晨或者晚上，我们总是在Φ的家里聚齐，上面提到的П·И也上那里去。他给我们诵读拉萨尔[4]论“第四阶级的思想”、论文化史、论阶级斗争等著作。我们因而很愉快地过了好几个星期天，慢慢地越加了解革命活动，和革命活动融合在一起了。我们在这里还认识了П·А·摩洛索夫[5]。他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工人中间最有学问的人。我们常常向往着自己几时也能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只有一件事不赞成他：他喜欢喝两杯，有时候还喝得酩酊大醉。我和柯斯嘉认为任何一个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都不应该喝酒，甚至对于抽烟，我们也加以谴责……同时，我们还严格地宣传这方面的品德。总而言之，我们要求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完人，自己也努力常常做别人的表率。我和柯斯嘉彼此间没有丝毫秘密。我们甚至想同住在一起，但是由

于我们都各自租着住屋，根据各种私下的打算，我们决定还是把两间屋都留着，以便将来建立两个学习小组。要是只建立一个小组，那就轮流在这两间屋子里进行学习。

我们这时候获悉，已经有人在注意Φ了，逐渐担心会失掉他。П·А·摩洛索夫为了防范万一，决定去寻找一所单幢的房子。他很快就利用上这幢房子了，然而这反而把情况弄糟了，因为这幢房子里住着好几个受到宪兵注目的人，其中也包括Φ……

在这幢房子里，Φ存着很多书籍，好像整个涅瓦关的书店似的，但是我们没法从这里得到最大的满足，懊恼自己没有一点看书的时间。真的，为了看鲍凯里[6]的一本书，我们至少得花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在这种只有一点有限的空间时间的情况下，我们看见书籍，情不自禁地从心里感到特别羡慕，然而看书还是看得很少，只好通过跑来看我们的 П·И 的谈话和短短的讨论来提高自己。当然，我们和从前是不同了。令人感到兴趣的是，摩洛索夫从家里进进出出地都带着书：他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自己的身上藏上十五本书，而且走过特务身边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危险[7]。在这间屋子里，我们认识了许多纺织工厂的工人。因此，我们的交友圈子慢慢地宽广起来，我们的眼界也扩大起来，但是就是感到时间不够。我们也知道，纺织工人干活的时间并不比我们少，然而他们挣的钱却比我们少得多。（在纺织工厂干活，是从早上五点钟到晚上八点钟。而我们连加班的工作时间在内，是从早上七点钟到晚上十点半，或者从早上七点钟到半夜两点半，然后再是早上七点钟到晚上十点半）。因此，我们的情况是相当被人眼红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更加热切地希望大家一样平等地干活。这个冬天就大概这么过去了。我和柯斯嘉什么特别事情都没有做，好像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过什么特殊事件似的，到处都非常宁静，工人们没有闹事，静静的。不过，要是哪个地方出事

的话，我们也不大知道。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认为少谈为妙，而工厂里也没有人发传单。我们所殷切盼望的夏天来了，然而它不像我们所盼望的那样。

夏初，也许还在春末，有一天，我们早晨上班的时候，发现Φ不在了，很吃惊，跑去找先前和Φ同住在一起的另一个同志，可是除了说Φ大概睡午觉，下午一定会来以外，从他那儿什么消息也打听不到。我和柯斯嘉预感到事情很严重。我们三番两次地下楼到Φ干活的车间去，但是全都白跑了。每一次，我们都是失望地回来，而且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这个人对我们的宝贵和重要，同时意识到如果我们的预感证实的话，对我们说来，这将是一个大损失。吃晚饭的时候到了。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赶到班上去等候消息，因为我们也害怕到Φ的家里去。忽然，一个同志垂头丧气地走来，他详细地把Φ遭到搜捕的情况告诉了我们。当然什么违法的东西都没有被搜到，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收藏得很好。不过，他们还是逮捕了他，把他押走了。他现在在哪儿？情况怎样？我们都怀着这些心思分开了。每个人的心里都很难过，每个人都担心自己会遭到不测。车间里在热火朝天地干着活，大伙都忙着赶快做完各人的活计。这是为啥呢？是为了赶快接别的活计。重新忙着干吗？是为了急如星火地加油干活吗？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仍然为的是：老板需要利润！因此，你得在老板把应付给你的微薄的工资扔给你以前，拼命地、头也不回地干活！这时候，我的眼前又浮起一幅宪兵警察到来的图景。

我们的 Φ 没有了，我们的家长和父亲没有了，同时又失去了他那深思的目光、严肃的面孔、他的钢铁般坚强的毅力、还有他那无畏的勇气。唉！失掉这样的人，是非常难过的，尤其对一个对这种损失还不习惯的人来说。后来，我很安然地看待逮人的事了，那样做，情况就不同了。但是，对现实妥协，毕竟是很难过的。

我和柯斯嘉现在开始考虑别人过去替我们决定的问题了。Φ的被捕使我们的青春倍增活力。但是，我们的好友却竭力向我泼冷水，他这样做是枉然的。我们

背地里称他为胆小鬼，算不上是个人，尽管我们还是继续不断地请教他给我们解释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在这方面满足了我们，不过反复叨唠，想叫我们暂时安静些。他说：不然，你们会落到监狱里，过早地把自己坑害掉。这番话对我们不起作用。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干自己的事。柯斯嘉这时候调到另外一个车间去了。别人呼他到那里去管理一批学徒。他现在有很多宣传工作可做了；情况要求我们设法去弄各种小册子。我们挨着书店去寻找，甚至到好多地方去询问两本违禁书籍，我们不知道它们是禁书。最后，我们终于慢慢地做出一份可以到处询问的书籍目录了。

我们虽然感到自己孤单无援，但是并没有灰心丧气。柯斯嘉顺利地在他的车间里替Π·А·摩洛索夫找到了工作。我们对这件事感到十分高兴，因为纺织厂过去不要他，还因为他从此就能生活安定，保障自己的经济状况。我们最高兴的原因是：他能在我们紧跟前领导我们，启发我们，让我们得到新知识。那时候，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推进自己的事业了。情况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必须着手启发年岁和我们相仿的青年，以及许多比我年青的人，同时揭发厂方施行的某些剥削行为。这时候，柯斯嘉在一个受我们影响、家庭负担很重的人那里租到了一间屋子。我总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去找柯斯嘉。每次碰到柯斯嘉，我总是再三询问他，这天他和摩洛索夫谈了些什么话，心里很想打听到一些有趣的事。但是，柯斯嘉说摩洛索夫现在只埋头工作，新的工作把他吸引住了。我们希望他赶快把自己安置好，那时候他就能和我们畅谈了。情况完全出人意外：有一天，宪兵队把他叫去了，随即把他逮起来，关进拘留所了。这件新的事件，完全把我们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我们几乎失掉了一切领导，因而我们的好朋友也越来越厉害地用各种话来吓唬我们。他要我们把存在他那里的书拿走。在我们没有把这些书拿光以前，他一看见我们，就反复地怨怪我们……

总之，这个夏天，我们作为两个成年人开始进行宣传工作，虽然我们感到自己做独立工作还没有充分的把握。果真，什么事也没有做成，我们被迫同情况妥协了。没有 Φ，没有知识分子 П.И，没有摩洛索夫，我们不由得常常感到自己的境况十分孤立。忽然，有一个人到涅瓦关来找我们了。这人早就熟悉各种革命活动，革命经验也很丰富，而且无条件地忠于事业。我们立刻感到了一股新的活力。同时，我们的处境也立刻好转了。无论哪个星期天，我们都不约人到自己家里来，自己也决不上别人那儿去。同派尔、玛克斯维尔、托尔东等纺织厂以及尼古拉铁路工厂的联络，已经安排就绪，会议开得很频繁。参加这些会议的，虽然纯粹是一些个别的人，但是大伙的目的和意图都是一致的，原因是运动高涨了（如果能够这么说的话）。

我们由于一心一意地埋头从事革命工作和交友的活动，连星期日学校几时开学，都没有去注意。大家迫切等待的开学日，终于到了。当然，我们大家都去报名进这个学校。这所学校既是一个健全的文化机构，也是一具从泥沙中筛取谷子的筛子，而且也是一架使两个东西互相撞击的机器。这里的社交圈子虽然不很广，不过也够复杂的了。这时候，我们已经在准备进行经常的小组学习。说不定，还有别的一些小组，但是我们不了解它们，同时也不打算去打听它们。彼得堡刚一入秋，各方面的知识分子都纷纷来了，跟着便掀起紧张的脑力劳动。我和柯斯嘉忙着做各种各样的紧张工作，因而干脆不回家。一个新朋友，我们称他叫 H（B·A·谢尔贡诺夫[8]——俄文版编者）的，是个工人，住在涅瓦关的后街。他和一批知识分子有联系。这批知识分子的外围，好像有很多工人，因而他们想在涅瓦关领导经常的小组学习。H 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我的屋子比较方便，做了学习场所，因为我那里没有外人。这个小组是六个人组成的，加上讲解员，一共是七个。于是，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便开始了。讲解员[9]向我们口述了这门科学，没有用笔记本。他常常设法启发我们站起来反驳或者争辩。那时候，他

总是鼓励我们，要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辩明自己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可见，我们的学习是十分生动有趣的，而且还会慢慢地把自己养成为演说家。这种学习方法是向学员说明问题的最好的手段。我们对这样的学习，感到非常满意，而且对我们的讲解员的智慧常常感叹不已。我们暗地里俏皮地说他的秃顶的原因，就是他过于聪明了。这种学习还教导我们去自修，去找寻参考资料。我们从讲解员的手里拿到了上面写着许多问题的纸头。这些问题要求我们留神了解和观察工厂里的生活情况。于是，我们在厂里干活的时候，时常假借各种借口到别的车间去，实则是通过观察的途径去收集必要的消息。有时候，得便，我们还交谈一番。我的工具箱经常塞满了各种纸头。吃饭的时候，我总是设法偷偷地抄录我们车间的工作日数和工资数。毫无疑问，缺乏空闲时间，是搜集各种消息的主要障碍。但是，事情还是有所进展的，虽然不像应该的那样完满而热烈。

学校中的学习，还是照常进行。女教师们的生动而又巧妙的言词，引起我们产生出一种对学校的特殊热忱，而我们的议论也是没有完的。女教师们采用的办法，我们很了解，而且惊叹她们有一种激发每个学生坦白说话的本领。这些学生中间有小市民，有工人，有农民。我们每来一次，就越加紧密地同学校和女教师接近。我们感到自己特别同情她们，彼此间都产生出某种亲近的、纯粹思想上接近的感情。大家一走进学校，就坐在课桌旁边，怀着某种特殊的感情等待女教师。她的到来会引起某种难于描摹的快乐。每一班里都有这种相同的情况。所有上学的学生都不能不钦佩和赞扬他们在学校耳闻目睹的一切事情。原因是，这所学校是如此深奥而巧妙地传播着知识。不仅如此，常常还有个别的人带朋友到学校里去看看女教师，听听课。我自己就曾经抱着这个目的到别的班里去过。

女教师还想在校外影响我们。为此，她们在我们中间指定了几个人，邀请我们星期天上她们家里去玩。我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于是星期天，五、六个人进城了，时间大约在下午一点或者两点光景，详细时间，我记不清了。在女教

师的家里，我们也是坐在课桌旁边，每个人的面前都放着一本笔记本，上面记着喜剧“纨绔子弟”[10]中的剧中人。她们向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用功地研究剧中人，就能当众公演这个喜剧。我不知道，其他的学生过去是否有过这种愿望。但是，我和柯斯嘉第二次去的时候，方才明白，研究这个喜剧的剧中人，乃是一种喜剧，因为我们很快就不再研究它们而转到饭堂里去了。那里，桌子上放着茶炊和吃食，喝茶时候谈的，根本不是“纨绔子弟”，而是沙俄政府的种种残酷行为。桌上出现了许多相片，照的都是各地闹饥荒、移民饿死等等的凄凉景象。她们好像在努力“鼓动”我们，其实，我和柯斯嘉早就是忠于这个事业的人了。因此，我们提议，不必教我们学习喜剧“纨绔子弟”，而把她们知道的全部东西都教给我们，同时用不着预备点心和茶，这些客套会使女教师们——一些很不富裕的人负担过重。我们这种访问很快就自动停止，宪兵们在注意我们了。但是，我们却永远牢记着这些次谈话。我应当说明的是，除了学校女教师家的学习和我家里的经常的小组学习以外，我们还同上面说的知识分子 П·И 学习。在每星期约定的日子，到时候，П·И 还是很准确地继续来看望我们。那时，我们在另外一间屋子结合了八、九个人。他给我们进行有关各种知识的讲演。我们仔细地阅读了拉萨尔的一部分著作，后来还阅读了凯南（Кеннан）的著作。凯南的著作给我们的印象很深。我们由于工作和学习都很忙，常常放下书本，就在屋子里睡了，尽管我们不是经常这样。我们十一点睡觉，早晨四点或五点半非起来上工不可，因为这时工厂已经开始强行吞噬无数的人了。

这时候，我们在求知方面非常紧张。对我们来说，每一分钟都十分宝贵。放工空闲下来的每一个小时，我们事先都加以安排好，而且每个星期都是这么严格分配的。现在有时回想起那段时期，自己也感到十分奇怪：从前过那样紧张的生活，精力不知从哪里来的？由此，也就会明白其他城镇缺乏有知识的工人同志的原因了。那些地方甚至知识分子都很少，你会深深地感到知识分子的不够。同时

也会完全明白，彼得堡工人很容易从自己的队伍里挑出又勇敢又有觉悟的工人，甚至彼得堡省经常还能提供出十分热情、勇敢、首先是有教养的战士。我们这些当时的彼得堡人，四周围都是知识分子，然而还是常常嚷叫着，要工人自己在小组中抓紧同志们的学习。这只有在缺乏知识分子、而有些地方甚至没有知识分子的省份内，才着手这么做。在这种基础上，像我们在下面的场合所见到的那样，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形成着一些独特的交往关系。我们这时候被四周围的各种知识和愿望压得气都喘不过来。要把这些知识灌输给我们，远远不是经常能够办到的事。原因是，没有空闲时间来学习，何况学习的时候许多人都说，他们的身体筋疲力尽到对他们讲什么都接受不了。1894 年 9 月底，彼得堡涅瓦关后街的工作，就是这么进行和准备的。那时，各个小组中的建设工作进行得很缓慢。情形很明显，知识分子中间有人正在准备开展充分影响广大群众的工作。我们的小组也间或谈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对这个新工作很不熟悉，而且也没有一个能够指导我们做这件工作的人。显然，我们不能特别匆忙地来进行这类活动。

有一天晚上，我和柯斯嘉买了书从城里回家，在有轨马车的顶座上碰到Π·A·摩洛索夫，他刚从“拘留所”放出来，挎着一包袱书和内衣，准备上他妹妹家里去。用不着说，我们对于这个突然愉快的见面，高兴得没法讲，立刻把摩洛索夫拉到柯斯嘉的家里去。我们在那儿向他提出有关宪兵询问他的时候的各种问题，问到他的被捕情况，问到监狱中的生活，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这时我们才知道，他们要把他送回乡下去。这件事对我们的影响很坏，因为碰到他所高兴的理由是，我们又有了一个能干的领导人，就是说，情况会不断地好转。我们三言两语地向摩洛索夫说了说我们的工作情况，当然用我们的成功之处去使他高兴。晚上的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一直把他送到他妹妹那里。为了以防万一，我们不从人烟稠密的斯摩棱斯克村走。客气地分手以后，我们就回家了，一边讨论对这个晚上的印象，心里更加迫切地需要努力工作。

这时候出现一种非常突出的现象，青年中间有很多十分忠心于事业的人，经常反复地讨论一个问题：如果某一个人被捕了，那我为什么就一定要倍加小心，或者说，做一个不太积极的同志呢？他们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我就比他好，要不，就不如他吗？为什么别人一定要逮捕他，而不逮捕我呢？难道我就经不起审问吗？不，去说，我愿意证明，我也是这样的同志，也忠于事业，决不会逃避逮捕？同志中间某个人被逮捕以后，一些热情而又坚强的人便立刻反复表示这样的信念和意见。有一次，我就这个问题甚至写信向某些同志提意见，向他们指出，这种态度对待事业是有害的，说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并且指出，重要的是尽可能长久地坚持下去，尽可能长时期地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竭力把自己的价钱卖得高些，并且在自己被捕以后，把痕迹留得更深一些（也就是使自己活在同志的心里长一些）。然而，我也不是经常注意这点的。因此，我相信，这种情形也是我被捕的一部分原因。总之，我希望每个人开头就应该谨慎小心，注意自己，留神自己的一举一动。

摩洛索夫动身后不久，刚入冬，一个大清早晨，我被敲门声吵醒了。我本来就养成习惯，睡觉很容易醒，现在立刻从打门中醒来了。当然，我毫不迟疑认为，来的准是宪兵，由于想到没有什么东西要隐藏，便镇静地去开门，放那些后来把我关进牢里去的仇人进来。和自己的一切愿望恰好相反，神经非常紧张。但是，我在表面上还是竭力装得很沉着。心里暗想，宪兵在我这儿什么也不会找到，走到灶屋里，看到房东老太太在那儿唉声叹气，准备出去关门。我向她说了几句话，叫她放心，便走到过道上，突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熟人声音。原来，我对宪兵的预测为时过早了，但是我深信他们还是会来的。一个好心的女人——柯斯嘉的女房东，站在我跟前激动地哭泣着。她告诉我说，柯斯嘉被捕了。她是一个不识字的人，但是我们感到她很懂得我们的正义的观点。当然，她亲眼看到了搜捕的全部程序。在别人把柯斯嘉装上敞篷车带走以后，她感到她好像失去了一个亲人，

一面哭着，一面撇下孩子，奔来给我报信。而我呢，不是安慰她，而是向她说，他们也会立刻到我这儿来。因此，我要她回去，甚至不让她待在我那里。她继续哭哭啼啼的，奔回家看孩子去了。我努力把屋子里的各种便条字笺以及对宪兵有用的东西都清除干净。一两个小时过去以后，我就要去上工，可是宪兵还是没有来。我走进工厂，感到失去了一个对我说来非常宝贵的同志，一个我与之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同志。他先我而去尝试俄罗斯宪兵的蹂躏了。柯斯嘉将会怎么样呢？宪兵将用什么去折磨他呢？他们会在他家里搜到什么违法东西吗？我的思想一直围绕着这些问题，脑子里惦记着很快也要这样来搜捕我。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和他这么接近，在他屋子里吃饭，他们竟没有像注视柯斯嘉那样注视我，——这是不可能的。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根据一封上面有柯斯嘉的完全地址的信以后去逮捕他的。当然，幸运的是，他们在他的屋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找到。虽然没有预料到会逮捕他，但是我们对于逮捕的可能性已经作了相当的准备，因此他的被捕并没有特别使我感到震惊。糟糕的只是，没有他，我们在他的车间里的工作完全停顿了。那里有很多年青工人，柯斯嘉特别惯于对他们做工作。我是绝对不能上这个车间去的，只能对那些我竭力在厂外与之会面的人做点工作，做我能够做的事。在我屋里集会的小组学习，照旧准时而又经常地进行，像往常一样，只不过感到少掉了一个人。

柯斯嘉被捕后不久，H 对我说，我必须去参加彼得堡工人的一个普通会议，会上需要解决某些个问题。我记得，涅瓦关方面出席这次会议的，连我在内，一共是三个人。会议是在城边的一个工人的家里举行的。参加会议的人，看来，至少有十五个。好像，其中有好几个知识分子，或者只有一个知识分子。在所有的人没有到齐以前，大家都是轻声地谈话，好像开亲切的小组会。人一到齐，也不举行任何特殊仪式或虚套，便开始讨论各种问题，而且争论起来。我和另外一个同志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因此，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和他感到自

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在这类会议上发言：参加会议的，全都是工人的领袖，或者是一些很有修养的、惯于体面地应付这种场合、并能巧妙地说明自己的思想和建议的工人。当然，大多数人事先就已经知道将要谈些什么，而且过去已经参加过这类会议，在那里培养了说话的勇气。我细心地聆听他们的争论，当然弄清了问题的实质。我清楚地记得，有人提议，设立彼得堡工人互助储金总会。这个互助储金会应当是所有互助储金会的总机构。基金，由各"区"的互助储金会提供。彼得堡工人互助储金总会的目的是，设法把钱交给被捕的工人，必要时资助某地的"区"互助储金会。在讨论知识分子的互助储金会现在有钱和工人的互助储金会基金空虚因而无法满足很多急需的用项这一问题时，大家议论纷纷。许多工人坚决希望从知识分子方面支取一部分款项。他们的感情相当冲动，以致引起我的惊奇。我疑惑他们的感情冲动，准是为了问题触及他们的荷包，因而一直默默地注视着，害怕自己失言，说出什么不恰当的话。问题终于解决了，办法是从知识分子的互助储金会里拨出一笔钱来，放到工人的互助储金会里。在这以后，决定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会计员，另外还选举两个什么负责人，我记不清了（是不是这样，我不敢保证）。大家决定在隐匿出席人的姓名的情况下，用下列方法来选举：所有的人都固定坐在一个位子上，每个人的名字都代之以一定的号码。我好像是第十三号，每人都领到一张同样大小的干净纸头，把他要选举的那个人的号码记在纸上，叠好，接着好像放在一顶帽子里，然后再计算掺杂在帽子里的纸头。谁的号码，被写的次数多，谁就算当选了。当我被选上会计员的时候，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满脸通红，感到很难为情。我走到桌子跟前，在上面放了十个卢布，说："同志们，这十个卢布，是红十字会的一个人交给我，捐给彼得堡工人的。"

大家留神听着，然后对这件事表示意见。我不记得他们说些什么了，况且我在自己激动得还没有平静下来以前根本就听不清楚他们说了些什么。我这个被选上的会计员，重新走到桌子跟前，拿了钱，就这么行使起自己的职务了。此后，

大家又提出一些问题来讨论，争论些什么，我可记不得了。接着，参加会的人开始一个、两个地走了。天黑时，我同一个同志走出涅瓦关，回家了，因为这时候已经好走了。这是第一次会议，我是作为一个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当然，这不是众人选举出来的代表，因此只好瞒着好多人，虽然我原先还以为它是一个盛大而又隆重的会议。不过，它还是给了我一定的印象。

我仍旧在厂里干活。走运的是，我转到另一个帮里去做容易做的活计了。我在那里坚决拒绝做急件，我终于侥幸地摆脱了它。同时，同帮里的人都非常了解我，了解我的观点，猜想能从我这里弄到秘密书报。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别的帮里的一些老师傅跑到我的虎头钳床上来，直截了当地要我向他们谈些什么。我总是觉得自己很年青，感到很不好意思。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这些都不是实话，因为说完这话以后，我就聊开了，像俗话说的那样，我竭力绕圈子说，结果怎么呢？——他们很乐意听，赞成我，夸奖我。然而，我还嫌不够。我想叫他们完全献身给事业，从此就停手不干小夜班和大夜班的活，阅读书籍，学习，用功而又坚持地学习，像我自己那样。但是究竟不是所有普通的、常常爱喝几杯的人都能什么都不考虑，而只惦记着社会主义的。我在这方面犯了一部分错误：我根本否认这些人能参加党。毕竟在一天内不可能坚决把他们的整个世界观扭转过来，使他们都成为有思想觉悟的人，像他们中间的个别人一样。但是，群众仍然可能在各种时机中变为彻底革命的人，然而这种时刻事先很难确定，甚至在一小时前都确定不了。我逼真地回想起这么一个晚上，那时工人群众的情绪十分激昂。他们很难忍着不让自己投入已经迸发的暴动的漩涡中去。他们很难抓住紧握在手里的石块，不把它们抛出去，哪怕去砸坏领班的某个狗腿子家的窗玻璃。在这种时刻，袖手旁观是决不可能的，要制止自己的同志，不让他们去憎恨自己的压迫者，那非要有很大的勇气不可……事情发生在 1894 年圣诞节前夕。节日前两天，工人们做完活，拿着工资薄，各自回家了，像平常放工回家

一样，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怨言，虽然每个工人都不满。事情很明显：厂方常常拖欠工资，特别是年终最后的两、三次工资。

星期六三点半钟，汽笛拉起回声，机器停止不动了，突然全厂静寂无声。这就是就说，工厂将要停工到下星期一（大家都知道，发完工资以后，是很少有人愿意干活的）。往常只要工厂汽笛一拉放工回声，工匠们便从各方面奔出来三脚两步地往大门口走，有的人跑着，有的人从什么角落里奔出来。门警们一面吆喝着，谩骂着，一面不停手地习惯地搜查工人的身体。但是，工人越挤越厉害，门警们只好动作加快。可是，到了星期六，大伙出门就慢吞吞的，不慌不忙的，甚至一小堆一小堆地聚在一起。这种情况说明，大多数人还待在车间里，等着发工资。许多住在附近的人，听说出纳员还没有从城里拿钱回来，便回家吃晚饭，然后再赶回厂来，甚至不肯放过自己领工资的次序。但是，住家离厂很远的人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在没有结束他们对厂方或同伴的一切事务以前，不能回家，不能放下自己应尽的各种义务。他们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等下去，工资还是没有着落。时间一直拖到晚上，工人终于开始怨骂管理处，其实一放工，管理处的人都走光了，甚至没法找人问问，到底几时发工资？因而大家都怨声载道。到了八点钟，出纳员终于带钱回来了。他听到四面八方都是一片震耳欲聋的埋怨声，有的地方还破口恶骂，扬言要向出纳员砸铁块。看来，出纳员简直是个替人受罪的倒霉鬼。出纳员默不做声地赶快踏进车间办公室。过了五到十分钟，开始发工资了。有时候，大约到十一点半钟才发完工资。当然，三点半钟完工，接着在厂里干等到十点钟，可以想象到，在这以后回家，什么地方也不可能去，甚至上澡堂洗澡，也没有时间了。这些自然使工匠们很生气。然而，厂方还是作恶多端，对工人的埋怨，毫不理会。

1894 年圣诞节前夕的情况，偏偏就是这样。完工第二天，工匠们大约在午后到厂里去领工资。他们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地继续等下去，但是钱还是没有

着落。许多人都诉苦，没钱买粮食。有的说，明天就活不过去。另外一些人发牢骚说，他们本来想回乡下去一次，现在看来去不成了，诸如此类。黄昏了，钱还是没有来，甚至没法弄清事情的原因。有人说，老板破产了，没法付给工人工资。很多人开始相信这点，因而散布的谣言就传开了，接着又出现许多谣言。当然，这些谣言都是对工人不利的。结果，大家都有点惊慌失措。工长们很着急，工匠们一会到车间里去，一会又从里面出来。在工厂附近的大街上，工匠们一堆一堆地站着，热烈谈论老板和工资的事。谈话中夹杂着各种谩骂。这时可能会酿成不小的乱子，但是厂方在七点钟光景宣布，工资改在明天上午十时发。这正是圣诞节前夕。尽管大家很不同意，但是已经宣布的声音毕竟起了安慰的作用。工人在出入口附近结成密集的人群，一帮一帮地拥出工厂。过了一会，人群慢慢地散开了。全厂重新宁静地酣睡到天明。

这种情况在圣诞节前夕又重复发生了。傍晚，大街上，天已经黑下来，家家户户都掌上灯。冬天，车间的工作台和机床上的电灯都点上了。别的地方也亮灯了。到处都有人在乱慌慌地谈话。大伙急得站也不好，坐也不是，出出进进地一会从车间里跑到院子里或者大街上，一会又从那儿往车间里走。我也到处乱跑，听别人讲话，自己也到处讲。我出去走到院子里，然后又走到大街上，到处都是人。看上去，不相干的人，厂外的人，很多。他们也在厂里和车间里来回地走动。我在街上稍微说了几句话，便回到车间里。突然听到有人说，厂门口闹事了。我不相信地说，我刚从街上回来，那里什么乱子也没出。可是，大家不相信我说的话。很多人马上站起身来往外走。不用说，我也想把事情弄清楚，因而也和别人一起往外走。在楼梯口跟前，领班十分着急地冲着我们走来。他声嘶力竭地嚷道："哥儿们，别到大街上去。钱马上就送来，就要发工资了。请你们别着急！我求你们安静些。"这些话破除了全部怀疑，工匠们赶紧下楼，匆匆地往厂门口奔去。我们身后有几个工人在叫唤。喊我们回去，生怕惹出麻烦来。这些唤声，徒然无

用，谁都没有理它。我们一会工夫都奔到大门口了。大批人都成了看热闹的了。根本没有办法从这堆人中间穿出去。我们厂里的门房都给打坏了。玻璃碎了，窗户框子也坏了。大街上有人用石头和木棒往我们的厂里扔，目的想砸坏灯炮和墙上的石头老鹰。灯很快就灭了，玻璃也碎了，好像石头老鹰也受了重伤。在这以后，石头和木棒就停止往厂里扔了。于是，我们也就能从工厂的院子里出来跑到大街上了。门房被打得七零八落，成了一群愤怒的好汉们的战利品。他们甚至想放火把它烧掉，但是没有成功。它像个妖魔似的屹立在那里。谁都不敢走进去，害怕别人疑心他是门警，而被人打死。因而门房没有被烧掉。所有暴怒的人的视线，现在都放到工厂的对门去了。那儿门上的灯，怎么也没法砸坏，其实人们不愿意去砸门房，生怕害了自己，因为这间门房里放着大家的出入证。

大门旁边有一幢长形的平房。工人大伙所痛恨的厂里的一个管理员就住在这里面。工人们也打算惩罚他一下。怎么惩罚他呢？大家就着想打开他的门，可是就是打不开，于是决定放火烧他的门楼。

“把火油拿到这儿来，快一点！”奔到门楼前的人嚷道，可是没有地方去弄火油。有人弄来了几只打坏的火油灯，把它们吊到门楼檐上，把火油洒在堆成一堆的各种木块上。

应当说明，这时候，人群把大街都堵住了，连一辆马车都过不去。然而却有一辆拖着三、四节车厢的机车，还是要继续开过来。机车司机害怕工人冲上车，伤害服务员和旅客，便让火车开足马力往前冲，自己则坐在窗户底下，在火车开过工厂以前，不准备了望路程。工人看到这种情形气愤极了，把所有握在手里的东西，全都往火车上扔。我亲眼看见一个人专门砸车厢的窗子。他支出一根长棍子，像打鼓似的，敲打飞驰而过的火车的窗户。车上很少有几块玻璃是完整的。旅客们吓得伏在车厢的地板上，避免被石块和木棒打着。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样

的情况下，竟然没有出事。工人们只要轻易地在铁轨上放上一样什么东西，覆车就不可避免了。显然，这时候站在工厂附近的工人吓得没有去参加这些行动。

在打门房的同时，又有一批工人向厂方开设的杂货店奔去。这个杂货店是工人的灾星。赊购物品的工人在这家杂货店里不仅受商店里的坏蛋的气，还要受形形色色的狗腿子的欺侮。工人在这里花钱买东西，不能要求过严。别人给什么，他们就得拿什么。他们得不到自己必需的东西。工人在买肉的时候，特别谈到这一点。他们先给你骨头，你要是叨唠两句的话，就把你从厂里开除出去。当然，现在在闹风潮的时候，这家人人痛恨的商店，是不会让它好好待着的，事实上，它是被捣毁了。果浆罐头被砸碎了，很多别的商品被毁坏了，糖和茶叶被洒在大街上，碗盏器皿等等东西也被打碎了。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工人们就这么砸坏了门房和放在里面的账本和书册，砸碎了洋灯，还想闹到一个管理员的家里去。这个管理员同全家人躲在屋内，不敢出来。他感到他快没命了。后来，工人们又打算烧掉他的屋子（也没有成功）。他们打了商店，毁了大批货物，还去砸总管理处和厂长家的窗户玻璃。总管理处和厂长住宅的房子是面朝大街的。大家把一块一块的煤块，直往这所房子里扔。我也抓了一块煤，可是没有扔。最引起大伙生气的，还是那家杂货店。所有的人都往那儿奔，把一条又窄又细的小胡同挤得水泄不通。这一切至少持续了半个小时。

当地警察局的消防队成了管理员的第一个救命恩人。消防队的驻地离管理员的家很近。消防队制止了工人在这儿的行动。哥萨克骑兵队迅速出动，出现在工厂对面的大街上。他们听说工人去砸杂货店，便往那儿奔去。但是，狭窄的小街道不让很多人涌到小胡同里去，到杂货店去。毫无疑问，待在杂货店里的人企图尽可能快地从里面退出来，可是退出来，还是会碰到哥萨克。一部分人越过篱笆，跳到工厂的院子里，没有碰着哥萨克。哥萨克在杂货店附近逮捕了很多老百姓。这些人根本没有去捣杂货店，只是好奇地瞧瞧热闹而已。

消防队来了以后，圣彼得堡的消防总队长巴斯金将军，也紧跟着来了。他向总管理处的房子走去，但是大门关得紧腾腾的。过于胆小的管理处的职员们，没有迅速让这位将军进去。他因为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很着急，摁着电铃的按钮。这时候，又有一个年约十五岁光景的人，安慰一小群工人，说他马上到办公室去安排一下，叫他们马上发工资。有人回答他说：我们不是闹风潮，只是等着领取看来别人不顺意发给我们的工资。最后，大门敞开了，将军几乎像跑似地奔上楼，到办公室去了解事情的真相。一群人聚到办公室跟前，没过十分钟，聚集了五十多口子。这时候，那位将军从楼梯上下来了。他出来，走到大街上，来到我们的跟前。他的脸涨得通红，看来，非常生气。应当说明，他对管理处的解释不很满意。但是，他仍然面对着聚在大门口的工人，呵责我们不该砸坏门房和杂货店，泛泛地谈到我们的行动是不道德的。一个上了年岁的工匠理直气壮地答复了他，指出，整个捣乱事件都不是工人干的，而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搞的。这些人后来首先去砸杂货店。他还说些什么，我记不清楚了。我也说了几句话，另外还有两三个人发了言，接着这位将军又要求我们老实些，不要胡来，至于发钱的事，他们立刻会找钱来。他说，钱本来已经送来，出纳员们因为害怕闹风潮，又回到城里去了，现在已经派专人进城找他们去了。这位将军再次地要求我们安心地等着拿工资，随即忽然往大门口走，然后上杂货店去了。这时候，显然，哥萨克骑兵赶来了。过了半小时，出纳员带着钱出现了。在各个车间开始发工资给工人的时候，形形色色的头儿脑儿们都到总管理处去了。他们在那里举行了一次特别紧急的会议……

我很想弄清酿成这次风潮的起因。根据较为可靠的人的说法，事情的发生原因是，有一个顽皮的小孩骂了门警一句，或者向他扔了一样什么东西。警察当场把他逮住了，巡官命令他把小孩拖到门房办公室去。人群奔去保护这个小孩。这

时，不知是谁打碎了一块玻璃。这就是整个骚动的原因。这时候，在场的门警和人群混在一起，要不就躲藏起来，逃到院子里，尽量离开那些暴怒的工人。

在圣诞节的假期内，在斯摩棱斯克村逮捕了大批人，原因是我们的工厂就在那里。他们按照令人十分怀疑的指示，逮捕了很多人。譬如说，有些人的被捕原因，只是为了过去和某个狗腿子吵过架，要不就是和哪个领班顶过嘴。大多数人都是根据警察局的命令而被捕的，或者是根据在搜查时发现二两或者四两原封的茶叶和白糖而遭到逮捕的。理由是这些茶叶和白糖的数量比杂货店赊卖贩上最后一次记载的数量多。总而言之，逮捕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过去根本就没有引起别人怀疑他们同情革命运动，或者赞成闹风潮。所有被捕的人都坐了长时间的牢以后才得到审判，而且好多人的罪名都被判得很重。在圣诞节的假日内，我们讨论了有关出版评论这次风潮的传单的问题。时候再也没有比这更恰当的了，大家都希望从这个问题开始试着进行鼓动工作。编写了一大张传单，然后用胶印版印刷好，订成若干小本子，准备散发。这时产生了一个问题，怎么把它们散发掉？大家委托我来主持这件工作，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把小册子散放在工具箱里，不方便，容易被人发现。而且，因为是第一次，准备的小册子也不太多。我记不得了，星期六呢，还是星期一，那天晚上，我把一部分小册子分别散放在各个厕所里，余下的，我尽可能地把它们撒掉：从破玻璃窗里塞进车间里；从门缝里把它塞进别人的家里；放在锅炉上；还放在机车的窗架上。总之一句话，我千方百计地把这些传单都放到所有的车间里。在工厂的另一方面，也有人准确地把一切事情都办妥了。他们东一处西一处地把传单放到工具箱里，放在工人们常常在那儿歇腿的扎棍机上，等等。这件工作做起来，好像很简单，很容易。然而第一次做这样的事，还是有些胆小。关于这些传单的事，事后很少听到别人谈起。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是不是传单太少，还是不该在风潮以后马上就出传单，或者是另外什么原因呢？虽然我们都很想把原因弄清楚，但是什么都打听不出来。

在某一个车间内，一个发现小册子和传单的工人，把它交给了领班。领班蛮不讲理地去找一个老工人，斥责他不应该散发传单，其实那时候他早就不过问这类问题了。我因为这个老人受到无理的谴责而很为他难过。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不把传单暗中扔到他们的车间里去，我也向他讲明了原因。这次经验，可以认为是成功的，虽然没有看到特殊的成绩。在这以后不久，彼得堡港也有人照样把传单偷偷地放到各个车间里。他们在那儿的活动，比我们塞棉尼可夫工厂有劲得多。圣诞节过去以后，每逢星期日，我们又开始在我的屋里进行学习，同时大伙重新到星期日学校去念书。此外，上面提到的П·И也常上我们这儿来。他仍然有时候在晚上给我们讲读些什么东西。我们完全埋头在书本上了。

在学习的时候，小组里有时发生这类事：我们正在屋子里和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坐在一块谈论问题，这时候，忽然门被推开了，一个女人的头探了进来，接着又消失了；有时候，在露过面以后，整个的人也跟着走了进来。我们的谈话或者讲解员的发言只好中断。这时进来的人要求某个先进工人和她出去，随即他们就一起走了。原来，这人是民意党人。她在我们小组学习的时候来找人，感到很不好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意见分歧的情况，并不很尖锐。在同一个小组中间，有时候既有社会民主党人，也有民意党人。这种情况的原因常常在于：小组里的人过去都是民意党人的小组成员。民意党人最后终于止步不上我们的小组来了，原因是我们没有给他们提供新的小组，同时他们也没法把我们小组的人和拥护我们小组的人拉过去。这时候，我们这儿有一个少女和一个被放逐出去的犯人的妻子。她们有时候向我们提议想参加我们的学习，或者参加我们在没有知识分子参加下举行的读书会。像上面提到的那样，我们曾经独自读过凯南的著作。读书的那间屋子，本来就已经有五、六个人了，现在至少得加上两个人，因而产生一个问题：人会不会太多呢？大家在这方面满意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时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女人参加到我们中间来，会不会对我们小组的学员产生不良影响。

结果，大家在这方面谈出了某些危险。一个组员甚至表示，如果情况真是这么复杂的话，他都不敢保证自己。这个看法本来是某个纺织厂的工人说出来的，后来我们都被这种看法迷惑住了。鉴于这种种缘故，大家都拒绝妇女参加我们的学习，虽然她们有时候还是来看望我们。这是我这一辈子碰到这类问题的唯一的一次……然而，我深信，下次碰到这类问题一定会完满地解决它。

Φ·A 也三天两头地来看望我们。他是一个非常乐观而又很有人缘的工人。拿革命活动的经历来说，他可以算是老资格了。我总是特别喜欢听他的谈话，接受他的意见。我把他当作是我们必须接替的老前辈。不过，我常常怀疑，我们将来会不会比他更坚定，更顽强，更聪明。我牢记着他被押上"十字架"去受刑的情况。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沉痛的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善良的人，一个可说已经失掉生命，但还被迫到监狱里去的人。他的一部分生命被交给了饕餮的专制政权。我记得他曾经埋怨我们很少唱歌，据说他们过去是常常唱歌的，并且唱得很多。这是事实，我们更少唱好的歌子，也不大懂得它们。我们就这样继续生活下去，学习下去。当然，这时候，又相识了好多工人。光阴不知不觉地过去，春天又来了。我记得，我这时候同帮里工头的关系搞得很糟，起初是因为我不做小夜班和大夜班，后来他干脆要把我排除出去。工头对我越来越厉害的、尤其是最近的独立行为，很不满意，另外还不满意我带坏了工头想按照他的心意加以教导的一个年青小伙子。这个年青小伙子在我们的帮里当学徒。这个暗斗，结果终于在某一天把我调到另外一个、情况更糟的帮里去了。我在这个帮里干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一次干急件，全帮的人都被迫做夜班。我和另外三个人不愿意干。他们用解雇来吓唬我们，而我们还是不答应，大发雷霆的领班给我们每人下了一张两个星期的旷工条。这等于使我们两个礼拜没法干活。如果我们旷了两个礼拜的工以后再去上班，他们照例还要强迫我们上夜班。这种手段常常能把一个工人治得服服帖帖。我拿了旷工条以后，去找驻厂检查员。他想把我打发走，对我大嚷一

通，把全部责任都推在我的身上，而不责怪厂方。我向他指责说，我是找他求保护的，不是来叫别人对我大嚷大叫的，也不是来叫别人把领班的责任全推到我身上的。听了这话，检查员的态度和缓下来，说他曾经一再禁止在厂里实行这种办法，可是他们还是采取这种办法。他答应到厂里去检查这件事。结果，领班受了惩罚，把扣掉的两个星期的工资又发还给我。这件事在厂里议论纷纷。有一段时期，我居然成了敢于冲撞领班的英雄。显然，在一个短时期内，车间里不再强迫别人做小夜班、大夜班和全夜班了。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已经准备离开本地，转移到别处去。但是，后来由于接到任务，而又留下来继续做工作。不久，还要搬家。我在那里已经住了很久，还没有受到警察的注意。这里还可以继续进行小组学习。夏天来了，星期日学校被关闭了。女教师们都四分五散地走了，工人运动也好像停止了。这不过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工人运动非但没有停止，而且日益壮大了。不过，目前的工作，由于没有知识分子参加，在进行方法上有些独特。

这个夏天，彼得堡的工人又召开了一次常会。这次会议是在涅瓦河右岸糕点工厂后面稍左的一个树林子里举行的。大家在那里谈到运动太缓和，应该通过某种方法去加强它。大家都埋怨小组的活动，一致要求声势浩大地进行某种新的、还未检验过的活动。争论的很激烈，嚷得也很火爆。两个青年工人的发言特别尖锐。他们对所有的事情都加以刺激，加以抨击，还责怪工人对新思潮太冷淡……总之，这次会议开得非常热烈……会上有人提出了给恩格斯墓送花圈的问题。恩格斯刚在那时候逝世。一部分人主张送，大部分人反对。反对送花圈的理由是，我们的运动范围太小，如果送一个上面附着彼得堡工人敬挽的字条的花圈，很不恰当。同时，我们还将失掉一个同志，这对我们来说是十分苦恼的，而最主要是，我们的花圈会误期。要在安葬那天送上花圈而不是在事后，这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最好用别的办法来纪念恩格斯，不必老惦念着花圈。这不是什么男爵和公爵的死，这些人死才需要花圈哩……

这个意见占了上风，后来好像提出过拍唁电的问题，现在我不记得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散会后，大家的心里都有这么一些思想，必须尽可能地从积极的方面来改变宣传方法。但是，这件事做起来，远不如想象中那样容易。这时候，还只能读到胶印的宣传小册子……只能把革命问题的领域限止在很狭窄的范围内。只有领导本地本区和小组的工人，才略略知道这个狭窄的范围。现在还可以在具有下列情况的若干边区和省份里看到这种现象。那里，工人还在自力地摆脱愚昧和闭塞的地位，得不到知识分子的帮助……

这时候，每逢星期日，我还同四、五个人带着书本到涅瓦河对岸去，在那里阅读一些书籍，读完再讨论；我们也对工厂里发生的事件互相交换意见，大家准备在秋天，考虑再建立几个新的学习小组，并且预先确定好十分可靠的人。毫无疑问，这时候工人互助储金会还存在，但是没有制定出严格的章程，因此现在很难弄清那些钱是怎么分配和支付出去的。我只记得，支出了很多买书的钱，甚至连购买违禁书籍的钱都没有记账。钱支得最多的，是一所合法的图书馆。[11]我们从女教师那里得到了很多书籍，自己也买了好多。而П·И也经常给我带书来。利用各种杂志上的文章编辑而成的很多宝贵书籍，都失落了。我后来经常感到书籍不够，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能真正地估量到一本好书对于其中没有知识分子推动而工人只好自己迈步前进的城市的好处；也只有在那个时候，书本才能成为好的领导。现在是新时代了，有着新的歌声。到处都传播着，而且必然传播着定期的违禁读物。这些读物可以做许多问题的指针。一个生活在偏僻地区的工人既然有可能得到这类书籍，因而也就得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锚。

1895 年的秋天到了，知识分子纷纷从各地赶来。大家开始感到运动正在猛烈地高涨着。来到本地的知识分子都希望工作，尤其其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于把工人搁置了整整一个夏天而受到过责备。大家都忙着要弥补夏天的消沉（说良心话，这个夏天决不能算消沉）。机器全都开足了；冬天还没有到，而各个小组就已

经开始集会了。每逢星期日，每个小组里都会出现一个知识分子和五个工人。大家都强烈地感到屋子不够，全都有人占着，因而特别租了一间屋子，专门用来学习和开会。有关鼓动的问题，已经肯定地解决了。但是，我对此不满意。我担心各个小组会被消灭，认为鼓动工作会把他们完全害掉。到那时候，我和其余的人就不会看到这一工作的果实。然而，各个小组的活动仍然进行得很好，有人要求我再建立一些新的学习小组。大家都等待着散发早已准备好的传单。在这以前不久，有人开始监视我了，而且还不止监视我一个人。引起他们特别对我注目的原因，后来才弄清楚。有一个工人从我这儿拿了几本违禁书籍回去以后，送了一本给他的妹妹，而他父亲又在他妹妹那儿发现了这本书，于是就把这件事报告给宪兵了。这就是引起他们暗中监视我的原因。这种监视没有产生任何显著结果。虽然有人警告我说，很快就要逮捕我了。我还是干我的，不过格外小心谨慎了，不让宪兵注目。工厂里仍然出现违禁书籍。这些都是我通过我的一个同志干的。

那时候，托尔东呢绒厂里也酿起各种风潮。这些风潮主要尽是因为厂方降低工资而引起的。最好在宣传传单中说出工人们最关心的事，譬如尽可能地说明当选的大多数领导者（和社会主义组织无关）的要求。为此，通过一个工人，把他们召集在一间秘密的屋子里。然后，由一个知识分子和他们谈话，弄清他们的情况。可是，谈话没有成功，原因是托尔东呢绒厂的工人不愿意同一个他们素不相识的人谈问题，疑心别人会给他们上当。他们对什么事情都不相信，只要求写一份恳切的请愿书给他们去求见市长。写一份如泣如诉的请愿书，对于大伙是枉然无益的。同时，要指望依靠这份请愿书去得到什么好处的话，更是想入非非。因此，通过托尔东呢绒厂的一个工人（现在变成了狗腿子）收集来的材料，都已写成了传单。这个工人和我们都对这个传单很满意。传单印了出来，然后偷偷地把它们散发在工厂里。这样，热火朝天的鼓动工作便开始了。

不久，普契洛甫斯克工厂里也有人散发传单了。有人拿了一份传单到涅瓦关来给我看。有一个同志在工作的时候，带着这样一份传单和一瓶胶水，跑到厕所里。他趁没人的时刻，把胶水抹在手上，用手掌把胶水抹在墙上，贴上传单，随即便溜到车间里去了。过了十五分钟，他忍不住地去看看他的那张传单。原来，已经有十五个人光景站在传单前面。其中有一个人竭力大声地读着传单。但是，他念不好，这个同志便挤到前面，高声而又抑扬顿挫地向在场的人念起来。大家都非常注意，厕所里挤满了人，不断地有人看。所有的人回到车间里，都要怂恿别人去看。你来我往的，差不多持续了两个小时，大家都看过了传单。最后，管理处知道了这件事，便下令把传单扯掉。然而，当厕所里挤满了很多人的时候，门警不敢去扯，其他的许多敌人也没有胆扯。这种情况特别引诱我和我的那个同志去进行这件事。此后，我们常常把小册子和传单偷偷地放在厕所里和背人的角落。过了一会工夫，这些小册子和传单就不翼而飞了。事情明摆着，有人悄悄地把它们拿走了，居然，快得我们都来不及注意。我们由于留神观察，最后我们终于发现一个人，悄悄地走去，小心地把他寻到的东西塞进袖子里，立刻带着它走出厕所。

开冬，工人代表开了一次会，人数大概是六个。在这次会议上，宣读了一份传单。这份传单不久就要用油印机印出来，散播到所有的工厂里去。不过，这份传单还没有最后定稿。有些地方，还需要订正。当时宣布，这类会议将要经常进行。好像说，一个月至少要开两次。参加这个会议的知识分子方面的代表，就是宣读上述传单的那个人。从这点可以看出，组织方面已经采取各种新办法，以求促进宣传工作。当时工作进行得非常秘密——情况非这样做不可。看来，一部分知识分子负责草拟上述各种传单，并且在十分秘密的组织问题方面和工人保持联系；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负责学习小组的工作。当然，我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情况是了解得不够清楚的。譬如，某人是谁，是做什么的。不过，最重要的是，这

时候知识分子和工人，双方都在加紧活动。在从学习小组过渡到宣传鼓动这样大的变动中，还没有产生特殊的误会和争论。显然，这是因为各个学习小组在继续努力进行各自的活动，并且恰如其分地符合其正确的工作方法，也只有这样的工作方法才能被公认为令人十分满意的。凡是在宣传鼓动的时候放弃学习小组的地方，那里的工作就会转向不正确的、有害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也必然会在有觉悟的工人中间产生激烈的争论……这种情况不仅不能培养出有觉悟的工人，而且知识分子也会在不参加小组学习的情况下逐渐变成修养很差的人，同时也不能深刻了解工人的心灵。

一年前，我在埋头从许多知识分子和学校女教师那里学习各种优美的言词和学识的同时，胆怯而又怕难为情地去参加各种会议，而现在我被逼着要到处独立工作，解决学习小组、工厂和学校中发生的一切问题。有时候，显然感到自己很不在行，但是还是需要讲话，还是需要发表意见，还是需要给别人解释问题，原因是许多优秀的、聪慧的领导人都被流放出去了。既然要做一个先进的人，那就不能不讲话。我不认为我自己不会出漏子，要自己注意自己是相当困难的。我在工作中十分努力和异常小心。

有一次，放工以后，我到那尔弗关去办件事。在一家人家遇到了那里的一些本地人。人们常常谈论他们，说他们都很勇敢，而且都能带头做榜样。不过，他们自己也常常到处这么说，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给我的印象很不好。我一心一意想在这里看到或者听到个把新事情，好学习学习，把它带回涅瓦关去，虽然，我们在那儿的工作做得还不错。但是，我在那儿没有发现一件新鲜事情。因而我对他们，对带头的工人的一部分信心便大大地冷却下来。从此我就更加热烈地专心致力于自己涅瓦关方面的工作，很少亲自出去了解别的地方的工作了。我对整个涅瓦关方面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因此我特别感到这个地区在广泛散发过第一批传单和小册子以后，运动是高涨了。我们收到的传单和后来收到的小册子，

都很顺利地散播到各个工厂里去了。居然，撒传单的时候，谁都没有被人发现。当然，这种情况使我们更加胆壮起来。同时，我们等待着更多的东西去散发给群众看。这种活动立刻把群众带动起来，各个工厂也谣言四起，说很快又要起风潮了。“我们这里人人都说，过年以后一定会起风潮”，厂里的一个临时工向我这么说道。这人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我们的事业。另外一个工厂的临时工竟然直接向我索取大批宣传读物，同时向我指出：我在我做工的那个工厂里常常散发许多传单和小册子，而他们那里却很少。我不能把宣传小册子给他，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过去也从来没有和他谈过话。这次我怀着殷切的期望问他，想弄清一个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组织的临时工人心里的想法。同时我还产生一个要求，想叫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深入到群众中间，去弄清群众的真正的意见。而这些人则是我个人的群众。

现在我想来谈谈，参加过我们学习小组的知识分子 П·И。这年冬天，他不大到学习小组去了，尤其不大上我这儿来了。但是，他介绍了两个对学习小组很有兴趣、很负责的人。这两个对事业忠心的人，受到了学员们的爱戴。这时候，有一批知识分子，坚决要求我们给他们建立学习小组；经过长时间的商谈以后，我们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但是，他们不是秘密地去工作，而是经常两个人一起去。与其说他们是上课，还不如说他们对他们所不满意的学习日程进行各种质问和批评。起先是学习小组的领导人，接着是学员，都纷纷抱怨这类学习毫无益处……另外一批知识分子，人数最多的一批，由于准备进行鼓动，了解了彼得堡方面的全部情况。他们领导了鼓动工作，这也就是说，送来了一些传单和宣传小册子。同时，他们还弄明白这些传单和宣传小册子将在什么地方散发。地方上的工作是由工人来领导的。他们把宣传品转送到所有的工厂里去散发。每一个工厂里，只有一个这样的工人来进行这个活动。这个工人知道哪儿需要多少宣传品，还知道

散发传单的具体日子等等。上面提到的两批知识分子想通过我们的帮助，双方合并。但是，这件事由于整个工作的失败而作罢了。

12 月 5 日前后，我们遭到了一次突袭。若干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知名的工人被捕了。逮捕的事，大家本来是预料到的，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范围会这么广。不用说，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强烈的，然而没有像以前发生事情时那样强烈。我对于逮捕这件事已经司空见惯了，能够很镇静地把它忍受过去。学校里的女教师的脸上眼泪汪汪，神情都很惊慌。这种惊慌与其说是为自己担心，还不如说是为事业担心。一般的影响当然非常重大。转送宣传品和传单的工作停顿了。必须到全区的各个地方去看看。这些地方的革命活动已经中断了。我们必须重新去掌握这个地方。可是，没有这份力量了，各处的小组已经瓦解，甚至我们这里的部分情况也是这样。我们这里本来只有三个工人，而现在特别感到 H 不在了。可是，我们还能继续活动。在工厂工作的人员方面，我们没有感到特别的损失。知识分子方面露出了缺点，他们不能迅速地恢复元气。一个星期以后，我们仍旧按时举行了会议，建立了联系。这时候，同志们的意见十分激烈，想打垮我的顽强的态度。我本来就特别反对进行鼓动工作，虽然我也看到这种工作对于提高工厂群众的一般情绪会起肯定的效果。可是我害怕，万一事情失败，一切都将完蛋。我毕竟在这里犯了错误。我知道，我被捕以后，工作还是要继续下去。当然，那时候，我再也不会过问鼓动工作了。我对于我没有被逮捕，感到非常奇怪。看来，他们不逮捕我，是另有打算的，企图追踪我的线索。但这点警察当局方面并没有得逞。这时，同志们把我制服了，我终于同意继续进行鼓动工作。为了显示一下我们的组织的力量，我们在秋真制造厂、玛克斯维尔纺织厂和派尔纺织厂散布了几本宣传小册子："谁是靠什么活着的？"、"每个工人应当知道些什么和牢记些什么？"、"代表会议"、另外还有一本宣传小册子，名称，我不记得了，数量都很多。这件事造成了大混乱。警察和宪兵继续出动，这只能更加激励我们，而信心和勇气则

在各工厂工人读者的心里扎根了。谈话和争论非常激烈，看来，汹涌的浪头就要涨到船舷里面来了。尽管这时候我们还没有通过学校做过任何事情，但是玛克斯维尔纺织厂的领班苏里茨却指摘学校是这一切现象的祸根。他把有人从邮局寄给他的东西都转交给了宪兵。不用说，他密切注视着他的工人。他们在工厂里逮捕了很多人，或者暗中记下看传单的人。令人最感兴趣的是，有一个暗中散发传单的人在干活的时候进行活动，相当大胆。大胆得出奇，一次也没被他的同伙发现。尽管他经常单刀匹马地一个人在各个车间里暗中撒传单，有时还把传单扔到里面待着三、四个人的锅炉间里，而这些看到传单的人从来也没有来得及发现，传单究竟是谁扔的。大家起初好奇地端详这些扔进来的传单，等到弄明事情真相以后，便开始小心翼翼地去看它们了。有时候，他们看完，便立刻把传单撕掉。不过，胆小的工人，很少会这么做。有一次，塞棉尼克夫工厂由于发生一件奇怪的事而没有出现传单。原因是：某个工人傍晚收到传单以后，把它们藏在一个地方，等到第二天早晨上工去拿这些传单的时候，发现那地方的传单竟然不见了。

此后，大家便更加小心了。一直到我被捕，这件事还没有弄清楚，而失落的传单也没有弄回来。一个月内散发了相当多的宣传小册子和传单，但是居然还发生了某些误会和抱怨：某些工人抱怨说：给他们的传单给得比别的工厂少。情况也多少是这样的，宣传小册子不够。我有把握很快就能弄到这些宣传小册子，打算到那时候，再广泛地把它们散到各个工厂去。各工厂散发宣传品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把宣传品偷偷地塞到工具箱里，或者把它们放在机床台上；有的人把传单塞在别人的大衣口袋里，这个办法做起来比较容易，比较简单；有的人把宣传品放在工人常常拿东西的地方，有时候把它们丢到锅炉间的工人那儿，把宣传品丢在大修的机车的各个部件上是最恰当不过了。有时，那里的工人上工以后，过几小时就发现了这些宣传品。那时候，从奥伏德运河起，一直到桥边的小教堂中间，只有一家小工厂，而亚历山大村里一家大工厂都没有。那儿没有出

现过一本禁书，因此我们在那里没有自己人。在派尔纺织厂和玛克斯维尔纺织厂里，我们的人就特别多。如果这些人中间能够出现一两个自己人的话，工作就会上轨道，而且只消一个月就能把损失完全弥补上。真需要有一个英明的领导……大失败以后，过了两三个星期，各地的联系又接上了。

到处都沸腾起学习小组的蓬勃工作、传单和宣传小册子的鼓动工作。大失败以后，过了四个星期，我收到了相当多的传单，性质都大同小异，谈到宪兵策动的这些突袭，谈到政府取缔思想觉悟的工人的办法。我接到这些传单以后，感到散布它们将是我的最后一件工作。我努力把传单按照各厂工人的数量加以适当地分配好，然后把这些传单分别送给我所知道的人，同时弄明白他们大约在什么时候散发。这些可靠的人立刻动手工作。有的人为了把传单妥切地贴在公共场所，忙着准备打浆子，或者找胶水。把传单分发完毕后，我和同志们告别，并且预先告诉他们，我可能被捕，一面嘱咐他们，在我没有去找他们以前，千万别上我家去。晚上十一点半钟，我搭上公园去的有轨马车往亚历山大村，到某个同志的家里去，有人在那里等我。我把应该分给奥布霍夫工厂的传单交出以后，预祝他们平安地继续工作下去，同时告诉他们，我相信在这批传单散发出去以后，我一定会被捕。接着，我就泰然地回家，心里满有把握地相信，明天一早，从施里塞尔到布拉格去的整条公路上的工厂里，都将有人散发传单。当然，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时，警察将四处奔忙，搜索散发传单的犯人，也必将有很多平白无辜的人被诬称为嫌疑犯。

白天过去了。晚上，我哪儿也没有去，留在家里，准备别人来搜捕我，我对这点早就估计了。也真是这样，我刚睡着，就听到嘭嘭的叩门声。我的房东迷惑不解地赶忙去开门，而我即自言自语地认为自己再也不会是涅瓦关方面的工人了。一个警察巡官从房门外闯进来，紧接着，自由党人——警察局长阿迦冯诺夫也跟了进来。他一面狡猾地表示道歉，一面声明他的来意，要在我这儿搜查一下。但

是，当他们经过详细的搜查，在我这儿没有发现任何犯罪证据后，他还是客气地宣称，仍旧要把我逮捕起来。他说，这是小事情，过两三天就会把我放出来。不用说，我是什么都准备好了的，这些对我都没有起什么特殊作用。早晨，当彼得堡大街上的路灯熄灭的时候，我和警察巡官，连同另外一个犯人，走进了拘留所。我弄清坐在我边上的这个犯人的唯一罪名是：有人在号房里从他的大衣口袋里拿走一本宣传小册子，交给了宪兵，因而他被捕了。宪兵确认某些个人的犯罪行为，往往就是这样。我也弄清楚，其他一些犯人也是不大参与撒传单的工作的，像坐在我对面的那个青年人一样。因而，我相信，那些真正散发传单的人，没有被逮捕，还平安无事地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最后，我们都被关在拘留所里。庞大的监狱，第一眼看到它，我就打内心里厌恶。但是，不得不和它接近，按照它的规则生活下去。十三个月的监禁，强迫我忍受着自己心里在这个时期内产生的种种波动。在这整个一段时期内，我没有和一个同志交谈过一句话。我旁边的人，也和我一样，默默地忍受着长年累月的死般的寂寞。我的关于圣彼得堡涅瓦关方面的活动的回忆，就此结束。

注释：

[1] 工人常常因为劳累过度而躺倒在床上。按照工人的说法，这种活计叫做“卖命”。——作者

[2] 井包，这就是说两个工人或者几个工人干同样的活计，因而像上面所述的，一个人拼命追赶另一个人，最低限度，不能落在别人后面。——作者

[4] 拉萨尔·斐迪男，1825——1864 年，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活动家。列宁称他为旧式的黑格尔主义者，好战的唯心主义者和先进科学的敌人。——译者。

[5]П·А·摩洛索夫——织布工人，是对彼得堡工人进行宣传的鼓动员。他曾经几度被捕和流放。他在索里维契城流放时，同 H.E.菲道席夫过往很密。在沃塔城

流放后，又流落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在那里身患重病，但是仍然从事革命工作。1899 年 4 月，他重新被捕了。出狱后，他在贫病交迫的情况下被送到斯摩棱斯克省绥乔夫市，后来死在那里。列宁主办的《火星报》在纪念 П·А·摩洛索夫的文章中说道："死者是我们运动中的优秀的鼓动员之一。"（1901 年 5 月第 4 号）——俄文版编者

[6]鲍凯里·亨利·爵麦斯，1821——1862 年，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社会学者和实用主义者。他把社会发展历史解释为地理条件对各民族的心理影响。他把历史的内容归结为理性的发展。——译者。

[7]这个办法后来被宪兵知道了。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常常发生这样的事，警察和特务用手推撞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如果发现这个人身上带着书，便当场把他逮捕起来。他们用这种方法曾经屡次逮捕过身上藏着传单和禁书的人。——作者

[8]В·А·谢尔贡诺夫，1867——1939 年，俄国革命家，圣彼得堡的冶金工人，布尔什维克。——译者

[9] 讲解员是列宁。——俄文版编者

[10] 俄罗斯大文豪冯维辛的作品。——译者

[11] 这所图书馆是克鲁普斯卡娅主持的。——俄文版编者

巴布石金的回忆（下）

1897 年初春，我迁居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在彼得堡坐了十三个月牢以后，能够作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几乎走遍整个俄罗斯，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而在初春季节来到南方的城市，可真叫人太高兴了。周围一切都是新的，人也好像完全不同，不是远远地留在北方首都的那些人了；从前老是看到监狱里冷酷的墙壁，使人感到头痛，现在可不再有那些墙壁了，一切都是轻松愉快的，而那儿——在另一条街的外面——就已经是辽阔无边的草原，在招呼着没有工作的人。

来到以后，我在当地警察的警惕的目光下办理了必要的手续，同时居然荣幸地听到市警察局长由于我选择了那个城市而对我表示不满，说是一定要给我吃点苦头。我开始等待彼得堡方面的文件，因为他们答应我要等文件到了以后，才发居住证。在等待的时候，我仔细地了解了当地的生活和工厂的制度，弄清了进厂工作的可能性和工资的多寡；至于一天做几小时工作，我因为住在一个当锻工的犹太人家里，所以已经弄清楚了。我看到各处都在陆续兴建新的工厂，心里充满了信心，认为对我来说上工是不会很困难的，所以就暂时安心地继续等候发居住证。过了大约三个星期，我的文件终于寄来了，并且归入警察局秘书的特号档案里。这位秘书填写了居住证，盖了章，把它交给我，我拿去给副局长签了字，走出警察局，希望有一个很长时期不来找这机关。可是居住证看来并不令人满意，它引起了公民证书登记员和房东太太的疑惑。所有这些都给我添了许多麻烦。我为了领取真正的公民证四处奔走，结果并没有成功。我只得忍气吞声，过着没有公民证的生活。

还在我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以后的头几天，我就盼望一个人来，这个人我是约好在该城的一个广场上碰头的。在约定的日子，我到广场上去白跑了一趟，那个熟人没有来，这种不顺当的事很使我难过。后来才知道，他没有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来，而是为自己张罗了一番，根本跑到另一个城市去了。这样，想同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会面的唯一希望完全破灭，而其他的熟人又不气味相投。因此我自然不由得感到寂寞，而且除掉这种寂寞以外，还加上运气不好，我不能进工厂工作。

钱快用光了，前途又很渺茫。我早晨五点钟起床，动身到一个工厂去，就已经在那里碰上一大群失业的人。有时候我站开一点，有时候挤到这个人群中间，同他们混在一起。当然，大多数人是从农村来的，主要是奥尔洛夫查人。他们有同乡在这里，指望靠他们的帮助找到工作，结果多半能够达到目的；我屡次看到，

好些下班的工人，就是一两天前同我一起站在工厂的大门外的。我没有任何熟人。每次向经理或工头要求工作，都没有成功。

在我到达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第二个月，有一天早晨，房东上完夜班，从工厂带回一个有点醉醺醺的工人。这个人自称为同志，他把我从床铺（实际是铺在室内地板上的一条薄垫子）上叫起来，拉我到他屋子里去。在那屋子里，我碰见了两个彼得堡人，他们是在同我一样的境遇下来到这里的。我的一个新朋友是工厂里的模型工人，另一个是工厂里的学徒，虽然他年龄已经不小（二十岁）。这个学徒的耿直脾气和他讲的故事都使我对他发生好感。在那些故事中，他自愿地把几次著名的彼得堡罢工的波折津津有味地讲给我听，并且还讲起他在那里所起的作用。我第一次从他口里听到那遍及彼得堡各工厂的波澜壮阔的罢工运动，并且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相信，鼓动工作初步下的工夫没有白费，玛克斯维尔工厂的那个工人的话是对的。那时他说，新年以后，一定会闹风潮。如果不闹风潮，而是举行罢工的话，这等于说，这时候工人的思想已经前进了一大步。这个朴实的小伙子马秋哈（为简便起见，我们这样称呼他）是群众的最典型的代表。他除了在乡村小学获得的最简单的概念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他起初费力地看完那些在工厂里偷偷地散发的传单，后来才亲身积极参加散发传单和鼓动罢工的工作。在遭到放逐以后，他只是惋惜朋友们的被捕，担心这种情况会损害运动的开展，并且满腔燃烧着彼得堡的罢工热情。

在马秋哈的身上，我满足了我对言行方面的切实要求，因而他获得了我的全部同情。同他认识以后，我感到精神特别奋发，郁闷的心情完全消失了，除非在自己感到无事可做的思想影响下，这种情绪才会偶然出现。可是，人们使我相信我很快便能踏进一家工厂，早晨到我屋子里来呼醒我的那个工人就在这工厂工作。后来我才知道，曾从彼得堡招募了一些专业的工人，以应工厂的需要。应募的工人旅费由自己掏腰包，可是他们在工厂里享受不到任何优厚的待遇，眼看着这样

地受到了欺骗，都想回彼得堡去。他们没有钱，只得暂时继续工作，后来对当地的生活慢慢习惯起来，逐渐把彼得堡抛在脑后了。和同乡，和思想上的同志认识以后，我常去拜访他们，也请他们上我这儿来，并且送他们几本带来的书。生活过得比较活泼了。

一天晚上，他们知道我第二天早晨得上工厂试工。这消息是令人十分欣慰的。早晨，我觉得非常兴奋，怀着开始工作的希望往工厂去。在紧张的工作停歇了一年零八个月之后，我不免心里发慌，精神特别紧张地等着试工。一个意大利工头来了，他一句俄国话也不懂，有一位同志照顾我，把我介绍给他。

意大利人一声不吭，抽着雪茄，用打量的目光注视着我，暗自作着结论。过了十来分钟，我得到试工，也就是干活的机会，这个活我是应当尽可能干得好些的，为的是让工头瞧着活儿，可以了解我的工作能力多强，并根据这一点来估计工资。我接受了试工以后，立刻聚精会神地干起活来，因为用锯子〔锉刀〕锯钢十分困难，过了两个钟头光景，我的活儿有了进步。不过，结果使我感到非常惊骇和惋惜的是，我觉得我不能够完成这项工作，马上像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似的。

问题是：还在进牢以前，我就长期没有干锉刀的活，而在牢里待了十三个月，终于把我一双手完全给毁了，使它不宜于干活了。我的手变成了老爷式的手，上面连一小块茧皮都很难发现，而对工人说来，茧皮是护身甲；不做工的人皮肤同钢磨擦，会感到疼痛，有了这种护身甲，皮肤同钢的磨擦以及任何扎伤，都可以忍受得住，不会有什么危险。我还没干满两个钟头，就觉得右手巴掌上痛得很厉害，我尽量设法不去注意它，继续干下去，可是肿起来的茧皮痛得够呛，妨碍工作。

有一个刚到这里的过去彼得堡的工人就在这工厂干活。他曾在“十字架”监狱[1]坐了一年牢，并且度过了监视期。他知道我是彼得堡人，来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不久，同时还受着监视。我们交谈了几句话以后，互相有所了解，我就把

我的苦痛告诉他；他很表同情，叫我停止工作，可是我还是继续干下去。当巴掌上的茧皮破裂，手里渗出水来的时候，我还没有丧失把工作进行到底的希望，在扎上一块手帕以后，仍然继续干下去。可是一切都是白费气力：手没有了劲，只得用略为不同的方式握住挫刀，因此工作就不能照旧进行。我还是干着，虽然必须停止工作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最后，我支持不住，终于屈服了。我对翻译说，让我过三四天再来结束试工；他把我的要求译给意大利人听，这位工头以为我害怕试工，也就是说不能工作。我猜到他的心思，就伸出手给他看，表明我不能干活的原因，这时他相信了，对翻译说了句什么话，这话由翻译译给我听，说是机械师要他转告我，我身体柔弱，不适宜干他们的活，因此他们打算把今天的工钱算给我，人却不能录用。对于这话，我能提出什么异议呢？当然提不出什么，满肚子委屈，拿了八十戈比（据说一天的工资是一卢布二十戈比），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失望地回到自己的住处。“现在我怎么进别的工厂呢？”我想，“要知道，这样的试工又会磨破皮，人家又会谢绝我，说我是个身体柔弱的人，不适宜做工厂工作的。”我寻找可么使掌上起茧皮的办法，可是想不出来。我的手痛了两个星期光景；后来我试试在手杖上磨擦手掌，想让它磨出茧皮来，可是这样做终于叫人厌烦，我就停止了。

有一天，我在车站站台上走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的一位彼得堡的同志，他是同我在彼得堡工人的几次大会上碰过头的，我们彼此都很高兴，并且畅谈起来；原来我们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已经住了两个多月，彼此还不知道，只是偶然的会面才使我们聚在一起，使我想起我们关在拘留所里的情形和其他许多事。看来，我们是处在同样的警察条件下，并且等着同时结束警察局的监视。我同他谈了一会以后，就把我认识几个彼得堡人的事情告诉他，同时答应想法使他和他们认识。在这一次，我们碰见了我那天试工失败时在工厂里认识的那个工人，因此我们便一起上他的住处去。这样，我们彼得堡人已经有了三个，并且很快就变得很投缘。

最后，我总算顺利地进了布良斯克工厂，而我认识的那个年老的彼得堡人则进了一家小工厂当工头，很快就能把另一个同志和马秋哈安置进去，因此我们大家都觉得很满意。不久，我们又认识了一个彼得堡人，他是两年前放逐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现在已经在一家工厂里工作。我们常常会面，终于决定想把生活安排得更密切些，因此特地租了一间屋子，三个人住在一起，其中也有我。在这以前，我已经和工头吵过几次架，因为他老是想用罚款来吓唬我，而我总是声明说我不能同意罚款，我们同他的问题闹成一场共同的斗争才算告一段落，结果使我干了两个星期不能再干下去了。我待在这工厂的短短的期间，发现了一位很好很能干的人Γ（Γ·И·彼得罗夫斯基。——编者），这个Γ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常常作长时间的谈话，这些谈话使我们能够真正按照彼得堡人的方式生活着。

在这个时候，我靠马秋哈的帮助，同一个子女众多的老人见了面，他是个受合作制社会主义影响的老工人，一个手艺出色的工匠。这个人的理想是：开设公营小铺，以便后来由此成长出一个良好而巩固的强大组织，能够供给资金来同资本家作斗争。也像所有入了迷的人一样，这个老头儿一心想要开设这样的小铺，所以常常同我谈到这个问题。我可决心要寻找现有组织的一切旧的力量，那时再开始有所行动，而暂时只是继续扩大交游，这事我甚至也很容易地办到了。每逢星期天，我又忙起来，我得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一些青年人，那些青年人是Γ有时替我召集来的。固然，他自己也需要全面的发展，因而他晚上常常在我这儿，但是我所熟悉的加班加点制度是那时主要的敌人。虽然我看到这样的工作使Γ在体力上很感疲乏，可是我又不能硬劝他完全不做夜工，因为他还需要训练做个优秀的工人，此外，他还受到家庭环境的压迫，那种环境需要他在经济方面给以不断的有力的支持。这就是我将来的帮手。

像我已经讲过的，我来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将近三个月的期间，由于我没有可能待在工厂里，我根本无事可做。而在结识朋友方面又没有达到很成功的地

步，因而我没有立刻投入紧张生活的旋涡中，并且当时也没有这样做的心情。在认识了新朋友，开始过那非常活泼愉快的亲密的小组生活以后，我们完全没有觉察到整个夏天已经过去，秋天已想降临了。因为没有特殊的工作，我想起了彼得堡夜校的生活，心里按捺不住，就报名参加了制图和绘画班的夜课，朋友们也学我的样。但这对负担重的人说来，是个很大的重荷。从住宅到学校要走四十分钟；在白天忙碌的工作以后，这样的闲逛决不是件乐事。我的朋友们不久就不去了。我一个人还继续去上学，如果学校是有趣的话，我也许会去很长一个时候，虽然对我这样一个被涅瓦关的星期日学校所习惯了的彼得堡人说来，这个学校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此外，有一个小老头儿，后来又有一个我称之为Д的人，常常在晚上到我们屋子里来闲谈。我记不起这个Д是怎么跟我认识的，他近来常常来看我们。显然，我并不喜欢他，但这一点，我可没有表示出来。

我有时候也不得不同这些新朋友谈话。小老头儿特别引起我的同情，他看见我们的屋子不隐蔽，不很愿意谈话。在告辞的时候常常请我上他那儿去。我有时去找他，可是在他那儿觉得不很自在。你有时候到他家里，他正坐在那儿同他的太太（一个相当胖的迟钝的女人）说着什么事。打过招呼以后，他请我走进前面的屋子，毫不客气地把里面的孩子赶出来，关上了门。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小声地或悄悄地谈话，既不让他的邻居也不让他的家属听到我们的一言半语。如果他的家属有谁偶然走进屋子，这个小老头儿就要骂人，把他赶出去，并且把门上的搭扣扣上。我和他谈书籍、社会主义、工厂制度，一般地也谈各种问题；他把从前哈尔科夫的工人运动告诉给我听。他曾在那里住过好多时候，最后不得不离开那里。从他嘴里，我知道了哪些人是可以信任的，哪些人是很有希望的，哪些人是危险的；总之，我力求从他那里获得可能得到的好处。在我们谈话时，他往往讲起他怎样把合法的书籍藏起来，免得人家注意到他总喜欢研究“这些无聊的东西”。

自然，我看出这个人是没有能力参加现代的运动的。他年纪已老，不易改造过来。虽然如此，最好还是给他一点什么工作，不让他的不甚深远的思想完全埋没掉。有时候，这样的人也能对运动有所帮助，当然，这时候跟着他们走是危险的，必须让他们一瘸一拐地勉强跟着你走，那末事情就不会遭到损失了。我正就是力求用这样的态度对待那个老头儿。于是我们的友谊就增长起来了。不久，我又认识了同样的一个小老头，不过年纪比较轻些，他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人，这些目的和计划在我看来完全是空想的，也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可是你既然不能给他以另一种理想，又何苦打破他的理想呢。在我住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下半年中，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交游。Д仍然继续跑来，并且不知为什么特别注意我们的生活，这常常使我很恼怒。我有时向同志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Д究竟为什么要来，他需要我们什么，他只是向我们打听，而一点也不把自己的事情告诉我们。假如他想博得信任，他就得更直率些。

最后，我决定直截了当地问他前来探问的目的，可是这一点没有来得及做到。

有一次，一个同志跟我讲起Д给他的一本小册子，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是什么小册子了。我们决定一同读完那本小册子。我们的屋子很不方便，因此我们就到那老彼得堡人的住处去找他，在没有屋主人和房东在场的情况下，了解了小册子的内容。这是我们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住了六、七个月之后读到的第一本非法的东西。可见那里的非法事业还很薄弱。在这本小册子以后，又出现了其他的小册子：我特别需要它们，所以我把它们抓得很紧。之后，我们同Д的友谊就更亲密了，常常同他谈起从前彼得堡的事情。

有一天，Д向我们建议，要聚集起来讨论一个问题。我和同志们很高兴地同意了，并且就在那个星期的一天晚上在一间屋子里聚会，提出了希望团结一致的问题，希望更积极地表现自己的存在的问题，以及从各工厂中搜集材料，特别是搜集有关当前重大事件的材料的问题。为了不致把这件事情遥遥无期地搁置下来，

我们决定立刻着手工作。此外并决议，每一个人不但应当搜集材料，而且应当为他所工作的工厂写传单，这样的传单决定在下次会议上宣读，如果我们认为它们是可以用的，那就用胶版印出来散发。这次会议决定，由于工作不多，暂时有三个人一起聚商就够了，在我们两个人中间，我当了选，因此从那一天起直到顺利地离开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两年几个月中，我成为这种会议的当然成员。我们的会开得相当多，各种技术方面的问题归两个知识分子负责。他们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或是来开会，或是带来传单，商谈其他问题。我记得，我们从开头起就彼此十分尊重。我和Д——工人和两个知识分子非常活跃地参加我们的组织。Д已经是个相当有经验的、早就干过革命工作的人了。主要是，他善于进行秘密活动，心思非常周密。我也已经有了彼得堡的经验，知道怎样行动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那两个知识分子不很沉着，性子太急躁。这一点基本上只会对他们而不会对我们这两个工人有害。就我所知道的，在我们成立这个组织以前，就已存在着一个可以称为手工业性质的、没有什么特出表现的旧组织，而我们的组织则在各工厂中奠定了作广泛鼓动工作的基础。在开始积极工作以前，我们就预先规定了自己的行动纲领；为此，我们同许多工厂，甚至同那些设在离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三十俄里的卡门地方的一些工厂取得联系。我们同卡门地方各工厂的正确关系建立起来了。传单也分别准备好了。这些传单预定要在同一个时刻，即我们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散发传单的那一天散发出去。

早在我们开始鼓动工作以前，我就觉得有必要另外租一间屋子，以便更容易保密。因此，我在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失了业，还是租了一间低廉的屋子。

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对于散发传单的人说来，1897年年底和1898年年初是运气特别好的日子。所需要的，不过是在夜间大胆地跑出去，在碰不到任何人——正在安睡的警察、清道夫、奸细和密探——的时候，赶忙散发传单。我们很

好地利用了这种情况。在出色地完成工作以后，只是在有些地方碰到了更夫，就平安地回到了家里。

有一天晚上，收到了预定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查德涅普尔和卡门散发的第一批传单。必须在夜里把它们散发出去。传单与其说是很多，还不如说是很少，所以我们决定要张贴一半。我转告一个同志，让他准备在当天晚上十一点钟以后同我一起去工作。

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气候，是相当寒冷的，很快就把所有那些不需要待在街上的人都赶走了。更夫偶然敲敲梆子，让人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敲过以后，就坐到角落里去舒舒服服地打瞌睡了。

当我和一个同志袋里藏着传单，手里拿了一大罐调好的浆糊出门的时候，月亮已经爬得很高。我们绕过广场，越过铁路，走到了一个住着工人的名叫“工厂”的村镇。我们四面张望了一下，没有看见什么人，就在栅栏上涂抹浆糊，随手把传单在浆糊上粘牢。我们小心地越过大路，一面在那些小屋的墙上涂抹浆糊，贴上传单，然后四处把传单放在地上或塞在栅栏的缝里。后来，我们进入另一个街区，把同样的事情再做了一番，不过很快浆糊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好把传单塞在栅栏的缝里。

那个同志在散播和粘贴传单的时候心里很慌张，往往不够勇敢，但他还是继续忠实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过了一些时候，我们一张传单都没有了。我们就这样没有让谁注意到我们的独特工作，平安地回家了。

工人们早晨上班的时候，看见了散放在街上的这些传单，就把它们拣了起来或从栅栏缝里拿了出来，这样，传单很快就拿空了。群众开始停留在栅栏旁边，读着粘贴的传单。有些传单，他们很中意。他们抱着想把这些传单带到工厂去的愿望，尽力设法把它从墙上揭下来，这样一来，部分的传单给他们撕破了，他们自己固然没法加以利用，别人也就没有机会再看到了。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后来

得出结论，认为贴传单是不值得的，因为这种工作要冒很大的危险，进度很慢，而收效不多：反正大部分都要撕破的。我和那个同志只在一个需要散发传单的地区活动。除我们以外，还有人在其他地方完成这项任务，虽然我们人数很少，不能很好地到处散发传单……在假定有必要散发传单的时候，就提出了可以在各工厂中散发传单的问题；

这时才知道，我们只能在两个工厂里散发，虽然三个最大的工厂和铁路工厂里还没有发过传单。由于考虑到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受着监视，可能很容易引起警察来追踪散发传单的人。我们就不得不利用我在上文提到的那种散发传单的方法。

警察到第二天的早晨才知道那些出现在街头的传单，可是这些传单很少落到他们手里。第一次，一切都很顺利地过去了，参加的人谁也没有被人发觉。

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及其郊区的情况就是这样。可是卡门方面的情形还一点都不知道。最后，也从那里传来了很可喜的消息。这就是说，开头的工作做得很成功，并且显然它在鼓舞我们要在最近期间也把其他的传单发出去。但是我们打定主意不找警察的麻烦，要更仔细地逐一检点一番，看有没有暗探在我们后面盯梢，因为我注意到有一件可疑的事情在追随着我。在留心观察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个普通人经常在我住宅附近徘徊，显然他是在监视着我；那时我就开始注意他，往往出其不意地跑出大门，向他那个方向看去。

那个普通人戴着一顶庄稼人戴的帽子，穿着一件短外衣或短大衣，继续每天待在同一个地方，或在同一个地方徘徊，表面上装作并不注意我所住的房子。我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就通知任何人都不要来找我，而我自己则力求整天待在家里，晚上才跑出屋子，出去的时候，让灯仍旧点着；假如偶然有人打算从远处向窗子里窥视，就会相信我好像是在家里。我沿着栅栏下降，然后跳了下去，等我一下子到了离我住的那条街道很远的地方、并且知道背后不会有人盯梢的时候，便动

身到我需要去的地方去。我用平常的办法回家，因为要沿着栅栏吊到上面去是很困难的。这样办没有什么危险，此后我也就常常采用这个办法。上面提到的那个人监视了我两个星期光景。看来，他对我颇有好评，似乎已经把这种意见报告给了他应该报告的人，因此我以后就继续安心地工作了。

在散发第一批传单之后过了约一个月，打算在工厂散发的传单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对于每一个工厂专门预备了一种传单。我们相信这些传单将轰动一时，可能还引起普遍的搜查。领到的传单是这样分配的：一部分留给铁路工厂，另一部分留给布良斯克工厂，第三部分留给制钉工厂，第四部分留给哈勒施坦工厂（农具工厂），第五部分留给德涅伯河右岸的一些工厂（好像是法俄工厂），最后一部分留给卡门工厂。一共将近有八种不同的传单。每一种传单都反映出散发传单的那个工厂对工人层出不穷地滥用权力和残酷勒索的行为。传单应该在夜间或清晨散发。为了在白天就能知道结果是否顺利，每一个在一定地点散发传单的人都应该做出顺利或不顺利的暗号。如果没有暗号，那就应该认为这个人已经被捕。暗号要用白粉在约定地点的墙上或栅栏上标出。为了避免混淆，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暗号。这种办法很方便，也很秘密。

夜晚，我带了马秋哈动身到一个工厂去；我们在路上藏了一部分传单，然后走近工厂。进厂里去是很危险的，甚至在旁边走过，都要十分小心，免得给看厂的狗听见。我们走近一座两层楼的楼房，跳过了栅栏，到了楼房的窗子旁边。我把马秋哈举到窗口，他打开了小窗，使劲把一扎传单扔了进去。我们就这样地继续行动，把传单扔进三个车间，只剩下两个车间没有去；我们相信，在工人们的帮助下，一到早晨这些传单也会在其他的车间里出砚。的确，到了早晨，聚在一起的职工刚刚打开车间的门走了进去，立刻就把散在地上和工作台上的传单捡了起来，过了一刻钟，直到工长为止的全体职工都读了传单，虽然没有达到罢工的地步，可是大家的不满情绪已经极端高涨了。在另一个工厂里，由于工厂日夜开

工，工人们到处奔忙着，使散发传单的人感到棘手。因此，散发工作曾经发生极大的困难，可是这个散传单的人很有耐心，也非常机灵，只是无可奈何地耸了肩膀。他早晨带着传单去上班，不慌不忙地工作了一整天。当大家在七点钟准备回家的时候，他也和别人聚在一起，可是他没有走出大门，而是走到人们挖掘自流井的地方，溜到了井里，坐在梯子上整整待了五个钟头，直到夜间十二点钟，这正是机器停歇让工人吃半夜餐的时候；后来，我们这位自愿囚禁起来的囚徒带着准备好的传单小心地爬到上面，等着熄灯。这是最宝贵的时间，他就是为了等待这个机会才在坑洼里坐上五个钟头的。各车间的机器一停歇，电机也立刻停下来上润滑油。这位同志看到电火一灭，马上就从坑里跳出来，奔进车间，不顾在夜间的黑暗里会撞着什么东西，迅速地散发传单。接着他跑出车间，或是奔进另一车间，或是从打破的玻璃窗里扔进传单，然后急忙地飞奔到选定的地点，就在电灯的照耀下跳过栅栏，脱离险地，没有被谁发觉。电灯熄灭三五分钟，这期间，工人们安静地坐在工作台上或者别的东西上面，丝毫想不到有人在匆忙地跑着散发传单；当灯光复明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抢到一张放在地上或工作台上的传单，开始阅读。这时候，我们这位已经跳过栅栏的主角，打破了办公处的玻璃，把传单塞了进去，此后就安然地回到家里，躺下睡觉。早晨，他到工厂去的时候，把这种传单当作厂里的新闻一样阅读着。这样的方法是常常被使用的。

夜里，当局的人都在睡觉，只有到了早晨，才会来没收传单。这时留在厂里的传单已经很少。它们一部分落到乌克兰土屋里，落到卡伊达基或捷也夫卡，或者落到了契契辽夫卡，因此警察们有时候只好满足于两、三张没收的传单，这当然无法削弱这些传单所造成的效果。

在其他几个工厂，大概也正是用这种方法偷偷地放置传单。并且处处都很顺手，没有引起人们对放传单的人发生任何怀疑。这一次传单起了很大的影响，所有的工人都知道了这些传单，工厂主管人员也知道了，宪兵队和警察队也知道了。

可是他们敲谁也弄不清这是哪些人散发的。这就鼓励我们用同样的办法继续进行以后的工作。在所有的工厂里，工人中间传说着不久就要发生骚动的谣言，这些传单使工人们振奋起来了，另一方面，当局的气焰显然已经矮了半截。

我记得，在卡门工厂散发的传单里，曾提出在工厂系统内建立病房的要求，第二天就从理发馆里请来一个医助，安置在工厂的编制以内；还要求在那里造两座出外的大门，这也如愿以偿了；另外还有某种要求，也得到了满足。当地的警察局长（显然是县警察局长）猜想一定要发生罢工，而他实在又不知道工人们希望达到什么目的，于是他想起了传单里提出的种种要求，就不等工人方面提出任何要求，立刻让这些要求得到了满足。在有些工厂里，许多要求就是这样地得到满足的。

通常，任何工厂当局都力图使大家相信，他们工厂里的制度是最好的，工人对工作条件都很满意等等。而现在突然这样赤裸裸地揭露了各种虐待工人的行为！工人们从传单里知道了实际情况，清楚地看出指示的正确性，都满腔希望结束这种岂有此理的行径，哪怕是结束一部分也好。总之，平静的沼泽开始起了涟漪，预料就要掀起汹涌的浪潮了。

骚动只会给工人带来损害，关于不希望发生骚动的话，在传单里讲得很清楚。因此，听到工人中间传说完全与传单内容相反的要举行骚动的谣言时，觉得很奇怪；可是工人们在读过传单后却立刻说，人们号召举行骚动。进行斗争旧的传统还很有力量：工人们还不能想象不殴打工头或一捣毁办公处就可以罢工。在倾听他们的谈话并直接理解到所谈问题的范围时，不会听到他们提起任何罢工的事，虽然每一个工人都会讲述一些关于骚动的回忆；而这个时候如果提起当局方面所实施的镇压，那是不会产生什么效果的。这种谈话总是以他们暗地里表示希望组织一次像样的骚动而告结束。当然，这时候他们会想起某一个他们真正称颂的领

导者。在这种情况下，群众自发地加以理想化的，显然不是他们完全陌生的罢工，而是骚动，因为这种抗议的方法是每一个人都能懂得的。

传单鼓动了厂里的群众，我的工作增加了。首先，必须搜集更多的材料来印发新的传单；其次，需要同我的那些在卡伊达卡方面的熟人晤谈，这常常是在晚上。年轻的群众不能很好地领会我的意思，往往完全误解了我的话；只有一个青年真正懂得我的意思。他们要求常常来，甚至企图租一间单独的屋子供上课之用。在这一伙人里，我曾碰到两个近乎民意党人的人……最使我生气的，是他们往往以不许人家提意见的命令方式来传播自己观点的那种落后作风。如果有哪一个年轻人开始摆脱他们的影响，他们就要暴跳如雷。他们特别对Γ感到愤怒，因为Γ似乎想要把年轻人引上可怕的社会主义和革命观点的道路，如果有人还是感染上这些观点，他们就会把他视同陌路，有时候还认为同他作梗是很有道理的。有一个民意党人在布良斯克工厂的机械工场里工作，得到了相当多的报酬，自己有一宅小房子，生活过得很不错。因此，他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显然没有什么热情，只求白忙一场。我屡次企图了解他们究竟抱有什么样的观点和规定什么样的纲领。可是我得不到任何结果，只看出他们是竭力想要扩充自己手下的青年人的力量罢了。

“在谈‘斯巴达卡’以前，应当研究一下希腊的历史，你才能够了解这部小说，”有一个民意党人对年轻职工们谈起他们阅读“斯巴达卡”时说，他们总是竭力强调自然科学，而我在翻阅那些从这几位先生那里拿来的书籍时，多半只看到算术习题集、文法课程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当青年人要求看一本比较严肃的书籍时，他们就回答说，这还太早，据说应当先精通地理、算术、文法等等，然后才可以开始看严肃的书籍。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那些年轻人老是不满意自己的领袖，不愿仔细研究他们给的书籍。

当然，不能否认在教科书里也有好的方面，但这应当在学校里，而不是在一个人希望了解他的社会地位的本质或对工人运动发生兴趣时的学习上。民意党人的学生固然常常向自己的老师提出意见。可是他们并不能够全心全意地献身于需要牺牲的工人运动，因为他们是被自己的老师用锱铢必较的自私精神教育着，虽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要求放弃每一戈比，甚至要求争取废除每一戈比。我记得一位同志讲起，当他偶然走进车间谈谈某一个人的情况或利用机会向什么熟人进行宣传的时候，就有一个上面提起的民意党人来追问他。这个不幸的人只是为了欺瞒热心的民意党人的独特的侦察行动，有时就不得不采用伪装的办法。在和这种民意党人谈话时，我常常想起彼得堡的同志 H 的一句话，那是讲到彼得堡的一个工人——自由分子时说的。

“作为一个自由分子，他还不坏，是个很好的人，可是作为一个工人——社会主义者，他就相当卑劣了。”这句话对于这些先生也是同样适用的，虽然他们只是解释了上半句。而俄国的宪兵们有时还要查究甚至惩罚这样一些先生！这只证明，警察队和宪兵队的一切蠢物看来都是恶魔。

我打定主意不同上述的民意党人打交道，并且要求同志们不要在他们面前讲起我，免得让他们知道。我担心人家可能会对我散布各种流言，那样的话，我就不容易继续保持隐蔽的地位了。在当时俄国的条件下，出了名是很危险的。这一点我当然完全明白，因此我权且把民意党人撇开，固然还经常特别注意他们，同时开始常常到卡伊达卡的当地青年人聚集的地方去。我在那里待到十二点钟，待到夜间一点钟，然后动身回家，由几个人送到一个树木茂密的深谷，我自己再从那里走向德涅伯河，路上由于刺骨的劲风和寒气而直打哆嗦。我身边藏着一柄短刀，因为在那种地方走路并不安全，我曾相信我会被人抢去银钱和其他东西。在卡伊达卡有了熟人，就使我以后能在他们从前没有到过的地方以及在我离开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以前他们不再去的地方散发传单，并且对此后的工作也有把握。到

了 1898 年的春天，我们成了孤儿。在传单出现后不久，我们的知识分子开始受到严厉的监视，他们应当离开这个地方。可是，他们显然抱有完全不同的意见，再三跟我们说谁也没有监视他们，并且继续来拜访我们，继续准备一批一批的供散发用的传单。

有一次，我们本来规定要举行一次讨论某一问题或关于领取传单的碰头会。我和一个同志来到了指定的地点。可是我们自己人一个也没有碰到，只发觉有一个陌生人站在街角。我们没有特别注意这一个人，就停下来开始谈话。我们在广场上站了好久，于是那个站在街角上的人就开始形迹可疑地盯着我们看。我们注意到了他，就讨论起这个人是不是密探的问题。我笔直地向他走去，希望看清他的面貌。他发觉了这一点，就沿着街道走去，很快便拐进一个院子，在那里消失了；我走近那所房子的大门，没有看见一个人，就折回来告诉我的同志，说那显然是偶然的事情，于是我们继续站在没有人的广场上，心里已经很焦急，埋怨同志们不守时刻。最后，终于来了一个同志，在他后面很快又出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当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开始讨论某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个行动诡秘的家伙又在附近出现，开始卑鄙无耻地在我们的四周兜圈子。我们的心里产生了要结束这个密探的性命的热烈愿望，可是谁都没有手枪，而他显然是带着武器的。我们决定使用刀子，大家都向他移动。也不知是他猜到了威胁着他的危险，还只是以为我们要穿过广场，他却用相当快的步伐沿着那个广场走去。当他已经离我们很远的时候，我们突然拐弯，走过一部分的街道，然后跳过了栅栏，走上另一条街，再爬过栅栏，到了铁路停车场，在那里的大批车辆中间是不容易追踪我们的。这样，我们的会议给打断了，而我们在匆忙地交换了一点情况以后，就接受了传单，各自走回自己的住处。这是最后一次和知识分子会面。因为，正如后来所知道的，确实有人在盯他的梢，而上面的那个形迹诡秘的家伙就是从城里专门跟他来的。当那知识分子躲进了一个空车厢的时候，密探认为一定是到指定的地点会面去了，

因此他仍旧在那里等候，希望好歹能发现一个工人的踪迹。这一点他没有成功，可是宪兵们不久就不让那个知识分子自由行动了。现在想起那个知识分子的时候，我可以说，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但是他盲目地相信能够很快地实行自己的主张。

我记得有一天夜里，当我送他回家的时候，我们意外地碰见了Д。我们的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在城市的危险地段，这样晚是不常看见行人的；因此，我们放心地在一座小桥上坐下以后，就非常热烈地谈起我们的工作来。

夜间的黑暗笼罩着我们，只有远处布良斯克工厂的宽阔的火光鲜明而动人地证明我们的工作的必要性。那个出了神的知识分子说，我们的鼓动工作再搞三年，多至四年，这个制度就要崩溃了。

我窃笑着这个出神的知识分子的天真，这是一个热心的、浅薄的人，一个社会主义者。可是他为了自己的理想甘心毫无保留地牺牲自己。大家可不愿使他失去信心，他对叶加特林诺斯拉夫说来是个值得看重的人，他第一个开始用鼓动宣传的方法进行工作，第一个带来了一些传单，那些传单有必要向广大工人群众指出并说明他们的艰苦生活，并使他们的闭塞的头脑中产生对于革命的渴望。大概，此后的长期监禁完全损害了这个先驱者的智力。

这样，他就被逮捕了。另外还有几个知识分子也被逮捕了，可是工人中间却没有一个人被捕。无论我们或事业所受的打击，都是严重的。可是，这些逮捕绝对没有在较深的程度上影响群众中的工作，因为工人——领导者们没有遭到损失。事情进行得相当顺利，参加散发文件的人每天都在增加……可是我的话有点讲过头啦。

正如我曾经提到的那样，在刚开始散发传单的时候所采用的一种方法，是把传单贴在过道或者墙角旁边的栅栏上，但是很快就被警察注意到了，所以不得不改换另一种方法。记得有一天夜里，天气很冷，我和一位同志从家里出来，两个

人的口袋里都装满了叠成三角形的传单，积雪在我们的脚底下沙沙作响。我们走完一条街又一条街，在每条街上都撒下了三、四张传单，走到最后几条街道的时候，我们便分头沿着两条平行的街道走去，一路上撒着传单；同时必须常常从街道的这一边走到街道的那一边。最后，我们在街道的尽头相遇了，便向着布良斯克工厂走去，尽可能地在所有通向这家工厂的小路上都撒下了传单。我们走了很多的路，后来便拐了个弯，越过铁路，向另一个地点走去，后来从那里再往前走，又撒了许多传单，因为这条路是通向工厂区的。经过一处栅栏，在那里扔完了传单以后，又走到铁路上来，从一列停在信号机旁边的列车车厢底下经过，又在路上撒了许多传单。当我们看见自己的口袋凹进去的时候，便往回走。走过工厂以后，我们便朝着一条通向这家工厂的小路上走去，虽然路上行人很多，可是我们仍然把剩下的传单都撒到这条小路上。我们总共只有两个人，但我们尽可能地在许多条小路上撒了传单，这样就能使这些传单准能落到每一家工厂里去。我们用这种方法把所有的传单都撒光了，便从容不迫地回家。我们在约定地方的栅栏上，用粉笔划了个暗号，好让自己人在白天看见这些暗号，知道此地一切都平安无事，因而可以走进此地的某一户人家。早晨，我们一走进工厂，每个人都听到大家在纷纷谈论传单的事情。我们津津有味地听见人们夸大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许多人都在谈论，一个夜里到处都撒了传单，可见“他们”干这件工作的人一定很多。当然，我们也听到了关于“这些人”的威力和勇敢的各种各样的传说。

一个工人毫无危险地在大街上捡到了一张传单。他把传单带到工厂里，于是，许多人把传单上的文字读了一遍。最初因为积极分子的人数很少，很难发现传单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工人们在谈论些什么。后来我们特别注意这件事情，责成大家有义务尽量地去倾听工人的谈话，把听到的一切都汇报给委员会。此外，每一个积极分子都应该尽量去认识暂时还没有和革命发生任何关系的工人，时常去访问他们，以便尽可能多搜集一些关于工厂的确切情报。

在卡门工厂（离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三十俄里）撒了三、四张传单以后，那些撒了这类文件的工人便引起别人的注意。有一个星期日，一个撒传单的工人来找我，后来又来了一个，他们把自己要逃往奥地利去的打算告诉我。因为待在奥地利比起待在俄国要好得多，而且自由得多。

我觉得很惋惜的是，工作刚刚开始，每一个有觉悟的人都十分重要和宝贵，而且工作还没有打好什么坚固基础，而这时候，他们却想着要走开，他们好像光是为了自己的“我”，而要尽力赶快离开，这是件十分遗憾的事。

另一方面，我又害怕他们当真会被捕，这等于把多余的一张王牌送到宪兵的手里。宪兵会把这些人从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弄走，因此，能够逃脱宪兵的魔掌，从而逃脱这些张着血盆大口要吞食我们这些受害者的凶恶敌人，也是一件愉快事情。我恳切地要求我的卡门工厂的同志们向我报告他们平安越过俄国国境的消息。他们答应了我的要求。不久，我果然知道了他们平安抵达奥地利的某一城市，并且很快在那里找到了工作。这些同志离开时，给我们留下了关系。他们走后，传单继续像从前一样准时地出现。这是最早一批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们干的，我当时曾被迫和他们分手。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我又被迫和另一批朋友分手，我曾经和这些人在夜间散发过传单，有时曾一同在井坑中。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只要什么地方一开始发生运动，那里很快就会失去一些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情投意合的同志。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我们失去了几个知识分子，他们一直都是我们的鼓舞者。必须提一提这些知识分子的优点，他们在没有和我们商量以前，几乎从来没有擅自做过任何事情，所以我们的新事业进行得很顺利，而且获得了发展；我们之间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意见分歧。进行这种工作，这点无论在哪里都是很重要的，而且必须加以强调。现在我们被迫失去了这些一直完成了重要工作的知识分子。

不用说，这对我们发生了严重的影响，对鼓动工作的影响尤其严重：我们甚至没有一个人做过这种工作的技术方面的事情。这点在传单的缺陷上特别可以看出来，因为编写传单，我们当然是办不到的。正像不幸地发生了一场埋住许多人的雪崩以后，不许人长久地考虑用什么特别方法来刨掘这些人，而是必须赶快拿起铲子来挖，不知疲倦地、无止境地挖下去，一直挖到能找出活人或死人，我们也没有时间讨论我们的处境，必须尽可能快地接受留下来的工作。

Д同志不得不去建立一处文件储藏所，虽然文件的数量不很多，但是它们对我们越珍贵，我们就越应该尽可能谨慎地保藏它。Д花了两个卢布租下一间屋子，他把文件放在篮子里带到这间屋子里去，放在卧椅（一种木床）底下。第二天自己就离开屋子，借口职务关系，必须出差，实际上他是回到他定居的那所房子去，而且从来没有想着要离开那里。他开始每周一次或两次地到文件储藏所去过夜，免得引起别人怀疑，或者怀疑他专门来拿文件。

同时，他又得给自己找一些助手，两个人工作很困难，何况担负领导成千上万群众这一重任是很艰巨的。就我现在所记得的，当时我们也印过传单，但是知识分子方面的积极性这时已经低落了。

上面还没有谈到必须完全由我和Д编辑传单的事，Д还必须经常誊写胶印器上的原文底版和印刷传单。我们还必须指导散发这些传单的工作。但是，这件工作非常容易，因为我们得到了工人有力的支持，只要把传单交出去就行了，用不着我们去散发。

我们的工作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着，工作面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

我们终于吸收了两个新人来参加我们的工作，这样一来，就把那些抱着指导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一切运动的目的的人结成了一个非常团结的集体。我们抓住各种机会出版传单，解答工厂中发生的问题。我们的话都变成了事实。我们准备了大量的传单，成批地出现在工人们中间和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的大街上。

我记得我们为了讨论某一个问题而举行过一次集会。正如当时所有的集会一样，这次集会也是在户外举行的，地点在城外某地。我记得我们全都到齐了，只等待着一个迟到的同志。我们谈到各种问题，交换一些听到的话，并且开始讨论到今天的集会，然而老是不见那位同志到来。我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又无法知道他缺席的原因，我们忍不住地甚至决定要散会。正在这时候，那位同志忽然来了。我们很冷淡地迎接他，开始严厉地盘问他迟到的原因。他断断续续地回答我们，而且常常显出非常兴奋的神情。最后，他答应告诉我们一件特别重要的消息，这件消息不但会使我们，而且也会使得俄罗斯全国和俄罗斯全体工人大大地高兴的。看起来，他是在计划着怎样更加有力地影响我们，我们一声不响地听着，等着他说出这件重要消息。这件重要消息究竟是什么呢？最后，他非常兴奋地宣布：所有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党。它的名称叫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拿出了一份党为这事而公布的宣言[2]，我们为了表示对党的尊敬，立刻站起来读完这份宣言。我们当时就在会上宣布自己的组织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市委员会"……

有一天晚上，我和Γ坐在自己家里，我忽然高兴得惊奇起来。刚从伏洛果州流放所归来的Π·A·摩洛索夫，在一位彼得堡同志的陪同下走进屋来。当然，我们都是老朋友，所以很快就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和他取得一致的意见。鉴于摩洛索夫是一个很老练的人，他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物，知道各种各样的方法，因而准能在许多方面帮助我们。这样，我就断定应该把他吸收到我们的委员会里来，我把自己这种愿望告诉过别人，得到了大家的同意。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我们非常需要参加过工作的、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能够多少帮助我们编写各种传单的人。摩洛索夫可以说是最能符合这些要求了。也就是说，他是个最理想的人。他被接受为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的委员。

在和摩洛索夫遇到以前，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小组改为“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以前，我加紧同我的老头子在德涅伯河对岸下德涅伯罗夫斯克小镇上进行谈判。他这时已经搬到了那一带地方去住。我常在晚上或是星期天到那里去。我们就在他家里开一个有两、三个人参加的小会。我们的会议不带革命的性质，但是仍旧很秘密，都是悄悄地召开的，决不许住户中任何一个人走进我们开会的那间小屋子。当然，我所遵循的，或者说指导我的，是纯粹的革命思想……

我的老头子早就有了开办一家合作社的打算。他相信业务很快就会兴旺起来，这样一来就能够积聚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它能够使我们把强大的革命事业向前推进一步。我在当时已经知道合作社的业务，特别是知道布鲁塞尔人民合作社，当然，这一点使我产生了一种希望，相信能够把业务办好，那时就可以从合作社的基金中抽出一部分基金来支援革命事业。我对这种工作不能说没有浓厚的兴趣。

老头子的计划是在工厂附近开一家小铺，因而我们就会有足够多的顾客，特别是我们如果能够努力用各种方法把它办得大众化的话；后来，他自信自己熟悉经商的业务，向我们保证，决不会因为开办这种小铺而遭到任何亏损。万一遭到什么失败的话，连老天爷也不会知道我们在这家小铺上会赔去什么钱。我们决定尽可能准确地计算一下有多少冒险的成分，以及我们的计划有多少保证的因素。我们开过好几次纯粹秘密性质的集会。当开办这家小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时候，还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回事。在一次这样的集会上，我们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剩下来的，只是筹集一部分资金来添置开办设备的问题；虽然小铺在计划中不是办得很大，但是它创办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资金，如果没有钱来购买必要的商品，我们的计划肯定是会破产的。我去催促同志们，要他们每人出五卢布来建立这个机构，连同我自己的钱在内，一共筹集到了五十卢布。必须去请求我们的一位同志，他约有二百卢布，要他借些钱给我们，哪怕开具借据也行。他并不是一个特

别忠心耿耿的人，他终于凭票据借给老头子一百卢布或一百五十卢布（正确的数字，我记不起来了）。

除了我以外，老头子和其他两个人，都是属于某一个组织的成员。看样子，这个组织是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产生起来的，它的几个成员后来因故被捕，当作刑事犯被定了罪。他们的罪名是殴打一个公务员。为了办理他们的诉讼案件和援助他们，募集了一笔当时说来是非常可观的现金。这笔现金剩下了三十卢布，暂时还没有地方可用（被捕的人都被遣送到故乡去了）。我们决定把它们作为流动资金，条件是在亟需时可以取出三分之一，用来帮助因散发传单或因参加小组而被逮捕的人。这笔钱，像我说过的，决定作为小铺的流动资金。我们所筹集到的资金约在二百卢布左右，后来还增加了大约五十卢布，我们决定拿这一笔钱去经营商业。

老头子被选为小铺的法律上的老板，他不但要主持小铺的业务，而且要对这小铺的一切事情完全负责。收到钱后，他就必须出票据，作为防备任何意外的保证。这样一来，开始就对筹集到的资金确定了法律上的保证。以后，老头子必须定期向检查员正确汇报账面上的买卖情况和存货的数量。我被选出来充当这种检查员，所以我对这一企业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责任。我们决定定期召开全体大会，好让我们在大会上知道业务情况，并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某种决定。我们也决定将小铺暂时开办三个月，期满时，我们的大会就应该来决定小铺是否要再开下去。最后责成每一个人去招徕顾客，但是尽力不给任何人赊账。

在这一次会议以后，我们收到了资金，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我们的代理人着手找寻合适的屋子。但是，找了很久还是找不到——这点使我们开始失望；主要的原因是缺少资金。屋子倒是找到了一些，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预付一年的押租，总数达二百五十卢布或三百卢布。希望这样的屋子里能住上一户人家，而且屋子要相当不坏。这样将是十分有利，而且非常方便，因而可以逐渐扩大营业。

尽管我们有这样的希望，然而因为缺少资金，租赁这样的房子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必须像正视愉快的未来那样，也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一个月以后，我们以每月十八卢布的房租在市场地区租下了一所房子，条件讲好是租半年，预付三个月的押租。在不可能找到更加有利的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同意这些条件，而且不得不立刻支出我们全部资本的四分之一；接着，必须领取营业证，这样又得支出各种各样的小数目的费用，因此很快就使我们资金减少下去。当这一切事情都办好之后，我们又得拿剩下的为数很少的资金去购买商品，而这些资金是必须要给我们增加收入的。我们所抱的能够从小铺里获得特别帮助的一切希望，一下子都破灭了，而花去的资金也要求我们出一把力，无论如何要把它们赚回来。

我记得在一个星期日，我去向那个名义上的老板祝贺小铺开张之喜，同时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小铺里的内部情况。房子足够使用，地点非常热闹，顾客盈门，而且看起来好像都很有钱。但是，不幸的是，几乎没有做过一笔买卖；在我待在店里的半个钟头的时间内，店方就回绝了四、五个主顾，理由无非是说还没有备全这些商品。的确，排列在架子上的木箱，里面都是空的，有一处地方放着一堆商品，然而，数量实在可怜，一堵墙壁上是精光光的，连一枚钉子都没有。几包纸袋里装着两、三磅各种各样的米粒，柜台上摆着四、五个装有糖果的玻璃瓶。当然，糖果的数量也是不多的；这里挂着两磅腊肠，小铺门外的台阶上摆着一整桶鲱鱼和一大束黑海产的小鱼，那里还放着粮食和一些供应乡下顾客的物资。我对它的第一个印象是不太好的。只有关于最初几天营业的数字的报告，才使我对美好的未来产生了希望。当我知道总共买了多少钱的商品，弄到了多少越来越感到短缺的资金，将用第一次的收入去购买什么东西以后，当然，我就抽走了我们小铺里可以购买必需的物资的全部资金，预备动身到城里去。这时候，他们要求我不要把一部分钱带走，留下来满足本地的一些顾客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合作社

的创办情况，虽然这样的创办是很难令人满意的，但我仍然认为每一座城市里都应该有这样的小铺。只有一件很糟糕的事：我们不能把这样的小铺说成是合作社。我们的小铺在各方面都很秘密，这样自然就不能对它有利；如果不是情况特殊，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拿这样的资金来开办这样的小铺。应该说明，这虽然是一间小铺，却需要一个人在铺子里连续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以上。安插了一个人以后，我们必须付给他相当的报酬。我们虽然这样穷困，仍然规定为十卢布。因此，我们每月最低的支出也达三十卢布；房租十八卢布，职员工资十卢布，守门的人月费六十戈比至一卢布，外加电费和一些想不到的开支，而商品总共只有六十至七十卢布。

虽然我的住处离开小铺八俄里，而且我从来不曾为小铺的事情跑过腿，但它仍然剥夺了我很多时间，而在当时，时间对革命工作是十分宝贵的。必须重视这方面的牺牲，虽然我从前对于时间是毫不注意的。最后Д同志直率地对我指出，在时间这样宝贵的情况下，我为了小铺付出了过多的时间。我虽然爱惜时间，但是一星期也应当至少到那里去一次，听听越来越大的怨言，说什么连创办人也对这个机构冷淡啦，一个老人做这件工作太辛苦啦，等等。在这一类的话中，我清清楚楚地感到，这是对我的责难。因而我就坦白地说出，我不能为我们的小铺抽出更多的业余时间，而使革命的工作遭到损失，如果别的人也不能帮忙的话，那么就很难把事情做好。我甚至没有进行特殊的检查就离开小铺。我觉得这样做，对于这一工作的领导人是一种很大的侮辱；但是，我对他的忠实是深信不疑的。革命工作按照自己的次序非常正确地进行着。我们也定期举行会议，经常印发传单，而且另外还印发了一本著作。

必须把事情稍稍往回谈一谈。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在事情失败以后，我们自己就担负起保管文件的工作。可是，我们的保管方法是非常冒险的，而且非常不方便；我们和Д就想出一个新

的保管方法，最后决定把篮子移交给Γ，他会把篮子保存在他那里。我和Γ从前就已经谈起过这件事。我们决定在房子附近刨一个大坑，把篮子放在坑里，当然，不应该让任何人知道。

我们决定行动。我站在一所穿堂房子的大门旁边，等候载着篮子和Д的那辆马车到来。当然，我同时也不得不体验到一种特殊的焦急的心情。那辆载着Д和篮子的马车悄悄地转动着，一会儿就出现在街角上。马车停住了，Д开始付车钱，我就扛着篮子穿过穿堂院子，走到另一条街道上，接着又走到第三条街道上。Γ已经在那条街上的一所房子旁边等着我了。他接过了篮子，我们就一起走进屋子，把房门关起来，开始检查篮子里面的东西。虽然里面藏着的东西很少，但是我们仍旧找到了许多使我感到兴趣的东西，而Γ一般说来读过的书是很少的，所以他对各种的文件感到很惊讶，当然他也想读一读他没有读过的东西。我们把书籍整理完毕，把所有的书都开了一张清单，然后把篮子放在墙角。Γ有几回在黄昏和黑夜里爬到房子附近，想挖一个坑。但是我们后来认定，这是很不方便的事，而且也不很安全。正在这时候，我们得到一个机会可以把篮子送到一处很安全的地方，于是我们很快就把篮子送到那里，后来又把它当作一只盛满旧衣服的篮子，从那里转送到别处去。我们把这桩事情办得很好，我们相信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些地方。

我记得有一回，Γ男扮女装到我这里来。我甚至一时都闹不清楚究竟是谁到我这里来了——如果一个受到监视的人负有许多重要任务的话。当然，这样的小心并不是多余的。在暮色苍茫中，甚至在深夜里，都得时时小心翼翼地跨出大门，看清楚屋子附近有没有人，有时必须走来走去，保护同志的住屋，以便偶然发现有人跟踪，如果真有这种情况的话。

夏末，有两个人又退出了我们的委员会：一个人实际上是由于胆怯，另一个人是因为要逃亡到伦敦去，所以委员会里必须补充一些新人。在没有垮台以前，

我们的委员会是由一些工作了半年以上的工人组成的。集会大部分是在郊外的旷地上举行。我们在那里一次也没有被人注意到。在这样秘密的情况下，我们只应该吸收那些非常小心而又坚强的人来参加我们的委员会。正在这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也受到监视的、从前曾在一座大城市里工作过的人。他老早就在找寻接近事业的人，而且希望亲自参加工作。在没有得到他的可靠的情况以前，我们虽然仍旧和他保持接触，但没有把他吸收到组织里来，一直到后来才把他吸收到委员会里来；接着Γ也被吸收到委员会里来了。这样，我们就用一些无限忠于事业的人来弥补自己所受到的损失，委员会得以继续正确地执行着它的工作。正是那时候，某一大城市派了一位代表到我们这里来，同时他给我们带来了他的一个熟人，这个人是应该参加我们委员会的。新同志是一位知识分子，虽然他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在他看到了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已经搞得很熟的独立工作以后，他仍旧觉得自己很为难，认为自己在关于工人问题的知识方面很不够。因而，我们就让他去领导一个由青年人组成的小组，但我们仍然要求他参加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他也去过好几次。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参加小组工作的人。1898 年的冬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到来了。鼓动工作具有正常而定期的性质，虽然各小组几乎没有集会，而且也没有可以参加小组工作的知识分子。由于没有业余时间，参加委员会的工人不可能定期从事工作。可是，从这时候起做出了一个决定，委员会务必一星期举行一次会议。这是一个对于整个活动非常有利的决定。哪怕一星期举行一次，这也是一种工作，因为每一个参加集会的人都要报告他所在的那个工场或工厂里的事情，任何特殊的事情都要着重加以说明，有时候甚至决定出版小报来加以说明。如果发生小规模罢工或者什么冲突的话，委员会就必须了解全部经过情况，做出决定，并把这些决定付诸实施。委员会由于知道自己处境的困难，很感激少数偶然参加的知识分子的帮助，但是，他们的帮助是很不够的。这样，我们就成为一伙中间没有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人们。就在这一年中，我们的

同志Д被捕了。这是我们委员会的一个大损失，他是我们中间最老的同志，他对于组织的事情比谁都知道得清楚，他和知识分子保持着联系，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和城里保持着联系，因为城里总是有一两个人在那里工作的。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我们得到了各种各样的书籍。随着Д的被捕，我们暂时和城里的小组失去了联系，这个小组除了书籍之外，还经常供给我们金钱和从事小组工作的人材。

就是没有这一切事情，我们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工人们也得尽可能多努一把力，竭力不暴露我们的弱点。但是，在我到达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期间，不止一次地发生了完全缺乏知识分子的情况。在Д被捕之后（他不是因为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案件而被捕的），我不得不常和城里保持联系，这一额外的工作剥夺了我的许多时间。

我因为对这个工作做得不够好，向城里建议要一个知识分子。这个人很快就找到了，因为这时候正有一批人从流放地回来，他们愿意参加组织。原来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已经在城里成立了他们的委员会。我们的委员会起初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知识分子的新组织。自然，它是愿意担负领导工作的责任。事情是十分令人奇怪的，正当老委员会（工人们这样称呼它）正确地起着作用的时候，就是在它每周举行一次集会，讨论各种问题，出版小报的时候，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委员会。当然，这个委员会对执行工人委员会的各种决议的工作，例如，运送书籍，募集资金和印刷已经编好的小报等等，是不能感到满意的。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知识分子希望掌握编写小报和总的领导运动的工作。在这一个基础上，工人委员会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冲突。这主要都是城里的代表们，也就是知识分子委员会的代表们所引起的。起初冲突是偶然才发生的，而且很快就解决了。可是，渐渐地开始发生一种不愉快的转变。产生了普通的不满，纠纷也增多了，事业因为纠纷而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我记得知识分子们常常攻击已经散发了的传单上的似通非通的用语，好像有一张传单被城市委员会作了一些修改和删节。这件事情引起了直接的冲突……[3]

已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候，而纠纷还是没有减少。在每一次集会上，委员会都提出种种的措施，企图使两个委员会互相达成协议。曾经建议召集两个委员会，并在联合大会上从两个委员会中各自选出人数相等的人员，如能合并起来，就可以组成一个统一的委员会，城市委员会不同意这一措施，借口是联合大会规模过大，可能引起怀疑，而且他们也不知为什么原因，不愿意选出数目相等的人员来组成一个像建议中所说的联合委员会，但是两方面都觉得有必要来摆脱这种紧张的处境。

终于，在下面几点互相让步的原则上达成了协议：（1）工人委员会的集会按照旧程序举行，知识分子中派遣一个有发言权的代表来参加集会，但是，这个代表不能更换，而且每次如果没有得到工人委员会的特别同意，他也不能够带领城市委员会的另一个代表来参加集会；（2）同样的，城市委员会也必须把自己集会的情况，通知工人委员会派来参加集会的代表，而工人代表也必须向工人委员会传达城市委员会里讨论过的问题和通过的决议；（3）两个委员会同样可以为某一个工厂的工人，或是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一般工人写作东西，但是，最后的编辑责任，以及承认它的及时性和必要性的权力应该属于工人委员会。在这方面达成了协议，以后对这些问题几乎没有引起任何的冲突，而工人委员会也经常不加任何修改地接受城市委员会所编写的小报。

在 1898 年年底和 1899 年初，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各部分和各地区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都进行得如火如荼，所有的工厂里都有我们的自己人，他们搜集情报，注意工人的情绪，揭露各种各样的舞弊行为。工人们对某些工厂中充当门卫的维尔克斯人特别感到不满。维尔克斯人是一个又愚昧又粗鲁的民族，配备有锋利的武器，有时配备射击武器，他们准备野蛮地保护每一个工长、首长，尤其是厂长

和副厂长；他们一有机会拿到武器，便准备向工人攻击。他们在工作中也是这样野蛮地执行命令；如果有谁跟工长吵架，工长就打电话把门口的哥萨克人请来，粗暴地嘲弄工人，命令维尔克斯人把叛乱者或“酒鬼”带到门外去，他们就立刻去执行。由于这种情况和维尔克斯人的野蛮性格，工人们简直是痛恨他们。就在这样的基础上不断地发生了需要警察和县政当局来干预的口角。这一方面的斗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是在德涅伯河彼岸，主要是在法俄公司车辆制造厂的一个工厂里。这个工厂从开始生产起，就成为最多事最革命的工厂：那里由于对行政不满，经常发生罢工。维尔克斯人就成了全体工人的眼中钉。

早在 1897 年春天，当我和十二个人从下德涅伯罗夫斯克车站到这家工厂去的时候，亲身受到了一次完全意料不到的接待。当我们走到工厂的时候，从厂里出来了一个好像当过多年门卫的维尔克斯人。他分明是要到车站上去，然后从那里再到城里去。我们这一群人看见这个维尔克斯人，便热烈地谈起想要揍他的事情。当然，我是仔细地倾听他们的谈话的，但我不让工人们找机会真去揍他。当我们这群人走近这个维尔克斯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分散到铁轨的两旁，然而有一个工人，他一面责备其余的人胆小，一面顺着铁轨的中间直向维尔克斯人走去，他刚走近维尔克斯人的时候，就给了他一起耳光。维尔克斯人抓起了武器。就在这时候，许多沙子和石头从铁路的两旁向他扔来。他像野猫一样地向栅栏那里奔去，一会儿就不见了。当我们刚走近工厂大门的时候，大门口已经站着约莫二十来个人，从工厂里走出一个哥萨克军队的下士，他身后跟随着那个挨过打的维尔克斯人。于是，他们就在人丛中找寻肇事者。维尔克斯人马上就认出那个打过他的人，但那个人拒不承认打过他，而且不肯跟哥萨克下士一块走；这时来了两个证人，他们报了假造的姓名，于是事情到此就完结了。可是那个维尔克斯人老是反复说，他会记住这件事情的，如果他自己不能报仇，他的孩子也会替他报仇。不消说，那个工人丝毫没有进这家工厂工作的意思。

确切的日期仿佛是在 1898 年 5 月 1 日，要不然，就在前一天，我到这家工厂去看一个同志。我突然发觉工厂的院子里出了什么事故。我在工厂的大门口打听到，有人在两小时以前殴打了副厂长。当时在门口站岗的已不是维尔克斯人，而是一个穿警察制服的门警。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吓得心惊胆战，以致我走进工厂的时候，他也不敢拦阻我。我打工厂的院子朝总办公室走去，看见一群工人，人数在一百人左右，在他们的面前站着县警察局局长，正向工人们打着官腔。我觉得有趣，便向工人们中间挤去。警察局长向工人们讲了很久的话，劝他们开始工作。有一个工人非常激动，尖锐地回敬了警察局长几句，所有的工人都支持他。警察局长毫无所获，溜进办公室里去了。原来工人们在上工的时候，从各车间里聚集在一起，要求副厂长到他们那里去。副厂长到了他们那里，起初说了一些非常尖锐的话，后来看见自己被一群愤怒的工人包围起来，便改变了口气。显然，他想仗着站在身旁的警察从工人们中间溜走。他的巧计没有成功，因为这时候有人把一个袋子扔到他头上，立刻便有一个工人用一样硬东西狠狠地揍了他一下，使他蹲了下去。引起了一片紊乱，工人们在拉过汽笛后，都离开了工厂。有人把头上鲜血淋漓的副厂长抬进办公室，我也曾在这所办公室附近遇见过集会的工人。这件事情发生后，工人们有两天没有上工，而且非常激动；开始进行必须释放被捕者的谈判。但是，当局在发生骚动时都躲进兵营里去，这事后来给工人们打听出来了。事情发生以后，星期六的工作缩短二小时。这样，就满足了工人们在殴打副厂长前所提出的要求。在德涅伯河彼岸，维尔克斯人被赶走了，任何一家工厂里都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但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布良斯克工厂里，维尔克斯人依然存在，因此继续引起工人们的憎恨。

有一个黄昏，附近一所炼铜厂的工人们下班的时候，从布良斯克工厂的栅栏里拿走了一块木板，一个守卫的维尔克斯人便去追赶工人，等他追到后，便想把木板夺回来。于是，发生了一场搏斗，工人们从四面八方跑到出事的地点。当然，

那时本来能够着实地给这个维尔克斯人来一顿教训，然而另外一些维尔克斯人从工厂里奔来援助这个维尔克斯人，而且有一个维尔克斯人用短刀杀死了一个工人。这事发生后，工人们非常愤怒，冲进布良斯克工厂，破坏并烧毁了维尔克斯人的岗楼，毁坏了他们的财产，另外一部分人数更多的工人，拥进总办公室里，进行了许多破坏，并且力图把钱柜打开。人们拿来了一把大铁锤，终于用这把铁锤打开了这个看来好像很小的钱柜，一部分金钱立刻就被拿走，丢到人群中去。这时，办公室由于四面着火燃烧起来，被烧得精光。

几乎和这同时，在凯达卡村（就是维尔克斯人杀害工人的地点），工人们捣毁了一家官办的酒店，喝光了店里所有的存酒，显然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就打开了钱柜。一部分喝醉了酒的非常激动的工人烧掉了办公室后，便冲向一家合作商店，他们也像捣毁酒铺一样地捣毁这家商店，并且开始毁坏商品。另外一部分约有十三个人，跑到契契辽夫卡一家合作总店里，他们在那里遇到了步枪的射击，他们撞了几下商店的铁门板后就退走了。这时有一批步兵从军营里被召集到这里来。他们包围住被捣毁了的小店，这样才使它免于被烧掉，虽然由于不使住在附近的工人受到损害，工人们反正也不会放火去烧这所商店。当工人们捣毁总办公室的时候，有一部分工人想冲进大门，显然打算破坏工厂本身，但夜班工人阻止住了这一行动；他们全都一窝蜂地拥到门口，担心会遭到痛打，所以都用铁器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时候才赶来的警察局长训斥了巡官一番，问他为什么不把工人们镇压下去；当巡官回答他说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时候，警察局长为了想证明巡官胆小和自己勇敢起见，便挤到工人中间高声地嚷了几句，但是他所得到的回答，是头上立刻挨了一下石块的痛击，被打倒在地上，人们只好把他抬回家。到早晨四点钟的时候，骚动几乎完全平息了。在发生骚动之后，我们马上向工人们散发传单，说明这样的牺牲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号召他们正确地组织罢工。维尔克斯人不久就被赶走了，工厂开始建筑钢筋水泥的办公室。一些工程师在审判时赶到法

庭上来，工厂的整个行政当局几乎都力图把事件的责任推到革命家的活动上和激起工人暴动的愿望的那些传单上，这就是这次事件的特征。然而，有一个工程师在法庭上表现很好，他说出了工厂活动中的许多内幕（虽然他是首长，当然也是个第一流的坏蛋）。这个工程师说传单上老是写着计件工资不断下降，领导人员对工人的态度不好，以及其他各种舞弊的行为，这样，自然总是博得了工人们的同情。

当时罢工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规模并不大，而且大多数是在没有厂矿监督人员干涉的情况下结束的，或者是慢慢满足工人们的要求，或者是双方互相让步。

在审判布良斯克工厂暴乱者的时期中，工人们都抢购《德涅伯罗夫斯克边区报》。但是这张报上的新闻很少，不能满足工人们的要求，于是大家便经常谈到必须出版一种能把事件的始末详尽报导出来的传单。

“报纸是没有什么好看的，等一个时候，我们自己的报纸一定很快就会出来，报上一定会狠狠地臭骂他们一顿，我们会在报上知道一切。不过时间过得相当久了，他们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听出，工人们对于传单是抱着无限信任的态度，在这次事件之后，可以知道传单会经常发生良好的作用。

有一件事情搞得很糟，这就是小组工作。我们不断地要求在小组里学习，可是，城里给我们的答复是，找不到人来主持这件事。我记得有一次在城里召开的会议上，我曾直接提出过这个问题，并且立刻相信参加会议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到小组里去：一部分是因为心理的原故，一部分是因为妇女，主要的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说话的才能。在小组里要学习什么呢？“要知道，我们没有书籍，”他们这样说。于是我们就预备课本，而且立刻开始行动起来。仿佛他们已开始写小册子。当然，写小册子是和委员会的工作有矛盾的，因为当时委员会里还有其他一

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和要求。最后，眼看着不可能立刻找到愿意参加小组的人，我们也只能满足于人家所谓必须从速找到这样的人才的声明了。

不久以后，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愿意给工人上课的青年。我们见面时约定在星期日碰头，那天我应该把这位先生介绍给工人们认识，这些工人是他必须要给他们上课的。我带来了一位工人同志，他应该把这个愿意跟工人们在一起学习的人直接带进屋子，和那些在屋子里等候他的同志见面。我让这位同志站在一边，自己走到这个知识分子跟前，他当时就要求对他说明他在小组中的地位。原来他完全不愿意对他实行任何监督，老是说些聋人听闻的话。只有在完全自治的基础上，他才同意在小组里教课。我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他所不能同意的。于是我们就永远分手了。我又不得不使那些聚集起来的工人们失望，尤其是因为我在那个星期天不能到那里去跟他们谈话。

在这一年（1898 年）夏天，我为了我们合作商店的事情时常到下德涅伯罗夫斯克，因此看到了那里发生的运动。这种运动表现为频繁的暴动和冲突，情况与我上面所说的殴打布良斯克工厂副厂长的事件差不多。我靠那位老头子的帮助，认识了两个人，他们后来也成为下德涅伯罗夫斯克运动的领导人。起初我请他们搜集关于工人生活的各种资料。可是，他们并不特别喜欢写作，我就只好自己把本地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记载下来。这时我才相信从前（1895 年和 1896 年）给予工人们的那种教育，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样的工人会把自己比作是惊弓之鸟。他们没有毅力、没有本领，而且又没有勇气，所以他们便在自己的工人同志中随便去发展任何一个人。他们丝毫不能传授给他们有用的东西。但他们仍然把自己一点蓬勃的精神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而我也有机会领教了这种蓬勃的精神。在没有完全放弃小铺以前，我继续到那里去，而且比以前去得更勤，所以我能够时常遇见这些人在研究找寻同志和散发小册子的工作……大概在秋天的时候，他们集合了很多人，要求给互助储金会制定一项章程，并且表示要更正确地领导运动。

用非常革命的精神拟定了“互助储金会章程”，而且在某一个星期天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当我到那里的时候，在一间明亮的大房间——“大厅”里，已经聚集了许多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是我所认识的。必须等待其他的人。时间在随随便便的谈话中过去了，而大多数的人都拿眼睛看着我，一声也不响。当然，有人违背我的愿望，把关于我的许多事情告诉了他们。除了两个人外，所有的听众都陆续到齐了。“我认为会议可以宣布开始了，诸位，你们以为怎样？”。我说道。

全体一致同意，因为最有威信的人都来到了，好像全体出席的人一共是十八个人。在提出章程以前，我当然谈到了工人运动，谈到了必须要有组织等等事情。后来我宣读了向大会提出的章程，并且问章程是不是合适，大家能不能通过。我也谈到了必须散发秘密书籍，总之一句话，就是要从事反政府的活动。大家都发言拥护通过章程。以后，就开始朗读各项条款，并且询问某一条是不是清楚，应不应该补充或加以说明。在向全体出席者征求过意见之后，每一项条款便认为是通过了。我特别担心其中这样的一条，那一条上说，任何一个成员在必要的时候，都有义务来散发公开的或秘密的书籍。其实，这一条款没有遭到反对就通过了。接着，一切当然都按照它的次序进行下去。最后，读完了并且通过了全部的章程。组织定名为“开端”，以后，就开始选举负责人，主要是选举委员。我作为一个外来人，不能肩负起任何复杂的责任，但是我仍旧接受监察的任务。现在，在一切的程序都进行完毕之后，一小部分人开始离开屋子，而大部分人则决定要给自己祝贺这个相当重要的组织。我谢绝参加这一庆祝，但不能打消这种款待的方法。

记得有一次，我为了工人运动的事情来找他们谈话。我们七个人聚集在一所土屋里，我尽力发言，说了很久的话，不下两小时。大家全都很注意地听我说，非常佩服我的知识。显然，他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但当我说完话，决定讨论某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听众们）却熬不住了，请求我原谅，表示希望喝点酒。当然，他们大部分都是有子女的人，或者至少是接近这种年龄的人，我也很明白，

我跟他们认识，也只有利用他们在啤酒铺里喝酒的时间。所以必须时常扶助酩酊大醉的人。我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有一个这样的工人，有一次到某一区营工厂（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附近的地区）去看一个熟人。显然，他想进行宣传工作，身边带了几本秘密小册子，但他就带着这几本小册子被捕了。当宪兵们从电话中知道了这个工人的住址时，在这所屋子里除了空啤酒瓶外什么也没有搜到，所以立刻就把他释放了。类似这样的事情还不止发生过一次。由于这样的情况，我并不特别主张戒酒，可是他们自己也觉得很难为情。我知道有一些人完全不喝伏特加，另外一些人则竭力戒酒。

当我开完全体大会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为了要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这个地方算是属于我无权到那里去的另一个县份）求得安全起见，早有准备地拿着已写好的章程，以便一旦遇到什么情况就把它扔掉。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口袋里的这份章程丢失了，幸亏我写好章程以后还保存着底稿，因而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丢失章程的事情。当然，必须经常到下德涅伯罗夫斯克去拿需要的书籍。读者们已经学会很好地保存这些东西，所以一切都很顺利。有些工人被章程吓得离开了；但是，他们在一起工作时，仍然认得从前曾经一同工作过的人。应该努力和他们小心相处，互相提醒危险。这些工人大部分在法俄公司工厂中工作。因此这家工厂经常发生风潮，并且时常使行政方面陷入啼笑皆非的境地。驻厂检查员必须经常到这里来给双方调解。他不止一次地保证工人代表不遭到解雇和逮捕。后来，他的保证为事实所证实了。

从 1899 年夏天开始，发生了开工不足的现象。那年冬天各工厂开始裁减工人，工人们发生骚动。当时在法俄公司工厂附近成立的一个特别组织进行鼓动工作，要求裁减职员，减低厂长和其他人员的薪资。这个组织不愿理会那个特别使资本主义企业感到鼓舞的事实，要求工厂全部开工生产。我在当时不得不热烈地、急促地和工人们进行多次的争论，向他们证明不可能使这些要求得到满足。他们

照例拼命地攻击我，责备我同情资本家。然而，他们很了解我，仍旧时常跑来请我帮忙，给他们解释各种各样的问题。委员会出版一种小报，它尽可能地出得及时。

在一个晴朗的傍晚（这是在 1899 年的秋天），我在工作完毕之后坐下来喝晚茶的时候，看见这家工厂的两个青年人匆匆忙忙跑进房里来，不禁觉得有几分惊讶。当然，我是十分了解这两个人的。他们说他们厂里决定要裁减很多人，人数超过半百；因此，他们选出了代表（我记不起代表的人数，好像是十三个人）来进行明天就要开始的谈判。代表当中有我十分熟悉的同志。必须说，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人感到几分满意。要知道，谈判是由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那些人来进行的，所有选出的代表几乎都是社会民主党员，他们会绝对证明工作不是没有结果的，我们也开始以真正领导者的身份出现。不幸的是，工厂中的这一运动现在不是具有战斗运动的性质，而是具有防御的性质。必须考虑到的，并不是我们获得胜利的问题，而是考虑到如何以较少的损失来退却，而同时又不做宪兵的牺牲品。有一个代表情绪非常激昂，他主张向政府要求定货和贷款，要求不辞退工人，要求减低厂长和所有工长的薪资。

这两个青年人读书不多，但是相信工人和社会主义的力量。他们这种热情，是可以理解的。必须让这些青年人的头脑冷静下来，必须说明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取得他们所要求的那种东西。当我做完这种工作之后，他们两人说明自己已被选为代表，到这里来听取指示：他们明天应该怎样和厂长进行谈判。当然，我的忠告早已准备好了，一部分还是小报上的指示：第一点要求不解雇一个工人，第二点要求减少工作时间两小时；这样一来，虽然工资会减少，却没有一个人会遭到解雇。

厂方同意代表所所提出的条件。于是，工厂的工作时间不是十小时，而只是八小时了。为了想在工厂已有订货这种假设的情况中利用这一点来竭力保持八小

时工作日，我们拟定了几个相应的条件。这一情况果然发生了。而我当时已经离开那里，不知道结果如何；我只知道厂方后来从特维尔地方招来一些工人，而把他们认为不安分的本地人开革了。但是，工厂方面不久又得对这些安分守己的工人进行工作；当宪兵把我送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去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大门和车间紧闭着的静悄悄的工厂。由于南俄发生的总危机，它停止了自己的活动……

约莫在那个时候，我们和摩洛索夫谈论创办地方报纸的事情。有人供给我们一百卢布来出版第一期。当然，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弄到铅字。我们也开始找寻，而且很快就找到了；剩下来的，只是去拿铅字和实际使用铅字的问题。

显然，大概就在这时候产生了创办南方总机关报的思想。我必须和一个知识分子谈谈这一件事情。我们不止一次地秘密聚会来谈论这一问题。

我回头来谈一谈 1898 年年底和 1899 年年初的事情。在这时期以前，由于警察严密监视，散发传单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必须特别更加小心。开头那个时期，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散发传单总共只有三、四个人，现在散发者达到十二人至十三人。甚至更多的人。在人烟稠密的地方，有四个人在一条大街上走动（每边两个人），一个人空手走在前面，——看见危险就发出信号，第二个人在后面跟着，他的口袋或手提包里装满了传单，从栅栏或大门里给每一户人家丢进一张传单；如果街上没有人，时间又很晚的话，他就走进屋子，把报纸扔到走廊里或者塞进百叶窗里，甚至警察想要找寻的话，也不是能够常常都找得到扔进去的东西的。当走在前面的那个人看是更夫的时候，就发出信号，后面的人便停止工作，从容不迫地继续沿预定的路线走去。如果没有四个人，那么便是三个人，发信号的人走在街道中央，注意两边的事情。走完了一条街，就转到另一条街，又走到第三条街。有一个人负责给各区散发传单；他知道工作的地点和人员，事先决定好开始散发的时间。只要这个时间一到，带着传单的工人便马上拥到各区的街道上，

开始工作：时间还没有到，许多人都已两手空空地回来，安安静静地躺下睡觉，只有在像卡伊达卡这样的大区，工作有时才需要超过两小时。

有一次，在进行这种工作的时候，我们一面在卡伊达卡大街上走着，一面散发传单。我稍稍落在其他同志的后头。当我看见一所房子以后，就上前去扔传单。这时，走在前面的同志们发现了一队巡逻队，他立刻通知我。可是我却继续干我的。士兵走到离我很近的时候，我假装出喝醉酒的样子，站住不动，呆呆地看着他们。等他们从我身旁走过，我就赶快往前走，又开始工作起来。同志们也上前请求兵士们保护，好像害怕在街上走，而当他们得到一个令人放心的回答，说是前面没有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便往前走去，继续挨家挨户地散发传单。在这种比两年以前更加谨慎小心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在街上或者工厂里散发传单时落到警察的手里。这就使我们在散发传单时养成几乎毫不恐惧的习惯。这些传单常常扔进军营的窗子或是扔在军营的附近；有时也把传单带到砖瓦厂里，把传单塞在遮棚或是砖头底下，这样，工人们在收拾砖头的时候，一定会发现它们。总之，没有一处是这些传单散发不到的地方。

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通过同某些人的谈判和打交道，我在某处发现有铅字。当然，我对这种宝贵东西是很欢喜的，赶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摩洛索夫。经过短时间的考虑，我们就决定赶快从这些人手里把铅字弄过来，否则他们很容易就会失踪，而铅字也会同他们一起失踪。为了取得铅字，我负责进行外交谈判。拥有这种贵重物品的那些人，绝不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们把自己设想得太高了。其中有一个人和我搞得很熟。我很器重他的宣传才能，但是对他好说空话这一点，却很不欢喜，我竭力不理会他。我在各个工业团体内享有威信。哪儿发生什么不满意的事情，他就常常来请我同他们联系，要我指出改正的方法。我为了谨慎起见，加以拒绝了。何况，我各方面的工作都很忙。这些工作都需要我经常小心而又认真地去处理。那时他想蹭进我们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工厂委员会里来，但是没有成

功。后来，当别人为了这一目的而施加压力的时候，他仍然没能蹭进来。情况也逼迫我去和这个人谈判。一开始谈判，就和他冲突起来。他突然声明，这些铅字不光是他们的，另外一些人也有份，而他们也想出传单。这一个转变是我预料不到的。他们当真想出传单的思想很使我吃惊，尤其他们在哪一方面都没有具备出传单的本领和力量；但是，他们暂时还能借各种口实不交出铅字。必须使用外交手腕，必须和某些个人打打交道，但是事情并不顺利。那个保藏着这种铅字的人，认为铅字是属于他的。在谈起出报的各种计划时，我从他们那里探听到，他们除了铅字以外便一无所有。于是，我表示愿意制造一架印刷机器，而且提出用他们的铅字印刷一份传单的一定条件。这就鼓舞了他们，欣然同意给予这种帮助。

现在，当铅字已经找到、谈判好转的时候，当问题只剩下需要市委会帮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市委会竟派代表来，希望我们不要同这些人达成什么协议，声称他们正在某地找寻铅字。市委会的代表说，他们对这类消息非常怀疑。

同时，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印出五月的传单。这种传单，我们希望无论如何要用铅字印。市委会的代表说可以用胶印。我怀疑城里的同志已经捷足先登，企图取得我现在正在谈判的铅字。我和摩洛索夫害怕城里的同志得到铅字，感到会失去我们的靠山。当然，我们开始加紧努力，打算比城里的同志抢先一步。我不放过一分钟有用的时间，在工厂里赶制一个放铅字的架子。工长好几次看见我在给自己做东西，但究竟做的是什么，他却猜不到。其实，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他不愿意惹起任何反对他的敌对行动。甚至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担心着一些更加坏的事情。不管怎么样，我总算把架子做好，接着就需要把架子拿出工厂。我请一个相熟的工长来做这件事。他很好地办成了。当然，他不知道我干吗要这些方木头。我带着做好的架子去看那个有铅字的人，时间已经不多了，快到四月十八日了，而传单无论如何是要用铅字印出来的。我们除掉希望放弃胶印以外，还希望向城里证明铅印比胶印快，危险性更少。同时，即使马马虎虎地用铅印印出

的传单，所花的钱也要比胶印少一半。当我取得同意可以去领取铅字的时候，城里答应拿出它拥有的一切东西，并且保证在必要的时候给予帮助。在制造可以涂抹颜料的印色棒时，是必需要有帮助的。因为城里的同志现有的那根印色棒，看来太小。

四月十八日是复活节的第二天。因此，必须在复活节前准备好传单，以便随时应用。在复活节前的三个星期中，工人委员会在一次会议上做出决定，要所有的同志在下次会议前把传单完全写好交出来，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根据那一条规则，所有的委员都要亲自起草写传单，并在委员会的会议上决定哪一张传单写得比较好，比较合适，这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教益的）。我记得，过了一个星期，知识分子没有根据那条原则把传单交到工人委员会会议上。据他们说，党将供给我们的城市一份很好的传单。我们不相信这点，并且不放弃自己的目的。会议上收到了三份传单，发现其中两份很合用，于是决定把这两份编成一份，并把编辑的工作交给两个人去做，主要是交给摩洛索夫。虽然摩洛索夫自己也没有写好预定在五一节前完成的传单。他反对这两份公认的传单，但他仍旧必须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来编辑传单，编辑工作至迟须在两天内完成。

离复活节大约还有两个星期，我必须催促同志们，到处东奔西跑。首先，必须动手拆铅字。我们是在一个同志家里（铅字的主人家里）来进行这件工作的。这是一个全城都认识的人，而且有不少人都知道他的手提箱里放些什么东西。如果一旦人家注意到他家里有铅字，这该是多么不愉快的事啊。时间很紧迫，特别是，没有时间来从容考虑。拆除工作只要有一个较长的傍晚和黑夜就够了。我们把拆下的铅字抛在一个小包裹里，然后又把它放进一个连锁都没有的箱子里。我把经过委员们看过的编辑的传单带到一间小屋里去发排。传单在那里也要放三天左右的时间，然后把排好的铅字牢牢地放进一个铁框，这样就便于搬移。

就在这紧张的时期中，却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失败。第一个失败是有人放出有关我和摩洛索夫的谣言，硬说我们想永久占用这些铅字。谣言对于铅字的主人，发生了有力的影响。他们坚决拒绝把铅字借给我们用，为了逃避和我谈判，他们常常不在家。这样我就很难找到这些人了。究竟是什么人在这紧急的时刻轻易地拆了我们的台，就是后来我也没法调查清楚。毫无疑问，这里面准是有人搞了鬼。与此同时，我必须用一些材料制造印色棒。尽管我东奔西跑，还是找不到一个很准确的圆形容器。找寻工作完全失败之后，我最后买来了两个盛电池的罐子。这两个罐子在工作上不听使唤，而且不到规定时间就破了。制造印色棒的材料是用上等的普通细木工胶和蜜糖调成的。这种材料很久都没法调成功，把它们注进容器后，不能凝固……我去看一个同志（委员会的委员），请他使用各种方法来旋制一个圆管。虽然做这工作会很容易被工厂里的严厉的领导人撞见。第二天，这个同志假装愿意留下来做夜工。深夜，他趁头子不在的时候，赶紧在机床上干起活来。过了两个多小时，一个滚筒做成了。它旋得很好，有着一个小小的锥体；只剩下把它带出工厂的问题了。那个同志想了一会，便向栅栏那边走去。过了一会儿，圆筒就带到了厂外。

第二天清早，他就把它带到我的家里来了。快近十二点钟的时候，我带着它到阿摩尔（德涅伯河彼岸的村镇）摩洛索夫家去。他家的炉台上放着盛有胶和糖蜜的各种容器，地板上放着带有铸成的印色棒的容器，到处都是乱七八糟和违反王法的标记。这里也有用来制造印色棒的把柄和钢轴，它们称是第三个委员在第三个工厂里制成的。那天是星期六，大约还剩下一周的时间，必须抓紧时间，尽可能努力工作。我当时失业，所以能够用全部时间来做这件事。但是摩洛索夫和其他的同志们都必须在复活节前赶工，而夜间还得同样紧张地忙着编印五一节传单。我那天夜里做好印色棒后才回家。我希望摩洛索夫明天就会干这件工作，并且好像就在那里事先安排好了复活节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就在那热火朝天的一周的星期一，我去买了三令纸回家，到了晚上就把纸张带到那所指定作为印刷用的房子里。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出去买面镜子，找了很久，最后才找到一面大小和厚度都合用的镜子。我记得我和商人讲了很久的价钱，希望尽可能买得便宜一些。经过很久的讨价还价以后，我买了一面不带框的镜子。这样，好像节省了一个卢布。我又多买了一张放颜料用的白洋铁皮，然后回到家里。只剩下去取已排好的铅字。我为此目的走到那所指定的房子。我们曾在这所房子里把铅字按大小分开，并且用它们来排过字。显然，铅字的主人声称，只有当他们能够在场的条件下，才允许借他们房子印刷。这点当然是不能答应的。我知道他们不愿意把铅字给我们，与其用外交手腕，还不如用各种诺言来影响他们，特别需要依靠对他们所作的诺言。经过长时间的荒谬的谈判之后，才说服了他们，以后不但拿走了已排好的、排好版的铅字，而且还把全部剩下的铅字和仪器都拿走。三个人一起来拿一个人难于拿得动的东西。为了不致特别引起别人的注意，大伙都上我家里去。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来进行印刷和校正清样的试验。我的房东们就住在隔壁。他们倒没有怀疑这种带着洋铁皮的哗啦哗啦的响声和印色棒滚过铅字的沙沙声的活计，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勾当。

结果，试验完全成功，我对于我们取得的成就很满意，并且打发自己的助手们回家去。当时已是深夜，我知道女房东就睡在隔壁，一旦她发生怀疑，就会把我的情况报告给警察局。我为了担心特务的追踪，小心翼翼地悄悄把所有的东西都收到床底下和箱子里，提心吊胆地睡了一会觉，惟恐会受到突然的袭击。第二天，天刚黑，我就和同志们把所有的铅字和物件都收拾妥当，然后扛到一处秘密的住所去，也就是再回到那个当委员的同志家里，在那里就可以完全自由地安排一切了。剩下的就是取印色棒和颜料。这些东西也从摩洛索夫那里拿来了。经过多次的失败，终于制成了两根很好的印色棒，而且已经不用担心它们不能满足全部工作的需要了，因为铸造它已经不困难了。

记得好像是在星期三，我在女房东的帮助下，一清早起就开始工作。我事先用布蒙住所有的窗子，把门锁上。当然，工作进行得并不很快，但是毕竟还是有所进展。很快绳子上都挂满了印好的传单。一瞧见这些传单心里就乐了，一看是工作有进展心里就觉得踏实。晚上，一个同志下班后跑来了，接着又来了一位，工作整夜都在紧张地进行。我们一面快活地工作，开着玩笑，一面仔细地观察着和研究着，看看我们的机器里到底缺少什么。原来，旧铅字印出来的传单，还不能使我们满意；有些东西是可以改进的，不过，暂时缺少时间和资金。尤其缺少资金，因为从城里只领到十个卢布的资金，用在整个工作和一切开支上。必须拿这些资金来周转，还要买镜子和纸张。

星期四那天，我一个人和女房东继续工作，四点钟的时候，同志们都纷纷聚齐了，连摩洛索夫也来了。于是，我便把吃力的活交给他们去做。这个工作就是拿用亚麻布毛巾包着的木头印色棒在排好的铅字上滚一遍。印色棒本身很轻，每次必须使劲压，用整个身子压下去。如果配合工作的速度这样做，是非常累的。工作是这么进行的：一个人涂颜料，压印色棒；另一个人放纸、拿纸；第三个人把印好的传单分开晾起来，把晾干的传单收起来；第四个人是休息或叠传单。在那个紧张的星期五的夜里，我们完成了印刷工作，大伙一齐动手把传单叠成三角形，由一个人在上面加盖委员会的图章。这些天来一直非常劳累的主妇，刮去桌上和地板上的颜料痕迹，把房间洗刷干净。印色棒拆掉了，并把印刷材料埋在地里。总之，一切都整理妥当了。一旦宪兵来突袭，也不要紧，房里一切可疑的东西都收拾干净了。接着，大家给各区分配传单的数量。传单很快被分成二百张一扎、三百张一扎和四百张一扎，总共有三千张。然后，各人拿走规定的一捆传单，到自己的区里去。此外，还需要把一部分传单分送到各地去，同时需要商量好电报的问题。总共有十个区。摩洛索夫当时住在阿摩尔。他应当带走三百张传单去分发。为此，我们答应给他派几名助手。

他拿了这些传单，到一个熟人家里去，傍晚才离开那里。当天晚上，我就得到摩洛索夫在车站上被捕的消息。因此，必须赶紧把铅字归还原主，把预定发给几个区的传单收拾起来。这些工作都妥帖地办妥了。

现在发生一个问题：摩洛索夫向宪兵供出了什么，宪兵会采取什么行动，会不会到处布下罗网，等着逮捕散发传单的人。问题很棘手，但是大家讨论时仍然决定不放弃工作，决定在星期六深夜散发传单（从十一点半钟开始），以便让人们在复活节早上起来就能够看到五月传单。同时，大家决定在散发传单时特别小心。一切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被破获。夜里回家，我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碰到了巡逻兵。从他们安静的神气上看，我深信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而当时我们几乎在每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都散发了传单。造成宪兵队事先毫不知情的原因何在呢？据摩洛索夫自己说，他对宪兵的口供是：他们发现的传单是他从一个陌生人手中得来的。这个人请求在星期六把这些传单带到铁路桥梁附近的森林里去。森林边上将举行一个会议，决定如何处理这些传单的问题。宪兵队长（他在彼得堡办过摩洛索夫的案子）居然相信摩洛索夫的话，一清早就派出便衣宪兵和警察，他自己也改了装，去捕捉他们要捕的社会主义者。过了很久，并没有发现什么地方开会，也没有发现一个开会的人。宪兵队长怕有人看出他，改装了好几次，但这也无济于事，结果并没有抓到革命活动的线索。然而，天已经渐渐接近黄昏，最后完全黑下来了，坐在桥下不仅是件令人厌烦的事，而且也是一件愚蠢的、令人发笑的事。他在那里一直凝神地监视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家，他对这些社会主义者很不满意，很生气。可是，就在这天晚土，整个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它的各区、各个角落和偏僻小巷中都有人散发了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传单。这种传单正和前天在摩洛索夫那里见到的一样。狂怒的宪兵队长把摩洛索夫从监牢里提出来，摩洛索夫一走进办公室，他就嚷道：“你欺……欺……骗了人，畜生……”

“怎么？我什么时候欺骗过人？”……摩洛索夫忍着笑问道。

“昨天是谁说的要开会？难道不是你吗？！”

“我怎么能知道开不开会？”

“就没有开会！我昨天在桥下坐了一整夜，换了三次装，可是一个骗子也没有看见。这一切都是你胡说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会议当时又延了期……”

“怎么又会在整个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发现传单呢？”

受了骗的宪兵决定去搜寻印刷传单的印刷所，但他不去叶加特林诺斯拉夫，而到特维尔去搜寻。因为，他以前曾下令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搜查过，甚至逮捕过一些人，但印刷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传单的印刷所还是没有找到。第二天，当铅字的主人到我的住所来找他的宝物时也扑了个空，他们也没有找到铅字。秘密工作之所以能秘密，完全是因为每个做印刷工作的人，都忠于事业，坐过长时期的牢，受过锻炼。最有趣的是：到住所来搜查摩洛索夫时，虽然那里放着装印刷材料和胶水的全部瓦罐，还放着许多违禁品，但除了纸张外，什么也没有查到。为了不让宪兵怀疑摩洛索夫那里还藏着准备散发的传单，只好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各地减少散发的数目，把减下来的数目发到阿摩尔去，这件工作做得很成功。我们结束发行五月传单的工作以后，便离开印刷所。我们取得了很好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当然都是有用的。但在摩洛索夫意外地被捕以后，工作终究做得少了。每月都有同志退出工人委员会。到了秋天，老同志中只有一人留在委员会里，而且他已经倾心于当时工作做得很有成绩的城市委员会了。可是，我们还是坚持着保存工人委员会的原则，竭力不让工人委员会瓦解而损害正当的运动。我们决不愿意牺牲某个委员会而有利于另一个委员会。修理厂铁路上发生的工潮，我记得不很清楚了。但我记得事情的经过好像是这样的。6 月 25 日就要到来，这是纪念为开辟铁路奠定基础的尼古拉第一的节日。在这一年以前，工人们这一天只消工作到下午两点或正午十二点，就算一天的工作日了。这一次，

工厂管理处却决定所谓“顾全一下血本”。工厂管理处希望工人在十二点以后去祈祷，一点半就回来工作，一直工作到下午六点。当然，如果管理处愿意放假，让大家过这个节日的话，就不该提祈祷，或是就地在工厂内安排一下祈祷就行了（这也许就会很自然地让大家去过节），而不应该用命令的口吻要求工人到教堂去，——要是这样的话，也许工人还会愿意做一天。工人喜欢过沙皇的节日，完全是因为这天可以休假。如果过节要强迫工人占用休息时间而不占用规定的工作时间到教堂去为沙皇祈祷的话，那就会引起每个工人喋喋不休地责骂，骂得沙皇及其仆从的尸体都会在棺材里翻身。这次骚动发生在 1899 年 6 月 25 日。24 日将近傍晚的时候，贴出一张通告，上面说：明日应从上午六点半工作到晚上，休息时间去吃中饭，十二点以后全体工人应到教堂去做感恩祈祷。这张通告贴出后，工人们就发出怨言：这可不行。这张通告引起了工人无比的愤怒；通知工人全天工作，中午还要去为死去的沙皇祈祷，这是几乎每个工人都不愿意干的事。难道我们就傻到这种程度，竟然默默无言地放过这个机会吗？

一个在该工厂工作的同志 24 日晚上回家时跑来找我。但是，没有碰见我，他就同另一个同志赶快用复写纸写传单。写了将近二十份，署名是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工人委员会（这是一个很有威信的署名，曾在工人中间起过很好的作用）。第二天早上，他们把这些写得不大明确的、为数很少的传单分发到两个工厂去。传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每个工厂的工人把传单传阅到完全破烂为止（后来委员会连一份都没有留下来）。传单要求在正午十二点下工后不到教堂去，大家回家吃中饭，午后不再上工。大多数工人完全同意传单提出的要求，只有少数几个人到教堂去。同志们随时都在警惕。不久，大门上出现了用粉笔写的严厉的告白：谁敢在午后上工，他将因他的行动而后悔。接着，又对胆敢擦去大门上的告白的人作了严厉的警告。下午一点钟左右，有一群工人（大约五十人）聚集在大门附近，但是告白不让大家进去；守门人看见聚集了这么多的人，不敢执行考勤员和宪兵

的命令，也不敢擦去大门上写的告白……这时，有人发出讽刺性的叫喊声，大家的情绪都是赞成那个告白的，虽然有几个挑衅者站在那里不断地向群众煽动，许多人还是赞扬大门上写的告白。最后一次的上工汽笛响了，但是大门还是紧闭着。最后，来了一个宪兵军官把大门打开，顺意上工的人还是很少；虽然有几个人进了大门，但他们总觉得这样做不大好，幸亏宪兵军官很快地帮助了他们，把人群驱散到街上去。工厂的大门一直关闭到第二天。一年内铁路工厂像这样没有工人工作的日子是少有的。以前，星期六、星期日或其他的盛大节日，总是有工人做加班的活，而现在整个工厂没有一个工人，这令人多么痛快啊！委员会收到的关于情绪的情报是：人们感觉到有点特别；大家都期待着第二天。

第二天，工潮继续扩大，大家只是假意地继续工作。大多数工作台、车床……车厢和机车都停在厂里。谁也不顺意老老实实地动手工作。不久，贴出了一份通告：6 月 25 日不发全日工资，只发半日工资。这样一来，就完全失去了继续工作的任何可能性，起初是一部分工人，后来全体工人都丢下工作跑回家了。委员会又发出大量传单；警察和宪兵没有办法，终于使用了祖巴托夫的方法。虽然复了工，但整整一个星期工潮都没有平息下来，好像还会继续到下一个星期。这时，警察和宪兵继续监视不大安心工作的工人，把他们的姓名记下来。最后，工潮开始平息，一切都预示着平静无事，但是这种平静的空气又被宪兵破坏了。有一天下晚班后，各个车间的工人朝着出厂的大门匆忙地走去。一部分工人刚刚走到大门口，迎面跑来一个手持出鞘军刀的军官大声喊道："站住！"工人们惊慌起来，一些带枪的兵把工人包围住；当场钻出几个警察署长来划分工人：警察署长的记事本上有名有姓的工人被划分在一边，由士兵包围住，另一部分工人放出了大门。他们在大门那里还看见一个带枪的兵得意洋洋地在喊口令"向左转！""向右转！"等等。宪警们不让走出工厂的工人停留在大门附近，把他们远远地赶开。铁路附近到处聚集着一群一群的工人，他们等待着押解被捕的工人到监狱或另外的地方

去。当时也许会发生流血的冲突，因为他们想劫夺被捕的工人。宪兵为了避免劫夺，继续装模作样，挡住站在工厂大门附近的工人，同时催促被士兵包围的工人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仍用包围的办法把他们押解着通过城市到监狱去。过了大约一个钟头，工人们才知道自己同志的命运。大家感到完全绝望了，每个工人都无比地愤恨，但又怎么办呢？工人们集合起来，走到电车街拐角的小广场上。有人用石头向一所房屋的窗框砸去，玻璃被打碎了。人群本来准备破坏这所住着自己工人和一部分犹太人的房屋，幸好人群中的一个委员会的委员，立刻制止他们这样做，大声地告诉大家：这所房屋住的是“你们的工人弟兄”。人群同意了这位叫嚷着的同志的话，离开这所房屋回身走去。迎面来了一位犹太小伙子。看样子，他好像完全相信人群中不会有人打他。但是，看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危险威胁着他，这时又跑出一位同志嚷道：不要碰他；同时这位同志向大家解释：这人并无恶意，警察压迫他，比这时压迫群众还要厉害。犹太小伙子说：“你们做什么？你们赶快去从敌人，从宪警那里救出你们的弟兄，你们的同志已被押解到监狱里去了，你们应该到那里去救他们。”

人群又叫喊着向监狱走去，沿途都有知道人群行进方向的警察跟随着。当人群到达监狱时，军队已在监狱门口排队准备回去，被捕的工人已被关进监狱了。这时，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被捕了，因为另外一群人派他去做一件工作。这次没有同军队发生特别的冲突，四面八方集合来的警察努力驱散聚集在一起的工人。

此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工人们还是很愤怒，但不久就开始释放被捕的工人了；两个星期后，几乎全部被捕的工人都毫无结果地被释放了。在铁路修理厂工作的同志又散发传单，但是没有被发觉；因此我们也没有遭到迫害。只有一个委员退出了委员会，这是由于他自己糊涂，在困难的时刻不能坚持不渝地承担自己的任务。当时参加在人群中的其他委员仍顺利地继续工作。此后，似乎又安静下来。

夏天来了，我们便在各地的户外举行委员会的会议。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天，我们在市中心德聂伯河岸边的木材库附近举行会议。大家聚合后，就觉得坐在来往行人经过的大庭广众之间，同时还常常使用铅笔和本子，是很不方便的。在堆木板和圆木之间又找不到一个幽静的地方，于是我们就爬上一只空的平底船。在船上发现一间便于利用的房间，我们就在这个房间内讨论工作，最后顺利地结束了会议。第二次我们又到近郊的一只小船上去开会，第三次又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们就是这样每个星期天都顺利地不断举行会议和商讨问题。常常单独地提出铅印传单的问题来讨论，因为在印发五月传单以后又不得不利用胶印器了。这是由于城市方面拒绝用另外的方式印传单，同时也由于缺乏做这一件工作的房间。我同一个同志积极地去找寻过。在远离城区的河边的灌木林中找到了一个可以做印刷工作的地方。可是，城市方面又不能同意给我们铅字，而铅字城内是有的。不仅我们修理厂的工人，就是最普通的工人也不愿意用胶印器印刷的传单。关于这一点，下列事实可以证明：在一个工厂里（钢管厂），工人们看了传单以后，谈话中都对印刷表示不满。他们募集了十个卢布和一些戈比，请求转交去改进印刷工作，而且只限于改进印刷工作。

铁路上发生的工潮还没有平息，马里乌波利爆发的骚动又引起了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工人的注意。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那里传来的情报激动了每个工人，但可惜有很长一个时期不能得到一点可靠的情报。自己的人虽然被捕，然而对于叶加特林诺斯拉夫还是需要散发传单，对马里乌波利更加需要。最后，终于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散发的传单满足了工人的要求。特别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如果只在某个地方常常出现传单，就能使这些传单及时地发生效果，能使它们更详尽地谈论所发生的现象，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如果能使工人信任传单，那么在罢工或发生工潮时，他们就愿意同意传单上所谈的一切，这也就是把运动引向预定目标的杠杆。起初，当直接参加宣传鼓动的人数还不多的时候，个人很容易保密；

但是在参加运动的工人的人数扩大以后，个人的失密立刻就会被发现。可是，在个人失密的情况下，宪兵是不大容易知道关于某人的详细情况的，关于全盘工作知道得还更少。我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些缺乏远见的同志对他们的青年朋友常常谈论我或另外的某人。因此，当你同这些青年朋友会见的时候就会发觉，虽然不认识他们，而他们却认识你，——这真是令人不愉快的怪事。同时，有的人也没有保密的习惯，如果是一个热诚的、醉心于革命工作的人，他就敢表现出很勇敢的行为。

例如，有一位青年同志在工作时间内对聚在一起的工人公开读秘密小册子。工长走到他跟前，从他手中夺去小册子，他一点也不惊慌，只是为失去小册子表示惋惜。当然，这件事会引起群众的不愉快。工长是我们很熟悉的人，虽然是个坏蛋，由于大家都熟悉，他也不敢做出危害我们的事。另外的一位同志在工厂里安置了一个对工人讲话的讲坛。这个厂的每个人几乎都是运动的同情者或参加者，仅仅因为这一点，他们当然就不会谈起某些不谨慎的人的这类不检点的行动。有人向我报道了这一切，我也不能出面反对这样做，因为认识的人太多了，很少有时间同这些急性子的人作长时间的谈话。而他们对别的同志，不是不听从，就是干脆不理。因此，曾引起这些同志的某种不满，后来还要在他们之间进行调解。这时，在下德涅伯罗夫斯克，由一位工人发起成立了一个新的团体。这个团体一成立，就同委员会闹对立。无论如何不愿（主要是这位工人不愿）作任何让步。因此只好进行斗争。当时曾同它谈判过，但毫无结果。这个团体也想自命为委员会，专对下德涅伯罗夫斯克的法俄工厂发传单。当时只好派人加入这个团体，在它的内部做工作，尽量使它不在工人中发生危害委员会的影响。同时，我们很担心这个团体的人会泄密，会因轻率的行动而遭到失败。这当然会拖累我们，所以这时的工作是很难做的。

他们筹集到现款以后，就把这个团体命名为“黎明”。他们是工人，当然有足够的金钱找来印发传单。他们一定要每天印发一次传单，或者是每星期印发一次，可是他们不重视印刷的方便问题，总不肯安装稍好一点的机器。当时，他们已经把钱浪费了一部分。这时，我邀请他们团体的人来开会，而且一定要请他们的领导人出席，这位领导人每次碰到我时总是不愿理我。同时，如果我在工作上有一点成就，他总是背着我竭力加以破坏。他的这套把戏，几乎每次都能要成功，因为我很少到下德涅伯罗夫斯克去。他仇视知识分子，根本不愿意见他们，这就大大影响了他同我们的合作。不知为什么，他也把我看成知识分子。他也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我只好不管他出不出席，仍然同“黎明”的其他成员进行会议。我向他们指出：没有委员会是不能进行工作的；他们的工作做得粗心大意；他们浪费了花了很大的劲才筹集来的金钱。同时告诉他们，我们一定把我们的各种文献送给他们，仅仅发一种传单是不大好的。一部分成员直到散会，都无条件地站在我这一方面……我建议把他们的团体合并到委员会来，并答应当时就送给他们各种文献，派知识分子去领导工作，但他们决不能不得到委员会的同意就出版任何东西。会议达成了协议，完满地解决了我提出的各个问题。此后，到那里工作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不断地起了作用，任何单独行动都没有了。这恰恰是在这个工厂缩减工作以前的事（上面已经谈过），当时，在几乎每天都同工厂管理处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是需要有正确的领导的。我曾回到合作小店待了一个时候。

三个月来，这个小店的主要发起人，其中也包括我在内，都很不注意这个小店了。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成立小店时资本就太少。以后，除了小老头增加了一点点资本，根本就没有增加过资本。小老头不但不在店里取钱用，反而常常把自己多余的工资投到这个事业上。他常常抱怨参加这个事业的人。他总是自己一个人去执行定购商品的一切义务。一有闲空他不是到城里去，就是待在店里。显然，他为这个小店很受累了，而且他的家庭情况好像也使他不安。我很明白，一个人

只有在看到个人的工作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的时候，才能在我们的小店里很好地工作。小老头的妻子常常待在店里，因为她对恭顺地执行丈夫的愿望已经习惯了，而且仅仅是因为这一点。显然，只要她知道这个小店的秘密，她就不会再努力工作了。我们也渐渐相信这个事业已经无法进行，只好把它看作是快完蛋的事业。三个月后，我们又召集所有的人（五个人）来讨论对我们如此重要的问题。当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歇业呢，还是继续营业？无论是歇业或继续营业都需要钱。当时的情况是这样：需要付房租，如果歇业，就要付五十卢布的违约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小店赊出了八十卢布的货物，而这八十卢布是很难收回的（当时根本就不可能收回这笔欠款，因为工人们在别的小店也欠着债）；同时我们查明：有些商人卖的货，价钱好像比我们的贱，有时甚至是赔本或蚀本卖。这可真把我们的主事者，即我们的老板弄糊涂了，后来调查一下，才弄明原因。原来，他们表面上比我们卖得贱，可是份量不足，有时一普特甚至短少七磅。我们虽然发现了这是竞争的原因，但还是没有什么办法，大多数买主既然看见旁边小店的货物比我们的贱，当然就不愿意到我们店里来买了。他们毫不怀疑贱价的货物实际上比贵的还要贵。这就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损失，虽然拿到闹市上去卖，也不能把我们从苦难中挽救出来。因此，只好常常赊卖货物，这就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在领工资以前，我们的小店总是空空如也，没有什么货物，要到领得工资时才有进款，去购买一点点货物。总之，我们的小店时刻绊着我们的脚，常常有倒闭的危险。现在真是弄得进退两难，但愿能摆脱困难而又不丢面子。

这时，小老头和他的朋友是小店最大的债主。因此，如果歇业，他们就要受很大的损失。简单地介绍了情况以后，做出这样一个结论：已不可能再在合作制条件下继续营业，如果歇业，就得付出违约金，而且有收不回八十卢布欠款的危险。当时小店的货物只值一百多卢布。怎么办呢？随便讨论了以后，就建议小老头来顶这个小店，作为他的私有财产，条件是可以用公有本金来付顶费，这就等

于用小店的期票来付顶费，但每月至少要付十个卢布。小老头好像不大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但他又没有更好的出路，只好接受我们的条件。他预先声明，让他不要在头两、三个月付款。我们也同意了。因此，我们的合作小店就转到私人手中去。

以后，这件事对于熟悉小店主脑人物的我，还造成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小店建立在合作制基础上，这当然是很多人听说过的，但他们就不大知道小店的基础究竟怎样，而且事后很久才知道小店已经转到私人手中，对它的业务已经不能再作任何监督了。小老头受到人们当面的指责，说他用公款开小店，这些公款是他用最卑鄙的手段攫为己有的。同时，因为他现在是工长（那时他当了工长），所以这种看法好像也能证明是对的。一个人当然会因人家对自己的这种态度而感到很难受，会因为受这种委屈而常常感到痛苦。我虽然尽量地向我认识的人说明他们的这种指责是不对的，但总是不能完全改变他们的这种看法。我同小老头的关系还是搞得不错。有一天，我要求他把我认识的一个工人安插到工厂去。他满足了我的要求，后来好像又后悔自己不该这样做。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新加入委员会的同志，自尊心很强，只听从我的意见，对其他人就不理睬，举止行动总是不能得到人们的好感。有人向我谈过他的这一切。我遇见他时，对他的举止加以指责过。他终于还是同这个工厂的工长小老头发生了冲突。他谩骂工长，使小老头受到很大的凌辱，小老头也毫无办法，只好命人把他轰出去，后来又下令要在两个星期后开除他。为此，我只好去找小老头，说了一些好话，劝他收回成命。我坚持我的意见，要他不要开除这位同志，而他也坚持他的决定。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这位成了家的老人曾在比他年轻得多的我的面前哭过。他竭力向我说明不能再留下这位同志继续工作的理由。同时，他自己也觉得用这种办法对待工人是不大好的。这件事明显地证明，要想两全其美是不可能的了，他很快也相信了这一点。他常常向我报告工长们问厂长开秘密会议的情况，以及他们在会上讨论了些

什么问题，等等。总之，小老头还是像我初见他时那样。但这也是我和他最后一次的见面了。

那时，他已经把合作小店应该付我的余款付清。我在离开他时，看出他对我的态度，对共同事业的态度，他在两年内始终是一位完全正直的人。我也看见他落泪，看见他焦虑不安以及其他一些不坚强的表现。多花费点时间同他去谈谈，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好处，以便将来能成为一个善于应付环境的小心的人。可是，那时天气太热，任何一点空闲时间都是宝贵的，而且我需要的是比小老头更坚强的人，能够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人。因此，我还是保持着友好关系和他告别了；有时还挂念他。不久以后发生的减低工资的事件，使他很伤脑筋，甚至他的朋友都不满意他，加之，我认识的一个人又没有被开除，当然，不满的情绪就更加增长了。有一次，我需要同我早就很了解的这个工厂的一个人会见。虽然他是工长的朋友，但在会见（在大街上）时他还是谈了大家不满意工长的情况，并且问我如何对待工长的意见。我认为：如果工长是一位暗中支持抗议的自己人，那倒是不错；如果工长虽然是自己人，却力图压制抗议，稍不得已时就向厂方让步，同时作为自己人还引起自己人的不满（倒不是引起仇恨），这样的工长对于运动就比直接的敌人更为有害。因此，我建议召集五、六个人来开一次私人会议，邀请工长参加这次秘密会议，在会议上善意地提醒他不要再做工长。后来我知道，他果然不当工长了，而且还坐过三个月的监牢。关于小老头的情况，我就谈到这里……这年冬天，我们的委员会有了一些改革，老同志中只有一个人留下来，其余的人都是新加入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的。

从 1899 年秋天起，需要加快出版新报纸。关于这一切，我个人是知道的，但是不知道要在哪里印刷；虽然我认为可以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本城印刷；我也不知道所要出版的报纸的名称。因为这一切是严格保密的。我记得，当时曾开了一次城市委员会的会议，在会议上念了几篇诗文，一篇是关于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工

人运动的文章，后来念的是一篇诗“暴君，你去发怒吧！”。这两篇东西都采用了。会上还讨论了派代表参加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问题，这只是预先介绍一下情况，至于如何选举，还要看以后的情况怎样再作决定。因为这是 1899 年年底的事。如果根据这一年多的情况来看，很可以看出 1898 年和 1899 年的运动已经普遍地发展了。工人群众已经相当爱看传单，开始要求看更重要的文献，而且也要求在技术方面作更好的安排。大家已经不乐意看用胶印器印得不好的传单了。对工作也开始提出批评。当然，如果工作不是这么秘密地进行，那就会好做一些。当时只好抛弃旧的印刷方法，考虑新的方法。大家大体上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当时的传单已经陈旧，必须再出版自己需要的印刷品。必需出版一个内容比以前所有的传单更为丰富的报纸，——每个人都这样说。1900 年 1 月，盼望很久的“南方工人报”终于出版了。曾把新出的报纸拿到工人委员会的会议上念了一部分。为庆祝新出的报纸举行了一次小宴会，大家当场约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推销报纸。自然，每个工人都特别感兴趣地拿到一份报纸。他们也像看传单时所养成的习惯那样，决不愿意把它交给警察或工长。

布良斯克工厂的轧钢工人得到了一份报纸，上面的目次使他们很惊奇，目次是：

“看，这才是真正的报纸！上面有新闻，也有通讯！’

他们立刻把这份报纸拿到幽静的地方去看。第一次出版的这个报纸曾长久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中，提高了他们的情绪。因为他们能看到；尽管捕人，可是革命活动并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巧妙，更有力量。

应该说，工人们在两年多内已经受到传单的培养，在这个时期内群众中没有人被捕过，这当然是很好的。群众已经看惯这种事件，所以一旦有人突然被捕，群众中也不会发生那种常常在各处可以看到的惊慌行动。可是，如果领导人中间有人被捕，情形当然就糟糕了，这会使活动暂时停业，这是无论如何，也就是通

常说的“要竭尽全力”不能让它发生的事，而且还不能表示出你或你的事业因某种原因所遭到的困难。

早在初冬时，我就觉得我已受到特别的监视，因此我非常小心。这时，宪兵没有对我作任何袭击，他们还是让我自由行动，这是宪兵队长后来很后悔的事。我只好每天等待着新的袭击。我也预料到这种袭击是会招致恶果的，但还是无法动身，不过我已算定了我还要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待下来的日数。期望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行前捆扎行装时连房东都不知道，捆好后，我出去雇了一辆马车。当时只有房东知道我出门。她准确地推测了我的去向，而且在我走后，立刻就到警察局去，报告我上哪儿去了。为此，我很感激她，因而把这些也写在书中。列车沿着尼古拉铁路疾驶，快到彼得堡了。我很快又可以看到我所熟悉的街道，又可以看到我的熟人。我衣服的侧袋里，装着一张货真价实的公民证。我拿着它可以大胆地到任何地方去。

我的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回忆录就写到这里。你如果想在其中找到关于系统地谈群众情绪和广泛地从心理学上来分析群众情绪的东西，那就会徒劳无益。我竭力想写的，不是这方面的东西，要写这方面的东西，就得完全用另外一种叙述方式。

我把这本关于彼得堡和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回忆录交给《火星报》档案室去全权处理，只要该室同意就可以采用，但一部分要得到我的同意。

我可以答应写一本关于俄国中部的回忆录续集，但是不在这里写。

注释：

[1] 彼得堡的一座囚禁政治犯的监狱，因建筑式样像十字架，故名。——译者

[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届代表大会的宣言。——俄文版编者

附录　巴布石金 1901 年发表在《火星报》上的通讯

1.1901 年 5 月第 4 期

奥列霍沃—祖耶沃（尼科尔斯克镇）。在叙述萨维·摩洛索夫的病院情况以前，我认为有必要先谈几句话来说明一下当地的情况。我们奥列霍沃—祖耶沃的工人，很愿意通过工人的报纸《火星报》，把我们这里有时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情况，介绍给我们本地的工人、其他城市的工人以及别种行业的工人们知道。用不着说，任何一个有觉悟的工人，都非常关心工人的问题，也有很多人虽然自己不是工人，但是对这些问题也十分关怀，同情工人阶级的运动……尽管臭名昭彰的神甫同资本家以及俄国政府的官吏狼狈为奸，用他们的各种狡猾的诡辩使我们处在愚昧无知的境地，但是工人们还是看到自己的可怜的奴隶地位。尼科尔斯克镇上有两个厂主，一个叫维库尔，另一个叫萨维·摩洛索夫。在他们那里工作的，大约有二万五千人，而奥列霍沃的居民，总共才四万人，他们散居在九平方俄里的面积上。人口数量虽然这么密集，但是工人运动却非常静寂和消沉。这种消沉现象主要是由于精神饥饿而引起的。同首都或其他大城市不一样，我们这里买不到书籍，而大城市的工人也绝足不上我们这里来。因此我们根本就不了解各地的情况。我们又无法自己去了解，一方面既缺乏勇气，另一方面又缺少这方面的知识。我们的处境和我们的物质情况大抵就是这样。我们丝毫没有加以夸大，这完全符合事实。我们这里有两所医院，一所是维库尔的，另一所是萨维·摩洛索夫的。我打算尽力谈谈萨维·摩洛索夫给工人办的医院。这所医院坐落在一所铸铁厂（专门替上述两家工厂包工）和工人住宅（宿舍）的附近，对工人住宅说来，这是个凶恶的去处，而对病人说来，尤其险恶。摩洛索夫以相当的代价，把医院交给一位“名医”——巴席莱维契大夫。巴席莱维契大夫对待病人，活像个屠夫。他决不白白替人治病，他能巧妙地扒掉病得奄奄一息的工人的身上的皮。茶和糖，病人是享受不到

的，只给他们白开水喝，就连白开水，也仅仅供应到傍晚六点钟。给他们吃的东西，非常简陋，份量很少。晚饭，给他们吃些酸汤，或者诸如此类的其他薄粥。病人都饿坏了。只有有朋友送吃食的人，才能不空着肚子。由于病人都吃不饱饭，巴席莱维契大夫从不禁止别人把东西送到医院里来。因而病人家属就带来了酸菜、青鱼、面包、葛瓦斯[1]，总之，样样都有。一锅食物一次能够供几个（四、五个）病人吃。病人的内衣脏极了，经常可以在床单和枕套上发现令人十分怀疑的斑渍。有一个工人谈起他访问这所医院时说：有一次，我上医院去看病人。我走到我的朋友跟前，发现他旁边还躺着一个病人。这是一个青年人，他身上穿着一件肮脏的长衬衣，一条龌龊的短裤衩和两只颜色不同的袜子（一只是白色的，另一只是红色的）。这个病人是腿上有病。我讲话的时候，这个青年的眼睛老是贪婪而又狠狠地盯着我，最后他终于说道：行行好事，给我一块面包吃吃吧，我快要饿死了，没有人来看我。医院里的治疗也是惹人气愤的，他们光用清水和一些廉价的药面。巴席莱维契本人很少替病人看病。他雇了两个大夫，自己只是监督发药。

这里还有一个产科。这个产科对待产妇的冷漠无情的态度，特别受人注目，它只在产前两天才接受孕妇，理由是她们来早了，要多付饭食费。那年十月发生了一件十分气人的事：助产士回绝了一个产妇，把她打发走了，产妇离开医院没多远，就在半路上生产了。

同志们，像你们所看见的，我们在萨维·摩洛索夫医院里的地位，是很不愉快的。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精力都变成了摩洛索夫之流的百万富翁的钱财。摩洛索夫越过越有钱，而我们为了糊口，不得不苟延残喘地生活下去。可是，我们要是落到残废院里，又将怎样呢？在下一封信里，我们还会看到我们可以料想得到的事。

1901 年 5 月，第 4 期《火星报》

注释：

[1] 一种饮料。——译者

2.1901 年 7 月第 6 期

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方面报导了许多关于一些小工厂闹风潮的情况。这些风潮表明，危机所引起的严重的贫困，以及各地社会民主党人所领导的鼓动工作并不是无影无踪地就这么过去的。

过了复活节，舒勃柯夫纺织厂借口调皮捣蛋，开除了十二个工人。这十二个工人要求厂方按照例规发给两个星期的工资，而且一定要达到目的。照例，驻厂检查员不但不支持工人们的合法要求，还企图利用叱责和谩骂来吓唬他们。工人们的坚持精神，迫使这个“法律的守卫者”履行自己的义务，工人威胁地要控告他。

德米特里·布林工厂的工人们，粉碎了厂主剥夺他们休假过 5 月 8 日圣约翰节日的阴谋。这家工厂过去逢到这一天，一直是放假的。同时，那儿的女工也想提高工资，但是没有成功。

6 月 4 日那天，А·И·迦莱林工厂的全体工人都跑去找驻厂检查员，要求他撤换工人讨厌的记工员。这个要求提得相当强硬，以致驻厂检查员只好劝告他的上级接受这个要求，而且终于实行了。

卡拉施尼柯夫铸铁厂（有二百个工人）实行减薪，把工人的工资减低了一半。5 月 1 日那天，铸工和厂方之间的紧张局面尖锐到了极点。七十个铸工拿了月薪以后，申明他们不愿意按厂方提出的条件续签雇用合同，要求按照旧条件签约。旧条件是半年一期（现在是一月一期），而且工资按冬季的标准计算。厂方拒绝了工人的要求，扬言要雇佣别的城市的工人来替换他们。铸工们都齐心一致地不肯按原来的条件续签雇用合同，跑去找驻厂检查员，要求他从中调解。被检查员借口老板有权变更雇用制度和工资制度，拒绝工人的请求，毫不干预这件事。厂方

开始在舒雅和莫斯科两地招募工人。莫斯科方面应募的工人有十个。雇佣他们的时候，瞒着他们，不让他们知道：雇用他们，是要叫他们去代替罢工的工人。厂方答应他们可以得到优厚的工资，每月可以拿到 75－80 个卢布，甚至还要多些。可是，莫斯科人一到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便看出招募他们来，是干什么的。他们向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人说明，他们是被骗来的，要是事先知道这儿闹风潮，他们决不会来。“打这时候起，伊万诺沃人和莫斯科人彼此彻底团结起来。而且，莫斯科人马上就去找驻厂检查员，责怪厂方不该把他们骗来。这时候，厂老板害怕事情弄糟，便把一个不好对付的铸工先送回莫斯科去了。”在舒雅雇好的铸工，听到这儿闹工潮，便不肯来了。于是，卡拉施尼柯夫工厂便把一部分紧急订单，交给舒雅的一家匿名的工厂去做。这家工厂的老板和卡拉施尼柯夫工厂的老板是亲戚。卡拉施尼柯夫工厂的工人去找社会民主党的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党委会，要求他们去影响舒雅方面的工人。党委会向这家匿名工厂的工人散发了传单。传单煽起了罢工，工人要求厂方不接受卡拉施尼柯夫工厂的订单。厂方答应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号召工人不要中断工作，同时等待老板回来。老板回来以后，做工的工人得到伏特加酒的“犒赏”，而那些在老板回来以前没有做工的工人遭到了罚款。卡拉施尼柯夫工厂的工潮，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最后还是厂方作了某些让步才结束的——把工资提高到冬季的标准。莫斯科人都回去了，卡拉施尼柯夫工厂的铸工们，替他们筹集了盘缠。通讯员这么写道：“老板的奔忙，结果是给自己的工人介绍了莫斯科人，因而替他们效了劳，并且告诉他们说，本地工人的经济要求比别的城市的工人低得多。”

当然，所有这些反抗的现象，不可能不引起沙皇的走卒的干预。有人写信告诉我们说：“警察最近特别敏感，监视着工人，5 月 1 日那天，到处都是警察。”5 月 17 日到 6 月 18 日的夜里，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上空响起了宪兵的警笛声。十九个工人在这次警笛声中被捕了。我们好容易才弄清下列几个被捕者的

姓名：Г·里雅宾、Н·哥洛霍夫、别洛夫、柯洛廖夫、莽里勃夫、柴洛夫、巴林诺夫、鲍格拉派夫、摩克罗耶夫、沃罗毕尧夫、索柯洛夫、迦拉文。被捕者一部分关在当地的监狱里，有的关在各个工厂的看押所里。许多人都到监狱里去审问。他们盯住三个被捕者不放。地方警察局长和宪兵队长亲自过问案件。他们的工作，做得很不高明，常常逮捕一些目不识丁的人。使人感到兴趣的是，我们后来弄明，在动手逮人以前，巴林诺夫曾被人叫去见警察局长。警察局长动员他给宪兵当狗腿子。巴林诺夫说，大伙都认识他，会很快把他活埋掉，因此他不肯干。警察局长答应给他两三支手枪，叫他不必害怕。然而，这点还是不能打动巴林诺夫。过了两天，宪兵队长又把巴林诺夫请去了，答应比警察局长多给五个卢布（警察局长曾经答应给他十五个卢布），要求巴林诺夫供出首脑们。巴林诺夫又拒绝了。这才把他逮捕，而且毫不含糊地怀疑巴林诺夫就是首脑。我们无从知道，巴林诺夫对他没有拿十五个卢布是否感到惋惜，然而我们确信地方警察局长和宪兵队长一定感到很遗憾，因为他们准备出十五个卢布，都没有弄清一个首脑。

大家都要求谨防迦莱林工厂的事务员柯雷契甫（皮肤黯黑、驼背，话音低沉）。过去，有一次他被捕后，把他知道的事全都说了，以致很多人被捕了。

舒雅城来信，谈到巴甫洛夫纺织厂（约有三千个工人）的令人气愤的情况。这家工厂的老板和他的几个儿子，都是色鬼。其中有一个儿子，淫乱得到了发疯的地步。现在，他的精神已经不正常，染上了花柳病。鉴于这种情况，一个姑娘置身在这里，要很安全地逃避掉这些恬不知耻的俄罗斯资本主义的代表和国家政府的官吏的凌辱，是非常困难的。这里的老板雇佣着一些特别女工，专门替他们引诱年青的花姑娘。巴甫洛夫把他的厂变成了他的一座特殊的宫闱。那些职员也仿效老板和他的卑鄙无耻的儿子，胡搞一气……工厂里空着很多机床，上面都蒙着草席，原因是老板害怕闹工潮，不敢把男子汉雇到自己的厂里来，而女人又由

于体力太弱，不能在这些机床上工作。任何一个男工和女工的心里，都对巴甫洛夫工厂里的情形感到憎恨。

＊＊＊

从同一个城市来的消息说，我们城里不久前搜捕过人。逮捕是在深更半夜里进行的。现在，宪兵队长那里存着很多案件。不用说，别的城市里也在捕人，因为他们发现了秘密出版的书报。而我们这里逮人的原因是，他们发现已经检阅过的书刊里有问题，哪怕一本、两本，都是这样。宪兵队长在审判中总是问道：

“你为什么要买这本书？”

“买了看的。”

“你干吗偏要买这种书，而不买别的书啊？”要不就问：“你为什么只看书，而不自己写呢？”或者问：你为什么不像他——舒雅城的宪兵队长那样过荒淫无耻的生活呢？他、宪兵队长总是和厂老板巴甫洛夫醉得像脏猪似的，然后他们就这么当众接吻，同时把他们共有的感情流露在他们的两对使人感到奇怪的眼神上。逢到这种时候，巴甫洛夫总是嘱咐某个鸨婆子（他在自己的厂里养了好几个这样的鸨婆子）去安排一个姑娘，而她把这件事做得就像烤个小鸡似的。俄国资本主义的代表和宪兵当局的代表，都干这种勾当。他们千方百计地要使群众处在愚昧无知的境地。因而，工人决不挟着书本在城里走，为的是不让警察看见撕掉它。他们一看书就问：“这是什么书？”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阅览室的附近。有一次，资本家巴甫洛夫、政府官员、宪兵队长和俄国神甫——凶手叶甫拉庇出门，动身到离舒雅很远的地方去，目的是暴饮一顿。他们真是喝醉了（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人和他们伙在一起），开始胡闹一通，险些打起架来。后来，他们全都强迫叶甫拉庇穿着肥大的僧衣跳舞。然而，喝醉的神甫叶甫拉庇很倔强，说什么也不肯跳。于是，怒气冲冲的朋友们便把这个酩酊大醉的神甫撵了出来。神甫徒步走了九俄

里，回舒雅城去〔路上差点滚到河沟里），派出去的马车花了很大的劲，才在第十俄里的里程上赶上这个倔强的神甫，把他送回家。

奥列霍沃－祖耶沃方面有人写信告诉我们说：3 月 19 月，尼科尔斯克镇又逮捕人了。洛达柯夫被捕了（几天后，又被放了出来）。织布工人伊凡诺夫、清扫工阿卡冯诺夫的一家都遭到搜查，据说索尔则夫的家也被搜查了。这一次突袭的根源，据我们后来查明，是奸细尼特金（真名：德米特里耶夫）干的。这个德米特里耶夫大约是在八个月前被维库尔—摩洛索夫工厂的新厂长斯柯攀莱夫带进去的。他在斯柯攀莱夫的指示下进行活动，从他那里领取各种费用的款项，德米特里耶夫－尼特金住在工房里的工人中间。他的特征是，现年三十三岁，身量比中等身材略高，体格结实，额角宽大，眼睛灰黑，嗓音温和，说话时额部起皱，神色抑郁。

1901 年 7 月第 6 期《火星报》

3.1901 年 9 月第 8 期

博戈罗德斯克（莫斯科省）的一个工人写信告诉我们说：

当然，俄国拥有若干工人城市，像：圣彼得堡、莫斯科、华沙、基辅、哈尔科夫等。工人在那里过着有文化的生活；社会主义思想在那里也能找到通往工人住宅去的大路、街道和胡同。那里有很多有觉悟的工人，他们正在从事自己的日益增强的事业。那里有知识分子在推动着这个运动……然而，俄国还有一些工人城市，社会主义思想直接通到那里是非常困难的，那里的文化生活被活生生地使劲捏死了。那里，工人过着没有丝毫文化娱乐的生活，他们只能用老板卖给他们的烧酒（现在由官家专卖）来消遣，或者请工人中间擅长弹琴和舞蹈的人来作乐一番。这种地方活像一个小小的死水塘，水面上满布着水草，而且水草一直伸到

塘底下，淤积着粘泥，而粘泥又接住抛到死水塘里来的一切东西。格罗霍夫纺织厂（在博戈罗德斯克附近），就可以算在这个范围之内。这里几乎没有文化生活。文化生活只要一产生，就很难立足。这里缺乏知识分子（假定我要在这里用“知识分子”这个词的话，也只能指一些官吏和另外一些没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一批阿谀拍马的小人，所谓“心腹”)。有教养的工人是很鲜见的。有教养的工人在这里受到一点压迫，就离开这里了。而被监视的人也不可能到这儿来，因此这里什么书籍都没有，无论合法的书也好，违禁的书也罢。如果，大城市有个工人到这里来，打算进行宣传的话，立刻就会受到厂方的注意。厂方处理事情，比军事法庭还快：立刻查明，就把他远远地赶出工人宿舍。我们现在想在这里谈谈这些工人宿舍。我的厂主扎哈尔·莫洛叔甫拥有一个男子（独身的）劳动组合——大约有八百人，还有一个女子劳动组合，都为它们建立了宿舍。另外，他还专为有家庭的人盖的宿舍。男子劳动组合占着整整一座三层楼房。尽管房子里没有取暖和通风的装置，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善工人的情况。工人住得非常挤，就是在兵营里、医院里、监牢里也决不会这么挤……床铺有两俄尺[2]宽，当中拦着一块高高的木板，作为每个工人的界线；每张床上放着两个垫褥，或者两条鼓鼓的被服。总而言之，每一部分都得住上一百多口子。床和床之间的距离是一俄尺，床头前放一张小桌子，上面有两个抽屉，桌主把自己的衣服、糖、茶叶放在里面。所有的人都没有箱子。凳子、椅子或者长凳，简直就没有，只能坐在床上。要是工人全都聚齐了，那么每一个角落就会有四个人。那时候，讲话要不让隔壁的人听见，根本就办不到。住工人宿舍虽然算是不花钱，但是每一个卢布工资里却被扣去两个戈比，带家眷的人则被扣去三个戈比。

宿舍里的厕所的位置，放得很不是地方，都在主要的住屋附近。楼下饭堂的紧旁边，就是厕所。厂方竭力不去打扫它。由此可以想象到，这个邻居对饭堂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899年工人们要求在工人宿舍里得到比较宽敞一些的住处。厂方同意了，并且挂出一块牌子，说明每一个人应得多少立方公尺的空间（一俄丈[3]）。厂方在执行这一决定时，迅速从工人中间开除了六十个所谓“不满”分子，而且在这以后又破坏了牌子上规定的标准。

家属宿舍是由若干小房子组成的。每幢小房子里住四户或五户人家，约十三到十五个人。家属宿舍里很不卫生。厂方强迫工人自己出钱买墙壁纸裱糊。在亚历山大宿舍里，一座三层楼高的房子造成五层楼。这幢房子的第一层楼有一半以上的高度是在地平线底下，而五层楼简直是个阁楼。这一年7月，厂方着手修理这些宿舍。工作做得非常巧妙，巧得以致二层楼塌下来，压在楼底下睡觉的人的身上，同时连带把上面的人也给翻下来。我看见一个娘儿抱着吃奶的孩子好容易才从这个戏棚底下爬出来；一个男人也抱着血淋淋的脑袋从另一个地方钻出来。无法再看下去了，得赶快到厂里去。宿舍里的伙食坏透了，一个在大城市里住过的、要不就是在厂里安家的人，甚至愤慨地上厨房里去责问；往往，有人饿了，还是忍着，不肯去吃饭。可是，伙食费却相当贵……扎哈尔·莫洛叔甫在任何吃食上都要净赚二成半或三成的利润。在住房方面，莫洛叔甫从我们的每一个卢布的工资中扣二个戈比，因此每年光从男子劳动组合方面就能赚两千三百卢布，他在伙食上的利润，每人每月按一个卢布计算，一年是九千六百卢布。他一年光从男子劳动组合方面总共大的可以赚到一万两千卢布。1899年，当男子劳动组合的全体成员，对伙食表示不满，要求改善，同时不在老板开设的商店里购买物品的时候，老板便对工人们嚷道：“我要毁掉这些房屋，让你们自己找房去住。”伙食是由两个组长管理的，他们是过去被众人选出来担负这个职务的。他们现在还继续做组长，虽然工人对他们很不满意。不久前，有三个工人表示不满，出来反对组长，但是他们立刻就被解雇了。

* * *

奥列霍沃－祖耶沃的工厂工人的住宅问题。人人都知道，各大城市里的工人的住宅问题，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凡是工资高的地方，那里的住宅问题就会引起很多各种不幸的事件，引起无穷的苦难、疾病、愁闷和丑陋的生活。住宅越是宝贵，住房的每一平方俄尺的租金越高，住屋的设备也就越糟。这种情况对工人来说是非常残酷的。房主除了在每一俄寸[4]的地板面积上向工人榨取暴利以外，对工人的生活，既不给予任何方便，也不给予任何照顾。

我们镇上的人口本来就增多了，而且现在还在迅速地继续增加着。然而，镇上过去就没有过好房子，而目前也还没有。尽管每年都盖了很多新房子。但是，这些房子都盖得很匆忙，很马虎，全都是用洋钉钉起来的。十四、五间屋子只装一个洋炉子取暖，或者装一个只值三个卢布的铁炉子，烟囱从这种炉子上延伸到所有的屋子里去。这样的火炉和烟囱决不能把屋子烤暖。屋子只有在夏天才是干燥的。冬天，衣服都因为屋子潮湿而霉坏，如果湿掉的话，好几个星期都不会干，住在里面的人也经常感到头痛……屋子都用最薄的薄板子做成的活隔扇拦截着。这种板子常常是用坏的大桶和坏的大抽屉做成的，手指头可以从板缝里塞到另一间屋子里去。好多地方的缝隙都很大。墙上糊壁纸的屋子很少，即便某个工人的屋子里糊着壁纸，也是他自己出钱买的和自己糊的。窗子的前面常常挂着窗帘。很多窗帘都能遮住屋子里的景况。当然，也会碰到一些比较体面的屋子。这毕竟是少见的。家家户户的主妇都没有空余时间来料理家务，因为她们在工厂里做工的钟点并不比她们的丈夫少。屋子里的隔扇，哪儿都没有做得和天花板一般齐，按照房主们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卫生。据他们说，这样，整幢房子的空气都会一样，每间屋子也能平均地分配到暖气。根据正面所述的全部情况，可以肯定地说，在大约拥有好几千居民的祖耶沃，决不可能找到一间可以容两、三个人居住、讲话又不会被别的房间里的人听见的屋子。这种情况把某种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限制得几乎不可能进行。

五、六个人决不能聚集在一间屋子里来进行有一定程序和一定规模的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房租逐年逐年地上涨，引起了工人的极度不满。他们经常去找厂主，交涉房贴的问题。我们这里的一个工厂的厂主发给男女工人每人一个半卢布的房贴，而另一个工厂却发两个卢布。这家厂主付两个卢布的房贴，是由于工人坚持的结果，工人们在这上面达到了目的。当然，住在工人宿舍里的人，什么房贴都拿不到。一个自己租房住的工人虽然可以得两个卢布房贴、而妻子也可以得一个半卢布，但是他还要付出很多的租金。他们两个人如果都在只付一个半卢布房贴的厂主那里工作，那根本是不够付房金的，原因是租金三个卢布的屋子是绝无仅有的，大多数都超过四个半卢布。因此，人人都想住工人宿舍，何况私人房子又离工厂太远。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住宅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厂主们是怎么对待这个问题的？他们是怎样干预的？他们用什么办法来对付这个问题，而工人们又是怎样看待工人宿舍的？大家都知道，很久以来，厂主们就把我们工人兄弟当作是某种半个人性的动物（直到现在，在承包基本建设的包工头那里还存在这种情况），像：粗木匠、泥瓦匠、砌桥匠、马夫，以及烧窑厂和铁路上的掘土夫，等等。因此，厂主给工人们盖的房子都很简陋、狭小，而且十分肮脏。奥列霍沃还有一些旧宿舍。这些旧宿舍和新宿舍比较起来，相形之下，显得很可怜。人住在里面很不舒服，但是厂主们还是不肯把它们拆掉，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单身工人往里面塞。这些是最坏的宿舍，它们的结构，一半是砖瓦，一半是木头。现在有许多宿舍，是按照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上的最新成就建筑起来的。当然，厂主营造这些宿舍，是有他们的打算的。人人都知道，厂主要是不盖宿舍的话，房租就会一倍两倍地往上涨，而工人还要在上工的路上浪费很多时间（现在全部住在宿舍里的工人，至少有二万人光景）。房租一涨，而房贴也将随着增加。假定不住宿舍的工人的数目少去一万二千人到一万三千人，按每人费两个卢布计算，每星期为二万五千卢布，

一年将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而这些钱，厂主是非付不可的。因此，厂主盖宿舍，可以长期地用不着付房贴。如果宿舍盖好后，能使用百把年的话，那就太好了，太合算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模范宿舍里的情况。关于这些模范宿舍，可以这么说：它们对工人来说，已经相当好了（当然，我们也知道，它们对一个南方的或者彼得堡的工匠来说，不仅感到不舒服，而且还会起恶感）。模范宿舍里装着自来水管子，供应干净的清水；屋子和走廊的墙上都粉刷得雪白；屋子里的窗户很宽大，高达一俄丈以上；走廊和屋子里都装着暖气；任何时候都预备着充足的热水；床都是上好的木材做的，等等。这也就是说，在清洁卫生方面，仿佛一切都很好，似乎很关心满足工人的某些要求。但是，蜜桶里要是渗进一勺柏油，就糟了，何况还不止一勺。第一，屋子的面积太大（大约有三俄丈长，五俄尺宽，而且几乎有两俄丈高），它不是供一户人家住，而是供三户人家住。这三户人家是这么居住的：两户人家的床铺放在屋子的两边，第三户人家住在乡下人的高木床上。说真的，这种高木床是相当大的，人站在上面，头不会碰到天花板。高木床成了悬空的屋子。下面的两户人家，各占半间屋子。这样，宿舍就不止住千把人，而是住一万多人。这种居住条件不断地产生许多不便，引起许多不愉快的事。一间屋子里的邻居常常彼此吵架，甚至动手打架。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某人家的一个人，手不干净（偷窃），以致弄得同住的人家很不高兴。第二，厂主的狗腿子和警察的特务（有公开的和秘密的，宪兵的谍报员也住在这里）经常密切监视着宿舍里的工人，而厂里的行政管理处也竭力事先给工人定好作息时间。因此，每一个人放工回来，只好蒙头睡大觉，就连这点也有人监视。第三，他们还严禁工人三三两两地在走廊上、过道上、屋子里、厕所里聚会，并且禁止他们议论任何事情，居然连凑在一起小声说几句话都不许。他们不是借口公共安宁去挑剔工人，就是无端指责他们破坏公共秩序。第四，谁都不得高声朗读报纸和书籍，甚至不准在自己的屋里

对不识字的邻居读书报。第五，禁止任何游戏；甚至同住在一个屋子里的人，譬如为了抽根香烟，也要向邻居征求类似许可的什么话。晚上禁止工人同宿舍内外的人来往和留宿。

尽管有这样的迫害和警察的监视，人们还是愿意待在这种房子里。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自租的房子的情况要比这里坏得多，还要额外地多付钱。因此可以理解到，自租房子的人总是渴望着住宿舍，而且常常羡慕那些住宿舍的人……厂主们营造新的宿舍，破坏了祖耶沃地方的房主们的一切主动精神（创举）。他们中间谁都不敢盖新房，害怕厂主们再盖一、两座新宿舍。那时候，成千成千的人都将搬到宿舍里去住，他们的房子便会空闲下来。这种恐惧心理强迫他们完全放弃盖房的打算，要不，他们就得营建上面所说的那种房子。奥列霍沃－祖耶沃人

1901 年 9 月 10 日第 8 期《火星报》

注释：

[2] 一俄尺合 0.71 公尺。——译者

[3] 一俄丈合 2.13 公尺。——译者

[4] 每一俄寸合 4.445 公分。——译者

4.1901 年 10 月第 9 期

奥列霍沃－祖耶沃。有人写信告诉我们说：鉴于《火星报》最近在奥列霍沃－祖耶沃广泛传布，和我们无法从口头上警告所有的同志，我们要求报纸载文叫同志们提防下列几个人：M·阿罔诺夫（助理工匠），矮个子、麻脸、厚嘴唇、脸上有几颗痣、口齿伶俐、说话时唾沫四溅、三十五岁左右、头发淡黄，旧教的传教士，替宪兵队工作，同奥列霍沃的正教传教士尼古拉耶夫过往甚密；И·С·沙波夫，在工厂的食品店的肉食部当门房，肤色黝黑、目光凶恶、说话又低又快、中

等身材；В·П·马佐林经常在工厂的厕所里夸夸其谈地罔论社会主义和各种迫害，他打听到什么，便立刻把它说出来。这人比中等身材略矮，说话带鼻音，身体孱弱。我们现在警告符拉其米尔和克略兹姆的人，德米特里·尼特金（见第 6 期《火星报》），现在已经在符拉其米尔当了警犬。我们这里争先恐后地阅读《火星报》，不论来多少份，全都被人阅读着。《火星报》使工人们都感到运动的强力高涨。大家都纷纷议论第 3 期《火星报》上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大家都想弄到这份报纸。在个别会议上，工人们希望《火星报》就这个问题再刊登几篇文章。关于圣彼得堡的工人和军警的冲突，议论得很热烈。这些冲突只是整个运动的开端。如果说，这种冲突将来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奥列霍沃的工人现在就没有做错。但是，这种冲突将是极其残酷的，不应当赤手空拳地去对抗武装部队，“木棍和刺刀是同样的东西”。

———

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现在我们这里开始迫害所有衣着讲究、外貌聪明的工人。每一个厂主都暗中命令他们的管理人，要他们对待工人，只要从头到脚地仔细打量他们。如果有个工人衣着比较好，那就必须把他赶出工厂。因而，工人们便被迫穿起“瘪三”的衣服。他们很不愿意雇用男工，但却乐意把工厂大门对女工敞开。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女工们还在忍着，没有吭声。博戈罗德斯克方面的扎哈尔。莫洛叔甫特别喜欢雇用比较愚昧的梁赞人。

对工人的监视，日益加紧。有一家工厂的门房不久前在厂门口搜查了一个上工人宿舍里来打算搜集某些情况的工人。这个门房凭什么权利搜查这个工人呢？伊万诺沃的市长捷尔别辽夫在他自己开设的工厂里，利用加班的活计把工人折磨得疲倦不堪；这种加班活计有时候拖长到全夜。布雷林工厂在发工资的时候，千方百计地克扣工人的工资。

———

博戈罗德斯克。开设在博戈罗德斯克的格罗霍夫工厂，拥有一万三千名工人，是俄罗斯的最大工厂之一，被公认是—座“设备完善”的防治厂，而在关怀工人方面也是受人赞誉的榜样。第 8 期《火星报》上的一篇通讯，向读者报导过博戈罗德斯克工人现实生活中的一面——住宅情况。我们现在根据该地的几个同志寄给我们的通讯，来谈谈格罗霍夫纺织厂的劳动条件。

那里的卫生情况很糟，而染布车间的卫生情况尤其糟。这个车间由于厂房盖得马虎和修膳不当，干活很不安全：天花板快要崩塌，地板没有钉牢，而且也不去整修它；地板的隙缝有寸把宽（这是故意做了当染水沟道用的）。这种沟道使室息人的蒸气不断地从地板底下冒上来。通风设备很不够。墙上和天花板都长霉了。“到处都堆着妨碍人走路的垃圾。”——通讯员这样写道。

这一切情况并不是发生在什么偏僻的角落，而是发生在离开莫斯科几十俄里的莫斯科省。政府十分关怀莫斯科省的情况，竭力把它放在“加强保护”的地位上。正像大家所见到的那样，政府在保护而且是加强保护莫斯科省的时候，却忘掉了保护工人的生活和健康。

格罗霍夫纺织厂实行三班制，因此一个工人头天工作十二小时，第二天就工作六小时。纺纱工人在种种严厉的罚款、腐朽的陋规和捏造的情况下，每月平均挣十四到十八个卢布（由于我们的通讯员的报导，一个月以后，工人们开始骂街了）。其他工人（织布工）的工资也不超过二十八到三十个卢布。染布工一天挣四十五到五十五个戈比。

冬天（从 10 月 1 日起），纺纱工人的月薪落到了十二到十四个卢布，原因是棉花太坏（这时候，工人们常常被罚款到两个卢布）。雇佣期限将满，各种罚款也激剧增多，任何事情都逼得很紧。“迟到五分钟就得罚款二十戈比，而他们自己却把和机车早开半小时，并且迟停二十分钟。”

如果说，百万富翁扎哈尔·莫洛叔甫对他用强盗手段从工人身上榨取利润这种勾当，毫不感到害臊的话，那他对待工人，就好像对待农奴一样。“我们的老板最喜欢用鞭子打人，到现在他还没有改掉这种强盗习性。”我们害怕在这种“最喜欢”的感情下，扎哈尔·莫洛叔甫在工人殴打他以前不肯改掉他的这种“习性”。老实说，我们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到如今工人还不动手打，从前农奴就曾经用打的办法强迫他们的折磨者——地主改掉这种“最喜欢”的感情。7 月 18 日，莫洛叔甫碰到了四个从城里回来的工人，一个工人的口袋里突出一瓶“官卖酒”。工人正要到浴室去。可是，贵族军人莫洛叔甫像头老鹰似地猛扑过去，用鞭子把其中一个工人打倒在地上，同时破口嚷道：“难道你们要老板跟着不成？你们把钱都花在城里，而不肯在我这里花”，然后他把这四个工人交给门警。总之，扎哈尔·莫洛叔甫先生的工人，都有义务把全部工资“花”在他的商店里，如果违背这个义务，就有被捕的危险。驻厂的检查机构会知道这些吗？难道它已经预料到格罗霍夫的工人有一天会捣掉莫洛叔甫的商店吗？如果这种“家长式”的秩序终究会产生家长式的后果，像许多地方发生过的那样，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不过，我们还想继续谈谈莫洛叔甫先生的粗暴的打人行为。“莫洛叔甫常常在机车中间走动，靴筒子里插着鞭子，要是发现哪个纺纱工人在纱锭上落下一个线头，就凶暴地用鞭子抽打他，罚他的钱，还不准他干活。”1899 年，莫洛叔甫用鞭子抽打了一个纺纱工人。这个纺纱工人很聪明，上法院去把他告了一状。案子一连转了三个法院，最后，莫洛叔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如果能使一个好工人和自己打成一片，这要比我打这些官司强得多。”莫洛叔甫所豢养的几十个“巡查员”也常常打人。显然，这类“巡查员”的暴行过去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和伯爵里包彼耶尔的庄园里所激起的混乱，还没有迫使莫斯科的懦夫们考虑到，这种“维持秩序”的办法会形成一种既伤人又害己的武器。该厂的医院“简直是在演丑剧，而不是替人治病”。可不是吗！他们用酸菜汤喂病人，居然还用发酸的东西给病人吃！

通讯员谈到工人的情况时说道："他们并不是胆小鬼，特别是青年人，但是糟糕的是，任何人都是单独地出来提抗议，要求得到厂方有时根本不肯发给他的工资。"

"我们那里也有图书馆。当然，也想去阅读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有人跑去借书，看看书架，然后从一个什么地方抽出一本童话，但是决不能明白说出，他喜欢这本书。这里甚至连杜斯妥耶夫斯基[5]的书都没有，至于什么谢尔贡诺夫[6]和彼萨莱夫[7]等人的书，那就更不必提了。有一次，有个工人问起达尔文[8]的书，但是给他的答复，只是惊奇得张口结舌地望着他。这个图书馆出借的主要是一些竭力想把本来就已经愚昧的工人变成傻瓜的书籍。而宗教道德内容的书籍，青年们是不屑读的。他们确切地意识到这些书籍的愚人和害人的意图……在没有办成秘密图书馆以前，还不可能满足这些人的求知欲望。"

1901 年 10 月第 9 期《火星报》

注释：

[5]Ф·М·杜斯妥耶夫斯基，1821——1861 年，杰出的俄国作家，《罪与罚》等小说的作者。——译者

[6]Н·В·谢尔贡诺夫，1824——1891 年，俄国著名的政论家，社会活动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译者

[7]Д·И·彼萨莱夫，1840——1868 年，杰出的俄国批评家，唯物主义的哲学家、革命民主主义者。——译者

[8]Ч·Р·达尔文，1809－1882 年，伟大的英国学者，进化论—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译者

5. "为捍卫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而斗争" [9]

哪儿有这种道理？——

你们欺侮我们，

你们的这种行径，

将要受到老天爷的严厉惩治……

（一首工厂里的诗）

我们的工人兄弟在工厂里的处境，是异常艰巨的。他们必须忍受许多五花八门的压榨、勒索和威胁。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迫害，到处都是压榨和罚金，但是收入却是菲薄的，难道对我们的压迫还少吗？尽管从工厂开门那天起，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不能就此甘心情愿地去忍受。我们奋身起来，反对上面所述的这些暴行，而且要在这一斗争中做胜利者。资本家－厂主恶毒地压榨我们，然而政府当局的迫害，还要厉害。形形色色的、披头散鬓的神甫，千方百计地向我们灌输奴隶的服从思想，假仁假义地责备我们的酗酒和诸如此类的放荡行为。当然，我们对这一切早就习惯了，而且很懂得它们的意义。至少可以用俄罗斯的一句谚语“狗叫”去形容它们。但是，当俄罗斯的一些报刊也出来反对我们工人的时候，我们还是很难过的。“公理到底在哪儿哩？”这好像等于说，不仅资本家和政府，就是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的机关杂志，像《俄国财富》，还有，至少达东诺夫先生，都不是我们的同情者。我们虽然不能一口咬定地这么说，但是我们有根据提出疑问。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而且牢牢记住：“解放工人，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共产党宣言》）。总之，《俄国财富》曾经刊登过达东诺夫先生的一篇文章《俄国的曼彻斯特》（1900 年 12 月）。达东诺夫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谴责我们酗酒，并且责怪我们对这类可以说十分重要的谴责置若罔闻，因此我们决不能再不加管理。当然，这种情况要是发生在几年前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去管理的，因为《俄国财富》那时也决不会接受工人的抗议，何况是做现在的这种说法。不过，那个时候也许已经过去了，而我们也在努力改好，少让别人指责我们。

我们现在还记得星期日学校的一个女教师，对学生们的答复。有一次，谈话涉及到“自由主义者”一词。女教师在解释这个名词的时候，竭力把自由主义者的个性提到相当的高度，而且从好的方面来阐述它。这里既有教育，也有人道，还有法制，更有充分的自由，以及“自由主义者”的个性所拥有的其他许多优良品质。我在别的一些学生那里听到这种阐述的时候，立刻想起一张报纸说：自由主义者在国外常常（也可能是经常？）进行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在这以后，我很久都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所有优良的品质，都和我们这些向往幸福的人格格不入。这是顺便说说的。现在我们来努力回答达东诺夫先生提出的上述责难，尽可能辩明我们的行为。

达东诺夫先生说，“我们主要的花费，是衣着和伏特加酒。每年这两项，每项都得花三十到七十个卢布”，而“工人的这种花费是从一年的工资一百到两百个卢布中间支出的”。也就是说，一个一年收入一百卢布的工人，在衣着和伏特加酒上要花去六十个卢布。这等于说，这个工人一年内平均每月只要三卢布三十三个戈比，就能吃到肉、面包、茶叶，还能租赁房子，吸烟，洗澡，剃头，并且往乡下寄钱。啊呀，啊呀，达东诺夫先生，你说话太荒唐啦！

要是一个工人每年真能花三十个卢布沽酒的话，那他就能用这些钱买五瓶伏特加酒。结果，达东诺夫先生却说，啃面包、嚼马铃薯、喝麦粥的工人，一天喝一桶酒。因此，你们就讥笑我们，呼我们“酒鬼！”这是否过分呢？！一个工人即使每个星期天花掉一个卢布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年得花掉五十二个卢布，而他还得吃饭，除了星期天以外，还有例假。的确，过年过节，倒是买很多酒，在伏特加上花去一大笔钱。逢到复活节和圣诞节，工人总是多喝两杯，但是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工人是酒鬼，那就眼光未免太短浅了。应当记着，靠茶叶、面包、马铃薯活着的工人，要喝上一杯是并不那么容易的，尤其是当他们得不到机会去充分干卖力气的活的时候……

达东诺夫先生硬说，酗酒成了一种风气。他是根据禁酒会的种种指责而做出这个结论的。当然，我们工人清楚得很，禁酒会里的许多人是些什么人，而且也知道在制造新风气的情况下，即当沙皇和神甫想当酒店老板、而部长维契当酒保的时候，他们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会是些什么人；只要提醒一下伯爵托尔斯泰从莫斯科禁酒会的荣誉会员中被除名，就足够说明问题了。让那些有教养的先生们去宽恕我吧，——但是我不需要做一个断言，这些有教养的先生决不会当上这些社团的头脑的先知。《火星报》打算尽速让读者了解一个正在加紧根除酗酒的禁酒会……完全正确，达东诺夫先生，不仅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而且在彼得堡、莫斯科、南方，乃至全俄罗斯，都有“请客”的事。这是每一个有教养的工人必须与之斗争的坏事，然而我们不能同意：它是“工厂生活中的一件最可怕的坏事”，尽管别人只是因为一个新进厂的织布工人邀请十到十五个人吃饭，给他们沽上四分之一桶的酒，而可笑地认为他在用这种办法强迫他们酗酒。其实，他们不光在工作以后喝杯酒，还庆贺他的进厂。要晓得，这样的“请客”，工厂里不是每个星期都有的，一年至多碰上一回到三回。说老实话，“鬼并不像禁酒会和达东诺夫先生所画的那么可怕”。

我们要提出几个疑问：为什么我们上面的“请客”就是“达到某种程度的风气的酗酒”，或者“是工厂生活中的一件最可怕的坏事”？而像文学家这类有教养的人在各种纪念会、宴会、庆祝会上喝的酒怎么也不会少于任何“请客”会上的人，试问，达东诺夫先生，为什么这就不是“达到某种程度的风气的酗酒呢？”当大人先生们“举杯祝好”、接着“碰杯”、“回敬一杯”、然后再“为公爵干杯”，这样无休止地在各种“干杯、碰杯、敬酒”的情况下喝个不停的时候，达东诺夫先生，为什么，这就不算是“达到某种程度的风气的酗酒呢？”这就不算是有教养的上流阶级的“生活中的一件最可怕的坏事吗？”姑且拿部长西彼金来做例子，他为了消磨这个夏天，到处参加宴会，醉得比皮鞋匠（请允许我在同志们面前用

这个字眼）还厉害，这完全是真事。工人们亲眼看见他“狼狈”地从摩洛索夫家里参加过酒宴走出来，用一句工人的粗鲁的比喻，他简直是“光着屁股”走的。达东诺夫先生，难道上面说的这些丑事，就不助长“普遍的群众性的酗酒吗？”再说一遍，为什么我们的“请客”就是“达到某种程度的风气的酗酒”，而上面说的其他宴会就不是呢？我们知道这种原因，因此我们不能对这件事默不吭声。

达东诺夫先生，分歧之点，完全在于：你们是有学问的人，尤其是形形色色的大人先生们和诸如此类的禁酒会会员们是在阔气的大饭店、俱乐部、公馆和宫殿里喝酒的，而我们这些穷人的喝酒地点，都是在后院子里和客楼里，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逢到夏天，在干瘪的小草坪上喝酒，嚼着粗淡的下酒菜。谈到酒量，我们是不能特别恭维自己的，因为我们那时面苍白而又体弱无力。你们没有看见酒鬼西彼金先生吗？他清醒的时候，看上去就活像个大铜炉子，如果喝醉了的话，那他就更美啦〔顺便提一下，我们劝他还是少喝酒的好，免得像叶伽契琳娜时代的省长凯莱尔将军那样被酒精烧死）。话要说回来，我们要是在后院子里喝酒的话，我们就不准你们说我们是酒鬼，而把别人称作禁酒会会员。你们看报的时候，也会看到：每一期上都登载着干杯、碰杯、敬酒等字样。文学家先生一辈子手里都握着高脚杯，竭力心平气和的，描写高尚的酒宴。啊，文学家先生们，世上还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吗？！这不由得使人要问：究竟禁酒会在哪儿呢？达东诺夫先生在哪儿呢？而他的眼力又表现在哪儿呢？他为什么不肯说：“教育丝毫没有提高”呢？他们究竟为什么要闭口不说话呢？很简单，他们害怕别人威胁他们，因此他对上面的酗酒只好讳莫如深。而对待工人就是另一码事了。对待他们，什么都可以说，因为工人是被人缚着的，因此干吗不跑到他们跟前去唾他们两口呢？于是五花八门的禁酒会就磨刀擦剑起来，而达东诺夫之流的人也跟着他们呐喊。关于酗酒的事，可以不谈了，但是同达东诺夫先生的公案，还没有完。这就是看到几个工人穿件毛纺的短裤的事。一个工人住在城里本来是乡下人打扮而现在买

了件城里衣服穿，就真值得大惊小怪吗？难道达东诺夫先生就认为农民不需要城市服装、老百姓只配永远庄稼人打扮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就等于承认希望在农村中保留简陋的土舍。我在这种情况下不打算把嘲弄服装的罪名放在达东诺夫先生的身上，而是要着重指出两个假设中的一个好的假设。我们早就尊敬的普列汉诺夫谈到工人（革命运动中的俄国工人）时说过，他们常常在服装方面和知识分子不同，但是有好处（可惜，我现在手头没有这本书，不能引用这位可敬的作者的话）。

总之，比起不爱惜衣服，还不如让衣服穿得漂亮些。老实说，我们这里的住宅问题提得很不妥当，不仅我们居住的城市，而且全俄罗斯都有人起来颂扬它，甚至捍卫它。在很挤的屋子里住惯的工人，使得某些有教养的工人很气愤。这些住惯拥挤房子的人，竟然认为他们住的房子比两、三个人住一间屋子还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习惯住在工人宿舍里很快活，而待在两、三个人住的屋子里，就好像待在监牢里一样。这种环境的生活经过几十年也就习惯了，根深蒂固了，而刚从乡下出来的人除了指望往乡下寄两、三个卢布以外，起初什么都不想，因此他们还准备降低这些条件。群众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就忍受不住孤独，不可能立刻把它当作刑罚看待。米尔新[10]先生在他的著名的作品《世界上被唾弃了的人》中，也描写了这种心理状态。在这个作品中，一个有教养的人忍受不住大牢房里的生活，而认为这是一种刑罚。这个人认为最好待在单人牢房里。但是，要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没有文化的人）待在那里的话，单人牢房反而成了对他的惩罚，而大牢房才能使他高兴。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任何一个有些文化的工人，都竭力想法单独一个人住。如果许多人都住工人宿舍里，大家就分居在单独的房间里，或者两户人家合住在一间屋子里，因而观察家达东诺夫先生就能够在那里的屋子里看到床铺。

达东诺夫先生的眼力，的确令人惊奇。他决不是克雷洛夫[11]寓言中看不见大象的主人公，绝不！达东诺夫先生一到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去拜访工厂，就立刻注意到一块凹地，什么样的凹地呢！——所有的工厂都在那里，你们瞧，达东诺夫先生就有这样的眼力……他把身子转了一圈，发现了很多东西，因而隔了没有一会工夫，他就回头往像风车翼子般的凹地走去，上上下下地走动。这里有厂主、行政当局、全市的市面，等等。但是，我们不想谈这些发现，只是来谈我们工人的事。就这样，他回身没多久，就立刻发现了“达到某种程度的风气的酗酒”，又一回身，就看到工人的睡觉情况，挤得好像阿斯特拉罕的罐头鱼似的，一个人的头竭力往另一个人的脚底下钻。过了一会，他又回身看见工人（全体）都没有丝毫读书的愿望和任何求知的希求。再一回身，他又看到：几个工人“合饮一瓶白酒”。再回身又发现：“警察局的警察破获了某一件案子”，留下了一件撕破的长襟衫。一回身，他又发现一座萧条的剧院、轮圈舞和游荡的观众，以及哪儿都没有一本书。接着，他又回头看到离《俄国财富》很远的铁路。虽然，达东诺夫先生的眼力很尖锐，然而单凭他一个人是发现不完的，而且也不可能把《俄国财富》的篇幅都登完。我们认为，他反映的情况不完全，要知道全部情况中还缺少我们有理由等待观察家达东诺夫先生说的几句话。真的，他会说：“毫无疑问，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都是懒虫”。同时，在我们回过头去指控以前，说不定，达东诺夫先生还会补充一句说，我们“对于知识，根本就漠不关心”。

达东诺夫先生得到了席斯契林先生对他的文章的答复。席斯契林先生向观察家达东诺夫先生指出，他举的数字是错误的，这也就是说，他本来想“捉个猪崽子，但却牵了条大犍牛”。然而，我们却要说，他是常常犯错误的，即便在相反的情况下。譬如，他在谈到读者的人数时说：“读者，年龄在20－30岁的，占23%。”我们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打哪儿弄来的，不过这点对我们不怎么重要。显然这是

从禁酒会的总结报告中摘来的，而禁酒会的总结报告恰好反映了达东诺夫先生所描写的那个时期。下面是按年龄分类的读者表。读者表：

年龄 15 岁以下的……………………159 人

年龄 15－20 岁的……………………818 人

年龄 20－25 岁的……………………240 人 16.41％

年龄 25－30 岁的……………………160 人 10.91％

年龄 30－40 岁的……………………54 人

年龄 40－50 岁的……………………27 人

年龄 50 岁以上的……………………8 人

原来，年龄 20－30 岁的读者，不是 23%，而是 27%。而且有很多读者都不是工人，我们可以从下表中看到：

工厂工人……………………1155

手工业者……………………108

商人……………………27

各种行业者……………………95

无业 者 ……………………81

——————

共计 1466 个读者，其中商人、各种行业者、无业者只占 13.8%

这个表也清楚地说明了谁是读者。但是，我们如果把读者的人数和书籍的卷数比较一下，就会明白许多人都不是经常的读者的原因了。

读者人数……………………1466 人

书籍卷数……………………1496 卷

14 个月内借出书籍卷次……14211 卷次（果戈里的著作占第一位）

老实说，结果，工人只好阅读黄色书籍，这并不是工人有这种口味，而是因为缺乏好书。如果达东诺夫先生打算责备农民吃鹅鸭而不吃面包的话，那么这种责备就和他责怪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的行为完全一样了。达东诺夫先生，您责骂工人对知识漠不关心，但是为了纠正工人这种对知识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您又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达东诺夫先生，您指责工人讥嘲地方自治机构和下级警官，但您又写过文章去说明它的优点吗？**什么也没有写**！要是一个工人在乡下的教堂－教区办的学校里念书，他会知道地方自治机构的优点吗？**什么也不会知道**！如果有人写了一本有关地方自治机构和论它的活动的通俗小册子，禁酒会和工厂的图书馆会出借这类小册子吗？**不**！工人们能从你所说的图书馆里借到这本小册子吗？**不**！工人们能从你所说的图书馆里借到深孚众望的作家所写的，知识分子能从中汲取知识的名著吗？**不**！工人们从图书馆里借到的书籍，能使工人们得到真正的知识吗？**不**！上述五个图书馆的书籍，能使多少有些教养的工人感到兴趣吗？**不**！你们所写的较好的丛书（公开发行的），工人们能弄到手吗？**不**！这样的例子是举不完的，不，不，不，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写，什么也不会知道，归根到底，反正是不，以及什么也不知道。就是再说十遍，还是毫无结果。但是，达东诺夫先生却肯定了这些。他的这种胡言乱语站得住脚吗？难道你们就没有千方百计地不让工人到领班、管理员等看书的图书馆里去吗？难道我们这里的文化和独立精神，尤其是高尚的人格，还没有危害到工人吗？难道我们的工厂图书馆不是经常被人当作暗中观察工人可否予以信任的场所吗？至于公共图书馆，我们也有理由肯定，它在这方面也决不是一头无辜的羔羊。难道，公共图书馆就没有竭力、尽可能地在向老百姓歪曲人的本性不是善良的而是卑鄙龌龊的吗？难道，柯马罗甫先生过去和现在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少吗？毫无疑问，公共图书馆里陈列了这类书。可是，公共图书馆里是否出借《俄国财富》呢？我们对这点感到怀疑。工人不大到图书馆去的主要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书不多，另

外是因为缺乏他们要看的书，因而也就更不容易从本来就不多的书中挑到它们。要是这些读者常常退出图书馆，那么责任往往也应该由图书馆来负。

我们已经指出了上述总结报告的数字：读者一共是 1466 人，书是 1496 本或 1074 种。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要是所有的读者每人都借一本书，图书馆就只能剩下至多 2%的书了。要不，图书馆就得关门。因此，希望看书的人也就迫不得已地甘心满足于各种诲淫诲盗的读物了。我们再来翻阅一下上面的总结报告：宗教－道德的书籍占 20％，只有 10％的读者借阅它们，文学书籍占 60％，但是有 66％的读者借阅它们。这种情况好像不能再进一步地去强调它的缺点在哪儿了。大家都看到，达东诺夫不肯承认那些有时上图书馆因为借不到书而等在那里的人，是读者。其次，达东诺夫先生硬说在我们这拥有两万人口的整个区域里没有一份人家屋里有一本书。这显然是弥天大谎，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工人们经常都有自己的秘密图书馆，书籍虽然少，但是所有的书都是精选的，经常都有人阅读。因此，一个真正的读者很少跑到上面所说的图书馆去，其原因，第一，怕受人注目，第二，到那里去也没有希望找到什么好书。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有教养的工人都不得不装傻子。达东诺夫先生决不会知道，其实也没有兴致去打听，符拉基米尔省全省都是和知识隔绝的，尤其是和社会主义隔绝的，听了这话，达东诺夫先生，请你不要害怕！有些人打算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经营书本生意，但是他们老是得不到许可。难道他们就不怕没有买主吗？奥列霍沃－祖耶沃倒有书店，但是那里严禁出卖一些著名的受人欢迎的书，而想买这些书的人碰到的回答总是“没有”和“卖光了”。那里的工人对于图书馆的缺书，经常怨声载道。这种怨声载道是普遍的。

在舒雅城（参看第 6 期《火星报》的通讯），有一个工人从图书馆里出来，没有走多远，就被一个警察喊住了，问道：“拿的是什么书？”后来，当警察弄清书的性质和出借处以后，才放那个工人回去。如果书上没有同图书馆的印戳，这个

工人能这么快拿书回家吗？职权就是监视工人的警察，能够受人信赖吗？宪兵队长在他执行的审问中，责问一个工人：你为什么偏要看这样的书，而不看宗教的书。这是什么原故呢？要是书是一本什么特殊的书的话，那就更要受疑惑了，其实它是政府机关同意了的书籍目录中的书！这一切，工人们以后都知道了，因此一些胆小的人后来走到图书馆门口都打哆嗦；既想借书，又害怕。当黑暗势力反对工人的时候，达东诺夫先生，你可知道工人们所处的是什么样的地位吗？我们再来拿奥列霍沃作例子。那里的地方当局搜查到莱肯特尼柯夹[12]的全集，把它当作禁书销毁了。正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工人决不能在那里的图书馆里借到大部头的书，他们总是说：给人借走了，而管理员们几个月、几个月地把两卷集、三卷集的书放在自己的家里；并且大家常说：工人要是向工厂图书馆借大部头的书，差不多经常遭到拒绝，他们总是说：书被人借走了，其实它仍还好好地放在书架上。贴出惩戒工人在宿舍里高声读书报的告示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对工人的教育的关怀程度了。哪怕为不识字的工人朗读书报，也要受到惩罚。

达东诺夫先生，请您不要因为我离开符拉基米尔省到鲍戈洛德斯克去而动肝火。扎·莫洛叔甫工厂的工人可以看到黄色书籍，因此工人们用不着到图书馆去。图书馆里连杜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都没有，难道除了一些没有价值的出版物和神甫们的愚昧的遗产及欺骗人的书本以外，工人还能借到满足精神需要的巨著吗？满足工人精神需要的方式方法的一般特征，就是这样。从上述情况中可以看出，工人好像有阅读书本的机会，而人们也在努力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政府、厂主和各界人士都公开承认这种满足的必要性。但是，事情又好像不是这样，实际上他们在咆哮，在质问，在指责：你胆敢念书给不识字的人听？你怎么异想天开地在工人宿舍里朗读起来？把他赶到闹哄哄的屋子里去！……你干吗不看宗教的书，而看这类书？——这类书没有，被人借走了。你是谁，在哪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听到别人责备我们“对知识漠不关心”，难道我们就不憎恨说这话的人

吗？达东诺夫先生说，“在所有的图书馆（五个）里，一共有八千册书，借阅这些书本的，大约三千人。”我们有根据不信任达东诺夫先生的这句话，因为据我们知道，禁酒会的一个图书馆有 1466 个读者，在每个图书馆具有同样数量书籍的情况下（当然不是绝对的），为什么事先就没有把其余的图书馆的读者人数定得差不多相等呢？如果达东诺夫说这些都不对，那也就只好由他的良心了。

我们心中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五个图书馆里哪一个里面都没有好书。如果说它们里面放着五花八门的荒谬书籍供人“挑选”的话，我们也就没有根据说，它们就没有人阅读。只有那些愿意愚昧自己的人，才阅读宗教－道德之类的书。而我们是打心眼里不想看它们的。最后，我来稍微谈谈一所公共图书馆。达东诺夫先生在那里发现，工人们“不肯每月从自己的 15 到 20 个卢布的工资中拿出 20 个戈比来付给图书馆……”请读者原谅，我不认为达东诺夫先生是克雷洛夫寓言中的看不见大象的主人公，而是个目光尖锐、很会观察事物的人。但是，我这么说，心里是非常难过的。因为，我这么说，算是干吗呢？要晓得，读者们，说实在话，他是没有看见大象呀！好啦，就算达东诺夫先生凭空想出了个玩笑！那又为什么呢？看来，看看书，也要花两个卢布，而且还要付四个卢布，作为借书的押金。他们看到工人挣到很多工资感到十分惊奇。可是，冬天，工人每月只能挣到八、九个卢布，而在看书——这是个机会——的押金上就要付四个卢布。……啊呀，达东诺夫先生，这样做，对我们合适吗？真的，我敢担保向你说，这是不合适的！把一半的工资去付借书的押金，我们买面包和白菜汤的钱就会不够，这样行吗？不，你们要是解雇我们的话，我们还是能好歹对付过去的！……老实对你们说，我们弟兄到哪儿都不要紧。有一个人，他很不满意你向我们说过的那些个图书馆。有一次，他想起上述五个图书馆中的一些大部头书，便走进其中一所公共图书馆：“请您无论如何把这部书借给我。”

“没有。”

“那末，这部呢？”“没有。”“可是，这一部呢？”“也没有。”

“好吧，那就请您把达尔文的书借给我。”“你是干什么的？”“工人。”“在哪儿干活？”“你问这干吗？”“那末，你住在哪儿呢？”等等，最后，这个工人全都说了，他住在哪儿，在哪儿工作，然而书还是没有借到，空手走出这个公共图书馆。大概，后来有人到工厂里去找过他了，不过，他说的不是真名实姓，而是信口捏造的。达东诺夫先生，结果竟然会这样！是不是因为有人告诉您说，本地工人不关心其他地方的工人生活呢？达东诺夫先生，原因准是如此！其实，原因简单得很，您就是花多少时间在附近绕圈子，都是白搭，都是徒劳的！我们心里明白，准是有人对您说，我们本地工人对别地方的工人的生活习惯和其他问题，都不感兴趣。“那儿大概有羊？啊呀，真的，倒把它们给忘了！”达东诺夫先生也把某件相类似的事，提到了恶狠的公堂上。你们硬说工人对知识漠不关心和不愿意看书，就应当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设立一所至少拥有25，000册藏书的图书馆，而且书籍不是按照国家机关制定的图书目录和禁酒会的更糟的图书目录来挑选，而是按照读者定的图书目录来挑选，同时使那里的人不把工人当低等人看待，也不把工人手里的莱肖特尼柯夫的作品当作禁书加以没收，——那时候就能明显看出工人们追求知识的愿望了。替西彼金等人卖力气的达东诺夫之流的先生们，请你们别忘了，前者手里握着一根上面刻着“根据第144条”等字样的棍子，随时准备迎头痛打《俄国财富》和其他刊物，而这些刊物也决不能跪在西彼金的条文面前央求赦免它们的达东诺夫之流先生们的罪名。

达东诺夫先生，请您允许我们问您一下，新闻界方面究竟为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呢？有没有一份大报为我们工作呢？如果有，那么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是否买得起呢？定报的工人能否从这份报纸上汲取到大量的知识呢？不！现在我们还没有希望获得一份向工人说公正话、毫不客气地当众说出真理的报纸。像《日光报》之类的报纸，只是践踏工人，愚弄工人。《商报》也千方百计地说工

人愚蠢，而收入却很丰富（这是涅撒维希姆先生从一个钳工身上得出的概略结论）。《商报》的论调是：只要皇帝陛下说一句话，地球就会立刻像西瓜似的分为两半，而瓜子也就会像各种贬低高尚道德的告示似的从中撒出来，而主编先生们将会好心地把它们拣起来。皇帝陛下扬弃掉不重要的东西，继续搜刮俄罗斯老百姓身上的脂膏。其结果，俄罗斯老百姓在高尚的道德方面就没有可能得到发展，因而他们甘愿通过不高尚的途径去得到它；另一个结果是，到处都出现秘密出版的读物，其数量无论有多少，都感到奇缺，工人们阅读它们，关心它们，而且把它们藏起来，虽然做这一切都很不方便，而且对自己说来，还常常不无危险。让达东诺夫先生给我们这些什么大部头的读物吧，我们会找到愿意阅读书籍的人，毫无疑问，这些人都对科学和知识感到兴趣。

总之，要是达东诺夫之流的先生们不来注意我们阅读什么，相反的，而是给我们带来什么读物，那就很好了。如果他们不愿意把书籍带给工人，那就让他们把书籍带给在精神食粮上比工厂工人饿十倍的农民。但是，达东诺夫之流的先生们也不愿意管这些精神上饥饿的人。我们这里过去和现在经常都有很多对我们吹毛求疵的人，而正派人，我们是很少遇到的，因而我们竭诚欢迎任何一个愿意在学问上致力的人。请原谅我，我想试问一下：在某个省城里受过相当教育而且具有文凭的知识分子，像县警察局长、检察员、神甫、地主、衙吏、地方上的官长、军官，就念过很多书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打牌、喝酒比起念书要用功得多。可是，表面上，他们好像比工人有教育，而且有的是时间去坑害工人，同时他们住得很宽敞，吃的比工人不知好到哪里。达东诺夫先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至于谈到看戏，只要戏好，演得好，票价便宜，贱价的座位也能听到和看到舞台上的唱做，戏院到处都会客满，这是人所共知的事，用不着去证实它。事实上，这种情况不是经常的。要是达东诺夫先生还没有发现工人的话，那他还有可

能在戏院里遇到卷着袖口的工人，像他们在工厂里和出厂时的姿态一样。达东诺夫先生的眼力，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再往下谈。达东诺夫先生说："还没有找到合作运动的任何征象"。达东诺夫先生没有看到任何征象，但是我们倒发现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它的商店、还有它的章程。席斯契林先生对这点作了回答，然而我们还想就这个问题谈些席斯契林先生没有讲到的话。正是这个时候，在俄国，任何一种正确的合作活动都会使人感到惊讶，要是愿意的话，还会使你感到恐怖。工人们要是在某个地方也异想天开地搞这类名堂，而且没有立刻叫人看出这是纯资产阶级的机构，那他们首先就得表现他们很安分。其实，最高权力机关总是不相信他们的安分。结果，社的章程还没有定出来，而某些个社员倒尝到了当局的厉害。当章程还在衙门里传返的时候，就有人用暴力把余下的社员送到不明的地方去了。在俄国，呈请批核的各种各样的章程，数量很多，但是得到批准的，是微乎其微的。只有省长、厂主、驻厂检查员等等是名誉会员和当然会员的合作社的章程，才能得到批准。而且要人相信，这些合作社具有考虑改善工人生活的基础，同时还强词夺理地说，仿佛地方长官就是老百姓的亲生父母……。

各大城市的工人们经常寻思着要建立工人俱乐部，但是老是得不到许可。因此，工人们不得不徒步到小客栈里去听手风琴或口琴。有教养的老爷先生们在这上面耍的聪明，很不高明。准许建立的合作社经常都处在被查封的恐惧气氛中，人们在集会上发言，必须四面瞅瞅，会不会有什么癞虾蟆或者蝮蛇跳到自己的脖子上。他们还经常为社的基金担心思、害怕政府把它充公和没收。只要一想到罢工和这种社将会帮助它的会员——罢工者，它就自然永远受省长的管辖。显然，达东诺夫先生不知道下面的屡见不鲜的情况：工人们制定了章程，刚签好名送出去，而所有签名的人都被逮捕了，政府当局把他们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果达斯克、符雅斯克等省。这是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某些看不出来的合作运

动的征象呢？”我们可以向达东诺夫先生担保说，我们谈这件事，是根据事实，而决不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反对合作社。只要冷静地观察一下实际生活，就不能不承认，在目前政治专横的情况下，合作社对工人的好处，不如对政府那样的好处。任何一个迷恋合作社的热情工人，都应该用这点来谴责自己的白费力气和徘徊不进。合作社决不能把它在政治自由的情况下一年所做的事，在目前政治专横的情况下的十年中做出来，因此我们十分希望，群众们都热衷地下教育（宣传鼓动），而不迷恋合作社。任何人都明白，现有的合作社和消费商店，是些什么东西，不论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在俄国产生的。有些地方，它们的性质，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机构；有些地方，它们是从工人手里收回工资的十分巧妙的手段；有些地方，它们纯粹是官厅机关（衙门）；而在有些地方，很难把它们叫做什么，它们的目的是：把钱拿来，我们来给你们支配！各地合作社的目的，从理论上来说，都是千篇一律的，第一条都是：“本社宗旨，尽可能供应社员以廉价的生活必需品”，等等。正像我们所说的，这是理论上的说法，而实际上是另外一码事。合股商店可以列入第一类情况（譬如普契洛夫厂的联合股份公司就是这样的商店）。最初，先确定多少股券。当然，股东常常都不是工人。只要生意一兴隆，股东们就竭力设法缩减股券，如果办不到这点，就把股券收到少数几个人的手里。那时候，股券的价值就被计算得一个普通工人不可能当股东。

老实说，工人也没有当股东的念头。股东们可以得到优厚的红利，而赊买的顾客如果能得到些什么的话，也只有在比较好的商店里，而且要逢到好年头。商店的业务归几个人管，赊买的顾客丝毫不能过关。另外一种情况是，各个工厂里都有很多由老板出资开办的商店，由管理处经营，全部收入归他们所有。那里的工人要是自己想办个合作社的话，立刻就会被开除出厂，甚至让他们去认识认识西彼金之流的老爷们，后者对待他们决不会忘记采取工厂管理处的威逼手段。工人走进商店，不得不付出他们用血汗换来的金钱，而且态度还要像在厂里一样。

因为商店里也有厂里的领导，他们同样能把工人开除出厂，因此工人只好默不吭声，别人给什么，就得拿什么。第三种情况，铁路办的商店，都是官办性质。这些商店的主要收入虽然都是从工人身上得来的，但是它们还不能控制大多数工人，而那些生意不景气的商店则乞求官僚们帮忙。第四种情况，有些商店的管理处和工厂的管理处很难区别，尽管它们是头挑的工厂（像布良斯克地方的工厂）。你们可以设想一下，工厂管理处不喜欢的一个人如果落到商店管理处，将会怎样？工厂管理处如果平静地把他开除出厂，这等于他被剥夺了成为商店管理处成员的权利，甚至被剥夺了商店的普通赊买者的权利。这种情况不仅可能发生在上述工厂里（布良斯克地方的工厂里），甚至会发生在几乎每一座工厂里。第五种情况，奥列霍沃的商店的基金，是依靠工人出资的。任何人想在这家商店里赊买东西，必须确定自己的赊买金额，我们假定它是十个卢布，但要先付，付了钱以后，他才能算是赊买顾客，然而还不能超过金额拿东西。看来，这好像是俄国最新颖的合作社。这个商店的管理人是遴选的。选举时，参加大会的领班、管理员和老资格的管理人，事实上都是决定商店命运的主宰。工人们站在后面，只能随声附和着提出候选人的事务员们的意见……这短短的几句话说明了我们的这些合作社以及工人们在这些合作社中被人强加在身上的义务，丑恶的义务！

此外，各地工人在这些合作社中，总是成为被人尽量天天剪毛的羊群。我们来看着，工人到合作社或公共商店赊购东西时被人盘剥的情况。无论你走进俄国哪家这样的商店里，最好、最嫩的肉，都是留给老板、领班、管理员、监工和狗腿子的。肉骨头、老肉，总之，孬肉，都卖给工人，臭肉和坏肉，也卖给工人。不久前，听说，奥列霍沃有人把生蛆的腌牛肉倾销给工人。正是“倾销”，别人定购两磅，却给秤三磅，等等。工人们吃亏后，马上就停止买肉，这才算救了自己。已经定了肉的人，就不能不拿。要是买户中有人指摘东西不好，就要被他们痛斥。逢到好的情况，他们只从他手中把东西拿走，一边嚷道：你不要，就不该定。最

好是，工人默不吭声地一走了事，但是也常常发生很坏的情况：他们记上工人的工号，把工人叫到办公室，对他大叫大嚷：造反、暴动、罢工、吃官司、西伯利亚等字眼，雨点似地落在倔强的工人头上。商店经理硬要把某个工人开除出厂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原因不外乎工人不肯拿坏肉，或者偶尔指责他们剥削人太狠了。还须值得注意的是，想买的东西，常常要等很久。弄错账的事，也常常发生，赊买的人拿了八到九个卢布的东西，但却从他的工资中扣掉十二到十五卢布。工人终日忙碌不堪，最后还被人算错账，钱给压着，一直等到下个月。要是不是错五、六个卢布，只错个把卢布，或者五十个戈比，工人总是会挥挥手算了。难道追查错账对他们来说是愉快的吗？现在的合作商店的最大的罪过就在于：它们恰恰违背自己的宗旨，出卖的货物，常常都不是质量好的，而价钱经常比私商还昂贵得多。譬如，上面提到的（布良斯克）商店的某些货物价钱，比私商贵 20%到 25%，而贵 5%到 10%——这是我们这儿的最平常的现象。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商店卖的货物毫不比私人商店便宜，相反的，私人商店的货物还打 2%到 5%的折扣，合作社是不打折扣的。奥列霍沃的消费商店卖肉也比私人铺子贵，而且不登记三等的，这也就是说，大家公认它是二等。对待赊买顾客，到处都很粗暴。凡是衣着讲究、有些地位的人，都能经常享受到优先权……这一切都是崇高的合作思想在我们这里产生的结果。

合作社在外国某些地方对工人有便利有帮助，但是我们这里只要抽打工人的皮鞭子存在一天，各地合作社商店就不会得到工人的同情，就没有工人想从合作社得到的甜果子，这是不足为奇的。因此，达东诺夫之流的先生们便大谈起缺乏同情和意图……还没有完！谈到合作社，我们的西彼金之辈们会说，我们这里是许可建立合作社的，没有反对它们的任何障碍。他们（西彼金之辈）什么勾当都干，甚至阻挡高尚的思想，而且无所不用其极。譬如，不久前，一个宪兵队长说，省长阁下先生乐意批准莱维茨基的劳动组合，甚至很表同情，因此工人们不必害

怕追究。他说，决不追究这件事。斯符雅托波尔克·米尔斯甚也说，“干吗不在那里（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办个什么工人联盟呢？”我们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就轻易地批准工人的联盟？况且，他为人是十分谨慎的……如果说，政府过去小心而又及时地歪曲过合作社的意义，阻挠过高尚的思想，现在则因为感到工人联盟必将到来，而顺着合作社的错误和失败的道路去引导它，从而麻痹合作社的优点，那么我们就险些犯了错误。这些就是他们的虚伪的同情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加倍小心，而且密切注意，及时看透一切情况。这点能否完全办到，很难说。达东诺夫先生结束他的文章时说：“渴求光明和文化的心愿，也的确是从外部进入工厂的。”达东诺夫先生，您有没有考虑到，光明是从军队中进入工厂的吗？是士兵把文化带进工厂的吗？如果说是对的，那么显然达东诺夫先生把飞廉（一种植物，学名 Carduus—译者）当作桑叶了。我来举个例，一个工人，曾经看见过工厂里的“造反”，或者他不是直接目睹者。现在，他要到军队里去服兵役。他离开自己的同志，去当兵了。有一次，这个士兵写信来说：“我没有荒掉我的本行，我们这里像我这样的人，大的有十个”……哎哟，其实简单得很，原来，知识是这么走进士兵的脑袋里去的。应当说明，现在工厂里也有不少人去服兵役。这些人要求寄些书他们，最好抓住机会给他们寄些违禁书籍。让他们瞧瞧我们工人知道些什么。我还要说一件事：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派出的工人，并不比伊凡·福罗洛夫（达东诺夫先生提到的城市）派出的知识分子差。虽然，也许他们不能做诗，或者是一些您所不知道的人。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还有许多有学问的工人，尽管这里还不包括任何不可靠的人。像一所大学把部分“光明和文化”输送到俄国各地去的情况一样，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同它的工人也把“文化的光芒”射到俄罗斯的各个角落去，结果，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和大学有些相似（是等量齐观的）。一个维护工人的工人

1901 年 10 月第 9 期《火星报》副刊

注释：

[9] 列宁第一个指出了巴布石金的文学天才，而且备加赞扬。巴布石金的这篇文章由 H.K.克鲁普斯卡娅写在她的宣传小册子《列宁是党刊的编辑者和组织者》中：

“……符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只想从工人方面得到通讯，他还打算叫工人替《火星报》写文章。按照符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嘱咐，我写信给巴布石金（我们和巴布石金很熟，巴布石金过去在星期日夜校我的那一组念过书，同时参加符拉基米尔主持的那个政治学习小组）：“我们对您有一个要求。您到图书馆里去借《俄国财富》杂志，从去年 12 月份借起。那上面有个叫达东诺夫的人，写了一篇粗暴的文章，评论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他竭力把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描绘成不懂得团结、没有要求、没有志向的人。席斯契林在那上面反驳了达东诺夫。达东诺夫又写了一篇更粗暴的文章，接着《俄国财富》“便宣布中止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您要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如果必要，您可以买几份必需的《俄国财富》，由我们出钱），并就这个问题撰写论文或短文（我本来在信上建议您写“短文’，符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改为“论文或短文——H.K.），您要尽可能收集很多事实材料。很需要刊登在《火星报》（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或者登在《曙光报》上，他希望厚厚的科学杂志上能出现工人的论文）或者《曙光报》上，从一个熟悉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生活的工人立场上来反驳这些荒谬议论（伊里奇把“工人”这个词强调了三遍——H.K.〕。”“这篇反驳文章，巴布石金写好了，集成一本小册子，作为 1901 年 10 月第 9 期《火星报》的副刊登了出来，标题是：“为捍卫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而斗争”，署名：“一个维护工人的工人’。——俄文版编者

[10] 米尔新，俄罗斯诗人 П·Ф·雅克鲍维契（1860——1911 年）的笔名。——译者

[11] И·А·克雷洛夫，1769——1844 年，俄罗斯伟大的寓言作家。——译者。

[12] Ф·М·莱肖特尼柯夫，1841——1871 年，俄国的民主主义者，作家。——译者

斯大林传记，苏联《格拉纳特百科辞典》，转引自《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郑异凡，2017年10月

1879年出生于梯弗里斯省哥里城，是格鲁吉亚人。他的父亲是皮鞋匠，在梯弗里斯的阿杰尔哈诺夫制鞋厂做工，不过按户口登记册，他是梯弗里斯县第地——利洛村的农民。

1893年，斯大林从哥里的一家教会小学毕业，于同年升入梯弗里斯的正教中学。当时，这所中学是梯弗里斯青年中各种解放思想——包括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的温床。因此，校内各种各样的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1897年，斯大林成为校内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领导人。在此期间，他与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的地下组织发生联系，从该组织取得违禁的书刊，并且参加梯弗里斯铁路工厂工人的秘密集会等。

1898年，斯大林正式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梯弗里斯组织。在这期间，他在铁路和工厂地区的工人小组中间进行宣传工作。在正教中学内，对"嫌疑分子"的监视是相当严密的，校方开始怀疑斯大林所搞的秘密工作，于是就以"不可靠"为理由开除了他的学籍。

1899年至1900年，斯大林一直在工人小组中间进行紧张的宣传工作。1900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正式成立，斯大林是该委员会的委员和出色的领导人之一。在这时期，梯弗里斯的工人运动已经开始突破只对工人中的"突出的个别人"进行单纯的宣传工作的老框框。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散发传单，召开飞行集会和举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性示威游行——用这些办法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已为大家普遍注意。在主张采用单纯宣传工作老方法的"老年派"和主张"走上街头"的"青年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斯大林属"青年

派”。应当着重指出：列宁最亲密的战友、第一位在外高加索传播列宁思想的人库尔纳托夫斯基，对于采用新的工作办法而放弃老办法，以及在对斯大林进行革命教育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1900-1901 年间，在梯弗里斯全市掀起的经济罢工浪潮，以及在市中心举行的声势浩大的五一节政治示威游行，使梯弗里斯委员会遭到破坏。1901 年，斯大林的住处被搜查，此后，又得悉暗探局已下达逮捕他的命令，因此，他被迫转入地下。从此以后，斯大林就成了秘密的职业革命家，直至 1917 年二月革命时期为止，始终处于地下，用“大卫”、“柯巴”、“尼日拉泽”、“契日科夫”、“伊凡诺维奇”和“斯大林”等不同的化名进行革命工作。

1901 年底，斯大林转移到巴统，在那里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统委员会，领导了罗特希尔德和曼塔舍夫两个工厂的罢工，并在 1902 年 2 月组织工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性示威游行。1902 年 3 月，斯大林在巴统被捕，在狱中被关押到 1903 年底，然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东部，伊尔库茨克省巴拉干县新乌达村，刑期三年。

1904 年 1 月，在到达流放地一个月以后，斯大林逃跑了，回到梯弗里斯，以外高加索地区组织（当时称为外高加索联盟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进行工作。1904—1905 年间，斯大林在同孟什维克主义进行激烈斗争的旗帜下进行工作。斯大林经常巡视外高加索地区（巴统、恰图拉、库塔伊斯、梯弗里斯、巴库），同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进行口头争论和文字争论。早在 1903 年，斯大林在狱中时，就从参加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同志那里了解到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严重分歧，斯大林坚决地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斯大林从流放地回来以后，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已变得非常激烈时，他是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领袖，领导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机关报《无产阶级斗争报》（1905 年），并积极参加组织布尔什维克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 年的《十月宣

言》发表时，斯大林正在梯弗里斯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口号而进行紧张的斗争。此时，他用格鲁吉亚文字写了一本小册子《略论党内意见分歧》。1905 年底，他作为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出席了在芬兰坦默福斯城召开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彻底地和列宁站在一起了。

1906 年是 1905 年革命被击溃的时期，是选举“新”杜马的时期，也是准备党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时期。布尔什维克主张抵制杜马。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也登上了舞台，他们在梯弗里斯甚嚣尘上。斯大林是反对外高加索形形色色的反无产阶级派别的核心人物。这一时期，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日报《时报》在梯弗里斯出版。斯大林用格鲁吉亚文写的一组长篇论文《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个时期写就的。1906 年斯大林用化名“伊凡诺维奇”作为梯弗里斯组织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

斯大林革命活动的巴库时期是从 1907 年开始的。他在作为梯弗里斯组织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参加党的伦敦代表大会回来以后，就离开梯弗里斯，而在巴库扎下了根，在那里他拼命工作，把巴库的组织团结在党的伦敦代表大会的口号周围。在那里，他领导了秘密的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巴库工人报》，并且顺利地组织了一场斗争，把孟什维克从巴库各工人区（巴拉汉内、比比一爱巴特、黑城、白城）赶走。同时，他领导了一次规模很大的运动：由工人和石油工业家进行协商并签订集体合同，最后使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巴库各级组织内取得了彻底胜利。从此以后，巴库就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

1908 年 3 月，斯大林被捕。在狱中关押八个月之后，他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索里维切哥茨克城，期限三年。几个月后，他从流放地逃回巴库，仍旧做地下工作。

1910 年，斯大林再次被捕。在狱中关押几个月后，又被流放到索里维切哥茨克。

1911 年，他再次从流放地逃跑。这次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他到彼得堡工作。从这时起开始了他革命事业的彼得堡时期。但他在彼得堡没能工作很久，又遭逮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

1911 年末，他再次逃跑，回到彼得堡，在那里领导地下工作。这时（1912 年）他已是党的中央委员，这是在著名的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上缺席当选的。他受党中央的委托，到俄国各重要的地区去巡视，筹备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示威游行，在勒那罢工期间领导《明星报》，并且参加创办《真理报》的领导工作。

1912 年 4 月，斯大林又被捕，关押几个月后，被流放到纳雷姆边疆区，期限四年。同年夏季，他又从流放地逃亡，回到了彼得堡；然后，他到克拉科夫去找列宁。在那里，他参加了于 1912 年末召开的一次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的会议，然后返回彼得堡；在彼得堡，他领导杜马党团中的布尔什维克派，并且领导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明星报》和《真理报》。此时，他写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1913 年春，斯大林再次被捕，几个月后被流放到土鲁汉斯克边疆区。1913—1916 年，斯大林一直在土鲁汉斯克流放地——库列依卡村。

1917 年二月革命后，斯大林返回彼得格勒，以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在布尔什维克的四月全俄代表会议上，当党内出现两派时，斯大林坚决捍卫列宁的立场。代表会议后，1917 年 10 月成立了中央政治局，斯大林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从此以后，他就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准备十月起义的整个过程中，斯大林和列宁完全一致地工作。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期，在民主会议和预备国会时期，在直接组织 1917 年十月起义时期，最后，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争论关于组织“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的时期——总之，在准备和巩固十月革命的所有这些时期内，党内一部分党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动摇有破

坏整个事业危险的情况下，斯大林始终是列宁最亲密的助手和志同道合者。从 7 月示威直到 10 月为止的这个时期内，斯大林是党中央机关报（《工人和士兵报》、《无产者报》、《工人报》、《工人之路报》等）的实际领导人。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中央推选斯大林为“五人小组”（在政治上领导起义）的成员以及“七人小组”（在组织上领导起义）的成员。

从 1917 年起，斯大林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1923 年间，他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19 一 1922 年间，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从 1922 年起，是党中央的书记之一，至今仍任此职。从 1925 年起，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国内战争时期，斯大林大部分时间是在前线。1918 年春夏，他在察里津前线工作，同伏罗希洛夫和米宁一起组织了察里津保卫战，击溃了克拉斯诺夫部队。1918 年末，他同捷尔任斯基一起到彼尔姆区视察第三集团军的战线，全力协助我军停止退却。1919 年春，他在彼得格勒战线工作，组织红军抗击尤登尼奇对彼得格勒的第一次进攻。1919 年夏，斯大林在斯摩棱斯克的西方战线工作，组织抗击波兰的进攻。1919 年后，他在南方战线工作，抵抗邓尼金的军队，一直到把邓尼金击溃、红军占领罗斯托夫和敖德萨为止。1920 年，斯大林在西南战线（反波兰军队的战线）工作，直接领导在日托米尔区突破波兰战线、解放基辅并使我们的军队一直挺进到利沃夫城下的事业。同年，他还参加了保卫乌克兰南部抗击弗兰格尔的工作。1920-1923 年，他是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由于屡建战功而荣获红旗勋章。

斯大林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论列宁和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问题》。

（本人审定的传记）

伊·托夫斯土哈 撰写

姜鸿霄 译